[美] 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著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权—性—钱"三部曲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The Chalice &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剑”是统治、毁灭的隐喻。“圣杯”则象征着神圣和谐秩序的回归，它给予权力而不是剥夺权力，用平等合作取代统治。在此基础上，艾斯勒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统治女人，或女人争取权利超越男权的观念，展示了一种建立新的男女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即以伙伴关系取向的文化取代统治关系取向的文化。

我从来没有如此高度赞扬过一本书……它是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读一读。

——阿什利·蒙塔古

我们这个时代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可以使未来变得可以接受。

——《洛杉矶周报》

上架建议：人类学

ISBN 978-7-5097-0587-2

9 787509 705872 >

ISBN 978-7-5097-0587-2

定价：49.00元

www.ssap.com.cn

"权—性—钱"三部曲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著

程志民/译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The Chalice &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权—性—钱”三部曲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著　　者 /〔美〕理安·艾斯勒
译　　者 / 程志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010）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010）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许春山
责任编辑 / 祝得彬　邹沁芸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010）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37千字
版　　次 /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587-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01-2008-2429号
定　　价 / 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美〕艾斯勒（Eisler，R.）著；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权—性—钱”三部曲）
ISBN 978－7－5097－0587－2

Ⅰ．圣…　Ⅱ．①艾…②程…　Ⅲ．社会人类学　Ⅳ．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256 号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Copyright © 1987 by Riane Eisler

本书根据 HarperCollins 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教授

爱德华·弗里德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

刘　东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陆象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顾问，研究员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人文学院教授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黄　进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权—性—钱”三部曲总序*

非常荣幸看到我的新书《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在中国翻译出版，同时，我过去的两本书《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和《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也一同再版发行。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介绍了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两种可能的基本社会模式。剑代表生杀大权，统治的权力，毁灭的权力。圣杯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给予的权力，养育的权力与启迪的权力。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圣杯代表给予权力而不是剥夺权力，因而更适合伙伴关系取向的文化。

我的第二本书《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集中讨论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透视下的性行为。我最近的作品《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则用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为透镜分析经济学，如副标题所言，倡导创造一种关怀经济学。

尽管我在写这三本书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它们事实上构成了一部三部曲：权力、性和金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三者是推动人类的动机和行动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说到底，我的工作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旨在更好地理解和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事实上我工作的驱动力来自我对包括我的孙儿女在内的所有孩子们的关怀。

我和其他很多人的研究都证明，现代科技和统治关系的社会系统相结合，就会把人类的进化带向死亡的深渊。但同时也证明，我们可以走向一

* 中文版总序前半部分由三本书的作者艾斯勒英文撰写，田海川译；后半部分由三本书的引荐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闵家胤撰写。

个更可持续、更平等、更和平的伙伴关系的世界。若要实现这样一个世界，就要求我们开始超越习惯的社会划分范畴来思维，如宗教的和世俗的、左的和右的、东方的和西方的，以及发达的和欠发达的这样一些划分。同时也要求人们看清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关系、信仰和制度的整体。如爱因斯坦指出的：你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过程中我使用一种叫关系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源于作为论据的事实基础，这种方法看到包括史前史在内的人类历史整体；看到包括男性一半和女性一半的人类整体；看到我们生活的整体不仅包括通常界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还包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我们的家庭和其他私密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分析忽略了作为社会系统核心要素的童年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建构，因而不能提供构建一个更为和平、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所需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伙伴关系系统和统治关系系统研究提供的可能性，受到国际强烈关注的原因。

《圣杯与剑》被人类学家 A. 蒙塔古（Ashley Montagu）说成“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圣杯与剑》已被翻译成 23 种文字出版，不仅有中文，还有韩文、日文、阿拉伯文、犹太文，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神圣的欢爱》同样传布全球。还有我的其他一些作品：《明天的儿童》概述伙伴关系教育的基本内容。《伙伴关系的力量》作为个人、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指南性著作获得了 2003 年的鹦鹉螺图书奖（Nautilus——改变世界图书奖）。我最近的作品《国家的真正财富》被组织管理大师彼得·圣吉（Peter Senge）称为“正所急需”，被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誉为“我们迫切追求的理想与世界的支柱”，被受人爱戴的科学家和活动家 J. 古多尔（Jane Goodall）称为“呼唤行动之作”。

下面这些例子表明，其他一些学者也运用了这种新的伙伴关系系统与统治关系系统的社会范畴。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文化中的圣杯与剑》一书，用历史文献证明史前社会中国文明从伙伴关系模式走向统治关系模式的演变以及当代走向伙伴关系的努力。著名苏美尔学者 S. N. 克雷默（Samuel Noah Kramer）运用这种理论框架完成了他的一部新作《恩基的神话》（*The Myths of Enki*）。在意大利，一种供欧洲知识分子阅读的期刊 *Pluriverso* 致力于研究文化转型问题；在乌迪内大学

(University of Udine)，一直举行这个主题的研讨会。在其最后的著作《女神的文明》中，考古学家马里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运用这种分析理论推进了她自己对史前史的解释。在2008年，玛丽·柯克（Mary Kirk）教授运用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理论构建了她的新作《性别和信息技术：促成共创全球伙伴关系》。加拿大学者B. 格里芬（Brian Griffin）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了他的著作《爱的不同景象：基督教历史中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的价值》中。

很多期刊和文集发表的文章都通过这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潜在的将来。例如我和神经学家D. S. 莱韦恩（Daniel S. Levine）合写的《天性、教养和关照：我们不是基因的囚徒》。我对个人暴力、战事和其他形式群体暴力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引领了大批的出版物，包括《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和《和平世界百科全书》。

我的书也被指定为大学课程读物，学科范围从社会学、心理学、组织发展和政治学到教育学、女性研究以及和平研究。我还有很多关于伙伴关系模式与统治关系模式的演讲稿。

伙伴关系研究中心（CPS）也是由这个概念框架引导研究。例如，《女人、男人和全球生活质量》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在1995年发表。该项研究使用89个国家的数据，不仅证明在衡量生活质量方面仅仅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不够的，而且为采用新的、更可靠的人文指数作衡量标准奠定了统计学基础，进而证明女性地位处于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中心位置。

对伙伴关系系统和统治关系系统的兴趣促成了我受邀到全球各地作讲座。邀请者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要员，如原德国上议院议长里塔·苏斯穆特（Rita Suessmuth）教授、原希腊第一夫人玛格丽塔·帕潘德里欧（Margarita Papandreou）和原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óclav Havel）。还有一些公司也邀请我，如瑞士联合银行、杜邦、微软、迪斯尼、宝洁、摩根斯坦利。我还应邀在有关和平、健康和环境的会议上作主旨演讲。

最近我重返教学工作。加州法学整体研究博士和硕士学位项目以伙伴关系研究为中心转变领导方式。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学生交流受益匪浅。这个有关领导方式的项目旨在激励领导人以革新方式探索前沿问题。由于这个项目是在网上公开的，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帮助未来的领导者理解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的系统动力学，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快乐。

在早些的书里我提出伙伴关系系统的起源在人类的史前史。在后来的著作中，我集中注意当代有伙伴关系构架的文化，不管是像菲律宾的泰杜蕾（Teduray）那样的部落文化、苏门答腊的米南卡包（Minangkabau）那样的农业文化，还是像瑞典、挪威和芬兰那样的工业和后工业文化。

北欧国家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示范的伙伴关系不仅仅更人道，不仅仅使环境更可持续，而且使经济发展更成功。

瑞典、挪威、芬兰的民主文化不存在拥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些国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暴力冲突解决问题的先锋。它们立法禁止在家里体罚孩子。它们开展声势浩大的男人运动，消除统治欲和暴力构成的“男性特征”。它们的社会犯罪率很低，开创和平研究，经常在国际纷争中起调节作用。至于伙伴关系取向的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些国家，女人扮演很重要的领导角色，在立法机构中占据将近40%的席位。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很多传统上被定义为属于女性的特征和行为，诸如带孩子、非暴力和照顾别人，在以上北欧国家都被认为适合于男性。所以，那些被称为“女人的工作”，如照顾病人、照料小孩和老人均得到优厚的财政支持。有充裕的基金用于全民的健康保健、孩子生育补贴、双亲育儿补贴，以及让老人过上体面生活。

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推行关爱经济政策，大量投资于后工业知识经济最重要的资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神经学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很大程度上要看孩子们受到何种程度的关爱。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过去被我们忽略的“妇女和孩子的问题”。

不能忘记，在20世纪初北欧国家是很贫穷的。然而，由于它们的关爱政策，如今它们变得繁荣富强。在联合国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上北欧国家稳居前列，同时也在全球经济论坛竞争力报告上名列前茅。至于教育，国际性考察显示北欧国家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能力测试方面也令人信服地排在最前面。

这种伙伴关系取向的社会并非完美。然而它们生动地证明，由于实行关爱政策，更和平、更可持续和更平等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我们从它们的社会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一条显而易见的道理，那就是，一种文化构建其首要人际关系——女人与男人、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方式，

是信仰和价值的根基，同样也是其所有制度性建构的基础，从家庭到教育，到宗教，最后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不无讽刺的是，仍有人试图把我们推回到过去"美好的时光"，推回到多数男人和所有女人都依照统治关系模式僵化的社会等级给自己定位的时代，而这些人也总是承认基本人际关系对社会的重要性。希特勒在德国、霍梅尼在伊朗、塔利班在阿富汗和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在美国，这些人都鼓吹让女人"回到传统家庭"中的"传统位置"具有优先重要性。这个说词的含义就是回到权威主义家庭中去，女人处于服从地位，而孩子知道质疑家长是要被痛打一顿的。

绝非巧合，那些参与"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正是来自那种妇女和儿童屈服于恐吓和压迫的文化。同样并非巧合的是，美国的基督教右翼势力最初组成一个强力政治社团也是围绕着"妇女问题"——挫败提议中的美国宪法"平权修正案"。

然而，许多致力于平等与和平的人，依然把"女性权利"和"儿童权利"视为次要问题。他们无视联合国的报告所讲的事实：对女性和儿童施加的暴力依然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普遍存在的人权暴力问题，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依然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基本的模式，与此模式相应的是男性的优越感和女性的低劣感，而这又在不同的宗族、宗教和种族中代代相传。

我们首先要改变家庭成员之间暴力和不平等的固有模式。当孩子亲身感受暴力，或者眼睁睁看着暴力施加于他们的母亲时，他们学会了一个人通过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他们会把这种做法沿用到私密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去。如果孩子们生长的家庭中女人服务而男人被服务——就像世界很多地区那样，女人得到较少的食物和健康关爱——他们就学会了接受生活中所有领域的经济上的不公正。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全面的政治议程，对幼年时期和两性关系给予特殊的关注。然后我们才会有更平等、更和平以及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础。

为了让子孙后代学会按伙伴关系方式生活和相爱，我们现在就需要打下基础。我们有义务为我们的子孙这样做。对今人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作为艾斯勒这三本书的引荐人和中文版的主要组织者，作为中国伙伴

关系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我愿接下来就这三本书的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

艾斯勒着手这个主题的研究和这三本书的创作起始于 1976 年，触媒是在此之前欧洲考古工作中的爆炸性新发现——挖掘出了许多属于欧洲史前史的文明遗址，特别是地中海靠近希腊半岛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从而使深埋于地下无文字记载的欧洲母系社会文明重见天日。

现行的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教科书，都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 3000 年的古埃及，随后是公元前 2500 年中东的苏美尔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至于欧洲本土文明，则说成是后来从外面输入的，不但比上述几种文明晚得多，而且比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也晚得多。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东南欧出土的母系社会文明遗址则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 3 万年欧洲本土居民就进入了旧石器时代，公元前 1 万年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从公元前 7000 ~ 前 3500 年古代欧洲早期文明遍及欧洲东南部。那些地方已经进入农业文明，有定居的村落；建筑业发达，甚至建有两层的神殿；崇尚艺术，制陶业兴盛，留下了许多彩陶小雕像和壁画。从出土的米诺斯文明看，当时的克里特岛上有“宏伟的宫殿、别墅、农场、港口设施、贯穿全岛的公路网、教堂和秩序井然的墓地”；还有“高架桥、碎石路、瞭望塔、路边凉亭、水管、人造喷泉和水库”；有四种笔迹的文字，后期已使用青铜器；居民的生活是相当“现代化”的：“所有城市中心都有完备的污水排放系统、卫生设施和家庭厕所。”大量的壁画、雕像、花瓶、雕刻品体现出活泼快乐的艺术风格。总之，人类后世文明的基本要素都进化出来了，其农业和水利之进步、建筑和手工业技术之高超、艺术和宗教之发达，使“考古学家们被惊得目瞪口呆”，而这一切都是在被称为母系社会的史前社会里进化出来的。

最令人惊奇的是，建筑遗址和艺术品反映出了对女性、母亲和女神的崇拜。例如，在旧石器遗址发现的摆成阴道形状的玛瑙、贝壳和红赭石，以及到处都有的裸体维纳斯小雕像，它们反映出的是原始人的一个重要观念：女性的身体是生命之源，是赋予生命的圣杯。到新石器时代，上述观念已经进化成女神崇拜文化和宗教。出土的大量石雕、浮雕和泥塑女神雕像，说明那时供奉的都是女神，“上帝是一位女性”，而主事的女祭司和女首领则是世俗权力和智慧的最高代表。

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没有发现战争的遗迹，没有发掘出武器贮藏

室和军事防御工事；艺术作品中没有武士形象，没有战争场面，甚至没有狩猎的场面；还有就是没有首领的陵墓和殉葬者的遗骨。这说明，尽管那时的首领都是女性，并以母系追溯血统和继承财产，但是没有类似后世“父权”那样的“女权”和女性君王。女神的手臂高举圣杯，它象征母亲的责任、关怀和爱。当时妇女并不君临和欺压男子，相反，两性维持着平等、依靠和合作的伙伴关系。人与大自然也维持着和谐的伙伴关系。

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这段时间里，这种男女平权和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和相应的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由男性祭司和武士统率的好战的游牧民族三次大规模南下，以手中的剑击碎了圣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珠、黄头发的印欧人种，其实并不是欧洲大陆的本土种族，而是入侵者的后裔。入侵东欧的叫库尔干人，入侵希腊半岛的叫阿哈伊亚人和多利安人，入侵小亚细亚半岛的叫赫梯人和米塔尼人，一直打到印度的叫雅利安人，打到迦南（巴勒斯坦）的则是属于闪米特的希伯来人，后称犹太人，建古以色列国。

这些男性武士率领的具有统治关系等级结构的强大骑兵，对女性伙伴关系和平、繁荣的农业社会的扫荡，可以恰当地用“剑击碎了圣杯”来比喻。等这两千年的战乱结束之后，世界已然变得面目全非。高举圣杯的女神雕像消失了，代替她们的是手握利剑的威严的男性神祇，女神都降低成了男神的妻妾或姘妇。在现实社会，身强力壮的、感觉迟钝的、粗野的男人占据着社会等级结构的各个统治者位置，他们把游牧民族军队中统治关系的等级结构系统（hierarchical system）放大成了具有固定等级结构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男性统治者都享有特权——统治、压迫、争斗、掠夺、破坏和享受。从最早的父系文明遗址出土文物来看，一夫多妻、奴隶、君王陵墓和殉葬出现了，男神雕像、武士陶俑、防御工事、兵器仓库随处可见。最精良的技术是用金属制造武器的技术，最发达的行业是兵器制造业。历史成了单一的男性统治的历史和他们征战讨伐的记录；艺术品不是对战争的颂歌，就是对血腥场面的描绘。

这以后才开始了以往世界史教科书中讲的西方文明的起源，以及作为西方文明主根之一的《圣经》里讲的“上帝造人”的故事。

被西方世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奉为最高神圣经典和律法的《圣经》，特别是前半部《旧约》，实际上是确立了人类的男性一半对女性一半的压制性统治之后，由希伯来教士对古代神话、历史故事和宗教律法

进行七拼八凑改写成的。这一重新创造男性神祇、制造男性统治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假象的工作持续了上千年。

我们在《圣经·旧约》里读到的唯一的、全能的、最高的神是一个男人——上帝耶和华。他其实是从闪米特人好战、残忍和容易震怒的战神耶和华演变来的。他现在成了全知全能的父、降灾赐福的君、世界的唯一主宰。他单人只手创造了世界，用泥土造出了人类始祖亚当；因为觉得他太孤单，才取他身上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夏娃不听从上帝耶和华的戒令，受蛇的蛊惑偷吃了伊甸园善恶树上的智慧果，又送给亚当吃，造成始祖犯罪，双双被放逐到地上。这样一来，女人从一开始就低男人一等，成了男人的附属品；而且，罪孽更深重，永远要受男人管制；怀胎生育，多受苦楚。在《圣经·旧约》接下来的几百页里，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父亲和丈夫把自己的女儿或妻妾交给男性匪徒去强奸、毒打和杀害是合法和合道德的故事。上帝耶和华不但没有任何的愤怒或谴责，有时反而对这样的男人给予特别的保佑！可见《圣经》在树立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的权威方面做得多么露骨，走得多么远。

在艾斯勒的第一本书《圣杯与剑》里，作者把欧洲历史上以“剑”为象征、以男性统治和女性被压迫为特征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取代史前无文字记载的以“圣杯”为象征、以女性和男性平等参与为特征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的巨变过程，称为“女性历史性的败北”、“文化转型”、“文明的改道”和“西方文明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五千年的弯路”，又申言在西方文化中，“女性因素”和“女性气质”、“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作为西方社会系统和文化中潜在的一种吸引子，它同另一种显在的吸引子——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吸引子，有五千年消长争斗的历史。

她接着分析在《圣经》后半部《新约》里，耶稣体现的非暴力女性气质和男女伙伴关系精神。在古希腊文化中，从某些女神和女祭司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依然有很强的男女伙伴关系的因素；而罗马文化采用的则是典型的男性统治、嗜血尚武的社会模式。在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里，政教合一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非常强固，男人憎恶女人，迫害女巫，消灭异端，妇女只是男人的性工具和生育机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重新唤醒了古希腊文化中和耶稣身上的女性精神。近代随着科技进步、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共和国代替了君主国，世俗学校代

替了教会学校，双亲家庭代替了宗法制大家庭，女性主义运动一直在向前推进。在欧美民主国家内，妇女赢得了恋爱婚姻自由、教育和工作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经历了性解放。

但是，艾斯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强调个人私欲，激烈竞争，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所以具有等级制的阶级结构，以及继续用暴力进行征服和扩张的倾向；由于男性继续在地位、财产和家庭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它仍然是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更有追随叔本华、尼采这种极端的男性统治论思想家的新法西斯分子，他们甚至贬斥《圣经·旧约》代表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完全不是男性统治的，因为里面有许多“女人气”的“奴隶道德”。他们鼓吹恢复古代库尔干人、雅利安人的尚武传统，实现纯种雅利安人男性精英统治世界的美梦。即使在美国这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新右派，他们公开反对妇女享有合法的生育自由和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苏联，虽然在早期曾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提倡男女平等，但在斯大林统治之下，仍然退回到依靠大规模暴力镇压的专制主义，并且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则有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者通过恢复妇女戴面纱的传统，实行性隔离的法律，禁绝言论和出版自由，处死异端和发动圣战，迫使妇女回到传统的服从位置。由此可见，新的文化转型远未完成。

艾斯勒认为，目前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诸如军备竞赛、战争威胁、恐怖主义、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都同这场新的文化转型尚未完成相关。因为这种男性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总是推崇“剑”的力量，总是依靠压制、暴力、战争和破坏来维持，把女人当做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并对大自然进行贪婪的掠夺和摧毁性的破坏。所以，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有待这场新的文化转型的完成和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的消亡。当世界系统进入再也无法逆转的突变分叉点之后，它将面临多条进化轨线的选择。最佳选择不是建立男性统治关系的极权的等级结构社会模式，而是向史前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复归，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都应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是全人类的一次新的文化转型的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艾斯勒创作这三本书，其初衷就是要促进全人类的意识进化和文化转型，实际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创作出版第一本书《圣杯与剑》之后，艾斯勒打算切换主题，写一本后来出版时名为《开创自由》的书。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和做阅读笔记

时，艾斯勒发现，为其中的一章“从混沌（Chaos）到爱神（Eros）：统治者式的性关系还是伙伴式的性关系”搜集的材料越来越多，最后竟装满了十几个箱子！这是她能够找到的关于“性”的全部资料。在读完所有这些资料之后，艾斯勒说：“最终，我对灵与性乃至痛苦与快乐的看法完全变了。”于是，她停下来写了第二本书《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

在这本书里，这位新文艺复兴式的女学者以她的实证精神和雄辩口才，用她搜集到的全部性学资料为人类的另一半辩护，翻五千年来妇女在性的问题上被统治、被蒙蔽、被压抑、被扭曲、被买卖、被玩弄、被戕害致死的冤案，论证人类超出动物的非生育目的的性欲、性爱和爱情不是肉体的、低贱的、肮脏的和痛苦的，而是精神的、高贵的、纯洁的和快乐的。因为性的本义不是毁灭生命，而是创造生命；不是制造痛苦，而是带来欢乐。只要破除男性在性事上对女性的统治关系模式，重建男女平等的伙伴关系模式，妇女就能同男人一样公开地、大胆地、全身心地投入和享受性爱带来的激情和神圣的欢乐。

本书副题“女性肉体的政治学”的含义是这样的：“政治学是对权力的解释：谁拥有权力、如何定义权力、如何行使权力。”至今“世界大多数地方在意识形态上，在法律和经济上，仍然固守传统观念：权力应当由男人来掌握，选择应当由男人来作，女人的肉体应当由男人来控制”。艾斯勒写这本书，就是要从古至今地、全面地、彻底地考察这件事，为女性重新争得她们本应拥有的对自己的肉体、性欲、性爱和性事快乐的权力。所以她才说：“过去30年发生的性革命，不是男子性行为的革命，而是女子性行为的革命。”

艾斯勒进而论证，人类两性的性—肉体关系同他们的家庭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同构的，性学是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完成性—肉体关系上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复归，才能进而实现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文化转型式的进化。

这样，在我看来，在有意无意之间，艾斯勒找到了要真正完成当代文化转型应当选择的起点——从两性性关系、家庭内部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以及父母同孩子的关系做起；并且，认识到了就身体力行。她多年前就同丈夫戴维·洛耶一起创办了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

用多种方式——包括在电视台举办节目——培训年轻父母和儿童按伙伴关系方式生活。他们还出版了多种伙伴关系培训教材，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于使"伙伴关系"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并被广泛采用。

那么，要真正完成当代文化转型的终点应当在哪儿呢？回答是"在经济"，因为经济是社会生活最主要的部分。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至今仍然是男性占据统治地位，女性处在从属地位；女性贡献最多，而收入最少。

正如在《圣杯与剑》一书中艾斯勒引用联合国《1985年世界妇女状况》指出的那样：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完成按小时计算的全世界工作量的2/3,工资收入却只相当于男人的1/10，占有的财产只有男人的1/100；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承担大部分农业劳动，还要伺候丈夫和老人，带孩子和做饭，但最后一个上饭桌吃饭，因而她们55%都有营养性贫血症。

此外，艾斯勒还看到，尽管有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强大生产能力，可是这种能力一方面在生产巨富，而另一方面又在生产饥饿、赤贫和暴力，生产残暴、冷酷和毁灭。当前的经济体系正在掠夺和削弱我们美丽的地球。她认为，现有的经济体系、经济行为和经济规章中有根本性的谬误，那就是不能恰当地评价最重要的人类劳动，即关怀我们自身、关怀他人、关怀大地母亲的人类劳动。为此，她创作了第三本书《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

艾斯勒把书名定为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国家的真正财富》），从字面上看，当然是在比照亚当·斯密开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名著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现简译《国富论》，严复初译《原富》）。尽管她在引言中讲，自己不是要写一本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全面的专业性很强的经济学专著——这也是实情——可是实际上艾斯勒这本书是在批评传统经济学的狭隘，拓展经济学的眼界，改变传统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传统经济学关注的中心是市场，或者说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本书则超越市场，以更开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经济学，包括家庭、社区和自然界的种种维护和支援生命的活动。艾斯勒说，农业社会，真正的国家财富是土地；工业社会，真正的国家财富是机器；后工业社会，真正的国家财富是人和自然环境，最宝贵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她倡导的"关怀经济学"就是包括关怀人的经济活动和关怀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的

经济学。

在旧经济模式中，旧经济图一直把社会的基础经济部门——家庭经济、无报酬社区经济和自然经济全都剔除，这导致了观点和政策的扭曲。当代社会的新经济图，应当包括六大经济部门：第一部门是家庭经济，第二部门是无报酬社区经济，第三部门是市场经济，第四部门是非法经济，第五部门是政府经济，第六部门是自然经济。在本书中，艾斯勒详细论证了重视关怀和给予关怀的文化观念和伙伴关系经济体制，制定了关怀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规章、措施和量化技术，并专辟一章制定家庭、社区和大自然维护生命活动的新经济指标。

在本书中，艾斯勒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经济指标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把 GDP（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外国投资的产值）或 GNP（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到国外投资的产值）作为主要经济指标，而这两个经济指标都不包括家庭、社区和社会对人的关怀活动的产值，都不考虑经济活动直接地对自然环境以及间接地对人的生活质量造成的负产值。今天，全世界 100 个最大经济体中的 51 个是公司而不是国家，而这些公司仅仅是一种赚钱机器，不关心任何别的事，包括不关心人与自然。艾斯勒在这本书中主张用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取代诸如 GDP 和 GNP 这样的经济指标，以便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幸福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艾斯勒特别赞赏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北欧国家，他们已经注重投资于关怀性政策和计划。通过普遍医疗、灵活安排上班时间、父母带薪休假、育儿津贴等政策，使妇女和男子都能平衡家庭内外的工作，并使更多男子有机会接近孩子和做家务。这些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还提出把自然更多地商品化。例如，把水、森林、能源甚至大气都转变成“全球公共货品”，建立更有效地使用和保护这些“全球公共货品”的经济指标、规章和措施。可以说，在进化出关怀经济方面，北欧国家走在了前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范例。

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取代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我们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都看到了可喜的进展。后工业—信息社会是网络社会，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就意味着伙伴关系结构取代统治关系结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网络结构（如地球生态系统）连一个中心点都没有，当然就更没有操控一切

的统治中心，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通观全球，20世纪末，两极世界跨塌成单极世界。21世纪初，随着美国在多方面逐渐衰落，“金砖四国”崛起，多个地区性国家集体兴起，单极世界正在走向多极世界，人类社会结构趋向扁平化。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都签订协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公司层次上，“共生关系”和“双赢”概念被普遍采用就是“伙伴关系”在生根开花。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严格捆绑的男性家长——对偶婚——双亲家庭在减少，在同居、非婚生育、独身、丁克家庭、高离婚率、单亲家庭这些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不断增长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合理的推进——男女伙伴关系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仅仅是学习伙伴、恋爱伙伴、性生活伙伴、创业伙伴、生儿育女伙伴和养老伙伴，而不是传统家庭模式中终生捆绑在一起的男人统治女人的固定角色。这样看来，艾斯勒这三本书似乎真的昭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写到这里，从国外传来喜讯，理安·艾斯勒在2008年被世界权威机构评选为20世纪对人类最有影响的20位思想家之一，而且早在2006年美国就为艾斯勒拍摄了一部传记影片，为此曾派了一个小组到我家对我进行采访和拍摄；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对艾斯勒的思想及其对人类的积极影响都是承认的。

在第一本书《圣杯与剑》的中文版出版之后，1995年我曾组织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作对比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艾斯勒本人大力支持下，17位中国哲学、考古、民俗、历史、社会学、妇女史学者，11位汉—英译者共同努力，在10个月内完成并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出版了 *The Chalice & The Blade in Chinese Culture—Gender Relation and Social Models*（《中国文化中的圣杯与剑——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其中文版书名为《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此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向其时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图书，很快传遍全球；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在这本书中，我们利用近年的考古发现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历史中，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有着同艾斯勒书中发现的相似的进化和转型的轨迹，但是也有不尽相同之处。例如，经历两千多年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统治和阴柔性很强的儒道释三教的教化，中国的男性，特别是男性知识分子，有女性化的病态；中国社会则有阴盛阳衰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在读过艾斯勒这三本书之后，不妨对

照读一读我们的那本书。

最后，我相信，将艾斯勒的这三本书作为“权—性—钱”三部曲在中国同时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这三本书视野广阔，思想深刻，资料丰富，论证雄辩。从考古发现开始，展开广阔的历史画卷和当代社会三个方面的场景，揭露了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存在的不合理的现实——男性在权力、性和金钱三方面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仍然普遍存在着男性在这三个方面蒙骗、欺压和无视女性的情况，还对印欧文化传统、基督教教义和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然而其着眼则在未来——只有整个人类社会完成文化转型和社会模式的变革，才能最后完成妇女解放和重建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因而这三本书对我们参与解决全球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事文化创新，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和培养下一代，都有着重要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艾斯勒这三本书将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提升了高度，提出了新的任务，因而必将引起人们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新认识。同中国革命运动紧密相伴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即使是对中国最抱偏见的国外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解放了中国妇女”，或者如我们自己经常说的“中国妇女翻身得解放”。那么，中国妇女是不是已经彻底翻身获得解放了呢？换句话说，是不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完全完成并且没有事情可做了呢？做妇女问题研究的学者，做妇联工作的同志，不妨把艾斯勒这三本书好好读一读，再对照中国的现实情况想一想，一定会有新的看法。

在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让我同艾斯勒一起，对多年来关心和支持这三本书的出版，先后参与翻译、校改、审校和编辑的全体同仁表示感谢！他们是：沈恒炎、陆象淦、程志民、冯韵文、俞天民、罗琳；谢寿光、祝得彬、黄觉、黄棣光、杨富斌、高铦。

理安·艾斯勒　闵家胤

2008 年 9 月 17 日

中文版前言

长期以来，我和许多西方人士一样，非常喜爱中国文化。我读过许多强调东西文化差别的著作。但是，15 年来，我在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东西方文化之间不仅有差别，而且还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这里所说的相似之处，不仅指世界各地无论男女都有的许多共同的需要、问题、希望和理想，更是指某种更本质的东西。因为事实证明，东西方可能有着相似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可能有相似的史前史。在当时以农业为中心的古代社会里，东西方都有过一种没有暴力、更富于人道精神的、生态上更平衡的社会组织形式。

本书主要讲的是西方文明的史前史。它深入地研究了被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称为“给考古学带来了名副其实的革命”的那些出土文物，因此阐明了关于西方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流行信念。但是，《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不仅对我们的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认为，我们的未来要向一种伙伴关系的，而不是现有的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发展。

本书前几章所讨论的那些考古学发现，赋予早期西方文明太平盛世的传说——即战争和“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出现之前的时代——一种新的、更为具体的意义。回顾我所读过的有关中国神话和考古学方面的著作，我同样坚信，在亚洲的史前时代，很可能也有过类似西方的发展过程。

在本书中我所阐明的史实证明，西方史前新石器（或第一个农业）社会是非常和平的。但是，也有迹象表明，早期中国农业社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举世闻名的位于西安东边的半坡村遗址，考古学家把它描绘

成一个和平的社会，也是一个妇女并不受男人奴役的社会。

我们还知道，在西方新石器时代的数千年历史中，人们所敬奉的是伟大女神。在有史时代的神祇中，例如，希腊的盖娅和罗马的伟大母亲，以及甚至在众所周知的现代术语——自然之母中，人们仍然保存着对伟大女神的敬奉。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女神的崇拜也是源远流长的。在有些地方，甚至直到今天，观音和妈祖仍被供奉为赐给人类生命的慈悲女神。

上述这些事实证明，在一些男人以暴力手段迫使妇女和其他男人就范被视为是“正常情况”之前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某些众所周知的中国道教著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些道教著作向封建等级制度（包括男人统治妇女这种现象）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老子的著作，强调了对阴阳平衡的基本需要，就是说，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我们很难准确地推测是否有其他史前资料足以证明，在“古代中国”（与加州大学考古学家马里亚·金布塔斯所说的“古代欧洲”相对应）也可能有过一个伙伴关系的时代。我同样怀疑，即使有这种资料，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女性特征”在许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特征体现在很强的审美敏感性以及对社会、亲缘关系和孝顺的极端重视上。根据西方文化传统，这些都是“女性特征”的体现。

当然，在这篇简短的前言中，不可能以本书所提出的作为研究工具的伙伴和统治关系这两种社会模式，对东西文化进化中的这些表面的相似之处进行任何更深入的探讨。但是，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固有的伙伴关系传统和后来发展的统治模式之间的斗争从未中断。实际上，也许中国早期传统是伙伴关系的，后来逐渐融入了另一种社会模式，结果形成了在西方经常所说的亚洲文化的“矛盾”。

当然，这只不过是推测，如果想要予以证明，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但是，恐怕只有中国的学者——考古学家、民俗学家、宗教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妇女史学者——才能真正做到这点。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本书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西方文化的新观点。

许多人认为《圣杯与剑》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们看到西方文明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本书问世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出现了许多反映本书所提出的新观念的书籍、艺术品，甚至歌剧和电视节目。本书除译成中文外，还有日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10种语言的译本。更重要的是，本书也有助于各界妇女和男人——不只为我们这一代人，也为今后的世世代代——进行新的有意义的选择。

本书所肯定的是许多人已经了解的事情，但也是那些竭力维护统治地位的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所企图否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类是有选择自由的，而且可供我们选择的一条道路是：实现一种更加和谐、更加和睦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女性”价值以及妇女在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结构中不再被贬为低人一等。

本书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并不是要让妇女反对男人，或是让男人反对妇女，而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组织。因为很明显，男人和女人都能有“女性”行为，例如，非暴力、关心别人的同情感，或者都有“男性”行为，如暴力和战争。

此外，我们所说的伙伴形式的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种完全无组织的社会，或是一种完全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权力并不是用来统治别人的社会，是一种等级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一种并不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包括打骂妻子儿女或进行战争）来强行贯彻等级制的社会。

换言之，主要适应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社会，和主要适应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看法截然不同。在统治关系的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以剑作为标志，即以统治、杀戮和毁灭的权力为标志；而在伙伴关系的社会中，支配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者的权力，这种权力亘古以来就是以圣杯为标志的，它的特征是给予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是以权力促进别人的发展，而不是以权力压迫别人。

总之，本书所阐述的问题不仅和妇女有关，而且和男人有关，尤其和全人类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所作的共同努力休戚相关。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是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是靠空话才深刻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大国和小国、大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最后，我们同样也必然会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东西方文化中的伙伴关系的传统，才能在这个日益受到核灾难或生态灾难威胁的世界里稳步发展这种相当重要的联系。

我希望本书的主张会在中国引起共鸣，就像在西方一样，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我将此书的中文版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和西方人士一道，将这个因为高科技的滥用而受到威胁的世界，引上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稳定、更和谐、更具伙伴精神的航程。

理安·艾斯勒

1991 年 5 月

译者的话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理安·艾斯勒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也是国际知名的文化史家、未来学家和女权主义学者。

艾斯勒女士生于维也纳，6岁时她的一家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乘船逃往古巴。在哈瓦那一个小小的公寓中，艾斯勒度过了她的童年。她14岁时移民到美国，后来在加州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并在该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艾斯勒一直从事研究、写作、教学和社团组织工作。她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洛杉矶圣心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而且是进化研究小组的成员。她是妇女儿童人权立法的先驱，创建了一些重要的组织，包括洛杉矶妇女中心法律组织（该组织是美国同类组织的前驱）以及伙伴关系研究中心。她较早期的著作，包括《解体》（1977）和《平等权手册》（1978）均饮誉全球，受到广泛的好评。她的文章曾刊登在很多重要刊物上，包括《世界和平百科全书》、《行为科学》、《未来学》、《政治心理学》等。艾斯勒很有口才，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她曾在各大学（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各大公司（如杜邦、迪斯尼）和许多世界性会议上，发表讲演。

艾斯勒是第一位以整体论的观点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她对社会和科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常被誉为现代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艾斯勒的《圣杯与剑》一书自1987年出版以来，受到广泛的好评。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认为本书是“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洛杉矶周报》称之为“我们时代出版的最重

要的著作”；《旧金山新闻》认为该书是一幅关于我们的“美好未来的蓝图”；社会活动家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称之为“我们生存的一把钥匙”。

该书自出版以来在美国已再版15次之多，并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出版，包括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腊文、芬兰文和葡萄牙文等。许多大学把该书作为教科书使用。它不仅对哲学、社会学、西方历史、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还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影响，促成了世界范围的伙伴关系研究中心的建立，甚至被治疗学家作为治疗疾病的催化剂，广泛向病人推荐以加速其康复。

《圣杯与剑》一书首先提出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全世界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剥削？为什么人类这么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这么野蛮而不是仁慈，为什么这么好战而不爱好和平，为什么要破坏而不是建设？有人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样的前提：人类互相之间是死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天生的，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别注定了妇女的屈从地位。艾斯勒认为，这些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并不是天生互相仇恨和互相压迫的，妇女并不是天生低于男人的，致命的竞争并不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圣杯与剑》一书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根据，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可能的美好未来。

艾斯勒指出，15000年前的人类历史证明，那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中，那时妇女并不是一个受压迫的等级，社会也没有富人高高在上、穷人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相反，艾斯勒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没有竞争的社会里发展了所有现代的基本工具和技术，例如，农业、冶金业、建筑业、城市规划、文字、纺织和卫生设施。那时的人们并不敬奉残忍的上帝，而是崇拜伟大的女神，她象征着生殖、生命、丰裕和大地的繁荣。

艾斯勒借助于许多考古学家的著作详尽地追溯了西方史前文明的进化。她的叙述也许并不完美，但是，她指出，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野蛮人的入侵浪潮连续不断地横扫了欧洲和地中海周围的中东地区，毁灭了青铜器时代高度发展的文明，包括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古代世界已经完全面目皆非了。奴役、战争、男性的暴力统治、

恐怖的宗教和为了毁灭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取代了从前和谐的、崇拜女神的、高度发展的文化。

通过上述论述，艾斯勒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因为几千年以前，社会是沿着伙伴关系的路线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剥削和压迫的等级关系。作为生命的给予者的妇女和女祭司受到普遍尊敬，而这并不是说当时是性平等主义的。但是，来自文明世界边缘地区的蛮族——库尔干人带来了靠暴力和暴力恐吓维持的等级制度统治的社会组织模式。这一过程持续了几千年，最后终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男性统治。艾斯勒称这一过程是“5000年的统治者弯路”。这一弯路完全改变了我们文化进化的方向，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还受其制约。

艾斯勒认为，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式并不是铁板一块。伙伴关系的社会并不是无组织的、无领导的社会；统治关系的社会也并不是绝对金字塔统治等级的社会。人类历史过程是由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模式之间的紧张斗争形成的。在某些历史时期，例如，大约在耶稣和文艺复兴时期，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倾向处于上升时期；在另一些历史时期，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倾向占据统治地位，例如，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中。

但是，这里自然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放弃它的史前伊甸园生活而陷入蛮族入侵者的手中呢？其次，现代社会能够按照伙伴关系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吗？

为了回答这两个有关文化转化理论的问题，艾斯勒借用了目前流行的系统论和广义进化论的概念构架。她用这些概念解释了社会这种大系统从伙伴关系的模式向统治关系的模式的转化。与强调现状的、线性的和静态的模式的旧科学相比，新理论假设系统是自由组织的、互相联系的、互相增强的和互相复制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系统可能被打乱，以致系统的行为变得无法预测出来。偶然性日益增加，直到系统达到科学家所谓的“基本分叉点”，在这个分叉点上，系统本身转化成某种完全不同的系统。

艾斯勒认为，几千年以前，人类社会从伙伴关系的社会转化为统治关系的社会，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这种基本分叉点。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分界点。我们或者毁灭自己，或者改变我们的观念。许多人

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但是，只有更多的人，或者说，全人类都改变他们的观念，人类社会重新向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的大规模转化才是可能的。艾斯勒坚信，这种转化是可能的，因为它以前曾经发生过。人类社会将来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伙伴关系的新社会，当然，这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

最后，艾斯勒阐述伙伴关系的新社会的三个主题：和平、伙伴关系和创造性。她指出，在这三个主题中，创造性是最重要的。这种创造性并不是单纯的发明，而是文艺复兴和印象主义的艺术家的那种创造性，他们根据他们的天性、快感、他们所使用的色彩以及和大自然的直接联系所发挥出来的那种创造性。

艾斯勒认为，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更多的人去探索、去研究，才有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

《圣杯与剑》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著作。首先，它的书名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圣杯，在古代欧洲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人类的生命之门，它创造和孕育着生命，我们正是从它那里吮吸生命之水；而剑，在印欧地区，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暴力、杀戮和抢劫的象征，它毁灭和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它面前战栗发抖。艾斯勒认为，圣杯是人类社会伙伴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而剑则是统治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因此，她从一种崭新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这种观点是：关于人类文化的双稳态的动力理论。她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互相竞争的吸引子：伙伴关系（或男女合作）的模式和统治关系（男性中心）的模式。她用大量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历史上男女合作的文化主要是爱好和平的，而男性中心文化的特征则是战争，因此，它们可以分别以圣杯和剑来象征。

其次，《圣杯与剑》一书也是大胆地用广义进化论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开创性的著作。从非线性动力学的观点（包括灾变论、分叉论和混沌理论）来看，该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历史理论的源泉，这种理论的基础是综合动力学的概念。它扩充了索罗金、汤因比和其他社会学家所阐述的早期的那种简单的模式，它强调社会转化（或分叉），而不是周期性出现的平衡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学特点。它还进一步发展了托姆、泽曼、波斯敦和雷福洛关于历史发展的灾变模式的理论，它不仅为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为调节文化进化提供了基础。

当然，艾斯勒把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所取得的

成果是否正确，还是值得争论的。但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而批判其错误的观点。

我的学兄闵家胤和艾斯勒女士很熟，正是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并且联系了出版社。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将本书全部译完，在翻译的过程中，闵家胤先生和俞天民先生通读了全书，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本书责任编辑罗琳女士为本书的可读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所提出的大量修改意见，译者尽可能都加以采纳了。

本书中文版前言、导论是在俞天民先生和朱枚女士译稿的基础上重新译过的。

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文虽然下了工夫，但不当之处，甚至错误一定还有，尚希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程志民

1991 年 11 月 2 日

目　录

"权一性一钱"三部曲总序 …… 1

中文版前言 …… 1

译者的话 …… 1

导　论　圣杯与剑 …… 1

人类的可能性：两种选择 …… 3

进化的十字路口 …… 6

混沌或转化 …… 10

第一章　漫游逝去的世界：文明的开端 …… 15

旧石器时代 …… 16

新石器时代 …… 22

古代欧洲 …… 27

第二章　来自过去的信息：女神的世界 …… 31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 …… 32

女神崇拜 …… 36

新石器时代如果不是父权制，那么必定是母权制 …… 40

第三章　基本的差别：克里特岛 …… 46

考古学上的爆炸性事件 …… 47

对生命和自然的爱 …… 49

一种独特的文明 …… 52
视而不见 …… 56

第四章　混沌中产生的黑暗秩序：从圣杯到剑 …… 60
来自边陲的入侵者 …… 61
冶金术和男性统治 …… 63
文化进化中的转向 …… 65
战争、奴隶和祭品 …… 67
文明的断裂 …… 70
克里特的毁灭 …… 72
一个崩溃了的世界 …… 75

第五章　对逝去的时代的回忆：女神的遗产 …… 78
进化与转化 …… 78
一个黄金种族和关于阿特兰提斯的传说 …… 80
伊甸园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 83
文明的礼物 …… 86
关于过去的一种新观点 …… 94

第六章　颠倒了的现实：第1部分 …… 99
弑母不是犯罪 …… 99
统治者和伙伴精神 …… 102
神话的变质 …… 106

第七章　颠倒了的现实：第2部分 …… 113
文明的改道 …… 113
女神的消失 …… 116
性与经济 …… 120
统治者的道德 …… 123
知识邪恶，生育肮脏，死亡圣洁 …… 125

第八章 历史的另一半：第1部分 …… 129
我们的隐藏的遗产 …… 131
自然的循环统一和宇宙的和谐 …… 134
古代希腊 …… 138
男性统治的是与非 …… 143

第九章 历史的另一半：第2部分 …… 146
耶稣和男女合作论 …… 147
被禁止的圣典 …… 150
男女合作的异端 …… 155
钟摆向回摆动 …… 157

第十章 过去的模式：男女合作论和历史 …… 162
“女性”是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 164
历史本身的重复 …… 170
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 177
女性的精神气质 …… 180
界线的终点 …… 183

第十一章 自由的丧失：未完成的转化 …… 186
理性的败北 …… 187
对男性中心论前提的挑战 …… 189
世俗的意识形态 …… 192
人类关系的统治者模式 …… 196
前进还是倒退？ …… 199

第十二章 进化的中断：统治者的未来 …… 204
难以解决的问题 …… 205
人类问题和妇女问题 …… 207

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 …………………………………………………… 214
新的现实和古老的神话 ………………………………………………… 217

第十三章 进化的突破：走向一种伙伴关系的未来 ………………… 220
一种新的现实观 ………………………………………………………… 222
一种新的科学和精神性 ………………………………………………… 227
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 …………………………………………………… 232
转化 ……………………………………………………………………… 236

图 表 ……………………………………………………………………… 243
致 谢 ……………………………………………………………………… 254
人名和术语索引 ………………………………………………………… 256
中文版后记 ……………………………………………………………… 280
第二版后记 ……………………………………………………………… 283
对本书的评语 …………………………………………………………… 285

导论　圣杯与剑

这本书打开了一扇门。很多人和很多书都铸造了这扇门的钥匙，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书来彻底探索门后的广阔前景。但是，即便把这扇门只打开一条缝，也能揭示令人神往的关于我们过去的新知识——以及关于我们潜在的未来的新观点。

对我来说，毕生的追求就是探寻这扇门。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处处都不相同。现在也是这样。我很小就产生了一种极度关心人类处境的热情。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所知道的外表安全的世界由于纳粹占领奥地利而被打得粉碎。我亲眼看着我的父亲被抓走，在我母亲奇迹般地把我父亲从盖世太保手中救出之后，我父母和我为活命而出逃。我们乘飞机到了古巴，最后到了美国。我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真理。我也开始思考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而且绝不是抽象难懂的。

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和迫害呢？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以及男人对妇女的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呢？人类怎么能对他们自己的同类如此野蛮残酷呢？什么东西使我们顽固地倾向残忍而不是友善，倾向战争而不是和平，倾向破坏而不是建设呢？

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中，只有我们能够耕种土地、收获果实、创作诗歌和音乐、寻求真理和正义、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或者也教孩子们欢笑和哭泣。因为我们具有想象新的现实并通过日益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这些新现实的独一无二的能力，所以在我们自身的进化中，我们确实是伙伴。但是，我们这个奇妙的物种现在似乎决心不仅要置我们人类自身的进化于绝路，而且还决心要置生存在我们地球上的大多数有生命的物种于绝路，用生态灾变或核毁灭来威胁我们这个行星。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从事我的专业研究、养育孩子，并逐渐把我的研究和写作重点集中在未来问题上时，我的研究和写作所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泛，话题越来越深入。就像许多人一样，我越来越确信，我们正在迅速走向进化的十字路口——我们过去所选择的行动方向从未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选择何种行动方向呢？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断言我们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资产阶级则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在把我们引向毁灭。有些人则认为我们的麻烦应归咎于我们的“工业范例”，而这种“工业范例”正是我们“科学万能的世界观”的过错。另一些人则还在谴责人道主义、女权运动，甚至现世主义，极力劝说人们回到一个小型的、朴素的、富于宗教色彩的“美好的过去时代”。

然而，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早餐时不得不通过电视或报纸上令人讨厌的日常仪式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如何都陷入了军备竞赛和所有其他的不仅威胁我们而且威胁我们的环境的非理性的事件之中。而且，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我们的过去——匈奴人、罗马人、北欧海盗和亚述人进行经常性的大屠杀，或基督教圣战和中世纪宗教法庭所造成的残酷大屠杀的过去——我们会看到在过去那种小型的、前科学的和前工业的社会里，甚至存在着更多的暴力和非正义行为。

既然倒退不是答案，那么我们如何前进呢？人们纷纷著书立说，连篇累牍地谈论一个新时代，一种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变。[①]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一种从什么向什么的转化？不仅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就我们的文化进化而言，未来的确可能是不同的，或者甚至是可能的吗？从一种长期战争、社会不公正和生态危机的系统导向一个和平、社会公正和生态平衡的系统的转变，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吗？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使这样的转变成为可能呢？

对这些问题答案的搜寻，促使我重新审查构成本书基础的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圣杯与剑》记录了这种对人类社会的新的研究的一部分。它不同于大多数过去的研究，因为它考察的是整个人类历史（包括我

① 参见，例如，弗里特约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新兴的文化》，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82；玛丽琳·弗格森：《太空时代的阴谋：20世纪80年代个人和社会的变化》，洛杉矶，塔彻出版社，1980；乔治·伦纳德：《转化：人类必然变化指南》，纽约，三角洲出版社，1972。

们的史前史），以及整个人类（不仅包括女性而且包括男性）。

本书把来自艺术、考古学、宗教、社会科学、历史，以及探究更确切地符合最适用的资料的新模式的其他许多领域的证据编排在一起，讲述一个关于我们文化起源的新故事。它证明：战争和“两性战争”既不是神意决定的，也不是生物学上注定的。而且它还确切地证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一美好的未来深深扎根于我们实际上发生过的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的戏剧性事件之中。

人类的可能性：两种选择

我们都很熟悉有关早期的、和谐而和平时代的传说。《圣经》讲到了一个乐园，在那里，在一个男性造物主规定妇女从今以后必须从属于男人之前，妇女和男人同自然互相和睦相处。中国的《道德经》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阴（或者女性原则）还没有被阳（或者男性原则）所统治，当时，母亲的智慧仍然特别受到尊重和遵循。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叙述了一个“优秀种族”的故事，这个种族在一个“很小的种族”把他们的战神引进以前，一直在“和平悠然”地耕种土地。虽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都是以史前事件为根据的，但是，一旦涉及男女在一种伙伴关系中生活的时代，他们却从传统角度看问题，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当考古学还处于初期时，海因里希和索菲娅·施里曼的考古发现有助于证实荷马的特洛伊城的真实性。今天，新的考古出土文物结合运用更科学的方法对过去的出土文物的重新解释，揭示了像我们被驱逐出伊甸园这样的故事同样来源于远古的现实，来源于在地球上建立第一个乐园的人们对最初的农业（或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回忆。同样的（正如希腊考古学家斯派里登·马里那托斯大约在50年前就已经暗示过的那样），关于阿特兰提斯的灿烂文明如何沉入大海的传说很可能是米诺斯文明无意之中被歪曲了的记忆——现在认为这种文明是在克里特岛及周围的群岛毁于强烈的大地震和滔天的海啸时结束的。①

① 斯派里登·马里那托斯的论文《火山爆发毁灭了米诺斯克里特》第一次提出了地震和海啸毁灭了米诺斯文明的理论，参见《古代》杂志1939年第13期，第425~439页。从那以后，似乎十分可能的是，这些自然灾害如此严重地削弱了克里特，以至于亚该亚（迈锡尼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占领克里特，因为并没有这种占领者通过大规模武装入侵占领克里特的证据。

正如哥伦布时代那样，由于发现地球不是平的才有可能发现一个原来就一直存在的令人惊奇的新世界。这些考古学上的发现——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称之为一场真正的考古学革命——打开了关于我们神秘的过去令人惊异的新世界。[①] 这些发现展示了一个和平繁荣的漫长时期，当时，我们的社会、技术和文化的进化正蒸蒸日上——数千年来，我们的文明赖以建立起来的一切基本技术在没有男性统治、暴力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得到了发展。

在古代艺术、神话，甚至历史著作中，许多在其他方面难以解释的女神形象进一步证明了古代社会和我们现代社会在组织上是完全不同的。的确，作为一位孕育万物的母亲的宇宙观念（尽管以修改过的形式）在我们的时代仍然幸存下来了。在中国，女神妈祖和观音作为仁慈和怜悯的女神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崇拜。事实上，人类学家 P. S. 桑格伦特别提到："观音一直是中国最流行的女神。"[②] 同样的，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也是广泛流传的。虽然在天主教神学中她被贬到非神的地位，但是，她的圣母称号以及成千上万每天都在祈求她富有同情心的保护和安慰的祈祷者毫无疑问都承认她的神性。此外，耶稣诞生、受难和复活的故事，与那些围绕一位神圣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早期"神秘的祭礼"（或者就像对得墨忒耳和她的女儿科列的崇拜）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在最早以人的形式对神的力量所进行的描述中，神应该是女性而不是男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当我们的祖先开始提出这些永恒的问题——我们在诞生以前来自何处？我们死后去向何方？——时，他们必然注意到生命来自妇女的身体。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宇宙想象为孕育万物的母亲，万物都来自她的子宫并返回那里去，就像草木的循环滋生那样，死而复生。同样有道理的是，以这种想象的力量控制宇宙万物的社会可能与崇拜一位使用雷电和（或）刀剑的父神的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社会结构。更进一步的看法似乎也是符合逻辑的：在那些把以女性的形式控制宇宙万物的力量加以概念化的社会里，妇女不会被看成是附属品；在这些社会里，"女人气的"品质，例如关心、同情和非暴力得到高度的评价。那种认为男人并不统治妇女的社会就是妇女统治男人的社会的结论是毫无道理的。

---

① 詹姆斯·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5。

② P. S. 桑格伦：《中国宗教象征中的女性：观音、妈祖和"西王母"》，载于《符号》第9期（1983年秋季号）。

然而，在19世纪，当这种社会的第一个证据被发掘出来时，人们得出了这种社会必定是“母权制”社会的结论。后来，当这个证据似乎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时，人们就再次习惯地争辩说，人类社会始终是——而且将永远是——由男人统治的。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流行的关于现实的模式，那么，很明显，存在着另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可能存在这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差别并不一定等于优等或劣等。

从一种性别整体论的观点重新考察人类社会的一个结果是一种新的文化进化理论。我称之为文化转化理论的这种理论指出，构成人类文化的大多数表面上的多样性的基础是两种基本的社会模式。

第一种，我称之为**统治者**的模式，就是一般所说的父权制或者母权制的社会模式——人类一半的地位高于另一半。第二种，最好能描述为**伙伴关系**模式，在这种社会里，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以联系原则而不是以地位原则为基础的。在这种模式中——从我们人类男女之间的最基本的差别开始——差别并不等于劣等或优等。[①]

文化转化理论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化进化主流的最初方向是朝着伙伴关系前进的，若非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混沌和几乎完全的文化分裂时期，那么，就会发生一种基本的社会转变。关于西方社会的大量有用的资料应归功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民族中心主义，这些资料使文化转化理论能够通过对西方文化进化的分析更详细地为证明这种转变提供文件。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从一种伙伴关系的模式转向一种统治者模式的这种变迁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②]

---

① 就与统治者模式的关系而论，在统治和实际的等级制之间可以作出一种重要的区别。**统治的等级制**这个术语所描述的等级制是以暴力，或者明确的或暗示的暴力威胁为基础的，它的特点是男性统治的社会的人类等级秩序。例如，这种等级制完全不同于那种以从低级向高级的有序化活动的进化为基础的等级制，例如，活体中从细胞向器官的进化。这些类型的等级制可以用**现实化的等级制**这个术语表示其特点，因为它们的功能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有机体的潜能。相比之下，正如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基础的人类等级制不仅抑制了个人的创造性，而且导致了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人类最低下的（最卑劣的）品质得到了加强，而人类更高的抱负（品质，例如，友谊和同情，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被故意压制了。

② 琼·纳什的论文《阿兹特克人和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对向严格的男性统治和伴随它的男性暴力转化的阿兹特克文化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参见《符号》第4期（1978年冬季号），第349～362页。正如该文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文化的某些最古老的神话都提到了一个更爱好和平和更公正的时代，当时妇女占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例如，正如R. B. 布莱克尼指出的，中国的《道德经》提到了一个男性统治强加于社会之前的时代（转下页注）

本书的书名《圣杯与剑》来自西方文明的史前历史的这种巨大变动的转折点，当时，我们的文化进化方向确确实实发生了转向。在这个决定性的分叉点上，崇拜宇宙的繁殖和哺育生命的力量——在我们的时代，仍然用古代的圣餐杯或圣杯来象征这种力量——的社会的文化进化被中断了。来自我们地球边缘地区的入侵者现在出现在史前史的地平线上，他们创造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马里亚·金布塔斯所写的那样，这些入侵者是崇拜"剑的致命力量"① 的人——这种与其说是给予生命不如说是夺取生命的力量乃是建立和加强统治的基本力量。

进化的十字路口

今天，我们站在另一个潜在的决定性分叉点上。同时，当剑的致命力量——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将其力量放大了千百万倍——威胁着要毁灭全人类的文化时，《圣杯与剑》一书所叙述的关于古代史和现代史的新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提供了有关我们过去的故事的一个新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新知识给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现在和潜在的未来。

数千年来，男人们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剑已经成为男性的象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必然是残暴和好战的。② 通观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

（接上页注②）（参见，例如，R. B. 布莱克尼编辑并翻译的《生命之路：道德经》，纽约，门托出版社，1955）。同样的，李约瑟论述了"退化进化"的道家学说（换言之，从一个更早和更文明时代的文化的退化）。他还提到了公元前 2 世纪的《淮南子》和后来孔子的《礼记》所提出的早期道家时代关于伟大的统一或大同思想的某些著名论述（李约瑟：《中国和西方的时间和知识》，载于朱利叶斯·T. 弗雷泽编辑的《时代之声》，纽约，布雷齐勒出版社，1966）。

① 马里亚·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载于《印欧研究杂志》第 5 卷（1977 年冬季号），第 281 页。

② 因为人类行为的某些成果并不是在遗传上预先安排好了的，而是生物学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例如，R. A. 欣德：《人类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74；鲁思·哈伯德和玛丽安·洛主编《基因和第二性》，纽约，戈迪安出版社，1979；海伦·兰伯特：《生物学和平等：一种关于性别差异的观点》，载于《符号》第四期（1978 年冬季号），第 97～117 页；理安·艾斯勒和 V. 昌尼：《人类生物学和社会结构》（正在写作中）；埃塞尔·托巴赫和贝蒂·罗索夫主编《基因和第一性》，纽约，戈迪安出版社，1978；鲁思·布莱尔：《科学和性别》，纽约，艾尔姆斯福德，培加蒙出版社，1984；阿什顿·巴菲尔德：《生物学对不同性（转下页注）

史，有不少男人是爱好和平和反对暴力的。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在史前社会里不仅有男人而且有女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圣杯所象征的孕育和哺育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男人是一种性别。问题的根子在于将剑的力量理想化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不仅男人而且女人都受到把暴力和统治等同于真正的男子气概的教育，而且把不符合这种理想的男人看成是“太娇嫩”或“女人气”。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很难相信还可能有任何其他构成人类社会的方式——更不会相信我们的未来可能由任何与妇女或女性有关的事情来决定。这些看法的一个理由是，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任何有关妇女或女性的事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无论在任何地方，只有在更重要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妇女问题才能被提到日程上来。另一个理由是，我们没有必不可少的资料。尽管人类明显地是由两部分（妇女和男人）组成的，但是，在大多数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主角——的确常是唯一的演员——一直是男性。

作为关于男人的实实在在的研究结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不得不使用这种残缺不全和被歪曲了的资料，而这种资料在任何其他场合都会立即被认为是极有缺陷的。即使是现在，关于妇女的资料也基本上被归入研究妇女的智力领域中去了。此外，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由于这一领域对于妇女生活的直接重要性（虽然长期被忽视），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妇女研究对妇女的意义上。

本书则完全不同，因为它的重点是，为了一种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我

（接上页注②）别的影响》，载于M. 泰特鲍姆主编《性别差异：社会的和生物学的观点》，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76；琳达·玛丽·费迪甘：《灵长目动物的范例：性别角色和社会联系》，蒙特利尔，伊登出版社，1982；R. C. 勒旺丁，斯蒂文·罗斯和利昂·卡明：《不在我们的基因之中》，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4。在阿什利·蒙塔古的《人类的侵略本性》（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中可以发现关于侵略行为的卓越的概述，以及对现在复活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有力反驳。

甚至关于动物本能的问题也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一清二楚。例如，新的研究证明，甚至在鸟类中，要使接受力变成能力也要通过学习或经验。参见，例如，吉尔伯特·戈特利布：《鸟类中的认同作用的发展：对胎内感觉因子的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丹尼尔·莱尔曼：《对康拉德·洛伦兹的本能行为理论的批评》，载于《生物学评论季刊》1953年第28期，第337~363页；约翰·克鲁克主编《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社会行为》，纽约，学院出版社，1970；彼得·克洛普夫：《论行为：本能是一个总是露出牙齿笑的人》，费城，利平柯特出版社，1973。

们如何把人类两部分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很清楚，如何构成这些关系不仅对男人而且对女人的个人生活，对我们的日常角色和生活选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虽然仍然普遍受到忽视，但某些曾经阐明的事情看来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我们用以构成人类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没有这一切关系，我们人类就不能生存下去）对我们制度的一切方面，对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正如随后所证明的那样，对我们的文化进化的方向，特别是这种进化是和平的还是好战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好好地想一想就知道，构成人类男女两半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基本方式。所有的社会或者仿照统治者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类的等级制度是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来维持的——或者仿照伙伴关系的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还有各种变异的模式。此外，如果我们从考虑到男女双方的角度来重新审查人类社会，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存在着各种类型或制度结构、具有统治者特征的或者具有伙伴关系特征的社会组织。

例如，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希特勒的德国、霍梅尼的伊朗、武士的日本以及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是种族、民族血统、技术发展和地理位置绝对不同的社会；但是，从文化转化理论的新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了这些社会的明显共性：它们都具有严格的男性统治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所有这些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的社会不仅是严格的男性统治社会，而且具有普遍的等级制度和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社会暴力，特别是战争十分频繁。[1]

相反的，我们也能看到，在与前述社会相反的其他方面极其不同的社会之间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这些社会在性别上是比较平等的。很有特征的是，这种“伙伴关系模式”的社会不但更倾向于和平，而且更倾向于没有等级制度和极权主义。人类学资料（例如班布提和孔人部落），当代关于更趋向于性别平等的现代社会（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例如瑞典）的研究，以及本书随后将详加阐述的史前的历史资料，都证实

---

[1] 在第二本书（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正在写作中的《开创自由》）中详尽考察了这些制度的结构。也可参见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和平和女权主义思想：新方向》，载于《世界和平百科全书》，伦敦，培加蒙出版社，1986；理安·艾斯勒：《暴力和男性统治：定时炸弹》，载于《社会中的人性》第7期（1984年冬春号），第3～18页；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自由主义的败北：从女性—男性的观点对意识形态的再评价》，载于《政治心理学》1983年第4期，第375～391页。

了这种特征。[①]

通过运用社会组织的统治者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来分析我们的现在和潜在的未来，我们还能超越右和左、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宗教和现世主义，甚至大男子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传统对立。大量出现的材料表明，所有为了争取社会公正的现代后启蒙运动——无论它们是宗教的或世俗的——以及最近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都是对从一种统治者的制度向伙伴关系体系转化的潜在冲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我们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技术时代，这些运动可能被看成是对我们人类的生存进化的冲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文化进化的全过程，我们会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全球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史前史中所发生的根本转变，这种根本转变不仅在社会结构上而且在技术上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从强调维持和改善生活的技术向以剑为象征的技术的转变，这种以剑为象征的技术是一种谋求毁灭和统治的技术。在大多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强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技术。今天威胁着我们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正是这种技术侧重，而不是技术本身。[②]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争辩说，因为在史前时代，存在着一种必定是适合的从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向统治者社会模式的转变。然而，这种因为在进化中发生的某种事情是适合的理由并不能支持上述看法，正如恐龙的灭绝非常充分地证明了的那样。总之，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文化进化的历史太短，以至于无法作出这样一种判断。关键之点似乎可能是这样的，假如我

---

① 参见本书导论第8页注①。关于更详细的人类学资料，可参见，例如，科林·特恩布尔：《原始森林中的民族：关于刚果俾格米人的研究》，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61；帕特·德雷珀：《孔人部落的妇女：觅食和定居关系中的性平等主义的比较》，载于《走向妇女人类学》，雷亚·赖特主编，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5。还可参见理查德·利基和罗吉·卢因：《湖边民族》，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78。还请注意，本书所使用的平等主义一词不同于常用的平均主义一词。原因是，平均主义（egalitarian）传统上只描述了男人之间的平等（就像洛克、卢梭以及其他“男权”哲学家的著作和现代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平等主义（equalitarian）描述了伙伴关系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中，妇女和男人（以及“男性”和“女性”）符合平等的价值。这就是这种用法日益在女权主义者中普及的原因。

② 参见理安·艾斯勒：《剑与圣杯：技术的转折点》，该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世界未来学会（华盛顿特区，1984）。理安·艾斯勒：《文化进化：社会转化和阶段变化》，载于欧文·拉兹洛主编《新的进化范式》，波士顿，新科学图书馆，1987；理安·艾斯勒：《妇女、男人和社会结构的进化》，载于《未来世界》第23期（1987年春）。

们今天的技术发展是高水平的，社会组织的统治者模式就是不适合的了。

因为这种统治者模式现在似乎正达到它的必然极限，许多男人和妇女正在抛弃长期停滞不前的社会组织原则，包括他们的老一套的性别角色。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这些变化只不过是制度崩溃前的信号，无论如何必须制止这种混乱和分裂。但是，这的确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正在变化得太快，以至于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圣杯与剑》探讨了这些选择。但是，当下面的材料证明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时候，也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有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我们必然可以躲开核威胁和生态大破坏的时代而进入一个崭新的美好时代。归根结底，应该由我们来作出选择。

混沌或转化

《圣杯与剑》一书所依据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行为研究。[①] 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和现在，甚至是关于将来如何的研究，而且也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介入我们自己的文化进化的探索。这篇序言的余下部分主要是为那些有兴趣对这种研究作更多了解的读者准备的。其他读者可以直接去读第一章，也许以后可以再回过头来读这部分。

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关于文化进化的研究基本上都把焦点集中在从较简单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向更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进步上。[②] 特

① 参见，例如，艾尔弗雷德·马罗：《实践理论家》，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69；克里斯·阿吉里斯：《行为科学》，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1985。

② 关于文化进化的这一研究是以19世纪奥古斯特·孔德和刘易斯·亨利·摩根明确阐述的假设为基础的：社会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通过几个固定和有限的阶段。摩根认为，这些阶段是：蒙昧状态、野蛮状态和文明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采纳了这种进化进步的观点（参见，例如，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赫伯特·斯宾塞发现了一种从小群体向大群体、从同族群体向异族群体的社会进步（《社会学研究》，纽约，阿普尔顿出版社，1873，第471页）。还可参见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33），作为一本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假定了从小的和很不特殊化的社会向大的、十分特殊化的社会发展的社会进化的两个阶段，这种观点大致类似于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早就提出的社会的社区和共同体类型的阶段。关于这种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所谓的社会进化的循环理论，例如，皮梯里姆·索罗金关于文化的“理性”、“感性”和“思想”阶段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各个阶段可以重复发生，但每次循环总是按一定顺序跟着前一次循环（索罗金：《社会和文化动力》，波士顿，萨金特出版社，1957）。

别是将注意力放在主要的技术转变上，例如，农业的发明、工业革命以及最近向我们的后工业时代或核时代和电子时代的转变上。[①] 这种转变明显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但是它只给我们讲述了人类故事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与一种不同类型的运动有关：社会转变或者趋向一种伙伴关系模式的社会组织，或者趋向一种统治者模式的社会组织。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文化转化理论的主要论点是，统治者社会和伙伴关系社会的文化进化的方向是十分不同的。

这种理论部分地来自一种重要的、还没有普遍形成的特征。这就是，“进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按照科学的说法，它描述现存物种的生物学历史，并且延伸为描述现存物种的文化历史。但是，“进化”也是一个规范的术语。的确，它常常被用来作为进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运动——的同义词。

实际上，甚至我们的技术进化也不是一种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直线运动，与其这样说，毋宁说是一个不时被大规模的倒退——例如希腊的黑暗时代和中世纪[②]——所中断的过程。然而，似乎存在着一种趋向超乎寻常的技术和社会复杂性的潜在冲动。同样的，似乎存在着一种趋向更高的目的的人类冲动：趋向真理、美和公正。但是，由于作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特征的残忍、压迫和战争总是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走向这些目的的运动几乎不可能是直线的。的确，正如我们将要考察的资料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倒退。

在收集资料说明和考察我一直在研究的社会原动力的过程中，我不仅把得自社会科学而且把得自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集中在一起。有两种来源特别有用，即新的女权主义学说和关于变化的动力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

① 以进化的技术阶段为基础的最著名的现代作品也许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0）。有些人类学家，例如，莱斯利·怀特和威廉·奥格本也把他们的社会进化理论建立在技术阶段的基础上，虽然他们并没有证明每个社会都必然通过所有这些技术阶段（参见，例如，莱斯利·怀特：《文化科学》，纽约，法拉和斯特劳斯公司，1949；威廉·奥格本：《关于文化和原初自然的社会变迁》，纽约，维金大学出版社，1950）。最近一本优秀的论技术进化的著作是贝拉·巴纳思的《系统的需求和科学的复杂性：概念的基础》（ISI 专题论文，第 84—2 期，旧金山，远西实验室，1984）。

② 这些倒退延续了数百年。希腊的黑暗时代长达 300 余年，从公元前 1100～前 800 年，而欧洲的中世纪延续了几乎整整 1000 年。

通过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斯滕格斯在化学和一般系统论方面，罗伯特·肖和马歇尔·费根鲍姆在物理学方面以及温贝尔托·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在生物学方面的著作，[1] 一种对于系统如何形成、维持和变化的重新评价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迅速地传播开来了。这种正在形成的理论和资料的主要部分有时被认为和“新物理学”是一致的，而新物理学由于弗里特约夫·卡普拉的著作《物理学之道》和《转折点》[2] 而被通俗化了。这种理论有时也被叫做“混沌”理论，因为在科学史上，它第一次集中研究了突然的和基本的变化——一种我们的世界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体验到的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例如V. 昌尼、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以及像埃里克·詹奇、欧文·拉兹洛和戴维·洛耶这样一些学者就“混沌”理论对文化进化和社会科学的意义[3]所撰写的研究进化变迁的新著作。但这绝不是说人类的文化进化和生物学进化是一样的。虽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而且研究社会系统必须避免机械的还原论，但是在系统的变化方面和系统的自组织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所有的系统都是通过系统的各个关键部分彼此加强相互作用来维持的。相应的，在某些引人注目的方面，本书所提出的文化转化理论与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所提出的“混沌”理论在下面这个他们告诉我们的问题上是类似的：当整个系统可能发生迅速的转化时，[4] 在系统的关键分支

---

① 参见，例如，伊利亚·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4；拉尔夫·亚伯拉罕和罗伯特·肖：《动力：行为几何学》，圣克鲁斯，航空出版社，1984；温贝尔托·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自我创造和认知：生活的实现》，波士顿，赖得尔出版公司，1980。

② 弗里特约夫·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波士顿，莎姆哈拉新科学图书馆，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新兴的文化》，参见本书导论第2页注①。

③ 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加强的平衡：种系渐进主义》，载于《古生物学模式》，T. J. 施罗普夫主编，旧金山，弗里曼与库珀出版公司，1972；V. 昌尼：《广义进化论》，布达佩斯，1982；欧文·拉兹洛：《进化：伟大的综合》，波士顿，新科学图书馆，1987；埃里希·扬奇：《自组织的宇宙》，纽约，培加蒙出版社，1980；戴维·洛耶和理安·艾斯勒：《混沌和转化：非平衡理论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的意义》，载于《行为科学》1987年第32期，第53～65页。

④ 遍及各个领域的这些发现的一致性与一般系统理论家的较早的结论相符合，例如，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纽约，布拉泽勒公司，1968）和欧文·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导论》（纽约，戈顿和布里奇出版社，1972）。

或分叉点上发生了什么以及现在可能再发生什么。

例如，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提出，与其说进化在逐渐向上的阶段始终是前进的，不如说是由长期延续的平衡构成的，或者说缺少大的变化，当新种在原种产地的周围或边缘出现时，进化常常为进化的分支或分叉点所中断。[1] 而且，虽然在这种形成分支和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转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古尔德与埃尔德雷奇的"边缘隔离"模式和其他进化论理论家与"混沌"理论家关于在我们的文化进化中发生了什么以及现在还可能发生什么的概念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女权主义学说对于文化进化——包括人类历史和人类男女双方的全部历史——的整体论研究的贡献就更明显了：它提供了在传统的来源中无法找到的遗失了的资料。实际上，如果没有许多学者的工作，本书所提出的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作的重新评价就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有：西蒙娜·德·波伏娃、杰西·伯纳德、埃斯特·博塞拉普、吉塔·森、玛丽·戴利、戴尔·斯彭德、弗洛伦斯·豪、南希·乔德罗、阿德里安娜·里奇、凯特·米利特、巴巴拉·吉尔皮、艾丽斯·施莱格尔、安内特·库恩、夏洛特·邦奇、卡罗尔·克赖斯特、朱迪思·普拉斯科夫、凯瑟琳·斯廷普森、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黑兹尔·亨德森、凯瑟琳·麦金农、威尔玛·司各特·海德、琼·贝克·米勒和卡罗尔·吉利根，这里只列举了一部分学者的姓名。[2] 从17世纪阿弗拉·贝恩的时代，甚至更早的

---

[1] 奈尔斯·埃尔德雷奇：《时间框架》，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5；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加强的平衡》。

[2] 参见，例如，杰西·伯纳德：《女性世界》，纽约，自由出版社，1981；埃斯特·博塞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伦敦，阿伦和昂温公司，1970；戴尔·斯彭德：《女权主义理论家：三个世纪的重要妇女思想家》，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3；吉塔·森和卡伦·格罗恩：《发展、危机和选择前景：第三世界妇女的前途》，新德里，黎明出版社，1985；玛丽·戴利：《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8；卡罗尔·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呼声》，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凯瑟琳·麦金农：《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国家：理论的议事日程》，《符号》第7期，第517～544页；威尔玛·司各特·海德：《为了女权运动的健康》，布法罗，玛格丽特女儿出版，1985；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卡罗尔·克赖斯特和朱迪思·普拉斯科夫：《妇女精神的兴起：宗教的女权主义读者》，旧金山，哈泼与罗出版社，1979；查伦·斯普雷特纳克主编《妇女精神的政治学》，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82。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认识许多重要的女权主义学者，但是，这类学者的人数增加得太快，以至于我无法提及许多重要人物的名字。

时代起,[①] 只是在最近 20 年以来，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资料和见解才像“混沌”理论那样为科学开辟了新的前景。

尽管双方在来源上截然相反——一方来自传统的男性，另一方来自极其不同的女性经验和世界观，但是，女权主义理论和“混沌”理论实际上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在主流科学的内部，这两方常常仍然被认为是在正当研究的边缘，或超出正当研究的边缘的神秘活动。而且在它们将重点集中于“转化”时，这两种思想都日益认识到，目前的系统正在崩溃，我们必须寻求通向一种不同的未来的道路。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探索这种未来的根源和通向它的道路。这些章节告诉我们一个在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千年之前就已开始的故事，即西方文化最初的伙伴关系方向如何转向了五千年血腥的统治者的弯路的故事。它们证明我们日益加剧的全球问题大部分是在我们的技术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组织的统治者模式的必然后果。因此，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这种统治者模式的内部得到解决。而且它们还证明，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仍然要由作为我们自己进化的共同创造者的我们自己来选择。这是突破而不是破坏的选择，即我们如何通过新的方式来调整政治、经济、科学和精神才能跨入一个伙伴关系的世界的新纪元。

① 斯彭德：《女权主义理论家》。女权运动作为一种现代现象开始于 18 世纪。但是，有许多更早的妇女学者的例证，她们探讨了她们时代业已确立的知识，例如，克里斯廷·德·皮桑，她在 1390 ~ 1429 年写了 28 本书，有些书，例如她的《妇女城市之书》，探讨了她那个时代的学术界男人的厌女主义。

第一章　漫游逝去的世界：文明的开端

保存在两千多年前的洞穴圣殿中的女性雕像向我们讲述了我们西方的远古祖先的精神。这是一种很小的石刻雕像：一种在史前欧洲到处都有发现的所谓的维纳斯雕像。

在广袤的地区里——从东欧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远至西欧维也纳附近的威伦多夫和法国的帕贝岩洞——出土的文物中都发现了这些雕像。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男性好色的表现，即它们是今天的《花花公子》杂志的一种古代类似物；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某种在原始的、可能是淫秽的生殖仪式中使用的东西。

但是，这些古代雕刻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真能把它们当做“顽固不化的男性想象的产品”① 而不加考虑吗？用维纳斯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些宽臀、有时是怀孕的、非常风格化的而且常常是脸部没有表情的雕像，真的很合适吗？或许这些史前的雕刻品确实要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曾经如何崇拜孕育万物的宇宙力量等某些重要的事情吗？

---

① 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史前时代的宗教》，纽约，巴恩斯和诺布尔出版社，1957，第146页。詹姆斯是最早批评这种观点的宗教历史学家之一。关于最近对许多学者对于旧石器时代女性雕像的神话意义的惊人无知的一个卓越批评，参见马里亚·金布塔斯：《史前时代艺术中的妇女形象》，《考古学评论季刊》，1981年12月，第6~9页。应该指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旧石器时代和后期旧石器时代这两个术语有时交换着使用。本书一直这样使用这两个术语，虽然所讨论的大多数属于后期旧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0000到公元前10000年，关于这个时期，教科书上描绘了许多惊人的洞穴动物壁画、雕像和人物浮雕。旧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可以回溯到公元前约65000年，但是，有关这个时代的早期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们的女性雕像和他们的壁画、洞穴圣殿以及墓地都是重要的心理记录。它们证明我们的祖先不仅敬畏神秘的生命而且敬畏神秘的死亡。它们表明，在人类历史的远古时期，人类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和神话来表现和保证他们的生活，而这些仪式和神话似乎和仍然广泛保持的死者可以通过轮回而复活的信仰联系在一起。

宗教历史学家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写道："在法国三友洞、尼欧洞、枫—德—哥姆洞或拉斯科洞这样一些巨大的洞穴圣殿中进行的仪式必然包含一种代表团体的有组织的力量，以便通过指导共同利益的超自然的手段来控制自然力量和自然过程。与食物的供给、生育、繁殖或死亡的神秘有关的神圣传统出现并发挥了作用，这种传统似乎是对今世和来世的生活意志的反映。"①

这种神圣的传统表现在旧石器时代卓越的艺术中。而构成这种神圣传统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是同妇女所掌握的生和死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在旧石器时代的葬礼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和创造生命的力量的联系。例如，在法国莱塞西的克罗马农岩棚中，1868 年首次发现了我们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祖先的骨骸，尸骨的周围和上面精心排列了许多当货币用的贝壳。这些贝壳被排列成詹姆斯谨慎地称之为"小孩通过它进入世界的门"的形状，它们似乎和某种对女性神灵的早期崇拜有关。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这种贝壳是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因此，红赭石在后来的传统中同样仍然是妇女创造生命或经血的象征物。②

它们主要强调的似乎一直是妇女与生命的给予者和维持者的联系。同时，死亡，或者更明确地说复活，似乎也是宗教的主题。在尸体的周围和身上把贝壳摆成阴道形状的仪式，以及给这些贝壳和尸体涂上赭石颜料（象征血液的生命力）的习俗，似乎都是企图通过轮回而复活的葬礼的组成部分。甚至更明确地说，正如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仪式和习俗"表明具有创造生命仪式性质的葬礼与女性雕像及女神崇拜的其他象征密切相关"③。

---

① 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母亲女神崇拜》，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1959，第 19 页。

② 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母亲女神崇拜》，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1959，第 16 页；詹姆斯：《史前时代的宗教》，第 148 页。

③ 詹姆斯：《母亲女神崇拜》，第 16 页。

除了这种关于旧石器时代葬礼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之外，还有证据表明，这种仪式看来是为了促进那些给我们的祖先提供生活资料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的生育力而设计的。例如，在法国阿列日的图克·德·奥多贝尔险峻的大山洞的地道里，在画着两头非洲野牛（一头公牛跟在一头母牛后面）的壁画下面松软的黏土地上，我们发现了许多人的脚印。学者们认为，这些脚印是举行仪式时跳舞的人留下的。同样的，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科古尔的岩棚里，我们发现一个表现许多妇女——可能是女祭司——的场面，她们在一个宗教仪式上围着一个较小的裸体男性雕像跳舞。

这些洞穴圣殿、雕像、葬礼和仪式似乎都和这样一种信仰有关：人类的生命从其中诞生的同一源泉也是所有植物和动物生命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伟大的母亲女神或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在后期的西方文明中仍然可以看到她们。这些洞穴圣殿、雕像、葬礼和仪式也表明，我们的远古祖先认识到，我们和我们的自然环境乃是伟大的生死之谜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然万物必须受到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的女神小雕像中表现得更鲜明，这种女神小雕像或者为自然象征，例如动物、水和树所环绕，或者她们本身部分地就是动物——明显是我们失去的心理遗产的核心。这种失去的遗产也是对我们人类状况的伟大奇迹的敬畏和惊奇，即对体现在妇女身上的生育奇迹的敬畏和惊奇。根据这些远古的心理记录来判断，这是史前西方信仰体系的主题。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还不是许多学者的观点，也不是仍在讲授的关于文明起源的大多数概论课程的观点。因为在这里，正如在大多数论述这个题目的流行著作中那样，仍然流行的是早期学者的偏见。这些早期学者是根据关于“原始男人”的传统观点来看待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这种传统观点认为，原始男人是嗜血的、好战的猎人，事实上与现代所发现的某些最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群体完全不同。[1] 正是根据这种对来自旧石器时代的极其零碎的材料的解释，关于原始社会或史前社会组织的男性中心理论得以建立。而且甚至在已经获得新发现时，学者们仍然按惯例解释这些发现，以便符合旧的理论模式。

这些学者的假设之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只有史前的男人才是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创造者。这种假设根本没有任何事实的证据。相反，它

---

[1] 参见本书导论第9页注①。

是学究式偏见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是对科学研究成果的侮辱，例如，在斯里兰卡（锡兰）的当代维达人中，事实上是妇女而不是男人创造了岩画。[①]

这些偏见的基础是这样的观念，正如约翰·法伊弗在《人的出现》中指出的那样，“狩猎统治了史前男人的注意力和想象力”，而且“如果他像现在的男人一样的话，那么他在许多情况下会利用仪式来补充和增加自己的力量”。[②]与这种偏见相一致的是，学者们甚至仍然把旧石器时代表现妇女跳舞的壁画解释为与狩猎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有关女性中心崇拜的拟人形式的证据——例如，发现了宽臀和怀孕的女性艺术作品——同样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归类为纯粹男性的对象：肥胖而色情的“维纳斯”或“粗野的美人肖像”。[③]

虽然有例外，但是，关于男人是猎人和战士的进化模式完全歪曲了对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解释。只是在20世纪后期，在东西欧和西伯利亚挖掘出新的出土文物时，对于新的和旧的发现物的解释才逐渐发生变化。有的研究人员是妇女，她们注意到女性生殖器的雕像，而且也倾向于对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进行更综合的宗教解释而不是作“狩猎魔术”的解释。[④] 而且

① 参见，例如，伊丽莎白·费希尔：《妇女的创造物》，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79，第140页。

② 约翰·法伊弗：《人的出现》，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72，第251~265页。关于一种新的人类进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似乎更符合最常见的资料——参见南希·坦纳：《论正在形成的人类》，波士顿，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阿德里安娜·齐尔曼、简·兰开斯特和其他女权主义学者的著作描述了类似模式的特点，她们的新的学术著作不再受“男人狩猎者”的进化模式的束缚。参见，例如，A. 齐尔曼：《进化中的妇女：第2部分：早期原始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载于《符号》第4期（1978年秋季号），第4~20页；简·兰开斯特：《推进并分担人类进化》，载于《人性》1978年2月第1期，第82~89页。还可参见本书第5章。

③ 金布塔斯：《妇女的形象》。

④ 参见，例如，格特鲁德·雷切尔·利维：《石器时代的宗教概念》，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63，初版书名为《角门》（伦敦，费伯兄弟公司，1948）。利维指出，洞穴本身可能是女神（女创造者、圣母、地母）子宫的象征，而且在洞穴里举行仪式表现了希望参与——而且也影响——她的创造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也包括生育来自她的子宫的动物（这些动物为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提供了食物）。因此，动物常常被刻在洞穴的墙上。
最近的另一位女性学者Z. A. 阿布拉莫娃出版了关于苏联境内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雕刻品的官方论文选集。和苏联的考古学家A. P. 奥克拉德尼科夫一样，阿布拉莫娃认为，“旧石器时代的妇女形象的两个不同方面……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妇女被描绘为“家庭和炉子的女主人，家庭炉火的女保护者……而且妇女是……动物，特别是猎物无可争辩的女主人”（Z. A. 阿布拉莫娃：《苏联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载于《考古人类学》，1967年第4期，第1~179页，切斯特·S. 查德主编，凯瑟琳·佩奇翻译，转引自亚历山大·马沙克：《文明的根源》，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第338~339页）。

因为更多的学者是世俗的科学家而不是像修道院院长布日耶——他对宗教习俗的“道德解释”严重歪曲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旧石器时代研究——那样的修道士，某些重新考察岩画、雕塑品和其他旧石器时代发现品的男人现在也开始对学术机构曾经接受的原则提出了疑问。

这种疑问的一个有趣例子与画在旧石器时代洞穴的墙壁上以及刻在骨头和石头上的条状物和线条有关。许多学者认为，这些条状物和线条似乎明显地描绘了武器：箭、箭的倒钩、矛和标枪。但是，正如亚历山大·马沙克在《文明的根源》——这本书是率先对上述这种标准解释提出挑战的许多著作之一——中所写的那样，这些画的或刻的线条更可能是幼苗、树、枝条、芦苇和叶子。[①] 而且，这种新解释可以说明，如果一个民族，如当时的采集和狩猎民族，不是必须完全依赖这些植物为生，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画出或刻出这些植物的图画。

彼得·尤科和安德烈·罗森菲尔德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中，对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很少有关植物的作品同样感到疑惑不解。他们还进一步注意到另一件难以理解的不协调的事。所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一种叫做两齿叉的特殊的标枪直到晚期旧石器时代或马格德林时代才出现，虽然学者们在几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的洞穴壁画中“发现了”这种以“棍子”形状出现的标枪。而且，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为什么要描绘这么多狩猎失败的场面呢？因为如果棍状物和线条实际上是武器，那么画面上经常出现它们就毫无目的了。[②]

马沙克并不是考古学家，因此他并不囿于早期考古学的惯例，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些神秘现象，他仔细考察了这些被认为是标枪的刻在骨头上的线条。他发现，在显微镜下，这种设想的标枪的倒钩不仅弯错了方向，而且标枪的长杆的尖端也是错的。但是，如果这些雕刻和画的线条不是“错了方向”的武器，那么它们代表什么呢？结果终于证明，这些线条画得或刻得无疑完全符合长在树干顶端的枝条的正确角度。换句话说，这些和其他通常被认为是“倒钩记号”或“阳物”的雕刻可能只不过是树、枝条和植物的某种风格化的表现。[③]

---

① 马沙克：《文明的根源》，第219页。

② 彼得·尤科和安德烈·罗森菲尔德：《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第100、174～195、229页。

③ 马沙克：《文明的根源》，第173、219页。他也承认旧石器时代艺术中的女性雕像的重要性。实际上，他的《文明的根源》就是探讨解释旧石器时代艺术新模式的一次寻根究底和引人注目的尝试。他对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旧石器时代的记号高超的创造性（转下页注）

因此，在一再仔细的研究下，那种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主要是原始狩猎魔术的传统观点，可以被看成是旧框框的反映，而不是对所看到的东西的合理解释。所以把旧石器时代的女性雕像解释为淫秽的男性性对象或原始生殖崇拜的表现，也可以被看成是旧框框的反映。

由于缺少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遗物，而且在我们和它们之间隔着一个漫长的时期，所以我们可能很难完全确定那时的绘画、雕刻品和符号对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但是，伴随着旧石器时代岩画的豪华彩色图片首次出版的冲击，这种艺术的吸引力已经逐渐变成了传奇的力量。动物的某些表演像现代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一样好，而且提供了一种只有少数现代人才能重新体验的新景色。因此，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绝不是不发达的原始人拙劣的涂鸦。相反，如果我们不仅打算了解人类过去是怎样的，而且打算了解他们可能变成什么，那么我们必须理解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表现了原始人的心理传统。

正如法国巴黎大学史前和原始史研究中心领导人安德烈·勒鲁瓦－古朗在一部最重要的研究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近著中所写的那样，对于“原始生殖崇拜”时期的信仰体系不加考虑是“不得人心的和荒谬的”。他说，我们“对材料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全部用图形表现的旧石器时代艺术是一种关于生物界的自然和超自然组织的概念的表现”。他补充道，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毫无疑问知道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划分为对抗的两部分，而且设想这两部分联合统治着生物系统”。[①]

勒鲁瓦－古朗分析了从大约60多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里挖掘出来的数以千计的绘画作品和物品。根据这种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反映了我们的远古祖先十分重视两性的存在。尽管他是根据男性和女性施虐—受虐狂的旧框框来讲的，而且在其他方面遵循着早期的考古学惯例，但是，他证实：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表现了早期宗教的某些形式，在这种宗教里，女性的形象和象征起过一种核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很有特点的是，女性雕像和他认为是表现女性

(接上页注③) 分析，为探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传说提供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基本资料，这些传说包括周期现象（例如，妇女的月经、季节、月球和太阳的循环）；就像妇女怀孕九个月一样，我们的祖先明显地看到了而且试图通过季节和历法的神话和仪式解释（而且也可能试图控制）这些现象。

① 安德烈·勒鲁瓦－古朗：《西方艺术的史前史》，巴黎、吕西安·马兹诺艺术出版社，1971，第120页。

的记号，都位于挖掘出来的洞室的中心。相反，男性记号都很有代表性地或者占据周围的位置，或者被排列在女性雕像和记号的周围。[1]

勒鲁瓦－古朗的研究成果符合我早就提出的观点：摆成阴道形状的贝壳、埋葬用的红赭石、所谓的维纳斯雕像，以及早期学者轻率地认为是"怪物"而不予考虑的半女人和半动物的雕像，都与一种妇女生育生命的力量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早期崇拜形式有关。它们都表现了我们的祖先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普遍的人类问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什么时候诞生？我们死后去向何方？而且它们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加以假设的观点：伴随着在与其他人、动物以及自然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自我的最初觉醒，自我必然会意识到生命来自妇女身体这个事实令人敬畏的神秘性——以及在实践上的重要性。

看来唯一可能符合逻辑的是：人类男女两部分之间明显的二态现象或形态上的差别，对旧石器时代的信仰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看来同样可能符合逻辑的是：不仅人类的生命，而且动物的生命也来自女性的身体，而且像季节和月亮一样，妇女的身体也经历着周期，这些事实使我们的祖先认识到，生育和维持生命的力量是女性形态，而不是男性形态。

总之，撇开偶然获得和互不关联的材料，女性雕像、埋葬用的红赭石和摆成阴道形状的贝壳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看来是后来发展成一种复杂的宗教的那种东西的早期表现，这种宗教以对母亲女神的崇拜为中心，这位母亲女神是一切生命形式的源泉和使之再生的女性。正如詹姆斯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这种女神崇拜"以近东和希腊一罗马世界的伟大母亲的复合形象"[2]很好地保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宗教继续保存在许多众所周知的诸神中，例如，埃及的伊希斯、努特和玛亚特；伊斯兰教的伊什塔尔、阿斯塔特和夜妖；希腊的得墨忒尔、科列和赫拉；罗马的阿塔迦蒂斯、刻瑞斯和西伯勒。甚至更晚些，在我们自己的犹

---

① 安德烈·勒鲁瓦－古朗：《西方艺术的史前史》，巴黎，吕西安·马兹诺艺术出版社，1971，第120页。关于他的发现的简略总结，参见安德烈·勒鲁瓦－古朗《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进化》，载于《科学的美国人》，1986年2月，第61页。

② 詹姆斯：《史前宗教》，第147～149页。关于最近对这种宗教进化和它所反映的文化的全面分析，参见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进化及其印欧化：中东欧的史前史》（没发表的手稿）。

与本书的用法一样，"女神"这个术语涉及古代对以女性形式支配宇宙的力量的概念化。因此，女神以及诸如圣母和女造物主等等术语都用大写字母开头。

太基督教的遗产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宗教存在于朱诺神中——在《圣经》中，她的园林被焚毁——存在于希伯来神秘传统的舍金纳神中，也存在于天主教的处女马利亚，即圣母中。

如果这些联系是很明显的，那么为什么在传统的考古学文献中它们又长期被贬低，或完全被忽视？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之一是：已经指出，这些联系不符合社会组织的男性中心形式和男性统治形式的原始历史和史前史模式。但是，还有另一个理由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关这种（延续数千年直到旧石器时代之后那个令人神往的时期的）宗教传统的某些最重要的新证据才被挖掘出来。这个令人神往的时期乃是我们文化进化中的一个漫长的时期，它处于旧石器时代文明和后来的青铜时代文明之间人类文化第一次重要发展的时期内，当时，我们的祖先建立了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农业社区。

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勒鲁瓦－古朗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关于史前史的知识由于新石器时代的两个新遗址——卡塔尔·惠雅克和哈希拉镇——令人激动的发现和挖掘而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增进。这两个新遗址是在现代土耳其，习惯上称作安纳托利亚的平原上发现的。根据詹姆斯·梅拉特——他领导了由设在安卡拉的英国考古研究所进行的这些挖掘工作——的说法，特别有趣的是：这两个被挖掘出来的遗址所提供的知识证明，发展了数千年的那种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推进了女神崇拜文化。

梅拉特写道："安德烈·勒鲁瓦－古朗关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宗教高明的重新评价已经清除了许多误解。……对于以复杂的和女性的（以符号和动物形式表现的）象征主义主题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后期艺术的富有成果的解释，与卡塔尔·惠雅克的宗教比喻极其相似。"而且，旧石器时代后期对于很多崇拜习俗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这些崇拜习俗所使用的红赭石埋葬品，涂成红色的地板，大量钟乳石、化石和贝壳，只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①]

梅拉特进一步评论道，只要认为高度发展的、风格化的旧石器时代后

① 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第 24 页。

期艺术只不过是“一种狩猎魔术的表现——一种从类似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那样的落后社会借用来的观点”，“那么，即便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这种女神也几乎是不可能被否定的”，还是毫无希望“与近东后来的生殖崇拜建立任何联系，这种生殖崇拜是以圣母及其儿子的形象为中心的”。但是，勒鲁瓦-古朗声称，“根据所得到的资料”，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①]

换言之，卡塔尔·惠雅克和哈希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经提供了关于我们悬而未决的过去一直缺少的那部分——在旧石器时代和后来的工业技术更先进的黄铜、铜及青铜时代之间所缺少的那种联系——广泛而详尽的资料。正如梅拉特所写的那样：“卡塔尔·惠雅克和哈希拉已经在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学派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从卡塔尔·惠雅克到哈希拉，直到古代的古典时代的伟大‘母亲女神’的宗教连续性便可以得到证明了。”[②]

正如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那样，在卡塔尔·惠雅克的艺术中，女性雕像和符号占据着中心地位。在卡塔尔·惠雅克，到处都可以发现供奉女神和女神雕像的神龛。而且在近东和中东的其他地区，女神雕像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特征。例如，在中东耶利哥城（现属以色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在公元前7000年，那里的人们已经住在用灰泥黏结的砖房里——有的房屋有带烟囱的泥灶，甚至还有门柱的承窝——并且发现了黏土做的女神塑像。[③] 在退尔·爱斯·萨万（以早期的灌溉农业和被称作萨玛拉的装饰着惊人的几何图案的陶器而著名的底格里斯河沿岸的遗址）中，挖掘出了各种各样的小雕像，其中有许多精心描绘的女性雕像。在叙利亚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奥努中，我们发现了最早使用的锤打过的天然铜和第一次使用的黏土砖，并且挖掘出了类似的女性小雕像，有的小雕像埋在遗址的最底层。在杰尔莫，甚至在远至西方的阿塞拉米克·塞斯克罗，都有较晚期的类似的女神小雕像。在这些地方，这种女神小雕像甚至

---

① 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第23页。不幸的是，诸如描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落后社会”以及描述女神中心的宗教的“生殖崇拜”之类的术语在文学中很普遍，而且反映了贬低和鄙视部落民族和妇女的文化偏见。

② 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第23~24页。

③ 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6，第15页。

在陶瓷技术引进之前就已经制造出来了。[1]

虽然这还不是普遍的发掘，但是，已经产生女神雕像和符号的无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远远超出近东和中东的广大地理区域。远到东方的印度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早就发现了大量的赤陶女性雕像。正如约翰·马歇尔所写的那样，这些女性雕像也许表现了这样一种女神："她具有与伟大的母亲女神——圣母——非常相似的性质。"[2] 在欧洲，在远至西方的所谓巨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女神雕像，巨石器时代文化在英格兰的斯通亨奇和埃夫伯里修建了巨大的、精心设计的石头纪念碑。某些巨石器时代文化传播到远至南方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在岛上，一座巨大的藏有7000具尸骨的山洞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接受神谕和举行原始仪式的圣殿。正如詹姆斯写的那样，在这些仪式中，"母亲女神可能起过重要的作用"[3]。

一幅关于文明和宗教的起源及发展的新图像正在逐渐出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乃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文明把数千年的历史引导到我们的时代。而且，这些在物质和社会技术方面创造了最初的伟大突破的地方，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女神崇拜。

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呢？而且，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这种关于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新观点，而抛弃旧的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男性中心论的学说呢？这种旧学说是许多动听而不可信、内容贫乏而装潢精美的考古学书籍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加以阐述的老调。

一个理由是，我们所发现的证明新石器时代以女性为中心（或以女神为基础）的宗教的女性雕像和其他考古文献太多，以至于仅仅把它们编成目录也要好几卷节。但是，主要的理由是，这种关于史前史的新观点乃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深刻变化的结果。

挖掘埋葬的古代金银财宝就像抢劫埃及法老的坟墓的盗墓贼一样古老。但是，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只能追溯到19世纪后期。即使在那时，最早的考古学挖掘工作，虽然在理智上也为我们对过去的好奇心所推动，但主要目的还是掠夺坟墓中的金银珍宝。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的博

---

[1] 詹姆斯·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纽约，斯克里伯纳出版社，1975，第152、52～53页。

[2] 詹姆斯：《史前宗教》，第157页。

[3] 詹姆斯：《史前宗教》，第70～71页；詹姆斯：《母亲女神崇拜》。

物馆为了获得惊人的古物，就干过这种盗墓的勾当。考古挖掘作为从遗址——不管它是否有考古学意义上的财宝——获得大量资料的一种方法的观念，只是在很晚才产生。实际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作为对我们祖先的生活、思想、技术和社会结构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开始获得应有的信誉。

新的挖掘工作逐渐由科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气象学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小组来领导，而不是由单个学者或早期的探险家来进行。这种表现了最近的挖掘工作——像梅拉特在卡塔尔·惠雅克的挖掘工作——的特点的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正在使我们对我们的史前史有更加准确的理解。

但是，或许最重要的是，一些非凡的技术上的突破——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魏拉德·利比用放射性碳或碳 14 确定年代的方法，以及用树干的年轮测定树的年代的方法——极大地增进了考古学对过去的理解。从前，确定年代主要靠推测，即估计一个物品比另一个更落后、相当或更“先进”。但是，当确定年代成为可以重复和可以证实的技术的功能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一件人工制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技术性，那么它必然属于较晚，因而可能更文明的时代。

因此，对于年代顺序的引人注目的重新估计反过来彻底改变了关于史前史的早期观点。我们现在知道，农业——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可以回溯到比以前所认为的更早的时期。事实上，考古学家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或农业革命的最初迹象开始出现于公元前 9000 ~ 前 8000 年，即大约一万多年以前。

农业革命是我们人类物质技术独具一格的最重要的突破。因此，我们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开端同样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早。

有规律的，有时甚至是过剩的食物供应增加了人口，从而出现了最初的大城镇。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耕种和灌溉着土地。技术的专业化和商业加速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而且由于农业解放了人类的力量和想象力，诸如制陶和编篮筐、纺织和制革、珠宝制造和木刻这样的手工业，以及诸如绘画、泥塑和石雕这样的艺术都繁荣兴旺起来了。

同时，人类精神意识的进化继续向前发展。最初的拟人化的、以女神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现在进化成了一种关于象征、仪式、神意和禁忌的复杂

体系，所有这些象征、仪式、神意和禁忌都表现在新石器时代丰富的艺术之中。

这种女性中心论的艺术传统的某些最生动的证据是梅拉特在卡塔尔·惠雅克挖掘到的出土文物提供给我们的。在这里，在近东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 32 英亩的考古学遗址。虽然只有 5% 的坟墩被挖开了，但是这次挖掘工作已使我们了解到一个长达 800 年左右的时期，即从公元前 6500 ~ 前 5700 年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艺术中心，有许多壁画、石膏浮雕、石雕和大量泥制的女神雕像，所有这些艺术品都以对女性神祇的崇拜为主题。

梅拉特在总结对卡塔尔·惠雅克第一次历时三个工作季度（1961 ~ 1963）的发掘时写道："它的无数祭坛证明了一种先进的宗教，这种宗教具有完美的符号体系和神话；它的建筑证明了建筑学和有意识设计的诞生；它的经济证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先进；它的大量进口证明了原材料贸易的繁荣。"①

尽管在卡塔尔·惠雅克和哈希拉近郊（在公元前 5700 ~ 前 5000 年就有人居住）所进行的挖掘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早期文明的最丰富的资料，但是南安纳托利亚平原只不过是建筑学上有文献记载的建立了女神崇拜的农业社会的少数地区之一。实际上，大约在公元前 6000 年，不仅农业革命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事实，而且——用梅拉特的话来说——"充分发展的农业社会一方面已经扩展到迄今为止的边远地区，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外高加索和里海以东的冲积平原，另一方面已扩展到东南欧"。"有些交往——例如在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明显地是通过海路"，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从那里来的移民都带来了完全成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②

总之，虽然仅仅在 25 年前考古学家还在谈论苏美尔是"文明的发源地"（而且这种观点现在还在公众中流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文明的发源地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所有这些文明的发源地都比我们以前知道的要早 1000 年，就是说，要回溯到新石器时代。正如梅拉特在 1975 年出版的他的《近东的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都市文明一直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现在在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的耶利哥或卡塔尔·

①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11 页。

② 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第 275 页。

惠雅克这样的遗址中发现了它的先驱，这些地方一直被认为是落后的。”[1]而且，我们现在还知道了另外一些对我们的文化进化的最初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在所有这些创造了我们的物质和社会技术最初的伟大突破的地方，上帝是一位妇女”——默林·斯通用这句不朽的话作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

关于文明比我们以前相信的更古老和更普遍的新知识，理所当然地正在产生许多新的学术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对早期的考古学理论做了大量的重新评价工作。但是，除了在女权主义学者中，在这些最初的文明中，意识形态是女性中心论的这个主要而引人注目的事实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非女权主义学者即使提到这个事实，常常也是一带而过。甚至像梅拉特——他的确提到过这个事实——这样的一些学者大都只是把这个事实作为一个具有纯艺术和宗教意义的问题，而没有探讨它的社会和文化含义。

事实上，流行的观点仍然是：男性统治、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度都是农业革命的副产品。而且这种观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无视这样的事实：在两性之间，而且在所有的人之间，平等乃是新石器时代的普遍规范。

我们在以下各章中将继续讨论这个引人入胜的题目。但是，我们首先要转向另一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新的发现目前正在推翻旧的考古学观念。

古代欧洲

一个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地方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最明显的证据，这些证据揭示了在人类文化过去不为人知的数千年中人类生活的情况。与那种长期为人们所接受的理论——地中海富饶的近东地区乃是文明的发源地——相一致的是，古代欧洲一直被认为只是一个文化死气沉沉的地方，后来才形成短暂的米诺斯和希腊文明，而且只不过是受东方影响的结果。但是，现在显现出的情景却完全不同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家马里亚·金布塔斯在《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

[1] 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第10页。

神》中写道："这里，介绍一个新名词——古代欧洲的文明，就是说，承认新石器—铜器时代的东南欧不同文化群体的共同特点和成就。"这部突破性的著作把数百件考古学发现物归了类并进行了分析，这些考古发现物分布在一个大体上向北——从北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包括岛屿）直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扩展的地区。[1]

7000年前的东南欧居民不像是原始的村民。金布塔斯写道："在农业稳定发展的2000年中，对富饶的河谷地区日益高效率的开发不断地改善了那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种植了小麦、大麦、豌豆、巢菜和其他豆科植物，饲养了除了马之外现在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各种家畜。制陶工艺和骨石制品技术得到了发展，铜冶炼术在公元前5500年就已被引进到中欧东部地区。经过1000年的发展，贸易和交通必然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惊人的、互相补充而得益的推动。……他们雕刻在陶瓷制品上的图画证明，早在6000年前他们就使用了帆船。"[2]

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3500年之间，这些早期的欧洲人就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包括手工业行会在内的社会组织。他们创造了复杂的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用铜和金这些金属制造装饰品和工具，甚至还发展了一种类似原始文字的东西。用金布塔斯的话来说："如果我把文明定义为特定民族适应其环境以及发展相应的艺术、技术、文字和社会关系的能力，那么，古代欧洲所获得的显著成就便是证明。"[3]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古代欧洲人的形象是那些可怕而野蛮的部落人，他们不断向南推进，最后终于在罗马城的围城屠杀中征服了罗马帝国。因此，考古学的铁铲向我们揭示的古代欧洲社会的一个最显著而且令人深思的特点是它在本质上爱好和平的特征。金布塔斯写道："古代欧洲人绝不愿意住在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又高又陡的山上；不像后来的印度

---

① 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17页。就其广义而言，"古代欧洲"包括草原游牧者（库尔干人）入侵之前的整个欧洲西部的黑海平原。参见梅拉特《女神的语言：古代欧洲的形象和象征》，纽约，范·德·马克出版社，1987。在狭义上，"古代欧洲"适用于欧洲最初的文明，这种文明主要集中在东南欧（参见插图说明）。

② 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18页。

③ 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17页。

欧罗巴人那样在险峻的地方修建山顶要塞，并且常常用巨大的石墙把他们的山坡居住地包围起来。古代欧洲的居民点一般都选在山清水秀、适合放牧牲畜的地方。温恰、伯特米尔、佩特里斯蒂和库库特尼等定居地都是极好的地方，因为它们那里环境十分优美，而不是因为它们具有防御价值。没有大量的要塞和杀人武器的特点表明了大多数爱好艺术的人爱好和平的特点。"①

而且，在这里，正如在卡塔尔·惠雅克和哈希拉在1500多年里没有战争破坏的迹象那样，②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男性统治并不是规范。金布塔斯写道："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已成为必要，但两性之间还是平等的。在温恰墓地的53座坟墓中，男性坟墓和女性坟墓之间几乎看不出有任何财产方面的差别。……就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温恰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平等和明显不是家长制的社会。瓦尔纳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可以看到，那里并没有按照家长制的男女价值等级划分社会地位。"③

总之，在这里，正如在卡塔尔·惠雅克那样，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一个没有以阶级或性别为基础的明显差别、普遍不分等级、基本上是平等的社会。但是，差别在于，在金布塔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并不是简单地附带提及的。这位著名的考古学先驱反复提醒我们注意她一直勇敢地加以强调而其他许多人宁愿忽视的那些东西：在这些社会中，我们看不到性别不平等的迹象，我们大家只受到了"人性"的教育。

金布塔斯写道："在几乎所有已发现的古代欧洲的公墓中，墓穴的装饰都证明那时的社会是一种男女平等的社会。"她还提出了许多物证证明这种社会是一种母系社会，即一种通过母亲追溯血统和继承权的社会。④她还指出，考古学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妇女在古代欧洲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布塔斯写道："家庭神龛、庙宇的模型以及实际的庙宇遗址，都证明妇女管理着供奉不同形象和职责的女神仪式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她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制作祭祀用品和奉献的礼品。庙宇的模型显示出磨谷粒和

① 马里亚·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印欧研究论文集131》，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第2章，第17页。

②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53页。

③ 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2章，第32～33页。

④ 马里亚·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2章，第33～34页。

烘烤祭祀面包的样子。……在通常构成建筑物的一半或占据庙宇地下室的作坊里，妇女们制作并装饰大量适合不同仪式的各种各样的罐子。庙宇祭坛的旁边立着一架竖式织机，大概是用来织祭祀衣服和庙宇装饰物的。古代欧洲最精致的创作物——现在还保存着的最精美的花瓶、雕像等等——都是妇女的作品。"①

考古学的铁铲还在挖掘这些古代社会——在这些社会里，女神崇拜是全部生活的中心——留给我们的艺术遗产。1974 年，当金布塔斯第一次发表她根据自己挖出的文物和 3000 多个其他遗址作出的研究成果的概要时，除了大量的仪式容器、祭坛、庙宇和画在罐子和神龛墙上的画之外，还挖出了至少 3 万件黏土的、大理石的、骨头的、铜的和金的小雕像。②

在这些文物中，这种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有说服力的遗迹是雕像。它们提供了关于那时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情况，否则考古学家就无法了解那时的生活情况，例如流行的服装式样，甚至发型。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期宗教仪式的神话形象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情况正像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里，以及后来在安纳托利亚的广阔平原的近东、中东新石器时代的其他遗址里一样，这些雕像所证明的是：女性雕像和象征在这里同样占据着中心地位。

除此之外，它们甚至还提供了关于这种逝去了的早期文明在美学和社会进化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引人注目的证据。因为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主题上，这些女性雕像和象征有许多同后来在传说中的克里特岛上繁荣昌盛的青铜时代文明的那些雕像极其相似。成千上万的旅游者今天仍然在访问克里特岛，而他们对他们实际上所看到的东西却几乎是一无所知。

在我们考察克里特岛之前——克里特岛是唯一已知的"高级"文明，那里的女神崇拜一直残存到现在——让我们首先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们可以从有关西方文化进化早期方向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中推论出来的东西，以及它和我们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① 马里亚·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 2 章，第 35～36 页。
② 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 11～12 页。

第二章　来自过去的信息：女神的世界

我们的崇拜女神的史前祖先是哪一类人呢？在有文字记载或成文的历史之前，我们的文化进化的几千年间，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能够从这些与我们自己血肉相关的时代中学习到什么呢？

由于我们的史前祖先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字说明，所以我们只能像福尔摩斯扮演科学家那样去猜想旧石器时代和后来更进步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如何思考、感觉和行动的。但是，我们所学到的关于古代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以猜想为基础的。甚至我们从诸如苏美尔、巴比伦和克里特等早期历史文化所获得的文字记载充其量也不过是贫乏而零碎的，而且大多是关于商品和其他贸易文件的目录。后来更详细的关于史前史以及古希腊、罗马、希伯来和基督教时代早期历史的文字说明，主要也是以推断为基础的，这种推断甚至无须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帮助就可以作出来。

的确，我们所听到的被认为是我们文化进化的大多数东西实际上已经是解释。而且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解释多半是仍在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的具体化。它已经构成了根据零碎的资料推论出来的被解释为符合我们的文化进化的传统模式的结论：我们的文化进化是一种从"原始人"向所谓的"文明人"的直线进步，尽管原始人和文明人有许多差别，但是他们都专心于征伐、杀戮和统治。

通过对古代遗址的科学发掘，考古学家们近年来获得了关于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当时我们的祖先首先定居在靠农业和畜牧业维持的公社里。根据最新的观点所作的分析表明，这些挖掘出来的文物所提供的大量关于我们的过去的资料，可以作为重新评价和构造我们的过去的根据。

这些资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出土的建筑物和建筑物里面的衣服、珠宝、食物、家具、容器、工具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具。另一个来源是出土的墓穴遗址，它们不仅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而且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两种资料来源的重叠是我们关于史前时代的最丰富的资料来源：艺术。

即使在有文字记载的和口头文学传说的时代，艺术也是一种符号交往的形式。新石器时代的大量艺术品——无论是关于日常生活或重要神话的壁画、宗教人物的雕像、描绘宗教仪式的檐壁，还是简单的花瓶上的装饰、海豹皮上的画或珠宝上的雕刻——告诉我们大量关于这些人如何生活和死亡的故事。它们还告诉我们大量关于这些人如何思考的故事，因为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实实在在是一种语言或速记，用符号表现那时的人们是如何感受形成我们所说的那种现实的。[①] 而且，如果我们让这种语言来说明自己，而不用现在流行的模式去推测它，那么，它会给我们讲述一个关于我们文化起源的迷人故事，而且，与陈规老套相比，这个故事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故事。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

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它所没有描绘的部分。因为一个民族在他们的艺术中所没有描绘的内容也可以像他们所描绘的部分那样使我们对他们有所了解。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与后来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明显没有这样的主题：把以武力、残忍和暴力为基础的权力理想化的雕像。这里没有“高贵的武士”形象或战斗场面，也没有任何“英勇的征服者”——这些征服者身后拖着带着铁链或其他奴隶标记的俘虏——的象征。

同样与他们最早和最原始的男性统治的入侵者的遗物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新石器时代崇拜女神的社会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没有大量“首领”的坟墓。而且与后来的男性统治的文明，例如埃及文明，形成显著对比的是，这里没有伟大的统治者的标志：他们在去世时把那些身份低下的人作为陪葬品。

① 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37～38页。

此外，与后来的统治者社会相比，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发现大量的武器贮藏处，或者大量地把物质技术和自然资源用于武器的任何其他标志。另外，这里没有军事防御工事进一步证明了这是一个的确非常独特的和平时代的推论。武器和军事防御工程只是后来才逐渐开始出现，这明显是对来自地球边缘地区好战的游牧部落的武装入侵的反应，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以后将要加以考察。

在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中，无论是女神还是她们的后裔，都不曾带有我们所知道的与强力——矛、剑或雷电这些靠杀戮和残害来迫使人们服从的世俗统治者和（或）神的象征——相关联的标志。甚至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艺术显然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这种统治者社会所特有的形象。

的确，我们在所有的地方——在神龛和房屋中，在壁画上，在花瓶的装饰花纹上，在圆雕雕刻品上，在泥质小雕像和浅浮雕品上——所发现的是丰富多彩排列整齐的取自大自然的象征。这些与女神崇拜相关的象征证明那时的人们对美好而神秘的生命的敬畏和惊奇。

在匈牙利出土的大约公元前 5000 年的古代欧洲祭坛上刻着维持生命的要素：太阳和水。例如，波浪形状的几何图形被叫做波形饰，它象征流动着的水。在卡塔尔·惠雅克的神龛墙壁上绘着有巨大弯角的巨大的石牛头，在罗马尼亚南部发掘出刺猬形赤陶制品，在保加利亚发现了宗教仪式使用的雌鹿形花瓶、鱼面蛋形的石雕品和祭祀使用的鸟形花瓶。[1]

正如在克里特岛东部的扎克罗的印鉴中，描绘着长着有眼蝴蝶的翅膀的女神那样，象征变形的蛇和蝴蝶在历史上始终是女神变形力量的标志。甚至后来的克里特岛的双刃斧——这种斧子使人联想到开垦农田的锄形斧——也是仿效蝴蝶形状的。[2] 蛇通过蜕皮而获得新生，它是女神显灵的要素，也是女神再生力量的另一种象征。[3]

而且我们在所有的地方——在壁画上，在雕像和还愿小雕像上——都发现了女神的形象。在处女、女祖先或女造物主的各种化身中，她就是

---

① 参见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中的插图（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

② 《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全页插图 17 和书中插图 148。

③ 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 148 页。

水、鸟和大地的母亲，或者说简直就是怀抱圣婴的圣母。[①]

有些形象十分逼真，以至于它们就像是活的，例如在斯洛伐克西部发现的远在公元前5000年的一个盘子上的蜿蜒滑动的蛇。其他形象的风格也十分独特，以至于它们甚至比我们“现代”的艺术更抽象，在这些形象中，有出自匈牙利东南部蒂萨文化的用表意符号雕刻的呈女神崇拜形状的风格粗犷的献祭花瓶或圣杯，在公元前5000年罗马尼亚的双臂交叉支着头的女神，有公元前6000年保加利亚中部特尔·阿兹马克的大理石女神雕像，这种雕像有着比例恰当的手臂和夸张的三角形阴部。还有一些形象也是不可思议地美丽，例如，一个8000年前的有着女性胸部的角状赤陶制品——它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古希腊被称之为“胜利女神”的雕像，以及绘有形象优美和丰富多彩的几何形状盘蛇图案的库库特尼花瓶。而另外一些形象，例如刻在女神肚脐或乳房附近的十字，提出了有关我们自己的某些最重要象征的早期含义和有趣问题。[②]

许多形象包含着奇妙的含义，它们的梦幻般的、有时异乎寻常的特点使人想起神秘的宗教仪式和早已被遗忘的神话。例如，温恰雕刻品上鸟形面孔的妇女和她抱着的鸟形面孔的婴儿，可能是古代仪式中戴着面具的主角，她们可能正在演出一个关于鸟女神和她的圣婴的神话故事。同样的，公元前4000年马其顿长着人眼的赤陶公牛头使人想起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的仪式和神话中戴着面具的主角。这些戴面具的形象有些可能代表宇宙的力量，或者是仁慈的力量，或者是恐怖的力量。另一些形象有一种幽默的效果，例如，公元前5000年法夫柯斯戴面具穿灯笼裤的袒腹男子，金布塔斯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喜剧演员。还有金布塔斯所谓的宇宙蛋那种东西。这些形象也是女神的象征，她的身体乃是容纳生命的奇迹并通过自然的神秘循环而且有起死回生力量的圣杯。[③]

事实上，这种由女神人格化的自然界万物统一的主题好像渗透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因为，在这里，统治宇宙的超人力量是一位神圣的母亲，

① 例如，参见埃里克·诺伊曼《圣母》(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5)中的插图；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按顺序排的全页插图58、59、105～107、140、144的例证；全页插图53；第95～103页上的文中插图50～58；第114、181、173、108、136页。

③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66页；全页插图132、341、24、25；第101～107页。

她赋予她的子民以生命，给他们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食粮，而且甚至在死亡时也可以指望她把她的孩子带回她的宇宙子宫。

例如，在卡塔尔·惠雅克的神龛中，我们发现了不仅孕育而且给予生命的女神雕像。她常常由强有力的动物伴随，例如豹子，特别是公牛。[1]作为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象征，在有关她的某些艺术作品中，她本人部分是人，部分是动物。[2] 甚至在她那隐秘的外表下，在学者们所谓的神秘东西中，她始终被描绘为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所有的生灵都产生于她，所以在死亡时又回归于她以再次获得新生。

可以说，学者们所谓的女神的神秘外表——她的超现实主义的、有时是形式怪异的画像——体现了我们的祖先试图通过赋予我们人类所恐惧的朦胧而未知的东西以名称和形状来应付现实的黑暗所作的努力。这些神秘的形象——面具、壁画和奇形怪状的、有时也是幽默形式的象征死亡的雕像——可能也是有意要赋予宗教信徒一种不仅是有危险的，而且是控制世界的仁慈力量的神秘的整体感。

因此，正如宗教雕像和仪式歌颂赞美生命那样，自然的毁灭过程同样受到赞赏和尊重。宗教仪式和典礼试图赋予个人和集体以参与和控制那给予生命和保护生命的自然过程的感觉，与此同时，其他的仪式和典礼试图避开更恐怖的过程。

但是，尽管如此，具有生死双重外表的女神的许多形象似乎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看来，艺术和生命的原初目的并不是征服、抢劫和掠夺，而是去耕种土地，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精神资力，使生活得到满足。而且从整体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以及甚至是更进步的米诺斯艺术，似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统治宇宙的神秘力量最初的职能并不是强迫服从、惩罚和毁灭，而是给予。

我们知道，艺术，特别是宗教或神话艺术，不仅反映人们的看法，而且也反映了他们的独特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我们所考察的这种以如神为中心的艺术，明显没有男性统治或战争的形象。这种艺术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首先是作为氏族首领和女祭司，然后是担当其他重要角色的妇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这种社会中，妇女和

---

①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77～203 页。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参见，例如，全页插图 179～181 的蜜蜂女神，全页插图 183～185 戴面具的女神，第 146 页长着鸟嘴的女蛇神。

男人以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劳动。虽然说这里没有赞美携带雷电或武器的愤怒的男性神或统治者，也没有赞美身后拖着铁链的可怜的奴隶的伟大征服者，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推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就没有这些形象。[①] 而且，虽然主要的宗教形象是一位孕育生命的妇女，而不像我们今天是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男人，但是，推测生命和对生命的爱——而不是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统治着社会和艺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女神崇拜

史前的女神崇拜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神话学家和宗教史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所谓的“信仰调和论”[②]。从根本上来说，它的意思是，女神崇拜既是多神论的，也是一神论的。说它是多神论的，就是说，女神是在不同的名字下而且以不同的形式被崇拜的。但是，它也是一神论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信仰女神就像我们说信仰作为一种先验实体的上帝一样。换言之，在与各个不同地方崇拜具有母亲、女祖先或女创世主以及贞女或处女等各种不同面貌的女神有关的象征和形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关于这种明显的宗教统一性，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所有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似乎最初崇拜的是女神。我们在农业发源的三个主要中心——小亚细亚和东南欧，东南亚的泰国，以及后来的中美洲——发现了把女性神化的证据，因为就女性的生物属性来说，她正如大地那样给予生命和食物。[③]

① 在米诺斯克里特的艺术中没有这些形象也是引人注目的。参见，例如，J.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 75 ~ 76 页。米诺斯女神的双刃斧是开垦农田用的锄斧的原始雏形，按金布塔斯的说法，也是女神显灵的组成部分——蝴蝶的象征。正如金布塔斯指出的，作为蝴蝶的女神的象征一直刻在双刃斧上（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 78、186 页）。

② 约瑟夫·坎贝尔：《女神的古典秘密宗教仪式》（埃萨伦研究所专题讨论会，加利福尼亚，1979 年 5 月 11 ~ 13 日）。文化史学家埃莉诺·盖登也强调史前女神崇拜的这个方面，但认为它是更重要的一步。盖登认为，女神重新出现在我们时代，对于十分迫切地反对流行的种族中心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激进的多元论来说是一个契机［关于埃莉诺·盖登《过去和未来的女神：我们时代的一个象征》的内容介绍（旧金山，哈泼与罗出版社，1988），以及和盖登的私人通信，1986］。

③ 参见约瑟夫·坎贝尔：《女神的古典秘密宗教仪式》。

在世界各地关于最早所知的许多创世传说中，我们发现母亲女神乃是万物之源。在美洲，她是穿蛇裙的淑女；有趣的是，还因为——就像在欧洲、中东和亚洲那样——蛇是她最初的化身之一。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在关于作为宇宙的女神母亲身体的世界山的观念中，也发现了这种相同的关于宇宙的概念，这种概念保存在各个历史时期中。而且就像纳慕——创造天空和大地的美苏尔女神——那样，她的名字由一个表示海的表意符号记录在约公元前2000年的一部楔形文字的文本中（现在保存在罗浮宫）。[①]

女性原则和原始的水相联系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例如，在古代欧洲的装饰陶器上，用象征手法表示的水——往往与原始的蛋相关——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在这里，伟大的女神——有时以鸟或蛇女神的形态出现——统治着孕育生命的水的力量。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安纳托利亚，下雨和产奶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仪式用的容器和花瓶是女神神龛里的标准器皿。她的形象也和盛水的容器有关，有时她被描绘为具有人形的水。作为埃及的女神努特，她是天空原始水流动的统一体。后来，作为克里特的女神阿里阿德涅（最神圣的太一）和古希腊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她诞生于大海。[②] 事实上，这个形象在基督教的欧洲始终如此有影响，以至于它使桑德罗·波提切利获得灵感创造了著名的诞生于大海的维纳斯。

虽然在我们所学到的关于我们的文化进化的知识中几乎没有包括这种看法，但是，在新石器时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所发展起来的许多东西仍然与我们今天密切相关。正如梅拉特所写的那样："它构成了所有后来的文化和文明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③] 或者像金布塔斯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在它们所代表的世界被毁灭了之后，我们崇拜女神的新石器时代祖先的神话形象，"仍在地下进一步滋养着欧洲文化的发展"[④]，极大地丰富了欧洲精神。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新石器时代的艺术，那么，实实在在令人

---

① 参见，例如，约瑟夫·坎贝尔：《神话形象》，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第157、77页。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112～150、112、145页；文中插图87、88、105、107；第149页。

③ 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5，第279页。

④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38页。

吃惊的是，这个时期艺术中的许多女神雕像被保存下来，而许多论述宗教史的标准著作却没有阐明这个迷人的事实。正如新石器时代怀孕的女神是旧石器时代十分丰满的“维纳斯”的直接后裔一样，中世纪基督教肖像画中怀孕的马利亚保存了同样的形象。新石器时代的年轻女神或处女的形象也仍然作为圣女马利亚的形象受到崇拜。当然新石器时代怀抱圣婴的母亲女神的形象作为基督教的圣母和圣婴，仍然戏剧性地随处可见。

与女神有关的传统形象——例如公牛和牛头骨装饰品，或公牛的角——作为自然力量的象征，同样很好地保存在古典时代和后来的基督教时代之中。公牛作为后来“异教”家族神话的主要象征是恰如其分的。再晚些时候，在基督教的肖像画中，长着公牛角的神从男性力量的象征变成了撒旦或邪恶的象征。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现在习惯于和魔鬼相联系的公牛角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卡塔尔·惠雅克，不仅在房屋中而且在神龛中都挖出了公牛角形状的偶像。在那里，献祭用的牛角有时在女神偶像的下面排成行或摆成祭坛。[①] 在这里，公牛本身仍然是女神基本力量的体现。它是男性原则的一种象征，但是，就像所有其他的东西那样，它来自一个孕育万物的神圣子宫——就像在卡塔尔·惠雅克的一个神龛中生动地描绘的那样，在那里，描绘着女神正在生产一头小公牛。

甚至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两种同时存在的形式——例如，在卡塔尔·惠雅克出土的成对的女神雕像——在历史上也保存下来了，就像在古希腊的得墨忒耳和科列的形象中那样，她们是女神的两种外表：作为自然界循环再生象征的母亲和处女。[②] 事实上，女神的子女从整体上来说完全与诞生、死亡和复活的主题相联系。她的女儿作为珀耳塞福涅或科列一直保存到古希腊时代。而她心爱的儿子或丈夫在历史上同样完美地保存下来了，只不过名字变成了阿多尼斯、塔木兹、阿提斯，并且最终变成了耶稣基督。[③]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古代欧洲的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以及后来的米诺斯和迈锡尼青铜时代的文明中，伟大女神的宗教似乎曾经是生活中唯一最突出而重要的特点，那么，宗教象征手法的这种似乎十分明显的连续性就变得十分容易理解了。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塔尔·惠雅克遗址中，女神崇

① 参见，例如，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108～109 页。
② 参见，例如，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13 页。
③ 参见，例如，诺伊曼：《圣母》。

拜似乎渗透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 1961 年和 1963 年之间出土的 139 间房屋中，有 40 多间似乎是当做神龛用的。[①]

在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欧洲，这种模式相当流行。除了所有这些供奉各种不同面貌的女神的神龛之外，每间房屋都有带炉灶、祭坛（长凳）和放祭品处的专供祭祀用的神圣角落。后来的克里特文明也是如此，在那里，正如金布塔斯所写的那样："各种各样的神龛数不胜数，以至于有理由相信不仅每座宫殿而且每座私人房屋大约都被当做神龛使用了。……根据神龛、献祭的牛角和双刃斧的多少来判断，克诺索斯的整个宫殿必定像一座圣殿。无论你走到哪里，各种柱子和象征都提醒你伟大女神的存在。"[②]

说崇拜女神的人是在迷恋宗教，可能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完全没有领会问题的实质。因为在这里，世俗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并没有截然分开。正如宗教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史前时代，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历史上，宗教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宗教。

使这种观点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是，学者们过去曾经墨守成规地认为崇拜女神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对生殖的狂热崇拜"，而且认为女神是"大地母亲"。虽然妇女和大地的生育力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物种延续必不可少的能力，但是，这样描述女神崇拜的特点就太简单化了。同样的情况是，例如，由于基督教艺术的主要形象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把基督教的特点刻画成只是一种死亡崇拜，这也是过分简单化的。

与现代的宗教意识形态及世俗意识形态一样，新石器时代的宗教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众神和基督教的众神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世界观多么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观。在新石器时代，神圣家庭的家长是一位妇女：伟大的母亲、天后，或者以各种不同面貌和形式出现的女神。众神的男性成员——她的丈夫、兄弟和儿子——也是神圣的。相反的，基督教神圣家庭的家长却是一位万能的父亲。众神中的另一个男性——耶稣基督——是神性的另一种面貌。虽然父亲和儿子是不死的和神圣的，但是，马利亚——这位父权制家庭组织这种宗教摹本中的唯一妇女——很明显，就像她的世俗的复本一样，只是个地位低下的、终有一死的凡人。

① 参见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77 页。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 80 页。

那种在其中最有影响或唯一的神是男性的宗教，往往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中，血统是父系的（通过父亲来追溯），而且定居在男家（妻子跟随她丈夫的家族或部落一起生活）。反之，在其中最有影响或唯一的神是女性的宗教，往往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中，血统是母系的（通过母亲来追溯），而且定居在女家（丈夫跟随他妻子的家族或部落一起生活）。[①] 而且，一种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而且通常是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从历史上看是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众神和宗教学说来表现和维护的。这种宗教学说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是神规定的。

新石器时代如果不是父权制，那么必定是母权制

把上述这些原则运用于大量关于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最高的神曾经是女性的证据，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一些学者得出了一个看来是十分重要的结论：如果史前时代不是父奴制，那么它必定曾经是母权制。换言之，如果不是男人统治妇女，那么必定是妇女统治男人。

后来，在这种证据似乎并不能支持这种女性统治的结论时，许多学者便退而接受更传统的观点。他们推论，如果从来没有母权制，男性统治毕定一直是人类的准则。

然而，证据并不支持这些结论中的任何一个结论。首先，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就其一般结构而言，前父权制社会从任何一种当代标准来看都是相当平等的。其次，虽然在这些社会中，血统似乎一直是根据母亲来追溯的，而且妇女作为女祭司和部落的首领，似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过领导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男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在任何意义上都像妇女在代替这种社会制度的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中那样处于服从和受压迫的境遇之中。

根据对卡塔尔·惠雅克的前父权制社会的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学家最初的目的是在那里有计划地凭遗迹重新复制城市居民的生活——梅拉特所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建筑物、设备和墓葬礼品的规模使人联想到某些

---

① 参见，例如，简·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伦敦，默林出版社，1903，1962，第 260～263 页。

社会的不平等，但这绝不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平等”[1]。例如，在卡塔尔·惠雅克，房屋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多数房屋都是标准的长方形，面积大约有 25 平方米。甚至神龛在结构上也和房屋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规模也并不一定更大，而且大多和房屋混建在一起。这再次证明了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是集权和等级制的社会和宗教结构。[2]

对卡塔尔·惠雅克的殡葬习俗的分析得到了普遍相同的结论。与后来的印度欧罗巴族长的坟墓不同——这些坟墓显然证明了一种由一位令人害怕而可恶的居首位的强者统治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卡塔尔·惠雅克的坟墓证明那里并没有明显的社会不平等。[3]

就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关系而论，正如梅拉特所指出的那样，卡塔尔·惠雅克的神圣家庭的确是“根据重要性，如母亲、女儿、儿子和父亲的次序”[4] 来表示的，而这可能反映了城市居民的人类家庭，这种家庭明显是根据母亲及其祖先来追溯血统的，而且定居在妻子的家庭或部落中。在卡塔尔·惠雅克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中，描绘女神的拟人化艺术品——年轻的姑娘、成熟的母亲和老祖母或女祖先，一直追溯到最初的女造物主——正如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后来指出的那样，确实是妇女生活不同阶段的具体化。[5] 还能使人想到一种根据母亲及其祖先追溯血统的和定居或聚集在妻子的家庭或部落的社会组织的是：在卡塔尔·惠雅克，我们始终在同一个地方，即起居室的东边，发现了放置妇女个人物品和她的床或长椅的住宿平台。男人的住宿平台却是不固定的，并且也稍微小一点。[6]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种证明妇女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生活上都很优越的证据，这并不能证明在妇女和男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也不存在妇女征服或压迫男人的任何迹象。

与我们时代男性统治的宗教——在这种宗教里，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甚至直到最近还只有男人才能成为宗教僧侣统治集团的成员——形成尖锐对比的是，这里显然不仅有女祭司而且也有男祭司。例如，梅拉特指出：虽然在卡塔尔·惠雅克，最初似乎可能是女祭司主持女神崇拜的仪

①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225 页。
② 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第 100 页；《卡塔尔·惠雅克》，第 6 章。
③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9 章。
④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201 页。
⑤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262 页。
⑥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60 页。

式，但是，也有证据表明男祭司参加了仪式。他报道说，只在坟墓的神龛中发现的两组东西是黑曜石制的镜子和精美的骨剥皮带扣。只在妇女身边发现了前者，在男人身上发现了后者。这就导致了梅拉特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东西“是某些女祭司和男祭司的标志，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只在神龛中发现了它们，而且也解释了它们很少见的原因”[①]。

同样明显的是，有时雕塑成使人联想起罗丹的著名的“思想者”姿态的老年男人的雕像表明，男女老人都曾扮演过重要而受人尊敬的角色；[②]公牛和牛头骨装饰品或献祭的牛角——它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和古代欧洲的神龛中，以及后来在米诺斯和迈锡尼的雕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男性原则的象征，正如男性生殖器和公猪是男性原则的象征那样。这种男性原则出现在晚期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此外，有些早期的女神雕像不仅是人和动物特点的混合物，而且常常具有例如过分夸大的长脖子的特点，这可能被解释为雌雄同体。[③] 当然，年轻的男神，即女神的儿子兼配偶，在前家长制宗教的主要奇迹中，即新生和轮回中发挥着一种循环的作用。

因此，当女性原则作为生命奇迹的最初象征渗透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和意识形态时，男性原则显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古代世界直到家长制时代，始终通过关于神圣婚姻的神话和仪式赞美这两种原则的联合。例如，在赫梯人的安纳托利亚，伟大的雅兹利卡亚神殿就是为这个目的建造的。而且甚至后来在希腊和罗马，这种婚姻仪式仍然作为“圣婚”被保存下来。[④]

在这方面，有趣的是新石器时代的雕像刻画了对男人和妇女在生育中的联合作用的理解。例如，卡塔尔·惠雅克出土的一件小巧玲珑的石刻饰物表现了一位妇女和男人在热烈地拥抱；紧挨着他们的是一位抱着孩

①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202、208页。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32页，插图248。还可参见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的插图84~91中男性人像的例子。

③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17页，在这里，金布塔斯指出，公元前7000年和公元前6000年，女神雕像常常长着长长的圆柱形的脖子，这是对男性生殖器形象的回忆，而且也有以简单的泥制圆柱形体的形式表现的男性生殖器形象，这种泥制圆柱形体有时有女性胸部，而这种女性和男性特点结合在一个雕像上的特点在公元前6000年以后也没有完全消失。

④ 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母亲女神崇拜》，伦敦，泰晤士与赫德森公司，1959，第87页。

子——他们结合的儿女——的母亲的浮雕。[1]

所有这些雕像都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流行的关于男女之间关系的明显不同的态度，即血统而不是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态度。正如金布塔斯所写的那样，在这里，“正如在印度欧罗巴和其他许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那样，神话世界并没有分化为对立的女性和男性世界。两种原则明显地是并列的。年轻男人或雄性动物形象的男性神祇似乎肯定并加强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活力。男女两性之间是平等的，就是说，通过互相补充，他们的力量增加了一倍”[2]。

我们一再发现，关于是否曾经存在过母权制的争论——这种争论始终反复出现在学术著作和通俗著作中——似乎比任何考古学的证据都更与我们今天流行的范例有关。[3] 这就是说，在我们建立在等级制和地位观念以及内群和外群对立的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中，强调了严格的区别和两极分化。我们的思想从性质上看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想。对这种思想，哲学家们从很早以来就已经警告过，它可能导致对现实过分简单化的误解。实际上，心理学家现在已经发现，它是心理上认知和感情发展的一个低级进化阶段的标志。[4]

梅拉特显然试图解决这种非此即彼，如果不是父权制就必定是母权制的争执，他当时写道：“如果女神指挥着卡塔尔·惠雅克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和死的全部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她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他的角色是严格从属于她的角色，但是男性在生活中的角色似乎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实现。”[5] 但是，在“充分实现的”角色和“严格从属的”角色之间的矛盾中，我们再次发现我们陷入了文化和语言假设中所固有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范例：人类的关系必须符合某种等级制社会秩序。

---

①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184 页。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 237 页。

③ 参见，例如，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学》中“为了防止误解作了这样的说明：这种社会秩序并不是一种性别的统治，因为‘母权制’这个术语可能是由于它和父权制这个术语在语义上是同源语而推论出的”（纽约，双日出版社，1970，第 28 页注 9）；还有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评论：“‘母权制’、‘母权’或‘女性统治’等术语容易被不正确地使用，常常被交换使用”（《妇女所生》，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76，第 42～43 页）。里奇还指出，“罗伯特·布里福尔特试图证明，原始社会的母权制并不就是另一种性别占统治地位的家长制”。关于男女合作这个术语如何避免了这种语义混乱的讨论，参见本书第 8 章。

④ 亚伯拉罕·马斯洛：《走向存在心理学》，第 2 版，纽约，范诺斯特兰德·莱因霍尔德公司，1968。

⑤ 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 184 页。

然而，从一种严格的分析或逻辑观点来看，女神的首要地位——以及与这种首要地位相联系的、由体现在女性身体中的养育和新生的力量所象征的占中心地位的价值——并不能证明这里妇女统治男人的推论的合理性。如果我们通过类似的推理从一种人类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一般也没有概念化为上下级关系——开始，那么，这种情况就变得更清楚了。这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所发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可能是前父权制社会生活的概念的一种残迹。高大强壮的成年母亲在等级关系上，明显地优于弱小的孩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样，孩子是下等的或毫无价值的。

根据这种不同的概念框架进行类似的推理，我们可以发现，妇女在史前的宗教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而有力的作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男人是处在从属地位上的。因为在这里，男人和女人都是女神的孩子，正如他们是支配家庭和部落的妇女的孩子一样。而且虽然这的确赋予妇女以一种很大的权力，但是从我们现在关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进行类比推理，这种权力似乎是这样一种权力：它更是一种责任和爱的权力，而不是压迫、特权和恐吓的权力。

总之，与仍然流行的关于权力——作为剑所象征的权力、夺取的权力或统治的权力——的观点相比，在新石器时代崇拜女神的社会里，似乎曾经有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观点作为规范。这种关于权力就是“女性”养育和奉献的权力的观点，毫无疑问并没有被始终贯彻执行，因为这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社会，而不是虚构的乌托邦。但是，这种观点始终是标准的理想，而且是妇女和男人都竭力仿效的模式。

这种由圣杯所象征的权力观点——我建议把这种权力称之为**现实化的权力**，以区别于**统治的权力**——明显地反映了一种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①] 我们可以从到目前为止所考察的关于过去的

① 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在《开创自由》中对这种区别作了详细讨论。这种区别恰恰是许多思想家目前正在发展的新的女权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参见，例如，J. B. 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卡罗尔·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呼声》，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威尔玛·司各特·海德：《为了女权运动的健康》，布法罗，玛格丽特女儿出版社，1985；在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是安妮·巴斯托的论文，《运用考古学研究妇女历史：詹姆斯·梅拉特论卡塔尔·惠雅克的新石器时代的女神的著作》，载于《女权主义研究》1978 年 10 月第 4 期，第 7～18 页。她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崇拜女神的社会里，权力方式可能被概念化了（见本书导论第 7 页）。

证据得出结论：这种社会不能被称为母权制社会。正如它也不能被称为父权制社会那样，它并不符合那种传统的统治者社会组织的范例。然而，运用我们一直在发展的关于文化转换理论的观点，它其实更适合于对人类组织的别种选择，即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妇女和男人，无论他们中的哪一半都不优于另一半，而且差别并不等于低下或优越。

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两种选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进化。技术的和社会的进化倾向于变得更复杂了，而且无视流行的进化模式。但是，文化进化的**方向**——包括一种社会制度是好战的，还是爱好和平的——取决于我们是有一种伙伴关系的，还是有一种统治关系的社会结构。

第三章　基本的差别：克里特岛

史前史就像一个毁坏或丢失了大部分部件的巨大的拼板玩具，完全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但是，精确地恢复史前史的原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我们缺少许多部件，而在于流行的范例使这种恢复工作很难确切解释我们已有的部件，而且很难设想同这些部件相符合的实际模式。

例如，当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最初报道埃及梅耶特－尼特墓中的出土文物时，他自然而然地就假定梅耶特－尼特是一位国王。然而后来的研究却证明梅耶特－尼特是一位妇女，而且根据她墓中的财宝来判断，她是一位皇后。德·摩根教授在纳格迪发现了巨大的坟墓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也假定这座坟墓是一位国王——第一王朝的霍阿哈的埋葬地。但是，正如埃及学家沃尔特·埃默里所写的那样，后来的研究证明，这是尼特－霍特普——霍阿哈的母亲的墓穴。①

这些文化偏见如何导致错误的例子只不过是例外，正如艺术史家默林·斯通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后来这些错误都被纠正了。斯通女士曾周游世界，考察每件出土文物、每份档案、每件物品，重新考察最初的来源，然后核对过去对它们的解释。而她所发现的是，过去关于妇女和男人曾平等生活在一起的证据竟然完全被忽视了。②

---

① 沃尔特·埃默里，引自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6，第 xxii 页。

② 沃尔特·埃默里，引自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6，第 xxii 页。斯通指出的考古学中的男性中心论的偏见，在其他许多领域里都有其追随者。但是，重要的是要指出，也有许多男性学者对关于妇女的知识和所谓的妇女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个著名的当代例证是阿什利·蒙塔古，他在《妇女天生至高无上》（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和其他著作中消除了许多众所周知厌恶女人的人关于妇女和“父权制必不可免”的错误概念。另一个是（转下页注）

在下面的论述中，正如我们对20世纪初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所发现的著名古代文明所作的考察那样，我们将看到，这种偏见已经导致了一种不完善的，而且实际上严重歪曲了关于我们的文化进化和较高文明的发展的观点。

考古学上的爆炸性事件

发现技术进步而且社会复杂的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古代文化——考古学家根据关于米诺斯国王的传说所命名的——是一件爆炸性的事件。正如考古学家尼古拉斯·普拉东——到1980年，他已经在克里特岛挖掘文物50多年——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家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这种高度发展的文明何以会出乎意料地一直保存到发现它们的时候”[①]。

普拉东多年来一直是克里特古迹挖掘组的负责人，他写道：“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惊人的发现。”由于工作的不断进展，“挖出了许多宏伟的多层宫殿、别墅、农庄、居民区和规划整齐的城市、港口设施，贯穿全岛的公路网、教堂和秩序井然的墓地”。[②] 当考古学家们继续他们的挖掘工作时，发现了四种笔迹（象形文字、原始直线、直线A和直线B），他们根据考古学的定义确定了克里特文明的历史时期或有文字的时期。我们从这些笔迹中了解到关于早期米诺斯时期和晚期迈锡尼时期的许多社会结构和价值的情况。而且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于挖掘工作的进展和大量壁画、塑像、花瓶、雕刻品和其他艺术品的出土，人们终于认识到，这里是文明编年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传统的残迹。

克里特文明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当时一小批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首先来到克里特岛海岸。正是这些最初的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女神，以及使他们被归类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在随后的4000年中，制陶、纺织、冶金、雕刻、建筑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得到了缓慢而平稳的发展，同时日益繁荣的贸易和逐渐进化的活泼而快乐的艺术风格形成了

（接上页注②）弗里特约夫·卡普拉，他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新兴文化》（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82）和其他著作中承认，女权运动乃是一个更和平的人道的未来运动的中心。

① 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15页。

② 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16、25页。

克里特的特点。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进入了考古学家们所谓的米诺斯中期或古宫殿时期。[①]

这时已经是青铜时代，当时在已经开化的世界的其他地方，好战的男神正在从容不迫地取代女神。但是，女神——例如埃及的哈托尔和伊希斯、巴比伦的阿斯塔特或伊什塔尔，或安纳托利亚的太阳女神——仍然受到崇拜。然而她现在只是一位从属的神，被描绘为更强有力的男神的配偶或母亲。因为这是一个日益繁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的权力也在降低，男人统治和征服及反征服的战争比比皆是，成了家常便饭。

在克里特岛，女神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战争的迹象。这里经济活跃，艺术繁荣。而且甚至在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岛最后归亚该亚人统治时——考古学家不再说米诺斯文化，而是说米诺斯—迈锡尼文化——女神和她所象征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似乎仍然坚不可摧。

在古老的米诺斯的影响下——这种影响在希腊主岛上也可看到，那里，这时同样进入了它的迈锡尼时期——岛上的新印度欧罗巴统治者似乎采纳了许多米诺斯的文化和宗教。例如，在公元前1500年的著名的三一教堂的石棺画中——画的笔触已经具有很富阳刚的风格，但无疑仍然是克里特风格的——仍然是女神驾着她的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怪兽，它拉着双轮马车载着已死的男人去迎接他的新生命。而且，在石棺的石膏壁画所描绘的仪式中，仍然是女神的女祭司而不是穿着女式长袍的男祭司扮演主要角色。正是这些女祭司指挥着仪式的进行，而且是她们伸出她们的手摸着祭坛。

正如文化史学家杰奎塔·霍克斯以典型的学者的古典语言所论述的那样："如果在14世纪仍然如此，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在更早的时代，女神一定是占优势的。"[②] 因此，在克诺索斯的伟大宫殿里，正是一位妇女——女神，她的高级女祭司，或者也许像霍克斯所认为的那样，克里特的皇后——站在中心地位，而站在她身旁的两排男人向她奉献贡物。[③] 而且人们到处都发现女性雕像，许多女性雕像都呈举起手臂做祈祷的姿态，有些女性雕像拿着象征女神的蛇或双刃斧。

① 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26～47页。

② 杰奎塔·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153页。

③ 杰奎塔·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109页。

对生命和自然的爱

这些虔诚的祈祷姿态似乎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了米诺斯文化的本质。正如普拉东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这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一种对于自然女神——万物及和谐的源泉——的热情信仰渗透了全部生活”。在克里特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似乎最后一次充满了一种快乐而平等地参与生活的妇女和男人之间的和谐精神。似乎正是这种精神贯穿在克里特的艺术传统中，用普拉东的话来说，这种传统就其“在美、优雅和运动中的欢乐而言”，以及就其“享有生活和贴近自然而言”，是独一无二的。①

有些学者把米诺斯的生活说成是“人的观念的完美表现”，即人通过快乐而且同时具有神话意义的仪式和艺术表演表现了我们人类较高的冲动。另一些学者企图用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如“敏感性”、“优雅的生活”和“对美和自然的爱”——来概括克里特文化。虽然有少数学者（例如赛勒斯·戈登）试图使克里特现象符合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古代人比我们更好战，而且（除了希伯来人之外）在精神上更不进化——而贬低或莫名其妙地重新解释它，但是，绝大多数学者以及那些在岛上作过广泛实地调查的人在描述他们的发现时似乎都无法抑制自己的赞叹，甚至惊奇。②

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在技术和文化上十分先进而丰富多彩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正如考古学家汉斯－根室·巴克霍尔兹和瓦索斯·卡拉吉奥吉斯所写的那样——“所有的艺术手段——事实上，整个生命和死亡——都深深扎根于渗透一切而无处不在的宗教之中”。但是，与当时其他高级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以女神崇拜为中心的宗教似乎不仅反映而且加强了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用普拉东的话来说，“普遍的生的欢乐几乎消灭了对死亡的恐惧”。③

---

① 普拉东：《克里特》，第 148、143 页。

②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45、73 页；普拉东《克里特》，第 148、161 页。

③ 汉斯－根室·巴克霍尔兹和瓦索斯·卡拉吉奥斯：《史前的希腊和塞浦路斯：考古学手册》，伦敦，费唐出版公司，1973，第 20 页；普拉东：《克里特》，第 148 页。还可参看霍克斯的《诸神的黎明》，第 186 页。

像伦纳德·伍利爵士这样严肃的学者认为，米诺斯艺术是“古代世界最激动人心的艺术”[1]。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用诸如“迷人的仙境”、“最完美的前所未知的美好生活的世界”这样的词句来描述米诺斯的文明。[2] 不仅克里特的艺术——画着五彩缤纷的鹧鸪的优美的壁画、古怪的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怪兽、漂亮的妇女、精致的黄金雕像、硕大的珠宝和优美的模制雕像——而且还有打动学者的克里特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

例如，明显地使克里特社会与其他古代高级文明区别开来的显著特点是：这里似乎一直是相当公平地分享财富的。普拉东报告说：“这里的生活水平——甚至农民的生活水平——似乎一直是很高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生活非常贫困的家庭。”[3]

这并不是说，克里特比埃及或巴比伦还富，或者一样富。但是，考虑到作为其他高级文明的特点的不同等级之间的经济和社会鸿沟，值得指出的是，克里特使用和分配它的财富的方法在开始时明显是不同的。

从最初的定居地来看，岛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随着时光的流逝，畜牧业、工业，特别是商业——通过在整个地中海航行，而且显然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的大规模的商船队——迅速发展，获得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社会组织的基础在开始时是母系的氏族或部落，但是，克里特社会逐渐变得更加集权了。不仅在阿瑟·埃文斯爵士所说的米诺斯中期和米诺斯晚期，而且在普拉东所说的旧宫殿时期和新宫殿时期，都有证据表明，在几个克里特宫殿中出现了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

但是，在这里，集权并没有给克里特带来独裁统治，也没有促使克里特只为了少数有权的或残酷剥削群众的人——这种剥削在其他时代的文明中是相当明显的——的利益而使用先进的技术。因为虽然在克里特有一个富裕的统治阶级，但是，与晚期的希腊神话——例如，关于忒修斯、米诺斯国王和弥诺陶洛斯的神话——不同，那里没有任何保护这个统治阶级的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的迹象。

普拉东写道：“正如少数刻有线条A的石板所证明的那样，文字的发

① 伍利，引自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73页。
② 伍利，引自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73~74页。
③ 普拉东：《克里特》，第178页。

展导致了最初的官僚政治的建立。”然后他评论了来自岛上日益增长的财富的政府税收如何被明智地用以改进生活条件，即使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这种生活条件也是非常“现代的”。“所有的城市中心都有完备的污水排放系统、卫生设施和家庭厕所。”他补充道，“毫无疑问，在米诺斯的克里特建立了大规模的由国库支付费用的公用事业。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挖出了几个废墟，但是已经发现了许多东西：高架桥、铺筑过的道路、瞭望塔、路边凉亭、水管、人造喷泉和水库等等。还有带输送和供水沟渠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遗迹。”①

尽管发生过多次地震——地震彻底破坏了旧宫殿，而且两次中断了新宫殿中心的建设——克里特的宫殿建筑风格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文明。这些宫殿乃是美化生活和赏心悦目等特点绝妙的混合物，而不是权威和力量的纪念碑，这种权威和力量乃是苏美尔、埃及、罗马和其他古代好战的男性统治社会的特点。

克里特的宫殿外观雄伟壮丽，有广阔的庭院和几百间设计成迷宫的房间，“迷宫”后来成了希腊传说中关于克里特的关键词。在这些迷宫似的建筑物中，许多不同层数和不同高度的楼房不对称地排列在一个中心庭院周围。还有举行宗教仪式的专门房间。廷臣们在宫殿中有他们自己的住处，或占据附近漂亮的房屋。还有宫廷仆人的住处。一长排带走廊的储藏室用来分门别类地储藏食物和金银财宝。而带有一排排漂亮圆柱的大厅则是用来接见宾客、举行招待会、举行宴会和宗教会议的。②

花园是所有米诺斯建筑的一个基本特色。同样，建筑物的设计考虑到幽静、采光良好和起居舒适，也许最重要的是对细节和美的关注。普拉东写道：“不仅使用了本地的材料而且使用了进口的材料，所有的材料都经过精雕细琢：石膏板、石灰华壁柱和瓷砖砌成的建筑物外表、墙壁、采光井和庭院。隔墙用石膏，在许多情况下用壁画和大理石贴面装饰。……不仅墙壁而且常常连天花板和地板都用油画装饰，甚至在别墅、乡间寓所和小镇的住宅中也是如此。装饰房间的油画的主题主要取自航海、农业、宗教庆典和宫廷及人们的快乐生活。对自然的崇拜渗透了一切。”③

---

① 普拉东：《克里特》，第 147、163 页。

② 普拉东：《克里特》，第 148、161 ~ 162 页。

③ 普拉东：《克里特》，第 161、165 页。

一种独特的文明

以其宏伟的石台阶、柱廊和辉煌的宴会厅著称的克诺索斯大宫殿也是米诺斯文化的典型。这座宫殿所注重的是设有御座的觐见大厅和寝宫的美学意义而不是纪念意义，也许表现了文化史学家杰奎塔·霍克斯所谓的克里特建筑的“女性精神”[①]。

克诺索斯城大约有10万居民，一条优良的公路把它和南方的海港联结起来，它是欧洲第一个有这种设施的城市。它的街道和其他宫殿中心——例如马利亚、法斯托斯——的街道一样，铺着石块并挖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是整洁的两层或三层的楼房，这些楼房都是平顶的，有时屋顶上有供炎热的夏夜乘凉用的凉棚。[②]

霍克斯描述了宫殿周围为文明生活所精心设计的内城，普拉东描述了这个时期人的私人生活的特点。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讲究而舒适的水平”。正如普拉东所概括的那样：“房屋适合一切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且在它们周围创造了优美的环境。米诺斯人非常贴近自然，而且他们的建筑物设计得使他们尽可能自由地享有大自然。”[③]

克里特的服装设计也很典型，既有审美效果而且非常实用，穿起来宽松舒适。克里特的男子和妇女都参加体育锻炼和运动，将其作为娱乐来享受。至于食物，他们种植了品种繁多的谷物、蔬菜和水果，加上饲养牲畜、捕鱼、养蜂和酿酒，提供了有益健康而且多样化的饮食。[④]

娱乐和宗教经常结合在一起，使得克里特的闲暇活动不仅令人愉快而且富有意义。普拉东写道：“音乐、唱歌和跳舞增加了生活的乐趣。这里经常举行公众庆典，大多是宗教庆典，伴随着群众游行、宴会和在剧院或木头搭的竞技场演出的杂技表演。”在这些节目中，克里特最有名的活动是公牛游戏。[⑤]

另一位学者雷诺·希金斯这样概括了克里特这方面的生活：“对于克

①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90页。

②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58页。

③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50页；普拉东：《克里特》，第181页。

④ 普拉东：《克里特》，第179页。

⑤ 普拉东：《克里特》，第181~182页。

里特人来说，宗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且是在宫殿的神殿中庆祝的，要不然就在山顶的露天祭坛和在神圣的山洞里庆祝。……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娱乐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首先，重要的是，公牛游戏可能在宫殿的中心庭院中举行。年轻的男子和妇女协力配合轮流抓住冲过来的公牛的角并翻身骑到牛背上。"①

构成米诺斯社会特点的男女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也许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些神圣的公牛游戏中表现得那么生动。在这种公牛游戏中，男女青年一起行动而且互相托付他们的生命。这些结合着激动、技巧和宗教热情的仪式似乎同样从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米诺斯精神的特色；这些仪式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快乐或拯救灵魂而安排的，而且是为了祈求神的力量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而设计的。②

这里值得再次强调，克里特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或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问题和不完善之处的现实的人类社会。它是一个几千年前发展起来的社会，当时还没有我们所了解的那种科学，而且总的说来仍然靠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和赎罪仪式来解释和应付自然过程。③ 而且它是一个在日益受男性统治的和好战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社会。

我们知道，例如，克里特人有制造技术十分精良的武器，如装饰精美的短剑。也许由于地中海上战争和海盗劫掠日益频繁，他们也进行海战，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大规模的海上贸易，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海岸。但是，与当时的其他高级文明相比，克里特的艺术并没有把战争理想化。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甚至女神著名的双刃斧所象征的也是大地的丰裕产物。用来开垦土地和种植农作物的形状像斧子的锄头也仿效蝴蝶的样子，即女神转世和再生的一种象征。

---

① 雷诺·希金斯：《米诺斯克里特的考古学》，伦敦，博德利·黑德公司，1973，第21页。

②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124～125页。

③ 与世界大多数宗教活动一样，这些米诺斯宗教仪式也常常以奉献祭品（例如花、水果、酒或谷物）的形式出现，与后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规模的和似乎是例行的以人作祭品的发现物（例如伴有大量廷臣和奴隶等随员的法老的葬礼）相比，克里特宗教仪式祭品（在所谓的宙斯出生地的一座山脚下的神殿里所挖出来的祭品）所唯一表现的似乎是——用约瑟夫·艾尔索普的话来说——"避免好像是不可逃脱的世界末日的一种绝望的方法"。实际上，对考古学家最近挖出来的一件戏剧性事件中的两个主角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强烈的地震击毁了屋顶（打断了似乎是一个祭司正在杀死一个年轻男人的仪式）并压死了他们两人（约瑟夫·艾尔索普：《一种历史观》，载于《全国地理杂志》，1981年2月，第223～224页）。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克里特的物质财富——就像在我们现代世界那样，而且每天都变本加厉地——被用于毁灭性的技术。相反的，有证据表明，克里特的财富主要用于和谐而美好的生活。

正如普拉东所写的那样："一种对于自然女神——万物及和谐的源泉——的热情信仰渗透了全部生活。这种信仰导致了人们对和平的热爱、对暴政的恐惧和对法律的尊重。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似乎也看不到个人野心；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一件写有作者姓名的艺术品，也没有发现一份关于统治者事迹的记录。"①

在我们的时代，当我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而需要"热爱和平、憎恶暴政和尊重法律"时，我们对克里特精神与它的邻国的精神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兴趣，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了。我们从可靠的史实得知：在克里特，城市都没有防御工事，海边别墅也没有设防，岛上各个城邦之间也没有任何互相征战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迹象，这与当时在其他地区已是司空见惯的筑有城墙的城市和不断进行战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深信，我们对于人类能够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不是如有些人经常说的那样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且在克里特的神话形象——作为宇宙母亲的女神与人类、动物、植物、水以及作为女神在大地上的体现的天空——中，我们发现了对我们和自然同一性的重视，这是一个今天同样重新提出的以保持生态平衡为先决条件的主题。

但是，就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论，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特的艺术，尤其就米诺斯早期而言，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权力并不等于统治、破坏和压迫。用杰奎塔·霍克斯——几位论述过克里特的女性中的一位——的话来说，这里没有"尚武的君主在羞辱和屠杀敌人的胜利中凯旋而归的观念"。"在克里特，受到尊崇的统治者支配着财富和权力并生活在辉煌壮丽的宫殿里，在那里，几乎找不到表现男子气概的骄傲和无知的残忍的迹象。"②

克里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里没有那些坐在克诺索斯宫殿御座上或任何宫殿御座上的人的雕像或浮雕。除了女神——也许是一位女王或女祭司——的壁画之外，在奉献祭品的行列中心，似乎直到克里特晚期也没有任何一种王室成员的画像。尽管如此，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有时被认

① 普拉东：《克里特》，第148页。

②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75～76页。

为是年轻的王子的彩色浮雕表现了一位年轻的、长发披肩的、没有武装的、上身赤裸的、戴着孔雀羽毛的王冠漫步在花朵和蝴蝶中间的男子。

同样明显而且说明问题的是，在克里特的米诺斯艺术中没有任何宏大的战争或狩猎场面。霍克斯评论道："假设米诺斯王位的占有者可能一直是女王的理由之一是，在文化发展的这个时期和这个阶段，在克里特的米诺斯艺术中，几乎普遍地没有表现万能的男性统治者的艺术品。"①

这也是文化人类学家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的结论。她从一种女性的角度论述了克里特，她指出，正是现代考古学家们给年轻的男子起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年轻的王子"或"男祭司国王"这样的名字，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发现关于一位国王或一位占统治地位的男神的单个艺术品。她还注意到，并没有把男性暴力和毁灭性的力量加以理想化的克里特艺术是和下述事实同步发展的：克里特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在一个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里，不仅在国内而且对国外，和平持续了大约1500年之久"②。

普拉东——他也把米诺斯人描述为一种"特别爱好和平的人"——的确把米诺斯的王位占有者写成了国王。然而，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他也强调了"每个国王都以和他人密切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式统治自己的领土"。他认为，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典型特点。但是，他指出，这里再次与同时代其他城邦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王的权力可能受到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的限制，这些高级官员可能代表社会的其他阶级"。③

这些仍然被忽视的关于古代克里特的前父权制文明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某些关于我们所重视的西方文明的重要起源的迷人的线索，我们在下面将探求这些线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所谓的古希腊时代的民主诞生之前很久，米诺斯的克里特可能已经预示了政府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种我们现代的信念。而且作为职责而不是统治的现代权力概念的出现，似乎

---

①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75～76页。普拉东也强调，从米诺斯时代到迈锡尼时代的变化是从"对生命的爱"到日益关心死亡的转化，而迈锡尼人应该对"新引入的英雄崇拜"负责（普拉东：《克里特》，第68页）。

② 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转变中的妇女：克里特和苏美尔》，载于《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雷纳特·布里登撒尔和克劳迪娅·孔兹主编，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77，第49、46页。

③ 普拉东：《克里特》，第167、147、178页。

同样是古代观念的再现。

因为这些证据所表明的是，在克里特，权力原本就等于母亲的责任，而不等于通过武力或对武力的恐惧强迫服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精英。这是对伙伴关系模式社会权力的特点的说明。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故意贬低妇女和与妇女相关的品质。而且这是仍然在克里特流行的权力的定义，因为它的社会和技术进步日益复杂，深刻地影响了它的文化进化。

特别重要的是，在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很久之后，女神作为自然界中万物的给予者和提供者，仍然被尊崇为这个世界的奥秘的最高体现者；在克里特的社会中，妇女仍然保持着她们的重要地位。这里，正如罗尔利希－莱维特所写的那样，妇女是“中心人物，总是被描绘在艺术品和工艺品上。而且这些作品主要在公开场合展出”[①]。

因此，断言城邦国家，或者某些现代学者所谓的“中央集权制下的经济统制”从结构上就需要战争、等级制和征服妇女，并没有得到证明。在克里特的城邦国家中，虽然关于它们的财富、优美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以及繁荣的商业有着种种传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以及与这种技术相关的包括日益增加的专业化在内的大规模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导致妇女地位的任何恶化。

相反，在米诺斯的克里特，伴随着技术变化所发生的角色再分配似乎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妇女的地位。因为在这里还没有发生基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变迁，技术进步所需要的新角色还没有造成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种历史中断。在南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中，我们发现了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伴随着妇女地位的衰落的严格的社会分层和连年的战争。在米诺斯的克里特，虽然也有都市化和社会分层，但是没有出现战争和妇女地位的衰落。[②]

视而不见

根据流行的偏见，等级乃是首要的组织原则。如果妇女有很高的地位，那么结论是，男人的地位必然很低。我们前面已看到关于按母亲及其

① 罗尔利希－莱维特：《转变中的妇女：克里特和苏美尔》，第49页。

② 实际上，罗尔利希－莱维特证明，妇女的地位比新石器时代甚至更高了（罗尔利希－莱维特：《转变中的妇女：克里特和苏美尔》，第42页）。

祖先追溯继承权和血统的证据——妇女是最高的神、女祭司和掌握世俗权力的女王——如何被解释为证明了一种“母权制”社会。但是，这种结论完全没有得到考古学证据的证明。也不能从克里特妇女的较高地位得出这样的结论：克里特男人的地位和男性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女人的地位相似。

在米诺斯的克里特，两性之间的全部关系——不仅对性别角色的定义和评价，而且对于肉欲和性的态度——都明显地不同于我们。例如，妇女袒胸露背的连衣裙和男子突出生殖器的简单装束都证明，他们对性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快乐表现出坦率的赞赏。根据我们现在通过对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了解来看，这种“欢乐的结合”可能加强了作为个人的妇女和男人之间的亲密感。①

在克里特人对待性的比较自然的态度中，可能还有流行的偏见同样难以发觉的其他结果。在流行的偏见看来，宗教信条常常认为性比暴力更可恶。正如霍克斯写的那样：“克里特人似乎已经通过自由而适当的性生活减弱并转移了他们的侵略性。”② 伴随着他们对待运动和舞蹈的热情、他们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爱，这种对待性的开放态度似乎有助于促进在克里特生活中普遍流行的和平与和谐的精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正是这种精神的实质使克里特不同于它同时代的其他高级文明。正如阿诺德·豪泽所指出的那样：“米诺斯文化，就其精神根本不同于其同时代的精神而言，乃是一种例外。”③

但是，现在始终存在的难题是，学者们所得到的资料无意之中都和流行的世界观相悖。因为在这些资料把这种根本差别与米诺斯的克里特乃是过去的、技术很先进的、男性统治并不是准则的社会这一事实联系起来时，绝大多数学者突然都陷入了困境，或者立刻就改变了观点。他们至多采取一种迂回的策略避开困难。他们可能注意到，与其他古代文明和当代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克里特，社会优先考虑的是“女性”爱好和平和容易感知他人的需要等美德。他们可能也注意到，与其他社会相比，克

① 参见，例如，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欢乐的结合：对性欲和义务的一种新观点》，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公司，1975。

②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156 页。

③ 阿诺德·豪泽，引自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73 页。或者如普拉东所写的那样，“一种优美的艺术感，一种快乐的美的、优雅的运动，生活的快乐和对自然的亲近，这些就是使米诺斯人区别于他们时代的一切其他伟大文明的品质”（《克里特》，第 143 页）。

里特妇女占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地位。但是，他们只不过顺便提一下这种情况，并没有加以强调，从而示意读者接受他们的权威观点：这种情况只是次要的问题。

在研究关于克里特的大量文献时，人们常常想起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中的一个有趣的脚注。在写作这部科学名著中关于种族差异的章节时，达尔文回忆起，当他在埃及时，他曾经认为埃及法老阿姆诺甫三世的雕像具有明显的黑人特征。但是，在谈到这点时，甚至仅仅在一个脚注中，他也立即对他亲眼看到的——而且后来得到肯定证实的——在埃及曾经有过黑人法老这一事实打了折扣。虽然据他自己说他的观察可以由当时在场的两个人作进一步的证实，但是，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这方面的两位著名权威的论证。这两位权威——J. C. 诺特和 G. R. 格利登在他们的《人类的类型》中把法老的特征描述为“典型的欧洲人”，并且坚持所讨论的雕像明显没有同“黑人混血”。[①]

在本章开头部分，我们评论了这种类似的与女法老——例如梅耶特-尼特和尼特-霍特普——的证据有关的情况。但是，与人们在埃及学中随处可见的这种对权威的盲从相同，在关于克里特的大量学术文献中，这种情况同样比比皆是，到处都是对极为清楚的克里特艺术资料的曲解、窜改或至少是肢解。在达尔文之后很久，虽然发现了许多证明历史上存在过黑人统治者的雕像和相当明显可见的证据，但是，专家们（当然大多数是男性白人）仍然坚持肯定不可能存在过“黑人混血儿”。[②] 同样，大多数学者不是否定就是掩盖克里特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明显证据。

妇女在克里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从最早发现米诺斯文化起，学者们就无法完全否认这种情况。然而，和达尔文一样，他们感到必须使他们亲眼看到的东西符合流行的意识形态。例如，当阿瑟·埃文斯爵士 20 世纪初在克里特岛开始挖掘工作时，他承认克里特人崇拜女性神祇。他也承认克里特艺术描绘了他所谓的“充满女性自信的景象”。但

---

①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一卷本，纽约，阿普尔顿公司，1879，第 168 页。脚注引自 J. C. 诺特和 G. R. 格利登的《人类的类型》，费城，利平科特与格拉姆伯公司，1854。

② 埃及学家一直坚持这种倾向，直到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推动了学术观点的变化。参见，例如，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从奴役到自由》，纽约，诺夫公司，1967；或戴维·洛耶：《一个恢复健康的民族》，纽约，诺顿公司，1971，关于古代埃及黑人领袖血缘的资料。

是，在评论这些景象时，埃文斯感到必须立即把这些景象当成只不过是他所谓的妇女关于“社会丑闻”的“闲言碎语”。[①]

一方面，H. G. 巴克霍尔兹和 V. 卡拉吉奥吉斯倾向于滑稽地模仿德国人对待妇女的陈腐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评论说，女性“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突出地位反映在万神殿中”，甚至后来还指出，“在比较男性化的迈锡尼文明的宗教中也看得出对妇女的高度尊重”。[②] 只有一位妇女——杰奎塔·霍克斯——直率地认为米诺斯文明是“女性的”文明，但是，甚至她也没有充分探讨这种重要见解的全部含义。

普拉东特别指出，“到处都看得到妇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进一步写道：“毫无疑问，妇女——或者至少是女性敏感性的影响——对米诺斯的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写道：“妇女在新宫殿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一事实，证明了妇女在社会中所起的支配作用。”然而，虽然承认妇女的较高地位和积极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克里特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但是，甚至普拉东也感到有必要地补充道：“这可能是由于男人长期外出航海，家里缺少男人。”在另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中，他特别指出：“虽然把克里特描述为母权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但是，大量的证据——甚至来自后来的希腊时代——都证明了继承次序是按女性排列的。”[③]

因此，我们一再看到，在流行的偏见统治下，我们的真实的过去——以及我们文化进化的最初源头——何以只能像对着镜子那样看得模糊不清。但是，一旦我们面对这种过去所预示的——在我们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我们过去可能是而且现在仍然可能是的——东西的全部意义，我们就会勇敢地正视这个萦绕于心头的问题：是什么引起了文化方向的彻底变化——把我们从圣杯所维持的社会秩序投入到剑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中去的转化？这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的呢？而且关于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的未来，这种大变动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

① 阿瑟·埃文斯，引自希金斯：《米诺斯克里特的考古学》，第 40 页。

② 巴克霍尔兹和卡拉吉奥吉斯：《史前希腊和塞浦路斯》，第 22 页。

③ 普拉东：《克里特》，第 161、177 页。

第四章　混沌中产生的黑暗秩序：从圣杯到剑

我们学会了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人类历史的时间。但是，对历史上极不相同的早期年代采用的计算单位却是一千年或几千年。旧石器时代可以回溯到大约30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0000年以前。卡塔尔·惠雅克大约建立于8500年以前。而克里特文明只是在3200年以前才衰落。

对于这段以千年为纪元单位的历史——比我们从基督降生起开始纪元的那段历史长好几倍——来说，在大多数欧洲和近东的社会中，强调的是维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技术。在新石器时代的几千年期间，提供食物的农业、狩猎、渔业和畜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建筑术的革新，地毯、家具和其他家用物品的制作，甚至（像在卡塔尔·惠雅克那样）城镇规划，都使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①] 在发明了纺织和缝纫之后，服装摆脱了兽皮时代。而且，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为高度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艺术也得到了繁荣。

作为一种普遍规律，血统可能是根据母亲来追溯的。部落的老年妇女或部落首领掌管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农产品被认为属于群体的所有成员。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作为对整体利益负责或托管人职责的社会权力概念相适应的，可能是一种基于合作的社会组织，妇女和男人——正如在卡塔尔·惠雅克，有时甚至是不同种族的人——都持合作态度，为共同的利益而劳作。[②]

---

① 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67，第67页。

② 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67，第225页，“卡塔尔·惠雅克的居民似乎是两个不同种族的混合”。

男性较强的体力在这里并不是社会压迫、组织战争或把私有财产集中在最强有力的男人手中的基础。它也没有为男性压迫女性或“男性”价值支配“女性”价值提供基础。相反，流行的意识形态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它拥有以女性形态为代表的神。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女性圣杯或生命之源所象征的大自然的生殖、孕育和创造的力量——而不是破坏的力量——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同时，女祭司和男祭司的职责并不是为残忍的男性精英服务并给他们以宗教的支持，而是为社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在社区里，部落首领以同样的方式管理共同所有的和大家耕作的土地。[①]

但是，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事实上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的一切都无法与之相比。

来自边陲的入侵者

最初，似乎微不足道的游牧部落的活动——正如《圣经》中的格言所说的——只限于“弹丸之地”，在地球边陲的不毛之地游荡，为他们的牲畜寻找水草。几千年来，他们显然生活在地球边陲寒冷而贫瘠的地带，而在这期间，最初的伟大的农业文明正沿着地球中心的富饶地区的湖泊和河流扩展着。对于这些农业民族来说，享有人类进化、和平及繁荣的早期顶峰生活似乎是人类神圣的永恒状态，游牧部落只不过是来自边陲之地的新奇之物。

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这些游牧部落的数量、残忍性和历史是如何发展的。[②] 但是，我们发现了梅拉特所谓的公元前5000年或大约7000年以前近东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瓦解模式的证据。[③] 到现在为止，许多地区的考古学遗址都显示出明显的紧张迹象。引起大规模的破坏与混乱的入侵和自然灾害——有时这两者同时发生——的证据比比皆是。在许多地方，古老的彩陶传统消失了。一点一点地破坏，一个文化退化和停滞的

---

① 因此，与后来祭司在宏伟的寺庙周围的住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卡塔尔·惠雅克，神殿（女祭司和男祭司同样生活在那里）散建在居民住宅中间，虽然神殿有时很大，但是和其他生活住房设计得一样（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6章）。同样的，在克里特，没有宏伟的寺庙供奉为万能的男性统治者服务的、男祭司所支配的严厉而带惩罚性的雷电和战争之神。

② 后一本书将研究这个问题，以及关于男性统治开始的各种理论。

③ 詹姆斯·梅拉特：《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第280页。

时期开始了。最后，在这个混乱上升的时代里，文明的发展停顿下来了。正如梅拉特所写的那样，这是发生在苏美尔和埃及文明出现之前 2000 年的事情。[①]

在古代欧洲，崇拜女神的新石器时代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瓦解可能也是在公元前 5000 年。从金布塔斯所说的第一次库尔干浪潮开始的。金布塔斯报道说："由于放射性碳可以测定年代，现在可以追溯席卷史前欧洲的草原游牧部落或'库尔干'人的几次迁移浪潮了。"这些反复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冲击和人口转移集中在三次主要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在公元前 4300 ~ 前 4200 年；第二次浪潮在公元前 3400 ~ 前 3200 年；第三次浪潮在公元前 3000 ~ 前 2800 年（这些日期是以树木年代学为准测定的）。[②]

库尔干人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说印欧语或雅利安语的种族，即在现代被尼采及后来的希特勒当做唯一纯欧洲种族而加以理想化的种族。事实上，库尔干人并不是最初的欧洲人，因为他们是从亚洲和欧洲东北部涌入欧洲大陆的。甚至从起源来说，他们也不是印度人，因为在雅利安侵略者征服印度人之前，居住在印度的是另一种民族，即达罗毗荼人。[③]

但是，**印欧人种**这个术语已经约定俗成，它描述了来自欧亚北部由强有力的祭司和战士统治的游牧民族入侵欧洲的漫长路线的特点，这些游牧民族带来了他们的男性战神和其他男性神祇。而且就像雅利安人在印度、赫梯人和米坦尼人在富饶的近东地区、卢维人在安纳托利亚、库尔干人在东欧、亚该亚人和后来的多利安人在希腊那样，他们逐渐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和民族。[④]

---

① 詹姆斯·梅拉特：《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第 275 ~ 276 页。

② 马里亚·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见《印欧研究杂志》第 5 卷（1977 年冬季号），第 277 页。库尔干人第一次入侵浪潮的日期，根据 1986 年和金布塔斯的通信作了修改。

③ 现代学术界不再使用印欧人这个术语表示种族特征。印欧人涉及一个拥有同源词根的语言群体，从不列颠诸岛到孟加拉湾都可以发现这种同源词根的语言群体。体质人类学这个最新的研究领域的成果证明，所谓的印欧人是不同的种族群。西欧学者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是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当时这个术语不仅涉及种族而且涉及语言，是当时一致承认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种意识形态试图以种族划分世界，竭力吹捧所谓的纯种。他们发现印度种姓制度肯定了他们的观点。参见路易斯·费希尔：《甘地传》，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50，第 138 ~ 141 页，其中对早期文化进行了有趣的讨论。

④ 参见，例如，詹姆斯·梅拉特：《近东和安纳托利亚的黄铜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贝鲁特，哈叶兹出版社，1966。

此外，还有其他的游牧入侵者，这些游牧入侵者中最著名的是我们叫做希伯来人的闪米特人，他们来自南部沙漠地区并且侵入了迦南（居住在这里的非力士人后来把迦南改名为巴勒斯坦）。现在，我们的那些与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联系的道德戒律，以及许多现代教会和犹太教徒对和平的强调，掩盖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些早期的闪米特人本来是一个由战士和祭司统治的好战民族（摩西、亚伦和约书亚的利未人部落）。他们和印欧人一样，也带来了他们的残忍而愤怒的战神和大神（耶和华）。而且就像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那样，他们同样逐渐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加在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人民头上。

在印欧人和古代希伯来人之间的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导致了某些猜测：这里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的起源，或者至少有某些文化扩散的因素。[1]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并不是尚未被发现的血缘或文化上的联系。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把这些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民族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体系的结构。

所有这些民族都具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社会组织的统治者模式，即这样一种社会体系：在这种社会体系中，男性统治、男性暴力和普遍的等级制的独裁的社会结构乃是规范。与为西方文明奠定基础的社会相比，这种社会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特有的获得物质财富的方式并不是借助于发展生产技术，而是借助于更有效的毁灭性技术。

冶金术和男性统治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是首先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和社会分层的出现与男性对妇女的统治联系起来的人之一。恩格斯进一步把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与铜和青铜冶炼术的发展联系起来了。[2] 然而，虽然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见解，但只不过是一种不成熟的观点。因为只有根据最近的研究，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令人困惑的——发展道路：铜和青铜冶炼术彻底改变了欧洲和小亚细亚文化进化的方向。

---

① 参见，例如，C. 戈登：《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共同背景》，纽约，诺登出版社，1965；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6。

② F.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

导致这些彻底变化的东西似乎与这些金属的发现无关。相反，这些变化与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关于技术的基本观点有关：如何使用这些金属。

流行的偏见所设想的是，所有重要的早期技术发现肯定都是“男子狩猎者”或“男性战士”为了更有效的杀戮目的而创造的。在大学的教科书和现代通俗史诗（如 A. C. 克拉克的影片《2001 年》）中，我们被告知，这种最早的技术都是从非常原始而粗糙的木头和石头工具开始的，根据这种逻辑，这些工具都是杀人用的棍棒和刀子。① 因此，同样被设想的是，金属首先被用来制造武器。但是，考古学的证据证明，铜和金这些金属很久以来就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所熟知了。但他们是为了装饰和宗教的目的、为了制造工具而使用这些金属的。②

在恩格斯的时代，还不能利用新时代的技术证明，欧洲的冶金术首先出现在公元前 6000 年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南部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迪那拉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居民中间。这些最初的金属物品是珠宝饰物、小塑像和宗教仪式用品。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和公元前 4000 年初，铜似乎已经广泛应用于制造平面斧、长柄锄斧、楔形工具、鱼钩、钻子、针和螺丝钉。但是，正如金布塔斯指出的，古代欧洲的铜斧“是伐木工具，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史前印欧文化中的战斧或神的力量的象征”③。

因此，考古学的证据证实了这样的结论：恰恰并不是金属本身，而是金属被用来发展更有效的毁灭性技术，在恩格斯所说的“女性世界历史性的败北”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④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采集和狩猎民族最初开始驯养和繁殖动物时（换言之，当畜牧业成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技术时），男性统治也没有成为西方史前史的准则。相反，这种男性统治发生得很晚，当时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游牧部落侵入了更富裕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里，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技术。

① 电影《2001 年》和罗伯特·阿德利的《非洲人的起源》（纽约，智慧女神出版公司，1961）是通俗作品的例子。它们表现了发现如何使用工具杀人的人类意识的开端。关于一种不同的观点，可参看，例如 R. 利基和 R. 卢因：《湖边民族》（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78），该书主要以利基家族的著名发现和对在非洲大裂谷发现的我们最早的祖先的化石残片的仔细分析为基础。

② 参看金布塔斯：《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载于《印欧研究杂志》1973 年第 1 卷，第 166 页。

③ 参看金布塔斯：《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载于《印欧研究杂志》1973 年第 1 卷，第 168 页。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毁灭性的技术对于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来说并不是社会应该优先考虑的重要事情。但是，对于从北方的贫瘠土地和从南方沙漠地带潮水般涌来的好战的游牧部落来说，这种毁灭性的技术却是性命攸关的。而且正是在这生死关头，金属在人类历史突然加速前进的过程中发挥了它们的致命的作用：不是作为普遍的技术进步的工具，而是作为屠杀、抢劫和奴役的武器。

金布塔斯已经煞费苦心地再现了古代欧洲的这个过程。她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在游牧部落的发源地，黑海北部的干旱的大草原，并没有铜。她写道："这一事实导致了下述的假设：干旱的大草原上骑马驰骋的库尔干人知道金属冶炼技术，这种技术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年的高加索山脉的南部。大约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他们从外高加索学会了冶金技术，而且不久以后，他们就开采了高加索的矿石。"① 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不久以后利用这些金属锻造了更有杀伤力的武器。②

金布塔斯的资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挖掘出来的大量出土文物以及采用确定年代的新技术为基础的。简单地说，这些资料证明：从铜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当时首先冶炼出了铜砷或铜锡合金）发生在公元前3500～前2500年之间。这比早期学者按照传统所确定的年代公元前2000年更早些。而且，青铜冶炼术在欧洲大陆的迅速传播和现已证实的游牧民族日益频繁的入侵有关，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些极具流动性、好战、实行等级制和男性统治的游牧部落，他们来自北方的大草原，金布塔斯称他们为库尔干人。她写道："与又薄又快的青铜斧、狼牙棒、宝石战斧及燧石箭镞同时出现的青铜武器——剑和戟——的出现与库尔干民族散布的路线相一致。"③

文化进化中的转向

绝不能说西方社会文化进化中的急剧变化只是征服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然而，看来毫无疑问的

① 金布塔斯：《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174～175页。

② 金布塔斯：《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174～175页。还可参看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

③ 金布塔斯：《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166页。

是，从一开始战争就是统治者模式取代伙伴模式的基本工具。而且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暴力在我们的文化进化从伙伴方向向统治方向的转变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社会组织从伙伴模式向统治者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而且不久就可预测的过程。然而，引起这种变化的事件相对来说是突然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考古学的记载所告诉我们的与关于不可预测的变化的新科学思想惊人地一致，或者说，这种新科学思想是这样的：系统在长时间内建立的平衡和接近平衡的状态如何才能相对迅速地转向远离平衡或混沌的状态。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文化进化中的这种急剧变化，就其在关键分叉点上出现了“边缘孤立种群”入侵的现象而言，在某些方面十分符合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提出的“间断平衡”的非线性进化模式。[①]

的确，当时来自地球边缘（北方荒芜的大草原和南方干旱的沙漠）的“边缘孤立种群”并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种。但是，由于中断了社会伙伴模式所引导的稳定的长期发展：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制度。

这些入侵者的制度的核心乃是使夺取生命的力量凌驾于给予生命的力量之上。这是由“男性的”剑所象征的力量，早期库尔干人的洞穴雕刻证明，这些印欧入侵者十分崇拜这种象征男性权力的剑。[②] 因为在他们由战神和男性统治的统治者社会中，这是最高的权力。

由于在史前时代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些入侵者，而不是由于像有时所说的那样逐渐发现了男人在生育中也起作用，女神和妇女逐渐成了男人的配偶或姘妇。男性统治、战争以及对妇女和温和的“女人气的”男人的奴役逐渐成了社会的规范。

对于这两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从基本上来说是不同的，以及为什么现在成了“边缘入侵者”的这些“边缘孤立种群”所引起的规范变化乃是突变，金布塔斯在她的著作中用下面这段论述作了概括的总结：

古代欧洲的文化和库尔干人的文化是互相对立的两种概念。古代

① 用我们习惯的标准来衡量，相对迅速的进化时间可能显得很久。然而，主要问题是变化不一定是渐进的，也不一定是一种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单向运动。

② 参看，例如，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 281 页。

欧洲人是倾向于生活在井然有序的大城镇里的定居的园艺家。没有要塞和武器的事实证明这种和平共存的平均主义文明可能是母系的、定居于母方的。库尔干人的社会是由父系的、社会分等级的游牧部落组成的，他们生活在小村子里或季节性的定居点里，在广阔的地区里放牧他们的牲畜。古代欧洲人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而库尔干人的经济则是以游牧业为基础，它们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古代欧洲人的信仰体系注重生、死和生育的农业循环，它体现在女性原则，即母亲造物主的身上。正如从比较印欧神话中所得知的那样，库尔干人的意识形态赞美掌握天空中的闪电和雷鸣的有男子英雄气概的战神。在古代欧洲人的雕像中没有武器，反之，剑和战斧是库尔干人统治的象征，就像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印欧人一样，他们赞美锋利的剑的致命力量。①

战争、奴隶和祭品

也许最重要的是那些刻在石头、石柱或岩石上的武器所代表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只是在库尔干人入侵之后才开始出现，我们现在才发现金布塔斯所描述的“最早知道的栩栩如生的印欧战神形象”②。金布塔斯报道说，在意大利和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出土的一系列岩石雕像中，有些雕像是“半拟人的”，它们有头和胳臂。但是，它们多数是抽象的图形，“在这些图形中，神只是由他的武器，或由带有腰带、项圈、双螺旋垂饰以及神圣的动物——马或牡鹿——的兵器来表现的。有几件作品，在应该是神的头的地方出现的是一种太阳形状的物件或鹿角。在另一些作品中，神的手臂被表现为带长柄的戟或斧头。一支、三支、七支或九支短剑被置于作品的中央，常常是在腰带的上面或下面”③。

金布塔斯写道：“武器明显地代表神的职责和权力，而且作为神本身的代表受到崇拜。在所有的印欧宗教中，武器的神圣性都得到了证实。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知道，西徐亚人为他们的神圣的剑——阿克那克斯——

① 参看，例如，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81页。

② 金布塔斯：《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201页。

③ 金布塔斯：《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202页。

举行祭祀。我们已经知道，在新石器时代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并没有以前那种带着武器的神的雕刻品或雕像。"[1]

这种对于锋利的剑的致命力量的赞美伴随着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有组织地屠杀其他人类——同时毁灭和掠夺他们的财产，并且征服和剥削他们的人民——似乎是家常便饭。根据考古学证据判断，奴隶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占有）似乎和这些武装入侵密切相关。

例如，这些发现证明，在有些库尔干人的营地里，大多数女性居民并不是库尔干人，而是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2] 这种情况说明，库尔干人杀掉了大批土著男人和小孩，而留下了妇女，把她们作为自己的妻子、姘妇或奴隶。从几千年后《旧约》的记载中发现了关于这种典型惯例的证据，当时游牧的希伯来人入侵了迦南。例如，在《民数记》第 31 章 32 ~ 35 节中，我们读到，在攻打米甸人的战争中，入侵者所掠夺的战利品依次有羊、牛、驴和 32000 名没有出嫁的姑娘。

关于库尔干人丧葬习俗的文献也证实，暴力使妇女连同她们的儿女处于男性的纯粹占有物的地位。正如金布塔斯指出的那样，在最初所知的关于"库尔干化"的证据中，有些坟墓是公元前 4000 年之前的，换句话说，在第一次库尔干浪潮之后不久，入侵者就席卷了欧洲。[3]

这些坟墓都是以强有力的男性精英为首的、具有印欧统治者等级特征的"首领坟墓"，它们表明社会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些坟墓中——用金布塔斯的话来说，明显是一种异化的文化现象——葬礼仪式和习惯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与古代欧洲的丧葬相比——后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坟墓的大小以及考古学家所谓的"随葬品"（在墓穴里所发现的除了死者之外所放置的东西）存在着明显的差别。[4]

我们在欧洲人的坟墓中，除了特别高大的男性骨骼之外，初次发现了殉葬妇女的骨架，她们是男性死者的妻子、姘妇或奴隶。这种习俗——金布塔斯称之为"自焚殉夫的寡妇"（这是一个借自印度语的名词，意思是宰杀寡妇作为丈夫的祭品，这种风俗在印度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明

① 金布塔斯：《公元前 3500 ~ 前 2500 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 202 ~ 203 页。

②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 297 页。

③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 302 页。

④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 294、302 页。

显是由印欧库尔干人带到欧洲的。这种习俗最初出现在黑海西边多瑙河三角洲上的苏沃罗夫。[1]

而且丧葬习惯的这些根本改革乃是库尔干人三次入侵浪潮的特点。例如，在所谓的球状双耳陶罐文化中——这种文化在第一次库尔干人入侵浪潮之后统治北欧几乎达1000年之久——流行着同样残忍的丧葬习俗，反映了同一类型的社会和文化组织。正如金布塔斯所写的："每次用多少人殉葬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这些丧葬的次数。一般来说，男性骨架和他的随葬品埋在石砌墓穴的一边，而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则分组埋在另一边……球状双耳陶罐文化的坟墓进一步证实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在沃利尼亚的沃杰次克希夫卡，石砌墓穴中的尸体证实了那里的一夫多妻制：在墓穴中，一具男性尸骨的两侧根据宗谱顺序安置了两个妇女和四个孩子；一位男性青年和一位青年妇女被安置在他的脚下。"[2]

这些地位很高的坟墓也是其他物品的贮藏所，对于这些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而且在死后都是统治阶级的男人来说，这些物品被认为是很重要的。金布塔斯报道说："从库尔干人的坟墓中所发现的物品——弓、箭、长矛、用来砍和刺的'刀'（原始的剑）、鹿角斧和马骨——证明，古代欧洲人从前并没有尚武的意识。"[3] 在这些坟墓里还发现了象征性的物品，例如母猪或公猪的下颌骨和獠牙、狗的骨骼，以及野牛或牛的肩胛骨。这些物品进一步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证明过去不仅发生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且发生了根本的意识形态变化。

这些随葬品证明，具有毁灭和统治作用的技术现在获得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它们也是一种为了消灭和接受意识形态的战略的证据，我们将日益发现，男人占用了重要的宗教象征物，他们的臣民曾经把这些象征物和崇拜女神的妇女联系在一起。

金布塔斯指出："只在男性的坟墓里放置公猪和猪下颌骨、殉葬的狗以及野牛或牛肩胛骨的传统，最早见于活动于黑海南岸大草原的库尔干人的坟墓里。只与社区的高等阶层的男性有关的猪和野猪这类动物的骨头的宗教含义，超过了它们作为食物的来源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男人和公猪、猪及狗之间的象征性联系现在已被证明，这些动物的宗教意义和这些

①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302、293、285页。
②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304～305页。
③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84～285页。

动物在古代欧洲的宗教意义正好相反。在古代欧洲，猪是生育女神的神圣伙伴。"[1]

文明的断裂

向西和向南延伸的古代欧洲的考古学景观现在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金布塔斯写道："几千年的传统已经断裂，乡镇和村庄已经毁灭，古朴动人的彩色陶器消失了，就像无数的神殿、壁画、雕塑品、符号和手稿那样无影无踪了。"[2]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活生生的战争机器——全副武装的骑马的男人开始起作用了。他们在当时必定具有现代坦克和飞机那样的作用。在库尔干人劫掠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战士首领的典型坟墓，在这些坟墓中，已死的首领周围是作为殉葬品的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的各种动物和他的武器库。[3]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考古挖掘工作之前，以及在金布塔斯利用最近发明的用碳及树木年代学测定日期的技术系统地总结新旧资料之前，欧洲史前史学者V. 戈登·蔡尔德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同样普遍的模式。蔡尔德认为，早期欧洲文化的特点是"和平的"和"民主的"：没有"首领集中掌管公社财产的情况"。[4] 但是，他指出，这一切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因为战争，特别是金属武器的使用，已经传入了。

同金布塔斯一样，蔡尔德注意到，正如在出土文物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武器那样，首领的坟墓和房屋也出现得越来越多。这些坟墓和房屋明确证明了社会已开始阶层分化，强有力的男性统治已成为社会规范。蔡尔德写道："新定居地常常建在山顶。"不仅在山顶，而且在山谷，新定居地现在"常常筑有防御工事"。而且他还强调，正如为了争夺土地，人们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好斗以及战斧这样的武器已成了专门的战争工具那样，不仅欧洲社会的社会组织，而且欧洲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都经历了

---

[1]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97页。

[2]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81页。

[3]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85页。金布塔斯：《公元前3500～前2500年欧洲人和印欧人的青铜时代的开端》，第177页。

[4] V. 戈登·蔡尔德：《欧洲文明的黎明》，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1958，第6版，第109页。

彻底的改变。[①]

蔡尔德甚至更明确地指出，由于战争成了家常便饭，“公社男性成员的必然的优势可以说明女性雕像普遍消失的原因”。他评论道，这种女性小雕像在早期到处都有，而现在明显地不多了，于是他得出结论：“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从母系社会组织向父系社会组织的变迁。”[②]

金布塔斯的论述甚至更独具特色。以对古代欧洲年代学的系统研究为基础，根据她自己的著作和其他考古学家的著作，她详尽地描述在每一次新的入侵浪潮之后，不仅物质财富被劫掠，而且产生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文化枯竭。在第一次库尔干人入侵浪潮之后，破坏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古代欧洲的居民区只有少数几个幸存下来，例如，奥尔特尼亚的多瑙河谷的柯托菲尼民族杂居地，蒙特尼亚的西部、西北部和巴纳特及特兰西瓦尼亚的南部。但是，甚至在这些地方也留下了重大变化的痕迹，到处都是明显可见的防御工事，例如战壕和土墙。[③]

对于大多数古代欧洲的定居地（例如，多瑙河盆地的卡拉诺沃的农场）来说，库尔干人的入侵——用金布塔斯的话来说——乃是一场灾难。所有的财物——房子、神殿、精美的工艺品和艺术品——都毁于战火，这些东西对野蛮的入侵者来说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大批人被屠杀、被奴役，或流离失所。于是，人口迁移的连锁反应开始了。[④]

现在，金布塔斯所说的“混合文化”开始出现。这些文化是以“对残余的古代欧洲群体的征服并使之与库尔干人的游牧经济的父系血统的分层社会同化”为基础的。[⑤] 但是，这些新的混合文化从技术和文化方面来看远不如它们所取代的文化先进。现在，经济主要是以畜牧业为基础。而且，虽然古代欧洲的某些技术仍然被保存下来，但是，陶器制造技术现在明显地毫无进步，而且质量低劣。例如，在第二次库尔干浪潮之后出现在罗马尼亚的塞那沃达第3号定居地，没有发现彩陶或古代欧洲象征图案的

① V. 戈登·蔡尔德：《欧洲文明的黎明》，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1958，第6版，第119页。

② V. 戈登·蔡尔德：《欧洲文明的黎明》，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1958，第6版，第119、123页。

③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89页。

④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88、290页。

⑤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92页。

遗迹。在匈牙利东部和西特兰西瓦尼亚，陶器的样式都是一样的。金布塔斯写道："社区规模的缩小——不超过30～40人——表明，重建的社会体系都是小规模的游牧单位。"① 现在，到处都开始出现防御工事，正如卫城或山顶要塞逐渐代替了旧的没有围墙的定居地那样。

因此，正如史前时代的出土文物所证明的，古代欧洲的考古学景观已经面目全非。在每次入侵浪潮之后，我们不仅发现物质财富遭到破坏和文化倒退的大量遗迹，而且文化史的方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古代欧洲人捍卫自己的家园免遭野蛮的侵略者蹂躏的努力大多数都失败了，因此关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规范的新规定慢慢地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到处都发现社会的重点在变化，这种变化就像一支装着核弹头的箭那样穿过时间射入我们的时代：向更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技术转变。伴随这种转变的是意识形态的彻底改变。依靠利剑进行统治和造成破坏的力量观念逐渐取代了作为维持和养育生命的能力的力量观念。因为，不仅早期伙伴关系文明的进化被武装的征服所中断，而且那些并没有被完全打败的社会现在也彻底地被改变了。

现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男人——身体最强壮、感觉最迟钝、最野蛮的男人——到处都占据首位，正如社会结构到处都变得更等级化、更独断那样，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在身体上比男人矮小和瘦弱，而且与孕育及维持生命的酒杯所象征的旧的力量观念最一致——现在逐渐退居于她们从今以后不得不遵守的地位：男性控制了生产和再生产的技术。

同时，女神逐渐地只能成为男性神祇的妻子或配偶。现在，男性神祇以其新的力量象征——毁灭性的武器或雷电——而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总之，通过我们在下章将要详细加以考察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转化的渐进过程，文明和更先进的社会物质技术发展的故事，现在变成了从苏美尔到我们自己熟悉的血腥的历史，即暴力和统治的故事。

克里特的毁灭

毁于暴力的克里特尤其是不易被忘怀而且是富于教益的。因为它是欧洲大陆南部的一座岛屿，虽然有一段时间曾经粉碎了来自爱琴海好战的游

① 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第294页。

牧部落的围攻，但是，最后还是被毁灭了，这种以伙伴关系的而不是以统治者模式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最后的文明终于衰落了。

克里特文明自始至终都仿效大陆文明的模式。在印欧亚该亚人统治迈锡尼人的时期，克里特艺术变得十分矫揉造作且死板。我们现在发现，在有关克里特的考古记载中十分明显的是，克里特人极其关心和强调死亡。霍克斯指出："在他们受到亚该亚人的影响之前，克里特人并不特别重视死亡和丧葬仪式。亚该亚人的高级人物的态度却完全不同。"[①] 我们现在发现了花费大量财物和人力为王室和显贵死者修建坟墓的证据。而且最说明问题的是，部分地由于亚该亚人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来自欧洲大陆的再次入侵浪潮日益加剧的威胁，克里特有尚武精神日益增长的明显迹象。

克里特的迈锡尼时期是何时开始和结束的，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仍然是许多争论的主题。有一种理论认为，亚该亚人不仅接管了克里特全岛，而且似乎还接管了希腊本土的米诺斯人定居地。他们是在一连串的地震和海啸之后来到的，当时衰落的米诺斯文明再也不能抵挡自北方蜂拥而来的野蛮人了。这种理论的困难是，这些地震和海啸灾难发生的时间常常被确定在公元前 1450 年左右，可是那时并没有武装入侵克里特的证据。[②] 然而，无论克里特是在地震后真的被征服了，还是受到军事压力的突然打击，或者由于亚该亚首领和克里特皇后联姻而被征服，我们都确实知道，在克里特文明的最后年代里，该岛是在说希腊语的亚该亚国王的统治之下。而且虽然这些人采纳了许多更文明的米诺斯人的方法，但是，他们还是把克里特引入了一种走向死亡而不是生气勃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

我们关于迈锡尼时期的某些知识都来自在克里特和希腊本土所发现的所谓的线性文字 B 的石碑，这种文字现在已经被译解。在克诺索斯和皮洛斯（希腊南端的一个迈锡尼定居地）所发现的石碑上，刻有神的名字的名单。为了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关于在克里特和古典希腊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的争论，这些石碑也揭示了后来的奥林匹亚万神殿的诸神（宙斯、赫拉、雅

---

① 杰奎塔·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 186 页。

② 参见，例如，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 198～203 页，其中讨论了如下学术争论：米诺斯文明如何逐渐消亡，以及迈锡尼时期文化和艺术水平的一般倾向。

典娜、阿耳忒弥斯和赫耳墨斯，等等）已经受到崇拜，虽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而且比我们后来从赫西奥德和荷马那里听到的要早几个世纪。[1]与考古学的证据相联系，这些石碑也揭示了——正如霍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克里特人的诸神和亚该亚人的诸神之间的一种十分般配的婚姻”[2]。

但是，米诺斯文化和亚该亚文化的这种迈锡尼婚姻可能是短命的。用霍克斯的话来说，皮洛斯的许多石碑“是在和平的最后年代里为了祛除灾难而刻制的，也是他们的徒劳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石碑得知，迈锡尼的国王事先已经得到皮洛斯可能受到进攻的警告。霍克斯写道：“各级官员镇定自若地面对紧急情况，各自坚守岗位耐心地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并且给担当防御任务的舰队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划船手；派出了泥瓦工，大约是沿着漫长的没设防的海岸线修筑防御工事；武装了士兵，收集了大约一吨青铜，而且集中了近 200 名青铜匠；甚至征用了属于女神圣殿的青铜，霍克斯认为这是“从和平转向战争危机的生动证据”。[3]

但是，这一切毫无用处。霍克斯写道：“在皮洛斯并没有留下迫切需要建筑围墙的遗迹。从石碑上的记载得知，人们为了拯救王国不得不借助于皇宫大厦，但发现它已焚毁倒塌。蛮族战士已经攻占了它。皇宫中金碧辉煌的房间和宫中堆积如山的财宝使蛮族人目瞪口呆……他们在抢劫时根本就没有留心这些建筑物的不好战的异国情调的装饰。他们放火烧了它，而它被熊熊大火所吞没。……大火炙热难忍，以至于厨房里的陶器都融化成了一堆堆玻璃状的东西，而石头都烧成了石灰。……在贮藏室和税务办公室门口，遗弃的碑匾烧成了硬块，以至于它们一直保存到现在。”[4]

因此，不仅在希腊本土和岛屿，而且在克里特，这种达到了早期文化进化最高点的文明成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毁灭了。霍克斯写道：“这种故事也许到处都是一样，除了雅典之外，诸如迈锡尼、梯林斯和其他所有的皇家要塞都被蛮族浪潮所吞没。多利安人终于占领了整个伯罗奔尼撒，

①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233 页。
②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235 页。
③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236 页。
④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241 页。

除了阿卡迪亚之外，而且接着征服了克里特、罗得岛和所有毗邻的岛屿。克诺索斯——在所有的王国中历史最古老的王国——可能是最后陷落的。"①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切都结束了。克里特人逃到了山里，有一段时间他们在山里展开了反抗多利亚人的游击战，但这种反抗最终还是失败了。② 伴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曾经创造下克里特——用荷马的话来说，"一个富饶而可爱的国家"——的那种精神现在逃离了长久以来一直是它家园的岛屿。③ 随着时间的流逝，米诺斯克里特的自信的妇女和男人的存在甚至也被忘记了，就像女神和平的、创造性的和抚育生命力的力量被遗忘了一样。

一个崩溃了的世界

克里特在大约3000年前的衰落可以说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结束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或公元前4200年，在欧洲开始的古代世界遭到了一次又一次蛮族入侵浪潮的猛烈打击。经过最初的毁灭和混乱的时期之后，逐渐出现了我们在中学和大学教科书里所歌颂的标志着西方文明开端的社会。

但是，在这种传说中的伟大而光荣的开端的内部隐藏着裂缝，这种裂缝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扩大成最危险的深渊。我们的技术、社会和文化进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现在正在发生着一种不祥的分裂。就像那时地球的剧烈运动留下了可怕的深渊那样，在我们的技术与社会进化为一方和我们的文化进化为另一方之间的分裂可能在不断扩大。技术和社会向结构和功能日益复杂的方向的发展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是，文化进化的可能性已被阻碍——被牢牢地封闭在统治者的社会中。④

现在，在所有的地方，社会都变成了男性统治的、等级制的和好战的。在卡塔尔·惠雅克人和平地生活了几千年的安纳托利亚，《圣经》中

①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241页。

② 普拉东：《克里特》，第202页。

③ 荷马：《奥德赛》。

④ 很明显，向更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运动并不等于向改善人类状况的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运动。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的第二本书《开创自由》将详细考察社会、技术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的关系。

提到过的一种印欧民族，即赫梯人却繁衍生息起来。虽然他们的考古学遗迹，例如在雅泽利卡雅的宏伟的圣殿，证明女神仍然受到崇拜，但是，她们已经逐渐降低了地位，成了新的代表战争和雷电的男性神祇的妻子和母亲。在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模式都是一样的。女神不仅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被变成了战争的女庇护人。

事实上，对于经历过这些可怕的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来说，似乎必定是，那曾被认为是慷慨的女神的住所的天空已经被女神与在大地上的野蛮的代表联合起来的反人类的超自然力量所占领。不仅“神意注定的”强壮的男子统治和连年战争到处都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从公元前 1500 ~ 前 1100 年这个时期是一个在物质和文化方面极其混乱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一连串的猛烈的火山爆发、地震和海啸震撼了地中海世界。实际上，自然环境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动，业已面目全非，以至于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解释有关阿特兰提斯的传说，一整块大陆可能在一场可怕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沉没了。

祸不单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来自北方的多利安人日益向欧洲的纵深地区推进。在他们的铁制武器的猛烈打击之下，希腊，甚至还有克里特，最后都陷落了。在安纳托利亚，好战的赫梯人王国在新的入侵者的压力下灭亡了。这种动乱反过来驱使赫梯人向南进入了叙利亚。在这个时期，黎凡特诸国也遭到了来自陆地和海洋的被迫迁移的民族的侵袭。这些被迫迁移的民族中有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非利士人。

再往南，亚述人现在突然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不断向弗里吉亚、叙利亚、腓尼基挺进，甚至一直向东方的安纳托利亚和扎格罗斯山脉推进。今天仍然可以在纪念后期亚述国王提革拉特 - 帕拉萨一世“英勇”业绩的浮雕上看到亚述人是何等残暴：在浮雕上，似乎全城的居民都被从腹股沟穿进去而从肩膀出来的尖木桩活活钉死了。

甚至在更远的南方的埃及也有反响，因为埃及的象形文字所记载的入侵者乃是来自海洋的民族——许多学者认为是来自地中海的难民，在公元前 11 世纪初，这些民族企图接管尼罗河三角洲。但是，他们被拉美西斯三世打败了。在底比斯的圣殿里描绘拉美西斯三世葬礼的壁画上，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一场面：他们乘船、坐战车、带着家眷及牛车徒步行进着。

圣经学者相信，在迦南曾经发生过三次迁移浪潮。团结在利未人祭司武士周围的希伯来部落现在开始了一连串的征服战争。[①] 正如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读到的那样，尽管希伯来人的战神耶和华对他们许诺了胜利，但是，他们用了几百年才战胜了迦南人的反抗。关于这些情况，《圣经》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上帝的意志，是为了使他的子民习惯战争，为了考验和惩罚他们，或者是为了使沙漠成为良田并且使他的万民子孙繁衍，兴旺发达。[②] 正如我们还可以在《圣经》中读到的那样，例如在《申命记》第3章第3～6节中，这些"被授意的"入侵者的习惯是"把所有城市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尽都毁灭"。

现在，整个古代世界的居民互相对立，互相征伐杀戮，因为男人反对女人而且反对其他男人。无数难民在这个崩溃了的世界里四处流浪，惊惶失措地逃离他们的家乡，绝望地寻求安身立命之处。

但是，在他们的新世界里并没有这种安全的地方。因为现在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女神和人类一半的女性的一切权力已经为暴力所剥夺，男性神祇和男人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世界里，从今以后是剑，而不是圣杯，才是至高无上的；正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能在久已湮灭了的神话和传说中发现和平与和谐。

---

① 有关圣经学者咨询委员会的评议，见《达特茅斯版圣经》，罗伊·张伯伦和赫尔曼·费尔德曼注释，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50，第78～79页。

② 《士师记》3：2；《约书亚记》23：13；《出埃及记》23：29。也可参看圣经学者的评注，见《达特茅斯版圣经》，第187～188页。

第五章　对逝去的时代的回忆：女神的遗产

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其他似乎很混乱的时代——罗马帝国的衰亡、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鼠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我们至今尚不太了解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情况——当时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们的史前史正处于进化的十字路口——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几千年过去了，当我们正在接近第二次社会转化的可能性——这次社会转化是一种，从统治者的社会向更先进的伙伴关系的社会转化——时，我们必须对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我们史前史的一切惊人的材料有充分的理解。由于我们现在正处在前途未卜的第二次进化的十字路口上，而我们又掌握了过去只有上帝才有的可以毁灭一切的技术力量，所以我们完全可能拯救人类。

然而，甚至在面对新的权威性的研究、新的考古学和社会科学的确切证据时，有关人类数千年历史的这些大量的新知识与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如此相矛盾，以至于我们很快就把这种新知识忘记了。这种新知识可能在我们的头脑里保留一天，甚至一周，但是，千百年来的教育的力量在暗中无情地破坏了它，直到只剩下一闪而过的印象和一时的激动和希望。只有借助于来自其他方面——不仅是熟悉的而且还有不熟悉的——的帮助，我们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记住并掌握这种知识。

进化与转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帮助的一个方面来自关于系统的稳定性和系统的变化的新科学发现。这种最近出现的知识体系一般称作“新物理学”，有时被称为“自组织”理论和（或）“混沌”理论。因为这种理论第一次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框架，从而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我们的史前史

时代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在不同的方向上现在可能再次发生的情况。

在这种新的概念框架的视野内，结合文化转化理论，我们所考察的是社会动态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和社会的稳定性相关，即，几千年以来，以一种不同于我们被教导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存在的，而我们被教导的是一切人类社会都是有组织的；第二个方面涉及社会系统——像其他系统一样——如何能够而且确实经历了基本的变化。

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化进化中第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化的动态：系统在经历了一个不平衡或混沌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个临界分叉点，从这个分叉点中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我们可以查明的关于这种系统第一次转化的一切情况，即，使我们深刻理解到在基本的或“混沌的”变化时期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仅阐明了我们的过去，而且阐明了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人们可能仍然要问，如果从伙伴关系的社会向统治者社会的转变迎来了我们人类历史的晚期，那么，这难道不意味着统治者社会毕竟是一种进化性的进步吗？这里，我们要重提导论里所指出的两点。首先，**进化**这个术语不仅被误用为描述性的，而且被误用为规范的；它不仅被误用为描述过去所发生的情况的词，而且被误用为隐含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运动的词（隐含着后来的情况必定更好的判断）。第二点是，甚至我们的技术进化也并不是一种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是一种被无数退化所中断的进程。

我们还可以重提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基本差别。生物进化需要科学家所谓的物种形成，即出现品种繁多而越来越复杂的生命形式。相比之下，人类文化的进化与一种高度复杂的物种的发展有关，这个物种就是我们人类，它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女性和男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人类的这种二态性或形式的差别从根本上制约了我们的社会组织的各种可能性：它或者可以建立在人类男女两大部分之间的等级关系上，或者可以建立在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上。必须再次加以强调的基本差别是，这两种组合模式的每一方都拥有独特的技术进化和文化进化类型。所以，我们的文化进化的方向——特别是，无论它将是和平的，还是好战的——取决于指导进化的是这两种可能的模式中的哪一种。

我们的社会进化和技术进化可能——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的确——首先是在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内，后来是在一种统治者社会内，从

比较简单的水平向比较复杂的水平运动的。然而，我们的文化进化——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更加复杂的技术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每种模式都是根本不同的。而且这种文化进化的方向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技术进化的方向。

最明显的例子是技术。在伙伴关系范式的文化指导下，强调的是应用于和平目的的技术。但是，伴随着统治者范式的兴起，出现了向毁灭和统治的技术发展的深刻转变，这种倾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稳步发展，已经危及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于根据形成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统治者社会模式或伙伴关系社会模式来观察历史，所以我们很难发现这两种模式对我们的文化进化所产生过的深刻影响。这就是大约5000年前我们的文化方向发生变化的另一个确实可靠的根源为什么相当重要的原因。与“混沌”理论不同，这第二个根源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它是某种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某种长期以来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即西方文明中大量宗教的、世俗的和科学的神话。现在，只有神话才能被认为揭示了关于一种更古老、更美好的过去的现实。

一个黄金种族和关于阿特兰提斯的传说

在叙述西方历史学家称之为**希腊黑暗时代**（多利安人入侵之后300～400年）的末期时，古代诗人赫西奥德告诉我们，当时曾经存在过一个“黄金种族”。赫西奥德写道：“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他们的。富饶的大地自动地倾吐出她那无限丰硕的果实。他们在和平安宁中耕种他们的肥沃的土地，料理大量的财物，祭祀心爱的诸神。”①

但是，在这个赫西奥德称之为“纯粹精神”和“反对罪恶的保护人”的种族之后到来的是一个低劣的“白银种族”。这个白银种族接着被一个青铜种族所取代。这个青铜种族诞生于战争的灰烬之中，但无论如何不像白银种族那样，青铜种族可怕而强壮有力。赫西奥德接着解释了这个民族——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这个民族就是青铜时代的亚该亚人——是如何在他们到来的同时带来了战争。“他们的首领所关心的是战神阿瑞斯毁灭

①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12～13页。

一切的邪恶事业。”与两个较早的民族不同，他们并不是和平的农民，“他们的主食不是谷物，他们心如铁石，顽强而不可征服。”[①]

在评论赫西奥德所叙述的第三种族的人时，历史学家约翰·曼斯利·鲁宾逊写道：“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来自北方，拿着青铜武器。他们定居于大陆，建立了伟大的迈锡尼要塞，并且在他们灭亡后留下了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B书写的文献，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文献是一种最早的希腊文……我们可以追溯他们的力量扩张的轨迹——向南到克里特，向东到小亚细亚海边，在那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初洗劫了特洛伊城。”[②]

但是，赫西奥德认为，亚该亚人的迈锡尼后裔和他们所征服的民族乃是第四个独立的“种族”。他写道：“这是比前一个种族更正直更高贵的种族。”[③] 他像荷马那样把这些民族理想化了，认为这些民族已经抛弃了他们的某些野蛮性，而且接受了古代欧洲许多更文明的习惯。

但是在欧洲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五种族的人”。这个种族就是赫西奥德的时代仍然统治着希腊的那个民族，赫西奥德本人就是这个民族的后裔。他写道：“但愿我不属于这第五个种族，但愿这个民族出现在我出生之前或我死之后”，因为现在“一个人将劫掠另一个人的城市。……权利将取决于力量，而虔诚将不复存在”。[④] 正如鲁宾逊所指出的，这“第五个种族”就是多利安人，“他们手执铁制武器摧毁了迈锡尼的堡垒，并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⑤]。

学者们普遍承认赫西奥德的青铜和铁器种族的历史真实性，他们就是希腊的印欧入侵者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但是，赫西奥德所描绘的，在他的时代仍然被牢记的，还没有崇拜战神阿瑞斯的和平的农民的“黄金时代”，始终被认为只不过是虚构。

①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13~14页。

②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14页。

③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15页。

④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16页。

⑤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15~16页。

很久以来，或许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一个更古老而且更美好的时代——阿特兰提斯的传说——的希腊神话也是如此。按柏拉图的说法，在那儿曾经兴盛过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文明，它后来被大海吞没了。

柏拉图把逝去的阿特兰提斯文明的地点确定在大西洋上，可能是根据梭伦的埃及情报人员的报告。他们说，阿特兰提斯位于“遥远的西方”，而且还给它确定了一个非常晚的日期。然而，正如 J. V. 卢斯在《阿特兰提斯的毁灭》中所写的那样，柏拉图的阿特兰提斯中的某些情况是对“公元前 16 世纪的米诺斯帝国的十分精确的素描”[①]。或者像希腊考古学家尼古拉斯·普拉东所写的那样，“柏拉图传下来的关于沉没的阿特兰提斯的传说可能参考了米诺斯的克里特及其突然灭亡的历史”。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阿特兰提斯是被“强烈的地震和洪水”所毁灭的，正如学者们现在所相信的那样，由于米诺斯文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亚该亚人才可能不仅接管了希腊在克里特的殖民地，而且接管了米诺斯的殖民地。[②]

这种理论首先是由希腊考古学会主席斯派里登·马里那托斯教授于 1939 年提出的。不久以前，这种理论得到了地质学证据的支持：大约在公元前 1450 年左右，地中海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火山爆发，使塞拉岛的一部分（现在有时被称之为桑多里尼的一狭条土地）沉入了大海。这些火山爆发还引起了猛烈的地震和海啸。在塞拉和克里特所发现的考古学出土文物证实了这些自然灾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这些自然灾害似乎是人们回忆起柏拉图所说的阿特兰提斯这块沉没的大陆的根据。这里有严重的地震破坏和同时发生的海啸使海岸遭到大规模毁坏的证据。[③]

正如卢斯所指出的那样，现在，似乎“海啸就是真正‘来自大海的公牛’，它被派来折磨克诺索斯的统治者”[④]。而且阿特兰提斯的故事似乎实

---

① J. V. 卢斯：《阿特兰提斯的毁灭》，伦敦，泰晤士与赫德森出版社，1968，第 137、20 页。

② 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 69 页。普拉东强调，为了解释“希腊的奇迹”，我们必须考虑前希腊文化传统。指出这一点的另一位学者是 J.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

③ 参见，例如，斯派里登·马里那托斯：《火山爆发毁灭的米诺斯克里特》，载于《古代》1939 年第 13 期，第 425～439 页。该文是关于这个题目最早的科学论文之一；以及卢斯的《阿特兰提斯的毁灭》，也是对这个题目的一个优秀而新颖的概论。

④ 卢斯：《阿特兰提斯的毁灭》，第 158 页。关于克里特文明逐渐毁灭的经过、时间和原因的某些有争议的观点，参看，例如，阿瑟·埃文斯：《米诺斯的宫殿》1～4 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1～1935；伦纳德·帕尔默：《迈锡尼和米诺斯》，伦敦，费伯兄弟公司，1961；普拉东：《克里特》。

际上也不是人们对消失了的阿特兰提斯大陆的被歪曲了的记忆，而是人们对克里特米诺斯文明的被歪曲了的记忆。[1]

伊甸园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中，人类过着更和谐的生活的古代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这些传说反复提到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时代，即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当时妇女和男人生活在一个质朴而宜人的乐园之中。这些传说大都是从圣经学者所相信的《旧约》伊甸园神话引申出来的故事。

根据我们已经考察过的考古学的证据来看，伊甸园的故事明显地也是以人们的回忆为根据的。乐园是对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比喻的描绘，当时妇女和男人刚学会耕种土地，因而创造了第一个“乐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部分地反映了游牧民族（以亚伯用宰杀的羊作献祭为象征）和农业民族（以该隐用“大地的果实”作献祭，被游牧部落的神耶和华拒绝为象征）的实际对抗。同样，伊甸园和逐出天堂的神话部分地来自真实的历史事实。正如我们在下面几章将要详加阐述的那样，这些故事反映了我们已经在考察的灾难性的文化变化：强加的男性统治和随之而来的从和平和伙伴关系向统治和斗争的转变。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中，我们同样发现，这些传说反复提到作为最高的神或“天后”的女神。后来在《旧约》中也发现了“天后”这种称号，但是，现在在先知的经文中则痛斥复活早期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碑文记载了大量关于女神的事迹。一位苏美尔祈祷者颂赞光荣的女王娜娜（女神的一个名字）是“伟大的圣母，女造物主”。另一块碑文提到女神纳慕是“创造天地的母亲”。[2] 在苏美尔的传说和后来巴比伦的传说中，我们都发现了解释女神如何同时或成双地创造妇女和男人

---

[1] 马里那托斯：《火山爆发毁灭的米诺斯克里特》；卢斯：《阿特兰提斯的毁灭》；普拉东：《克里特》，第69页。

[2] 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6，第82页。在导论里，斯通详细叙述了她从各个博物馆和各个图书馆收集有关早期女性神祇的资料的经过，她收集的大量资料只是在书架后面才能找到，而且令人生气的是大量有关的“古代著作和雕塑品一定是故意被毁坏了”。此外，她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甚至现有的材料也几乎完全被通俗文学和普通教育置之不理”（参见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xvi～xvii页）。

的故事[①]——在一个男性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回到一个妇女并不被认为是从属于男人的时代的故事。

从其他的碑文也可以推知，在这个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的发源地的地区里，曾经有过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时血统仍然是母系的，而且妇女还没有为男性所支配。例如，甚至直到公元前2000年，一份来自埃兰（苏美尔稍东的一个城市国家）的法律文件中还记载着，一位已婚妇女拒绝和她的丈夫共同管理她的遗产，而把她的全部财产交给女儿继承。我们在这里也发现，埃兰的女神只是在晚期才变成众所周知的“伟大的妻子”，而且被降到从属于她的丈夫哈姆巴姆的地位。甚至在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男性统治的晚期巴比伦，也有文献证明：某些妇女仍然掌管着她们自己的财产，特别是女祭司，她们还广泛地从事商业活动。[②]

而且正如H. W. F. 塞格斯教授所写的那样，“在早期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女神占有一种突出的地位，除了——只有伊什塔尔例外——作为个别神的配偶之外，她们后来实际上都消失了”。这就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即，再次用塞格斯的话来说：“在早期苏美尔的城市国家里，妇女的地位的确比她们后来的地位要高。”[③] 就像乌尔第一王朝的王后舒伯·亚德的坟墓那样，当时的许多坟墓也证明，在西亚的肥沃土地上，在男性统治和可怕的全副武装的男性神祇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规范之前，曾经有过一个较早的时代。因为在舒伯·亚德王后的坟墓里只刻有她的名字，虽然考古学家断言，在她的坟墓旁边的那座有一副男性骨架的墓穴是国王的坟墓，而且她的坟墓更富丽堂皇。[④] 同样，虽然苏美尔的历史都谈到路加兰达和乌鲁卡吉那“王朝”，而且只是顺便提到他们的妻子巴拉那姆塔拉和夏格夏格，但是，查看一下官方文件，却发现这些文件实际上是以这两位王后的名义签署日期的。[⑤] 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男人的统治和支配下，这些妇

① 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219页。

② 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42~43页。

③ H. W. F. 塞格斯（引自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39页）。还可参看沃尔特·欣兹（引自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41页）。

④ 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转变中的妇女：克里特和苏美尔》，载于雷纳特·布里登撒尔和克劳迪娅·孔兹主编《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77，第53页。

⑤ 参见，例如，伦纳德·伍利：《苏美尔人》，纽约，诺顿出版社，1965，第66页；G. 汤普森：《史前爱琴海》，纽约，城堡出版社，1965，第161页。

女实际上是否只是“配偶”。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关于苏美尔的所谓乌鲁卡吉那改革——公元前2300年——的原文，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原文中读到，从此以后，寺庙土地上生长的果树和庄稼如何必须分给需要它们的那些人，而不能像旧有惯例那样只给祭司，以及这种做法如何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实行了。但是，这些改革不仅正是在女王仍然（或者再次）行使权力的时代发生的，而且正如艺术史学家默林·斯通所指出的那样，这也表明，苏美尔的早期社会还没有明显的等级制，而且是朝着相当公有的方向发展的。[①]

除此之外，这些原文还告诉我们，相当人道的习惯和法律——例如，社区帮助穷人解决燃眉之急——也可回溯到伙伴关系社会的时代，而在这方面，乌鲁卡吉那改革只不过重申了那个较早时代的道德和伦理戒律。正如斯通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用来标明这些改革的格言肯定了这种结论。这种格言被称之为“阿玛吉”，在苏美尔语里，它有两种含义：“自由”和“返璞归真”。这再次说明了对于一个更早而较少压迫的时代的回忆，当时妇女作为部落的首领或女王仍然行使着权力，这是一种职责而不是独裁统治的工具。[②]

恰恰也是根据苏美尔的碑文，我们了解到，拉加希的女神南希受到人们的崇拜，因为“她熟悉孤儿和寡妇，她为穷人寻求公道，为弱者寻求庇护”[③]。在元旦那天，正是由她来审判全人类。我们在厄瑞克附近出土的碑文上读到，女神尼达巴被认为是“神的法庭的法官，她颁布戒律”[④]。诸如法律、正义和仁慈的给予者以及最高法官等古代女神的名字，似乎也表明某些较早的法律汇编的存在，而且甚至可能有过相当复杂的司法制度，为女神服务的苏美尔女祭司也许就根据这种司法制度裁定争端和执法。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碑文中，我们进一步读到，女神宁利尔如何由于教给她的人民耕种和收获的方法而受到尊敬。[⑤] 此外，从当时所使用的语言也能看出那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苏美尔文中发现的农民、犁和沟等词，并不是苏美尔语。织布工、制革匠、编篮工、铁匠、泥瓦工和制陶工这些词也不是苏美尔语。这似乎表明，所有这些基本的文明技术都是后来的入侵

---

①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41页。

②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41页。还可参看罗尔利希-莱维特：《转变中的妇女》，第55页。

③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82页。

④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82页。

⑤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3页。

者从较早的崇拜女神的地区的人们那里接收过来的，否则这些地区的人的语言早就失传了。[①]

文明的礼物

一个流传很广的假设是，自从苏美尔人和亚述人的时代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历史，但无论如何这恰恰是技术和文化进步的令人遗憾的先决条件。如果先于我们的“最早的”文明而存在的“原始人”是爱好和平的，那就可以推论，由于缺少适当的动机，他们自然很少创造任何永恒的价值。虽然“普通人”和五角大楼的理论家总是认为，战争的刺激必然促进所有的技术进步和相关的文化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考察的资料以及许多其他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所告诉我们的情况，与我们从考古学文物所了解到的情况完全相同。这就是，保存得很好的历史秘密之一是，作为文明基础的所有物质的和社会的技术，实际上都是在强加的统治者社会之前发展起来的。

新石器时代崇拜女神的民族已经完全了解农作物生长、建筑、容器和编织技术的原则，[②] 并且日益熟练地利用自然资源，例如木材、纤维、皮革以及后来用于制造业的金属。我们最重要的非物质技术，例如法律、政府和宗教，同样来源于——借用金布塔斯的术语：古代欧洲——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社会的那个时期。祈祷者、法官的职权和祭司身份等相关的概念也是如此。舞蹈、宗教典礼戏剧、口头或民间文学、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同样是前统治者社会的产物。[③] 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是这个较早时代

①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 84 页。

② 参看，例如，杰奎塔·霍克斯和 L. 伍利：《史前史和文明的开端》，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63，第 265 页，他们写道：“一般都承认，由于妇女作为植物性食物的收集者在古代起了作用，应该是她们发明并发展了农业。”还可参看埃斯特·博基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伦敦，阿伦与昂温出版社，1970；以及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 36 页，引用狄奥多罗斯的话。

③ 参看，例如，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特别是第 4 章（建筑）、第 5 章（城镇规划）、第 6 章（神殿和浮雕）、第 7 章（壁画）、第 8 章（雕塑品）、第 10 章（手工艺和贸易）、第 11 章（人民和经济）。但是，正如梅拉特在《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75）中所写的那样，“虽然考古学研究在最近 25 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对考古学发现的解释没有跟上，许多文化发展理论令人悲哀地陈腐不堪”（第 276 页）。

的另一份遗产。[1] 行政机关、教育，甚至对未来的预测也是这样。因为最先验证神谕或预言的力量的是女神的女祭司。[2]

宗教支持并使它所反映的社会组织永久存在。在许多残存的古代宗教经文中，正是女神——不是任何当时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神祇——被当成给予人民以“文明的礼物”的神祇。[3] 把我们主要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明归功于一位女性神祇的神话，可能反映了这些发明实际上是女人做出的。[4]

这种假设在流行的范式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流行的范式把妇女描绘成依赖和从属于男人，她们不仅智力低下，而且根据《圣经》，她们和男人相比精神毫无发展，她们应该对我们的堕落负责。

但是，在把宇宙中的最高力量抽象为一位女神的社会里，这位女神被尊崇为智者和我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才能的正当源泉，妇女可能倾向于把一种非常不同的自我形象内在化。由于这种强有力的角色模式，她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她们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积极参与并且带头发展和使用物质和精神技术。她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她们自己是有能力的、独立的，而且确实是有创造力的和有发明能力的。事实上，关于妇女对发展和管理物质与非物质技术的参与和领导的证据越来越多，而一种统治者的秩序后来就是建立在这种技术上的。

从头至尾回溯了我们的祖先灵长目动物最初开始变成人的历史，学者们现在开始重新建构关于我们的进化的更正确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我们的进化中，妇女——不仅是男人——发挥了核心作用。以“男子狩猎者”为基础的旧的进化模式把人类社会的开端归功于狩猎所需要的“男性联合”。它还主张，我们最初的工具是由于男人要杀死他们的猎物，而且也要杀死竞争者和弱者而发展起来的。像南希·坦纳、简·兰开斯特、莱拉·莱博维茨和阿德里安娜·齐尔曼这样的科学家现在已经提出另一种进

① 参见，例如，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第10章，梅拉特在该章中写道：“勘探和贸易成了城市经济最重要的项目，而且无疑对城市的富裕和繁荣做出了明显的贡献”（第213页）。

② 参见，例如，简·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伦敦，默林出版社，1903，1962）第261页中，引自埃斯库罗斯献给“先于其他所有神祇的……原始女祭司”的祈祷诗。

③ 参见，例如，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特别是导论和第2、3章。

④ 关于某些较早的学者间接提到的妇女对于我们的基本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主要贡献，参见罗伯特·布里福尔特：《母亲们》，纽约，约翰逊·雷普林特出版社，1969；以及埃里克·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5。

化的模式。[①]

这种观点认为，使双手获得自由所必需的直立姿势与狩猎无关，而是与从找到就吃（或边走边吃）向收集和运送食物，从而可以分享和贮藏食物的转变有关。此外，促使我们的大脑发展得更大更有效，不仅用它指导制造工具和更有效的生产过程，而且分享信息的原动力，并不是男人需要联合起来进行杀戮。相反的，这种原动力乃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如果人类的后代要活下去，那么显然需要这种联系。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最初制造的人工制品并不是武器，而是装运食物（和婴儿）的容器，以及母亲为他们的孩子弄软食物所使用的工具，孩子不仅需要母亲的乳汁而且需要固体食物才能活下去。[②]

这种理论更符合这样的事实：灵长目和最原始的人类部落主要靠采集食物而不是靠狩猎为生。它也符合这样的证据：肉食只构成原始灵长目、原始人和早期人类食物的极小部分。下面的事实进一步支持了这种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只有母亲与她们的幼崽分享食物方面，灵长目不同于鸟类和其他物种。我们还在灵长目中发现，最初的工具的发展，**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采集和加工食物。而且在某些经过最仔细观察的现存的灵长目——黑猩猩——当中，我们发现雌性猩猩经常使用这些工具。[③]

因而，正如坦纳关于更古老的时代——这个时代为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古代社会提供了基础——所写的那样，“妇女采集者”而不是“男子狩猎者”似乎在我们人类的进化中起着最基本的作用。[④] 坦纳说：“继承母亲的

① 南希·坦纳：《论正在形成的人类》，波士顿，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简·兰开斯特：《推进并分担人类进化》，载于《人性》1978年2月第1期，第82～89页；莱拉·莱博维茨：《女性、男性、家庭：一个生物社会学的研究》，北锡图埃特，达克斯伯里出版社，1978；阿德里安娜·齐尔曼：《转变中的母性：从猿到人》，载于《第一个儿童和家庭的形成》，沃伦·米勒和露西尔·纽曼主编（查珀尔希尔，卡罗来纳人口中心，1978）。关于我们人类起源的各种理论的一个卓越的概述（以及关于女性灵长目的惊人资料），参见琳达·玛丽·费迪甘：《灵长目范式：性别角色和社会契约》，蒙特利尔，艾登出版社，1982。也可参看阿什利·蒙塔古：《人类的侵略本性》，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正如罗伯特·阿德里所写的那样，一个很好地整理过的证据所揭示的观念是，“人来自类人猿的背景的唯一理由是，他是一个杀人者”。见罗伯特·阿德利《非洲的起源》，纽约，智慧女神出版社，1961，第29页。

② 参看本书第88页注①。还可参看R. 利基和R. 卢因：《湖边民族》，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78。

③ 坦纳：《论正在形成的人类》，第190页。

④ 坦纳：《论正在形成的人类》，第10～11章。特别参看第258～262页关于使用工具、脑容量扩大和牙齿减少的论述。

智慧足以找到、采集、预先咀嚼并和兄弟姐妹平分充足的食物的幼崽具有选择优势。在这些活下来的孩子中，那些最优秀的孩子能够学会并改进他们母亲的技能，而且像他们的母亲一样，乐于分担母亲的职责，同样也会有孩子，这些孩子最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①

坦纳继续写道：“当时，工具根本不可能用来宰杀动物，因为被捕食的动物很小而且很弱，可以用手抓住并杀死。”而且，“相当可能的是，正是有孩子的妇女发展了新的采集技术”，就是说，不仅发展了工具而且促使人类双腿直立，或独立使用手和脚，这是和搜索相反的采集的先决条件。妇女可能最需要自由的双手，以便不仅搬运食物，而且抱孩子。②

妇女也可能发明了所有最基本的物质技术，例如，驯化植物和动物；没有她们，文明就不可能获得发展。③ 事实上，虽然在教科书和课堂上几乎从来就没有提到这点——在教科书和课堂上我们学到的是关于“古代男人”的历史，但是，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指出，在现代的采集者和狩猎者社会里，妇女——不是男人——主要负责加工食物。因而，很可能正是妇女首先在她们营地的土地上播种，而且她们还通过喂养和照料幼小的动物开始驯化它们，因为她们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年幼的孩子。人类学家们还指出这样的事实：在“发展中的”部落和民族的原始园艺经济中，与西方人所设想的相反，土地的耕作直到今天主要仍是由妇女进行的。④

古代的许多宗教神话——这些神话明确地把农业的发明归功于女神——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论。例如，在埃及的记载中，女神伊希斯一再被称为农业的发明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碑文中，女神宁利尔由于教导她的人民耕种而受到尊敬。⑤ 不仅在考古学中而且在神话里，也有大量关于女神与农业的实际联系的证据。这种联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古老的卡塔尔·惠雅克——在那里的女神神庙中摆满了谷物祭品——到古典

① 坦纳：《论正在形成的人类》，第 268 页。

② 坦纳：《论正在形成的人类》，第 146、268 页。

③ 参见本书第 86 页注②。

④ 埃斯特·博塞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伦敦，阿伦与昂温出版社，1970；《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联合国新国际主义出版部编辑，英国牛津；巴巴拉·罗杰斯：《妇女的家务：发展中社会的歧视》，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9。

⑤ 参见，例如，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 36 页，引用狄奥多罗斯论伊希斯；第 3 页，论宁利尔。

希腊时代——当时，同样的祭品仍然被献给诸如得墨忒耳和赫拉这些女性神祇。[①]

根据对史前神话广泛而详尽的研究，像罗伯特·布里福尔特和埃里克·诺伊曼这样的学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陶器是妇女发明的。在某个时期，制陶被认为是一种与女神崇拜有关，而且一般地与妇女有关的神圣过程。在大多数古代神话中，纺织同样与妇女及女性神祇有关。这些女性神祇，例如希腊的命运女神，仍然被认为是给“男人”编织命运的神。[②]

从埃及、欧洲以及富饶的西亚地区所获得的材料也证明：女性与公正、聪明及智慧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玛亚特就是埃及的正义女神。甚至在男性统治被强加给社会之后，埃及女神伊希斯和希腊女神得墨忒耳不仅仍然以法律的给予者而著称，而且以赐予正当的智慧、忠告和正义的圣人而著称。关于中东城市尼姆拉德——在那里，崇拜已经尚武的伊什塔尔——的考古学记载证明，即使在那时，有些妇女仍然担当法院的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我们还从前基督教的爱尔兰传说中了解到，凯尔特人把塞里德温尊崇为智慧和知识的女神。[③] 执行法律的希腊命运女神和激发诗人的全部创造热情的希腊缪斯女神当然都是女性。索菲娅或智慧的形象也是女性，她的形象和作为仁慈的圣母马利亚的女神形象一起广泛流传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④]

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灵性，特别是聪明的先知所特有的超凡洞见，曾经和妇女有关。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记载中了解到，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印娜娜的继承者——仍然被认为是显圣夫人，她是指导者、神使和库阿的女预言家。巴比伦的碑文包括大量关于女祭司在伊什塔尔神庙中给予人们预言性忠告的资料，有些碑文记录了相当重要的政治事件。[⑤]

根据古代埃及的记载，我们知道，眼镜蛇的图画是女神这个词的象形

---

① 参看，例如，诺伊曼：《伟大的母亲》；马拉·凯勒：《古希腊的生殖、性和新生女神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神秘宗教仪式》，《宗教女权主义研究年鉴》，1988 年春，第 4 卷，第 1 号。凯勒关于依洛西斯神秘宗教仪式的深入研究对于理解古代女神崇拜所包含的仪式制度是一个重大贡献。这种研究还追溯了向包括活祭品和古典希腊时代这些仪式商业化的退化。

② 布里福尔特：《母亲们》，第 1 章，第 473～474 页；诺伊曼：《伟大的母亲》，第 134～136 页，强调女神的来源。

③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 4 页。

④ 诺伊曼：《伟大的母亲》，第 178 页。

⑤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 200 页。

文字符号，而眼镜蛇被认为是巨眼女神——乌扎特——神秘的洞察力和智慧的一种象征。被称作瓦·泽特的眼镜蛇女神是王朝统治以前下埃及（北部埃及）的女性神祇。后来，哈托尔女神和玛亚特女神都仍然被认为是巨眼女神。常常在埃及国王的前额上发现毒蛇形标记——一条昂首直立的蛇。一座预言祭坛——可能是女神瓦·泽特较早的圣殿遗址——矗立在埃及培乌托城——希腊人称之为布托，这是希腊对眼镜蛇女神的称呼。[①]

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圣殿也坐落在原来是对女神进行礼拜的地方。甚至在古典希腊时代，在特尔菲神谕圣殿被用来对阿波罗进行礼拜之后，仍然由一位妇女来传达神谕。她是一位名叫皮西亚的女祭司，她坐在一把三脚椅子上，椅子周围盘着一条名叫皮松的蛇。此外，在埃斯库罗斯的剧本中，我们读到，在这个最神圣的圣殿里，女神被尊崇为原始女预言家。这再次表明，甚至直到希腊古典时代，仍然还没有忘记通过妇女寻求神圣的关系和预言智慧的伙伴关系的社会传统。[②]

根据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著作，我们了解到，甚至在那么晚的时代，不仅是司法，而且还有治病救人，都仍然与妇女有关。当他在埃及游历时，他发现，作为瓦·泽特和哈托尔的继承人的女神伊希斯不仅仍然被尊崇为第一个建立法律和正义的女神，而且仍然被尊崇为一位伟大的医治者。[③] 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以双蛇杖标记著称的缠绕在一起的两条蛇仍然是现代医学专业的标志。传说表明，这种传统起源于希腊神祇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是蛇。但是，事实可能有利于这样的观点：蛇和治病救人的关系来源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就是说，这是蛇和女神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关系可能不仅适用于治病而且适用于预言。[④]

甚至文字的发明——很久以来一直被假定可以回溯到公元前约3200年的苏美尔——似乎更早，而且可能来源于女性。在苏美尔的碑文中，女神尼达巴被描绘为苏美尔人天国的书记员，而且被描绘为泥制碑片和文学作品的发明人。在印度神话中，女神娑罗室伐底被认为发明了最初的字母表。[⑤] 目前，根据古代欧洲的考古出土文物，金布塔斯已经发现，系统化

①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201~202页。还可参看巴巴拉·G. 瓦尔克：《妇女的神话和秘密百科全书》，旧金山，哈泼与罗出版社，1983。

②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261页。

③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引自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36页。

④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343页。

⑤ 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第199、3页。

的文字的最初开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且就像在苏美尔一样，这些开端似乎与“商业管理上”为了更好地记录财物的积累而设计的手写体文字无关。相反的，这种人类交往最有力的工具的最初使用似乎是精神性的：一种与女神崇拜相关的神圣的手写体文字。[1]

支持这种新理论的最著名的发现可能来自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以东14英里处的温恰遗址。就像其他一些遗址一样，当温恰文化最初被发现时，由于它的极其精美的艺术品，人们认为它比实际的年代更晚。在1908～1932年间挖掘过温恰文化遗址的M. 瓦齐克教授第一个作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公元前2000年爱琴海文明的中心。于是他断定，它是一个更晚时期的文明，而且实际上肯定是一个希腊殖民地。正如金布塔斯所指出的，某些巴尔干现代史还在引用这个结论。[2]

在考古学获得科学的测定年代的工具——例如，放射性碳和树木年代学——之前，这些理论符合当时流行的考古学范式，即，在古代巴尔干不存在先进的土生土长的文化。但是，目前从温恰文化八个不同时期的遗址所得到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确定它的年代在公元前5300～前4000年之间，就是说，大约在7000年以前。[3] 除了女神是至高无上的神祇的考古学证据之外，这些资料公正地把温恰置于伙伴关系社会的时期。

正是在温恰发现了所谓的塔塔尔碑文和刻在雕像及陶器上的其他符号。金布塔斯记载了这些发现以及“精神生活普遍明显地得到加强的证据”[4] 是如何导致了另外一种理论的，这种理论至少仍然和那种认为在巴尔干不存在先进的本土文化的旧考古学规范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温恰文化是一种来自安纳托利亚或者甚至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舶来品。但是，温恰文化现在已被确认为巴尔干的本土文化。因此，如果刻在温恰以及其他古代欧洲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碑匾、雕像和其他物品上的符号，似乎是一种最初形式的线形文字，那么，文字的起源就要比以前所认为的更早，完全可以追溯到统治者时代之前。[5]

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结论。金布塔斯教授在1980年报告

---

① 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印欧研究论文集131》，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第2章），第17页。

②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2～23页，引用瓦齐克教授的话。

③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2～25页。

④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2～25页。

⑤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22～25页。

说："目前，已知大约有 60 多个遗址挖出了刻有文字符号的物品。……大多数遗址是温恰和蒂萨文化群的遗址和保加利亚中部卡拉诺沃文化遗址。在迪米尼、库库特尼、皮特雷斯提、列格依尔、布特米尔、比克和线形体陶器上刻的或绘的符号也很著名。"这些发现证明，"只提'温恰字体'或塔塔尔碑匾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这种字体似乎是古代欧洲文明的一个普遍特点"。[①]

此外，这种字体似乎是使用一种形象的速记术来交流重要概念的古代传统的副产品。整个古代欧洲都使用象征性符号，例如，用波形饰、锯齿形饰、V 型和 X 型标记、回旋线、圆形线和各种直线来雕刻风格独特的女神雕像。正如金布塔斯所写的，这些形象是古人集体赞成和理解的互相交流他们关于他们时代的世界的基本解释的设想所采用的手段。当这种用符号交流的形式后来进一步发展时，人类最早的字体形式也进化了。这就是表意文字，其中的象征性符号（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在新石器时代广为流传）被简化成了直线、曲线和点。

金布塔斯正在译解古代欧洲字体，她也相信，有些表意符号逐渐地获得了语音音值。她写道："在雕像和其他雕刻品上最常碰到一个标志是 V。我的看法是，它是脱胎于表意符号的具有语音音值的常用字体。在埃及，M 可能是水的表意符号，它必定很早以前就具有语音音值，至少不晚于公元前 6000 年。"[②]

通过对最初主要是在雕像上发现的，后来逐渐在陶器、图章、圆盘和饰板上发现的符号和记号的广泛研究，金布塔斯试图通过联想译解其意义。例如，她假设，雕刻的 V 可能是表示显灵为鸟的女神的一种方式，而刻有这种标记的那些物品最初是用来对女神进行礼拜的。她进一步观察到，后来这些符号被刻成几行时，就像在格雷德希克盘子上那样，一组重复的 V（以及 M、X 和 Y）可能表示誓约、祝福或献给女神的礼物。[③]

金布塔斯还指出了"在古代欧洲文字和公元前 18 ~ 前 15 世纪克里特岛的线形文字、塞浦路斯—米诺斯语及古塞浦路斯语之间毫无疑问的相似之处"[④]。这就引起了下述这种情况的极大可能性：在米诺斯的克里特发现

① 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 2 章，第 72 页。
② 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 2 章，第 78 页。
③ 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 2 章，第 75 ~ 77 页。
④ 金布塔斯：《欧洲早期文明》，第 2 章，第 78 页。

的最古老的、到目前还未译解的文字——线形文字 A——可能是这种已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字后来的发展，而不是像迄今为止所设想的那样，是克里特人从他们与其通商的小亚细亚和埃及人那里借用来的。[①]

关于过去的一种新观点

所有这些关于我们逝去的过去的资料，都不可避免地引起我们自己思想中新与旧之间的冲突。旧观点认为，原始人类的血缘（及后来的经济）关系是从男人狩猎和杀戮发展来的；新观点认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产生于母亲和孩子共享共有。[②] 旧观点认为史前史是“作为战士、猎人的男人”的故事，新观点则认为，男人和女人都运用我们人类独特的能力去维持并提高生活。

正如某些最原始的社会那样，例如班布提人和孔人的社会，其特征并不是好战的穴居男人抓住妇女的头发拖来拖去。现在看来，旧石器时代是一个相当和平的时代。而且正如海因里希和索菲娅·施里曼否定了他们时代的学术成果，并且证明特洛伊城并不是荷马的虚构而是史前的事实那样，新的考古学发现证实了关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传说：在一个男性神祇规定妇女永远服从男人之前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活在和平和富裕之中的时代。

总之，根据文化进化的新观点，男性统治、男性暴力和独裁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永恒的规定。而且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说，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与其说只是一个“乌托邦梦想”，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得自这些崇拜女神的社会的遗产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摆脱不掉的回忆，当时，“生命之树”和“知识之树”仍然被认为是自然母亲既给予妇女也给予男人的礼物。这也不仅是对某种可能存在过的东西的生动感受——如果人类已经进入自由享受这些礼物的时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所有后来的文明赖以建立起来的基本技术，都是我们得自这些早期伙伴关系社会的遗产。

这并不是说这些社会是理想社会。虽然这些社会对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作为一个淳朴而美好的时代为后人所怀念，但是，这些社会并不是乌托邦社会。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一个和平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暴力，因为这些社会是由血肉之躯的人组成的社会，这些人具有人类

① 还可参看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68 页。

② 参看本书第 86 页注②。

的各种弱点和怪癖。

而且，就他们所有的创造性和前途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技术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相比，还是十分原始的。虽然有文字方面的证据，但似乎没有用文字记载的文献。虽然我们了解大量有关农业和天文学的资料，但是可能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

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的宗教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少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我们的祖先试图以在我们的时代看来是原始和迷信的方式来解释和影响宇宙。虽然在后来的统治者社会中发现了大量关于用活人作祭品的证据，但是，有迹象证明，这种举行仪式供奉祭品的实践可以回溯到这个更早的时代。[①]

---

① 关于奉献祭品的宗教仪式是否与女神崇拜有关，存在着许多争论。在埃及和巴比伦时代的墓穴里发现许多活人祭品只不过是最近的事，而且似乎是对关于印欧人引入欧洲和印度的献祭男人的妻子、情妇和（或）奴隶的论点的精心说明。但是，也有一些考古学资料似乎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宗教仪式祭品的情况。例如，参看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74页。然而许多资料是神话，例如，参看，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2。弗雷泽是19世纪主要理论的倡导者，这种理论认为，国王按习惯在他所说的母权制社会里被作为祭品。就像弗雷泽所认为的那样，宗教仪式的献祭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或者是对付即将来临的灾难的一种权宜之计。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米诺斯所发现的那种宗教仪式献祭，十分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当时，地震中两个人被压死打断了一个正在献祭一个青年男子的祭司的仪式（耶尼斯·萨克拉拉基斯和萨波娜·萨克拉拉基斯：《米诺斯神庙中的死亡戏剧》，载于《国家地理杂志》1981年2月第159期，第205～222页）。这个例证以及一直没有发现米诺斯宗教仪式献祭的其他证据的事实，导致了这样的推论：正如约瑟夫·艾尔索普所写的那样，活人祭品并不是米诺斯的习惯做法。相反，与后来古典希腊时代的相似情况一样"这似乎是为了避免好像是无法逃脱的世界末日的一种绝望的手段"（约瑟夫·艾尔索普：《一种历史观》，载于《国家地理杂志》1981年2月第159期，第223～224页）。我们的确知道，直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还偶然献祭"替罪羊"（常常是一个已判死罪的犯人）作为涤罪仪式的行动（参见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102～105页）。然而，关于是否经常用活人作祭品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十分不同。有些学者，例如埃莉诺·盖登，虽然并没断定这是一种普遍甚至常见的做法，但是提出了这样的证据：在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繁荣于公元前3000～前1800年），实际上是以活人作为宗教仪式的祭品的（1986年和盖登的私人通信）。另一些学者，例如南希·杰伊和马拉·凯勒，证明崇拜女神的农业民族甚至不用活动物作献祭品。例如，在人们所熟悉的关于该隐和亚伯的圣经故事中，该隐（代表迦南的农业民族）向耶和华贡奉水果和粮食。然而，接受了亚伯（代表游牧入侵者）的血腥祭品的耶和华拒绝了该隐的贡献（关于这个神话的一个较早的重新考查，参见E. 塞西尔·柯温：《耕地和牧场》，伦敦，科贝特出版社，1946）。还有一些证据是，在卡塔尔·惠雅克，没有任何种类的血淋淋的祭品。始于印欧人入侵之前的得墨忒耳崇拜的祭品也主要是水果和谷物（马拉·凯勒：《古代希腊的生殖、性和新生女神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神秘宗教仪式》）。

我们根据证据所能推断的这个古老时代独特的精神实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是非观。新石器时代艺术的特点有时被概括为是非理性的，因为它那大量各种各样的雕像可以和神话故事、恐怖影片甚至科学幻想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用人类的标准将理性的意义规定为，运用我们的精神超越某些天生的破毁性和野蛮性，把非理性规定为毁灭性的思想和行为，那就可以更确切地说，新石器时代艺术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非理性的世界观，不如说是一种前理性的世界观。[①] 与我们这个世俗时代受到高度评价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思想相比，这种前理性的世界观乃是以幻想的、直觉的和神秘的意识为特点的精神产品。

正如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所论证的那样，这并不是说，这些远古的人是只用右脑思维的。杰恩斯声称，真正的人类意识——他认为就是使用我们更有逻辑的或左脑的功能——产生于我们已经考证过的连续的血腥入侵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灾难性震动。他论述道，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我们只不过是用右脑思维的、神所拥有的自动机器。[②] 但是，我们只要注意一下斯通亨奇和埃夫伯里的圣殿就会发现，在新石器时期，左脑操作的逻辑的、连续的和直线的思维特征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很明显，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动来调准建造圣殿的巨石，以及这些巨石的制作、运输和布置都需要有数字、天文学和工程学的先进知识。[③] 而且克里特人——他们建筑高架桥，铺路，设计了结构复杂的宫殿，而且有了室内上下水道、繁荣的贸易和大量关于航海的知识——当然必定也广泛地运用左脑以及右脑进行思维。因为即使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克里特的物质成就也是令人吃惊的，实际上超过了现代许多发展中社会的成就。

在与我们现代世界相比时，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些史前的伙伴关系社会里，技术的进步首先是用来使生活更快乐，而不是用来统治和破坏。这就回到了统治者社会和伙伴关系社会的文化进化之间的基本差别，还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早期的技术和社会并不先

---

① 关于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的阐述，我受惠于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面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77）中对理性的讨论。见该书第 236～237 页。

② 朱利安·杰恩斯：《在分成两半球的大脑中诞生的意识》，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77。

③ 例如，参见 C. A. 纽汉：《史前巨石群的天文学意义》，利兹，约翰·布莱克本出版社，1972。同样的，梅拉特把卡塔尔·惠雅克描述为拥有“编织、木工和冶金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的农业和畜牧习俗的”乐园（《卡塔尔·惠雅克》，第 11 页）。

进的伙伴关系社会比现代世界的高技术社会更进步。在我们现代世界的高技术社会里，一方面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饿，而另一方面又有几十亿美元被用来制造最尖端的杀人武器。

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可以用一种新的而且十分有益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对逝去的古代精神的研究。今天许多人研究较早时期的神秘智慧，实际上是研究伙伴关系社会而不是统治者社会的那种精神特征。

神话和考古学的证据都表明，前统治者精神最值得注意的性质也许是它认识到我们自身与自然万物的同一性，这种精神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和克里特人崇拜女神的核心。现代生态学家的著作不断地指出，这种早期的精神实质常常和现代某些类型的东方精神相联系，它比现代破坏环境的意识形态更先进。事实上，它预示了新的科学理论：地球上一切生物与大气、海洋及土壤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相互联系的生命系统。化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和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十分恰当地称这种新理论是盖亚假设——盖亚是女神的古希腊名字之一。[①]

古代社会关于作为给予和抚育的母亲支配宇宙的力量的观念，从心理学来看，也比现在仍然支配我们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惩罚性的男性神祇的观念更令人感到放心——而且社会很少产生紧张和忧虑。事实上，在西方的数千年历史中，妇女和男人都始终以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为象征，表示对富于同情心的、仁慈的母亲的崇敬，这种执著性充分证明了人类对于这种令人感到安全的形象的渴望。然而，就像其他许多令人感到困惑的历史问题一样，只要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史前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女神崇拜的传统相联系，这种执著性就极其容易理解了。

但是，正因为这种关于我们文化进化的最初方向的新知识使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潜在的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研究我们的过去和潜在的未来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因为这种新知识对现存制度构成一种威胁，人们正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它。

在这里所报道的、目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考古学资料的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统治者社会隐瞒信息的事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虽然还没有挖到遗址的最深和最古的地层，詹姆斯·梅拉特却奉命停止在哈希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挖掘工作，理由是“继续进行遗址挖掘工作只能获得毫无科学价

① 詹姆斯·洛夫洛克：《盖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

值的重复的结果"①。这一决定是不顾梅拉特的多次抗议作出的。虽然当时土丘的外围部分，包括周围的坟地（对大多数挖掘工作来说，这是丰富的考古学资料的主要来源）还没有探测，但是这一决定还是被执行了。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财政支持或公共机构的支持，挖掘工作不得不停下来。而且从那时起，盗墓贼对遗址进行了骇人听闻的非科学的劫掠，现在，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遗址已毫无价值了。

毫无疑问，其他因素对于作出过早地停止这些重要的考古挖掘工作的决定也起了作用，梅拉特认为这一决定乃是"考古学史上最富于悲剧性的一章"②。但是，问题仍然是，这一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是由新的知识所促成的（虽然是无意识促成的）。这种新的知识是，在哈希拉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背后，正如梅拉特所写的那样，"存在着一种伟大而激动人心的力量，即古代安纳托利亚的宗教对伟大女神的狂热崇拜"③。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知识分子使现实符合统治者的世界观的努力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当然，促使我们的文化进化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主要工具是剑。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有另一种工具甚至更强有力。这就是作家和学者的工具：把言语记录在木板或纸上的笔或铁笔。尤其在今天，当我们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社会时，了解笔可能像剑一样强大有力是富有教益的。因为归根结底，正是这种表面上弱小的工具实际上颠倒了现实。

---

① 詹姆斯·梅拉特：《哈希拉的出土文物》，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0，第2章，第iv页。

② 詹姆斯·梅拉特：《哈希拉的出土文物》，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0，第2章，第v页。

③ 詹姆斯·梅拉特：《哈希拉的出土文物》，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0，第249页。

第六章　颠倒了的现实：第1部分

《奥瑞斯忒亚》是我们最著名而且经常演出的希腊戏剧之一。在这部名著中，在审判杀害自己母亲的奥瑞斯忒斯时，阿波罗神解释说，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并没有亲属关系。他断言，“创造孩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母亲“只是一位承受了种子的哺育者”。①

阿波罗继续说：“我将向你们证明我所解释的证据。可以有一位父亲而没有什么母亲。她就站在这里，这位活生生的证人，奥林皮亚的宙斯的女儿，她从来没有在黑暗的子宫里孕育过，还没有任何女神能生出这样的孩子。”②

这时，女神雅典娜——根据古希腊的宗教信仰，她是长大后从她父亲宙斯的头里跳出来的——进来并证实了阿波罗的陈述：只有父亲和他们的孩子有亲属关系。她声称：“我根本就没有给予我生命的母亲。”她补充道：“要不是婚姻，我会始终全心全意献身于男性，而且坚决站在我父亲一边。”③

因此，当代表古老秩序的欧墨尼德斯或复仇女神痛苦地齐声惊呼：“年青一代的神啊，你们践踏了古老时代的法律，从我的手中夺去了它们”④ 时，雅典娜投了决定性的一票。俄瑞斯忒斯被赦免弑母的全部罪行。

弑母不是犯罪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人试图否定人类全部亲属关系中最有影响而

①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第158页。
②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第158页。
③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第161页。
④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第163页。

且最明显的关系呢？为什么像埃斯库罗斯这样优秀的剧作家会围绕这样的主题写出一部三幕悲剧？而且为什么这部三幕悲剧——在那个时代，它并不是今天所理解的戏剧，而是宗教仪式剧，其目的是要激起人们的热情并遵奉当时的规范——会在重要的庆典场合向全体雅典人民甚至包括妇女和奴隶演出呢？

在试图回答《奥瑞斯忒亚》的规范作用是什么的问题时，标准的学术性解释一直是，它试图解释希腊的雅典最高法院或杀人犯法庭的起源。据推测，在这个当时还是一种新事物的法庭上，可以通过国家不那么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合法手段，而不是通过氏族复仇来获得正义。[①] 但是，正如英国社会学家琼·罗克韦尔指出的那样，这种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它甚至没有触及中心问题：这个案件——据说是希腊杀人犯法庭审理的第一个案件——为什么是一位母亲被她自己的儿子杀死。它也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支持国家执行正义的“道德教训”可以根据什么宣布因预谋的冷酷无情的复仇而杀死他母亲的儿子无罪——而是根据显然十分荒谬的理由：他和她没有亲属关系。[②]

为了回答《奥瑞斯忒亚》实际上表达和肯定了何种规范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这部三幕悲剧看成一个整体。在第一幕“阿伽门农”中，皇后克吕泰涅斯特拉为她女儿的死复仇。我们知道，她的丈夫阿伽门农在出发去特洛伊时欺骗她，说要带他们的女儿伊菲革尼亚去和阿喀琉斯结婚，但是，实际上是要把伊菲革尼亚作为牺牲，以使无法起航的舰队获得顺风。当阿伽门农从特洛伊返回时，当他为了洗清自己的战争罪恶而举行沐浴仪式时，克吕泰涅斯特拉扔出了一张网缠住并刺死了他。很明显，她这么做并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悲伤和仇恨，而是由于她作为氏族首领的社会角色，她有责任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死复仇。总之，她是在母系社会的规范内行动的，在这种社会里，作为皇后，她的职责就是亲眼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在第二幕“奠酒人”中，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奥瑞斯忒斯化装返回阿尔戈斯。奥瑞斯忒斯以客人的身份来到他母亲的宫殿，杀死了他母亲的

① 参见，例如，休·劳埃德－琼斯：《阿伽门农、奠酒人、欧墨尼得斯导论》，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兰蒂斯·霍尔出版社，1970。

② 琼·罗克韦尔：《虚构的事实：文学在社会系统研究中的运用》，伦敦，罗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74，第5章。

新配偶埃癸斯托斯；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为了给他父亲的死复仇，又杀死了他的母亲。第三幕“欧墨尼得斯”，表现奥瑞斯忒斯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受审。我们知道，欧墨尼得斯作为古老秩序的代表，而且就她们的角色来说是社会的保护者和正义的执行者，一直在追究奥瑞斯忒斯的罪责。现在，女神雅典娜主持的由12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要决定奥瑞斯忒斯是无罪释放，还是被判处死刑。但是，陪审团投票的结果是双方票数相等，雅典娜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奥瑞斯忒斯被无罪释放，因为他并没有使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流血。

因此，《奥瑞斯忒亚》这部剧使我们返回到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发生了古典作品学者如H. D. F. 基托和G. 汤普森所说的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之间的冲突。[①] 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描绘了而且证明了从伙伴关系规范向统治者规范的转变。

正如罗克韦尔所写的那样，它把我们从“完全同意第一幕中克吕泰涅斯特拉案件的公正转到这一点上来：她的女儿被忘记了，她的鬼魂消失了，而且她的案件不存在了，因为妇女并没有她所要求的那些权利和品质”[②]。因为“如果像克吕泰涅斯特拉这样有权的人物——她由于她的女儿伊菲革尼亚被谋杀而怒气冲天——都无权复仇，那么女人还算什么呢？”

通过对这位“盛气凌人的”妇女的教训，甚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妇女实际上都被禁止接受采取反叛行动的思想。而且，正如罗克韦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部标准戏剧中，雅典娜的角色“是一位有教养的外交女强人；在一种社会制度发生转变时，被打败了的政党的领导人物接受新政权是十分重要的”[③]。

雅典娜不仅是女神的直系后代而且是雅典城的保护神，由于她表态支持男性的统治地位，所以每一个雅典人都必须接受向男性统治的转变。而且同样必须接受从过去曾经是基本的公社或氏族的财产所有制（在这种制度内，血统是通过妇女来追溯的）向男人占有财产和妇女的私人所有制的转变。正如罗克韦尔所写的那样：“如果在杀人犯新法庭上的第一次审判

① G. 汤普森：《史前的爱琴海》，纽约，城堡出版社，1975；H. D. F. 基托：《希腊》，巴尔的摩，企鹅书店，1951，第19页。

② 罗克韦尔：《虚构的事实》，第163页。

③ 罗克韦尔：《虚构的事实》，第162页。

证实，由于没有母系亲属关系，弑母并不是一种渎神罪，那么，这难道不是父系血统的最好论据吗？”[①]

在《奥瑞斯忒亚》中，每一个雅典人都可以看到，甚至古代的愤怒女神或命运女神最终也不得不让步。男性统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新的规范已经取代了旧的规范，她们的愤怒已毫无用处。完全失败之后，她们回到卫城下的洞穴里，当时雅典娜“劝说”她们仍然留在雅典——并反复重申她的引人注目的证据：杀死自己的母亲并不是使血亲流血，因此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明显地屈从的她们现在不得不乞求于她们的古老权力，即女神的权力，并且答应协助雅典娜保卫“这座万能的宙斯和战神阿瑞斯统治的城市”[②]（阿瑞斯当然是战神）。

作为来自前奥林匹亚时代的女性权力的最后残余，愤怒女神将仍然编织妇女和男人的命运，她将决定凡人的生命何时诞生、何时死亡。罗克韦尔写道：“就像印度神话中的时母那样，妇女给予生和死。”[③] 但是，现在这些妇女成了古老权力最后剩下来的代表，在男性统治的新神神殿中，作为次要的而且勉强够格的人物，她们不得不隐蔽起来。

统治者和伙伴精神

《奥瑞斯忒亚》试图影响并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亚该亚人于公元前 5 世纪统治雅典之后几乎 1000 年，这种情况仍然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更惊人的是，为欧墨尼得斯辩护的合唱队本身竟会总结《奥瑞斯忒亚》实际上有什么意义：“他们可以这样对待我！我，过去的精神，被逼无奈转入地下，就像尘土一样被抛弃！”[④]

虽然在埃斯库罗斯时代，这种过去的精神——表现了对一个较早时代逐渐淡漠的回忆——还没有被完全毁灭，但是，它现在能够在重大的庆典场合公开宣布：应该完全忘记男人反对妇女的错误，甚至忘记被自己的父亲杀死的女儿。人民的精神已经如此彻底地被改变了，以至于现在可以说，母亲和孩子实际上并没有血统关系；这就是说，母权制已经没有现实

① 罗克韦尔：《虚构的事实》，第 162 页。
②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第 167 页。
③ 罗克韦尔：《虚构的事实》，第 150 页。
④ 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第 164 页。

的基础了，相比之下，只有父权制才有现实的基础。

大约在 2000 年之后，某些西方科学巨人，例如 19 世纪的赫伯特·斯宾塞，仍然通过肯定妇女只不过是男性精子的孵卵器来解释男性的统治。[①] 根据科学证明，一个小孩从父母双方接受了相同数目的基因，现在，在中学和大学里已不再向我们传授母亲和孩子之间没有亲属关系这种思想了。但是，甚至我们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以及许多我们最尊敬的科学家现在仍然告诉我们，妇女是上帝或大自然放在地球上的创造物，主要是为男人生孩子——最好是生儿子。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仍然通过姓氏来识别孩子，这些姓氏只说明了孩子和他们父亲的关系。此外，成千上万的西方家庭仍然根据教士和家里的圣经读物所规定的父系制来适应社会规范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谈论《圣经》中连篇累牍关于"父亲生孩子"的高论。我们要谈论《圣经》中所有有关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当某个重要人物被认出时，他是作为他父亲的孩子被认出的，甚至以色列人（以及全人类、救世主或弥赛亚本人）也是上帝父亲的孩子。[②]

对我们来说，在数千年无情的思想灌输之后，这就成了现实，就成了事物的原貌。但是，对于那种被驱逐的精神——这就是崇拜女神的那种精神，这位女神是所有生命的女性最高创造者，她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所有动物和植物的母亲——来说，现实应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

对于在这样的社会里——血统是通过母亲和作为氏族首领并占据社会受尊敬的重要地位的女祭司的妇女来追溯的——适应社会需要的精神来说，父系制——它把妇女逐渐降低为男人的私有财产——似乎不可能是"自然的"。至于儿子没有因杀害自己的母亲而受到审判，这可能是这种精神所完全无法理解的，正如埃斯库罗斯剧中的欧墨尼得斯完全无法理解一样。同样难以理解，而且实际上是渎神的思想可能是这样的思想：统治宇宙的最高力量应该是人格化的全副武装的有复仇心理的神，他们不仅宽恕，而且实际上以正义和道德的名义，指挥男人按照常规进行杀人、抢劫和强奸。

① 关于斯宾塞和其他 19 世纪男性中心理论家的卓越分析，见玛莎·维西奴斯主编《忍气吞声：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2，特别参看第126～145 页。

② 参见，例如《民数记》32；《历代志》（上）5。

总之，这种旧精神完全不适合在新的统治者制度内发挥作用。通过暴力和恐怖也许可以暂时制止它。但是，从长远来看，简直可以说完全改变了人们理解并改造现实的方式。

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化呢？怎样才能使精神发生这样的转化呢？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当我们再次站在我们文化进化的重大转变的入口时，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如何在极端不平衡的时期打破旧体制，并且由不同的体制取而代之。[①] 关于一种社会制度怎样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问题，特别有趣的是智利的温贝尔托·马图拉纳和 F. 瓦雷拉以及匈牙利的 V. 昌尼和 G. 坎皮斯对生命系统自组织的研究。马图拉纳称之为自我创造，而昌尼则称之为自然发生。[②]

昌尼描述了系统如何通过他所说的复制过程形成并维持自身。在生物水平上，一般来说，可以观察到自我复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系统不断用其遗传密码或 DNA 带有昌尼所说的复制信息的细胞来取代它们自己。但是，这一过程发生在分子、生物和社会等所有的层次上。因为每个系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复制信息，这些信息形成、扩展并支撑系统。[③]

正如昌尼所指出的，观念的复制首要是形成，然后是维持社会系统。而且，很清楚，适合伙伴关系社会的特殊类型复制信息（例如，关于平等的基本观念）完全不适合统治者社会。规范——或者被认为是规范的和正确的东西——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为了用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代替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不得不对复制信息进行基本的改革。为了模拟生物的功能，必须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复制密码。而且这种新的密码必须被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孩子所牢记，直到他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完全转变得符合统治者社会的要求为止。

在寥寥几页的篇幅中甚至不可能开始描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持

① 参看戴维·洛耶和理安·艾斯勒：《混沌和转化：非平衡理论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的意义》，载于《行为科学》1987 年第 32 期，第 53～65 页。

② 参看，例如，温贝尔托·马图拉纳：《活组织：活组织理论》，载于《人机研究年鉴》1975 年第 7 期，第 313～332 页；以及 V. 昌尼：《广义进化论》，布达佩斯，基多大学出版社，1982。

③ 参见，例如，V. 昌尼和 G. 坎皮斯：《自然发生：复制系统的进化》，载于《理论生物学年鉴》1985 年第 114 期，第 303～321 页。

续了几千年，而且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仍然在进行着：正是这个过程有时残忍地、有时难以捉摸地、有时无意地、有时深思熟虑地把人类精神重新塑造成人类文化进化中这种激烈的转变所需要的新型精神。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正是这个过程在历史上不断造成巨大的物质毁灭。正如我们仍然可以在《圣经》中读到的那样，希伯来人以及后来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样毁灭了寺庙，砍倒了神圣的树林，打碎了异教的偶像。[①] 它也需要大规模地毁灭精神，这是一个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过程。不仅通过焚书，而且通过烧死和迫害异教徒，那些不能按照规定的方式理解现实的人被杀死或被改变信仰。

直接通过对个人的高压统治，以及间接通过周期性地显示社会力量，例如，公开审讯和判处死刑，有组织地打击不符合统治者规范的行为、态度和观念。这种恐怖状态成了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组成部分，渗透到儿童教育、法律和学校中。而且通过这些和所有其他的社会化手段，把建立和维持统治者社会所必需的复制信息分配给整个社会系统。

几千年来，这些社会化手段中最重要的是由古代教士所执行的“精神教育”。这些教士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现在到处都在统治和剥削人民的男性精英中的成员。

现在到处散布说他们的话是神的命令——他们利用巫术与之交流的上帝的话——的教士们得到军队、法庭和刽子手的支持。但是，他们得到的最大的支持并不是世俗的，而是精神的。他们最强有力的武器是“宗教”故事、神圣的仪式和教士的敕令，通过这些东西，他们在人们的精神中反复灌输对令人敬畏的、遥远的和“不可思议的”神祇的恐惧。因为人们被告诫要服从神及其世俗代表的教训，所以神现在以最野蛮、最不公正和反复无常的方式执行生与死的权力。直到今天，这种权力仍然被解释为“上帝的旨意”。

甚至今天人们仍然通过“神圣的”传说学习什么是善或恶，什么应该效法或厌恶，什么应该被接受为神的命令，不仅他们自己而且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这么做。通过仪式和典礼，人们也参与这些传说。因此，这里所表达的价值渗入了精神的最深处，甚至在我们的时代，它们仍作为神圣而永恒的真理而受到保护。

---

① 参见，例如，《列王记》（下）18：4；《民数记》31：2；《历代志》33。

今天，除了宗教、国家审查制度或传播媒介对之进行控制的地方之外，当人们可以了解到大量各种各样的观点时，很难理解古代神权政治的城邦国家的教士通过这些神圣的学说所实施的这种中央集权的一体化统治。在古代，可供阅读的东西很少，就没有文化的广大群众来说，可听的材料更受到限制。而且它主要表达官方批准的观点。此外，复制任何可能损害官方批准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设法逃脱了神权政治的审查，对于这种异端邪说的惩罚仍然是可怕的严刑拷打和死刑。

对于古老的神话、仪式、韵文和诗歌的回忆在民间流传着，就像在今天仍然流传着那样。但是，逐渐地，经过世世代代的流传，这些古代神话、韵文、仪式和诗歌日益被窜改和歪曲，因为教士、颂诗和歌曲作者、诗人和作家把它们改造成了他们认为可以邀宠于他们的主子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所做的也是他们的神的意志，而且受到神的鼓励。但是，他们无论是以神、主教或国王的名义，还是出于信仰、野心或恐惧而这么做，这种不断地制作和重造标准的口头和书面作品的工作，根本没有跟上社会的变化。它是规范变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男性统治的、暴力的、等级制的社会，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才逐渐开始被认为不仅是规范的，而且是正确的。

神话的变质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84》一书中预言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一位“真理的牧师”将重写所有的书，而且重造所有的观念，以便使它们符合男人政权的要求。[①]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时代竟还没有到来。很久以前，在古代世界，它几乎已经到处都发生了。[②]

在中东，首先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后来在犹太和以色列的希伯来王国，与重新编写法典一道重新创造神的传说主要是教士的工作。就像在古代欧洲那样，这个过程是从男性统治的第一次入侵开始的，而且延续

① 乔治·奥威尔：《1984》，纽约，新美利坚图书馆，1971；初版标题为：《一九八四》，伦敦，高兰兹出版社，1949。

② 参见玛丽·戴利：《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8，对这种重要的见解作了论述。

了数千年，例如埃及、苏美尔和所有富裕的伊斯兰国家都逐渐变成了男性统治的好战的社会。而且正如圣经研究家们现在用大量文件所证明的那样，这个重新编造神话的过程仍然继续到公元前400年，学者们告诉我们，当时希伯来教士最后重写了希伯来《圣经》（《旧约》）。[①]

最后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西方精神的神话和法律归纳成一本《圣经》——我们的《圣经》的前半部分，即《旧约》——的工作，发生在埃斯库罗斯在希腊写成《奥瑞斯忒亚》之后约100年。这时，在巴勒斯坦，一群被圣经学者认为是教士学派的希伯来教士对《圣经》神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仍然以这些神话为基础——进行了筛选、编辑和补充。这种标记可以使他们区别于较早重新编造神话的那些人——例如埃洛希姆学派，这个学派在北部以色列王国写作——以及耶和华学派，这个学派在南部犹太王国写作。这些埃洛希姆学派和耶和华学派的编辑队伍拥有更早的、符合他们的目的的、重新加工过的巴比伦和迦南神话以及希伯来历史。现在，教士学派的队伍开始彻底整理这些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古代文本，并试图编辑一部新的完善的本子。用给著名的《达特茅斯版圣经》作注释的圣经学者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是“把神权政治国家的蓝图变成现实”[②]。

上述这些宗教学者还告诉我们，不论他们是否在思想上有共谋，至少他们在行动上有共谋，他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圣经》做了最后的改写工作。《达特茅斯版圣经》的注释者关于教士派这样写道：“他们合并了耶和华派和埃洛希姆派的材料，并且加进了一些被称之为教士派的材料。”注释者还写道：“教士派作者后来的这种贡献的数量和质量，使那些不熟悉他们著作的人大吃一惊。人们认为这种贡献几乎包括了《旧约》前五卷的一半，因为许多学者认为《创世记》的50章中有11章，《出埃及记》的40章中有19章，《民数记》的36章中有28章，以及整个《利未记》都出于教士派的手笔。”[③]

此外，许多从前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如某些所谓的伪经，被删除

① 《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说明了现在学者们如何能够重新构造几百年以来各种“流派”的拉比和祭司们所拼合的《圣经》。特别参看第5～11页。

② 参见《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第9页。

③ 参见《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第10页。

了。而且，正如《达特茅斯版圣经》也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这里，“只有承认当代宗教习俗起源于遥远的过去，或者把神的起源归因于各种宗教仪式，当代宗教习俗才能获得认可”[①]。总之，用《达特茅斯版圣经》的话来说，这部经过决定性改造的神话——传给我们的《旧约》——是“一个七拼八凑的东西”[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圣经》中存在着这么多的矛盾和内在的不一致，尽管它试图“给人一种统一的印象”[③]。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创世记》第一章中发现了关于上帝如何创造人类的两个不同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女人和男人是同时产生的神的创造物；第二个更精心炮制的故事则告诉我们说，上帝先创造了亚当，事后觉得亚当太孤单，才用亚当的肋骨又创造了夏娃。

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有许多明显地是古老现实与教士统治阶级试图强加于人的新现实之间仍在继续冲突的反映，这种冲突遗留在人民的文化中。旧规范和新规范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十分明显的，就像平等主义和关于人类第一对夫妇的男性至上论的故事之间的冲突那样。但是，新旧之间的冲突通常并不明显。

有关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圣经》中对蛇的处理。事实上，蛇在人类戏剧性地离开伊甸园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有与更早的现实——蛇在其中乃是女神最主要的象征之一——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出土文物中，蛇是最常见的主题之一。金布塔斯写道：“蛇及其抽象的派生物——螺旋线——是古代欧洲艺术占支配地位的主题。”[④] 她还指出，蛇和女神的结合——不仅以它的原初形式，如在克里特，而且通过晚期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各种变形，例如，雅典娜、赫拉、得墨忒耳、阿塔迦蒂斯和迪娅·叙利亚——妥善地保留在各个历史时代中。[⑤] 在中东和东方的许多地方，情况也是这样。在美索不达米亚，从一座公元前 24 世纪的遗址中挖出的一座女神雕像，有一条蛇盘在她的颈

① 参见《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第 10 页。

② 参见《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第 10 页。

③ 参见《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50，第 10 页。

④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 93 页。

⑤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 149 页。参见，例如，E. 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整幅插图 59。

部。公元前100年，印度的一座几乎同样的雕像也是这样。[1] 在古代埃及神话中，眼镜蛇女神瓦·泽特是世界的原始女神创造者。迦南的女神阿什托雷斯或阿斯塔特被描绘为蛇。在公元前2500年一座名叫生命之树的苏美尔女神浅浮雕上，我们发现两条蛇正好刻在二位女神形象旁边。[2]

很明显，蛇是女神权力十分重要、十分神圣而且极其普遍的一种象征，所以不能忽视。如果旧精神可以被改造得符合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蛇可能或者不得不被挪作新统治阶级的一种象征，或者被打败、歪曲和怀疑。

因此，在希腊神话中，在奥林匹亚的宙斯身旁，蛇成为新权力的一种象征。[3] 在雅典娜神殿里，同样有一条蛇。雅典娜现在是一位变了质的神，她不仅是智慧女神，而且是战争之神。在埃瑞克忒翁庙——一座位于雅典卫城的雅典娜神殿旁边的建筑——甚至还饲养着一条活蛇。[4]

希腊新的印欧统治者对于蛇的这种盗用，是为其十分实际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蛇有助于使新统治者的政权合法化。由于发现了敌人手中曾经属于女神的强有力的象征物的这种令人迷惑的效果，蛇又成了征服者的暴力与战争之神打败女神的一种永恒的提示。

我们从希腊传说中了解到，旧秩序失败的进一步象征是大批的蛇被杀死：宙斯杀死了巨蛇叙封；阿波罗杀死了巨蛇皮松；而海格立斯杀死了巨蛇拉冬。拉冬是女神赫拉的神果树的守护者，据说这棵神果树是赫拉和宙斯结婚时，女神盖亚送给赫拉的。

同样的，我们在富饶的近东地区发现了巴力（他现在不仅是暴风之神，而且是女神的姐夫）征服巨蛇洛坦或劳坦（值得注意的是，在迦南人的语言中，洛的意思是女神）的神话。而且从安纳托利亚，我们听到了印欧人的赫梯神如何杀死巨龙伊卢扬克斯的故事。[5]

---

① 关于在近东、欧洲、亚洲甚至美洲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与女神紧密结合的蛇的形象的概论，参见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中的全页插图。

② 参见，例如，约瑟夫·坎贝尔：《神话的形象》，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第295页。

③ 参见，例如，约瑟夫·坎贝尔：《神话的形象》，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第296页。还可参看简·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伦敦，默林出版社，1903，1962，对蛇在希腊神话中的起源作了概论。

④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第149页。

⑤ 默林·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6，第67页。

在希伯来的神话中，正如我们仍然可以在《约伯记》第41章第1节和《诗篇》第74篇中所读到的那样，耶和华杀死了巨蛇利维坦，它现在被描绘为多头的凶恶的海中怪兽。但是，我们同时在《达特茅斯版圣经》中读到，希伯来宗教最神圣的象征约柜最初可能并未装有《十诫》。在这个约柜里——直到今天这个约柜在犹太人的仪式中仍然占据中心地位——有一条青铜制的蛇。[①]

《圣经》中的《列王记》（下）第18章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黄铜制的蛇，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写的那样，它“和它的配偶，万能的女神，通称为阿瑟拉的形象一起，在耶路撒冷的神殿里受到崇拜”[②]。正如我们也在《圣经》中所读到的那样，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当希西家国王进行宗教大迫害时，这条据说是摩西本人为了证明耶和华的力量在沙漠中用黄铜制造的蛇终于被扔出神殿并毁掉。[③]

但是，有关蛇的缠绵不绝的力量的最惊人的证据乃是来自夏娃和亚当从天堂里堕落的故事。[④] 因为正是蛇劝告女人不服从耶和华，而且劝告她偷吃智慧之树的果实，这种劝告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人类注定要受到永恒惩罚的原因。

神学家们多次尝试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从天堂里堕落的故事，但是，这些方式无法解释作为“原罪”不可避免的结果的野蛮、残忍和冷酷。事实上，以新的而且更进步的人类的象征主义对所有宗教神话中这个最著名的神话所作的重新解释，乃是意识形态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必然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从统治者制度向伙伴关系制度的转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根据这个重要故事的历史背景，我们完全理解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意义。

事实上，只有从这种历史观点来看问题，夏娃接受蛇的劝告的故事才有意义。蛇——女神的一种古代预言或神谕的象征——劝告夏娃——女人的原型——不服从一个男性神祇的命令的事实，的确并不仅仅是一件偶然的事。夏娃实际上接受了蛇的劝告，即无视耶和华的命令，她吃了神圣的

---

① 《达特茅斯版圣经》，第146页；《列王记》（下）18：4。

② 坎贝尔：《神话的形象》，第294页。

③ 《列王记》（下）18：4。

④ 关于夏娃起源的讨论，参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拉斐尔·帕泰：《希伯来神话》，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3，第69页。

智慧之树的果子，这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在早期的神话中，和生命之树一样，智慧之树也是一种与女神有关的象征。而且，在古代神话和社会现实中（希腊的皮松女神和后来的罗马西比尔女神也是如此），一位作为女祭司的妇女只不过是神的智慧和启示的载体。

根据对较早期的现实情况的考察，这位强有力而且自命不凡的上帝耶和华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夏娃不能吃神树的果实（或者是知识之树，或者是神圣的智慧之树，或生命之树）——可能不仅是违反自然的，而且是渎圣的。神树的园林是旧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引诱崇拜者有意识接受神圣或神秘的真理的启示的仪式，也是旧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在这种仪式中担任女神的女祭司。

因此，根据旧的现实，耶和华无权发布这样的命令。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他发布了这样的命令，作为女神的代表，夏娃和蛇也可以不服从。

但是，当这一部分堕落的故事只有根据旧的现实才有意义时，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则只有根据把统治者社会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才有意义。因为就像后来有角的公牛（与女神崇拜有关的另一种古代象征）变成了基督教肖像画中有角有蹄的恶魔那样，神谕智慧的古代象征变成了魔鬼似的罪恶，以及因人类的一切不幸而谴责妇女的象征，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这种转变乃是对从前曾被理解的现实的蓄意颠倒。

对于《圣经》最初的读者——迦南人，他们仍然会记得那些给他们带来新的战神的男人施加给他们祖先的可怕的惩罚——来说，夏娃不服从耶和华的命令的可怕后果不只是对人类“罪恶”的一种讽喻，它也是一个明显的警告，以免人们仍然坚持崇拜女神。

当夏娃公然反抗耶和华，而且胆敢求助于知识的源泉时，她的“罪恶”实质上是拒绝放弃对女神的崇拜。而且因为她——第一位妇女，而且是妇女的象征——比亚当（他只不过追随她的领导）更顽强地坚持旧信仰，所以对她的惩罚可能更可怕。从今以后，她可能不得不忍受一切苦难。不仅她的悲伤，而且她的怀孕——她必须生许多孩子——可能是无穷无尽的。[①] 而且她可能永远受这个有报复心理的上帝及其在尘世的代

① 《创世记》3：16，“耶和华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段话明显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当时从天堂里堕落的故事被认为是一则关于男性统治的寓言：崇拜女神的平等主义的农业（或园艺）民族如何被男性统治的好战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以及这种情况标志了（转下页注）

表——男人的统治。

此外，对蛇的诬蔑和把妇女与罪恶联系起来，是使女神丧失信誉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关于《圣经》如何帮助建立和维持一种男性统治、等级制和战争的现实最明显的例子，并不是它如何对待蛇。甚至更明显的——而且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那样——独一无二的例子是写作《圣经》的男人们如何对待女神。①

（接上页注①）妇女的性自由和生殖自由的结束。"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这句话强烈地暗示了，在那个时代，妇女不仅丧失了和谁过性生活的选择权，而且也丧失了使用节育技术的权力。古代埃及莎草纸文稿所描述的使用杀精子剂的事例证实了使用避孕用具可以追溯到古代。参见诺曼·海姆斯《中世纪避孕史》，纽约，肖根图书公司，1970，第64页。

① 关于19世纪的一本不仅向当时流行的学术研究而且向《圣经》本身提出挑战的杰出著作，参见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妇女的圣经》（巴巴拉·韦尔特作序并重印于《攻击圣经的最初的女权运动》中，纽约，阿尔诺出版社，1974）。该书力排其他许多女权主义者的异议于1895年首先出版，这些人认为它不是可怕地渎圣，就是不适合于一个世俗的或启蒙的时代。《妇女的圣经》是几个女权主义学者的作品。虽然她们中有些人企图调和《圣经》和女权主义的愿望，但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可能是19世纪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立刻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认清并反对许多观点：神圣的教义认为妇女是次要的造物。从那时起，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妇女重新审查了《圣经》，对宗教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这种新研究的一些概述，参见盖尔·格雷厄姆·耶茨：《精神性和美国女权主义的经验》，载于《符号》第9期（1983年秋季号），第59~72页；安妮·巴斯托·德赖弗：《评论论文：宗教》，载于《符号》第2期（1976年冬季号），第434~442页；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学院中的女权主义神学》，载于《基督教和危机》1985年第45期，第55~62页；还可参看卡罗尔·克赖斯特和朱迪思·普拉斯科夫主编的《妇女精神的兴起：一本妇女宗教读物》，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79；南希·A.福尔克和丽塔·格罗斯主编《沉默的世界》，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80；查伦·斯普雷特纳克主编《妇女精神政治学》，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82；伊丽莎白·舒斯勒·费奥伦查：《对她的回忆》，纽约，十字路出版社，1983；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主编《宗教和性别歧视：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妇女形象》，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74；玛丽·戴利：《超越圣父》，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3；苏珊娜·赫谢尔主编《一位活着的犹太女权主义者》，纽约，肖根图书公司，1982；一篇最近的优秀短文是卡罗尔·克赖斯特的《学院和宗教研究中的范式转化》，载于《转变学院的意识》，克里斯蒂·法哈姆编，布鲁明登，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关于对撒拉的圣经故事引人注目的重新解释，参见萨维娜·J.托巴尔：《女祭司撒拉：〈创世记〉的第一个母权制》，芝加哥、斯沃洛出版社，1984。

第七章　颠倒了的现实：第2部分

最初的入侵者简直就是一群烧杀抢掠的强盗。例如，在古代欧洲，已经建立的文化突然消失和库尔干人首领的坟墓最初出现在时间上是一致的。[①] 而且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整个城市如何照例被夷成平地，艺术品——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包括被征服的民族最神圣的偶像，即“异教偶像”——如何被熔成黄金以便于运输。[②]

但是，新统治者本身不久就开始了变化。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采纳了被征服民族的某些更先进的技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下来并且常常娶当地妇女为妻。和克里特的迈锡尼统治者以及迦南的所罗门王一样，他们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逐渐更感兴趣了。他们为自己建立了宫殿并命人制作艺术品。

因此，渐渐地，在每次入侵浪潮之后，向更先进、更复杂的技术和文化前进的势头始终长盛不衰。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退步之后，每次被中断的文明过程都重新恢复了。但是，文明现在发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因为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男人要想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那么，早期文化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被吸收。这个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各个方面的复合物，就是作为早期伙伴关系社会模式核心的性别和社会的平等主义与和平。

文明的改道

两种制度的连续——一种统治者制度压服早期的伙伴关系制度——必

① 马里亚·金布塔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入铜器时代欧洲的第一次浪潮》，载于《印欧研究杂志》第5卷（1977年冬季号），第297页。

② 《民数记》31；《约书亚记》6，7，8，10，11。

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即旧制度由于全力呼吁人民追求和平和摆脱压迫而可能重新获得力量。因此，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母系氏族的首领作为人民的受托管理人而占有土地——始终是一种威胁。

为了巩固新的统治精英的政权，这些妇女必然会被剥夺作出决定的权力。同时，女祭司必然会被剥夺精神权威的地位。甚至在被征服的民族中，父系制也必定会代替母系制，正如在古代欧洲、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这些地方，妇女现在愈来愈被认为是男性控制下的生产和再生产工具，而不是公社的独立的领导成员。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妇女被调离了从前负责的并且有权力的职位。关键的是，当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时，这些新技术也被用于巩固和维持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统治者社会的特点，毁灭性的技术现在被赋予了最高的优先地位。最强壮和最残忍的男人不仅受到高度尊敬，而且由于他们出色的征服和抢劫本领而受到奖赏；物质财富现在也日益被用来制造更尖端而致命的武器。钻石、珍珠、绿宝石和红宝石被用来镶嵌盾和剑的柄。而且，虽然征服者用来把囚犯拖在身后的铁链仍然是用贱金属制造的，但是，甚至那些更有教养的军事首领、国王和皇帝的战车都是用白银和黄金制造的。

由于技术重新恢复了发展，随着入侵时代的停滞或倒退，商品的数量和其他物资的积累却增多了。但是，它们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克里特强调的是公共工程和所有人的高标准生活。现在，当先进的技术增加了物质财富的生产时，这种新财富的绝大部分却被占统治地位的男人所占用，而只把剩余部分分给他们的臣民。

社会进化也重新恢复了向上发展的势头，而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则日益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当新技术需要新的专业和管理职务时，它们也被强有力的征服者及其后代所接管了。

在这种接管的典型模式中，这些男人首先是通过破坏和盗用被占领地区的财富，而不是通过创造新财富才获得统治地位的。于是，当技术和社会的更大复杂性在财富的生产和管理中需要新的角色时，这些新角色也被占统治地位的男人及其后代所霸占了。最有利而且赚钱的角色被有权的男人归为己有；其余的角色则被分配给他们的臣民中那些手脚勤快而且会巴

结奉承的人。这些角色包括，例如，贡金收取人（和后来的收税员）这种新的赚钱的职务，以及其他官僚职务，不仅给它们的把持者带来了权力和声望，而且带来了财富。[①]

这些受人尊敬而且有利可图的新角色当然不会授予母系氏族的首领或仍然坚持旧方式的女祭司。相反的，正如我们在有关苏美尔人的记载中所看到的那样，像埃兰这样的城市，所有新的社会角色和任何一种特殊的权力或地位——以及同样日益增多的旧角色——都被有计划地从妇女手中转给了男人。[②]

现在，武力和武力威胁决定了谁控制经济分配的途径。等级制成为社会组织的既定原则。从占人类一半的身强力壮的男性凌驾于另一半的女性之上的等级制开始，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必须符合这个模式。

但是，武力常常并不能使人们服从。必须让这样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扎根：新的，而且更强有力的神，已经取代了过去统治宇宙的以给予生命的圣杯作标志的旧的权力。在这些新神的统治下，剑现在是至高无上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到的是：不仅女神的世俗代表——妇女，而且女神都不可避免地从她们的高贵地位上被拉下来。

在中东的一些神话中，这种情况是通过女神被杀死的故事来实现的，在另一些神话中，她被征服，而且受到强奸的羞辱。例如，在中东神话中，最初提到的最强有力的苏美尔神恩利尔就与女神宁利尔被强奸有关。这种故事服务于十分重要的社会目的。它们不仅象征了强迫人们接受的男性统治，而且为之辩护。

另一种常用的手段是把女神降低到一个更强有力的男性神祇的配偶（妻子）的从属地位。还有一种方法乃是把她变成一个尚武的神。例如，我们在迦南发现了残忍嗜杀的伊什塔尔。作为一个战争女神，她不仅受到尊敬，而且令人害怕。同样的，在安纳托利亚，女神也被变成了战神，正如 E. O. 詹姆斯所指出的，这种女神根本没有早期文献中所记载的那种

---

① 在现代，技术和社会的更大复杂性也在发挥新的作用，而且当代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人是否应该再次从根本上认为男人更有目标和更受尊敬。《开创自由》一书继本书之后考察了这个问题。关于从男性中心论的观点研究史前时代的技术和社会组织这个问题的有趣的讨论，参见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技术和人类的发展》，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与沃尔德出版社，1966。

② 参见本书第 3 章，该章讨论了社会和技术的更大复杂性并不一定导致男性统治，以及在克里特，妇女何以像在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中那样长久地保持了她们的权力和地位。

特点。[①]

同时，许多从前和女性神祇有关的职责被重新分配给了男性神祇。例如，正如文化人类学家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指出的那样：“当抄经人的庇护人从女神变成男神时，只有男性抄经人受雇于寺庙和宫殿，历史开始根据男性中心的观点来书写了。”[②]

但是，虽然迦南像美索不达米亚一样暂时已经向统治者社会发展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13个希伯来部落的入侵不仅加速了而且激化了这个社会和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因为只是在《圣经》中，女神作为一种神圣的力量才完全消失不见了。

女神的消失

这种对女性——因而对妇女——拥有神性的绝对否定，明显地是根据这样的事实：绝大多数希伯来神话都来自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神话。考古学的证据甚至更明显地证明了，在希伯来人入侵之后很久，迦南人，包括希伯来人自己，都继续崇拜女神。

正如圣经学者拉斐尔·帕泰在其著作《希伯来女神》中所写的那样，考古学的发现肯定地证明了“直到希伯来君主制度完全结束，对旧迦南神

① 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母亲女神崇拜》，伦敦，泰晤士与赫德森公司，1959，第89页。在《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中，M. 斯通特别指出，在这种联系中，重要的是必须区别从前所采取的女神崇拜形式和后来所强加的男性统治形式。但是，可惜的是，在这部其他方面十分优秀的著作中，斯通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两种形式分开。结果，我们在所讨论的男性统治时代常常发现与那些代表更早的女神一样受到崇拜的女性神祇，没有区别雅典娜、伊师塔，或西伯勒（所有与战争有关的神祇）和史前女神：例如，旧石器时代怀孕的“维纳斯”形象，以及卡塔尔·惠雅克伟大的母亲女神，她们主要代表生命的新生。

② 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转变中的妇女：克里特和苏美尔》。载于《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雷纳特·布里登撒尔和克劳迪娅·孔兹主编，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公司，1977，第55页。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的《宗教和性别歧视：妇女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形象》（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74）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论文集，这部论文集讨论了后来的宗教如何反映妇女被贬黜和征服并永恒化这些广泛的问题。一些最新的著作是：卡罗尔·克赖斯特和朱迪思·普拉斯考夫：《妇女精神的兴起：一本妇女宗教读物》，旧金山·哈泼与罗出版社，1979；查伦·斯普雷待纳克主编《妇女精神政治学》，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82。还可参看理安·艾斯勒：《我们丧失了的遗产：关于上帝如何变成一个男人的新事实》，载于《人道主义》1985年5～6月第45期，第26～28页。

祇的崇拜一直是希伯来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这种大众化的宗教中，对女神的崇拜比对男神的崇拜起着更重要的作用”。[①] 例如，在退尔·贝特·米尔西姆（《圣经》中的得维镇，在现在的希伯伦西南）的坟墓中所发现的晚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1～前13世纪）最普通的宗教物品是所谓的阿斯塔特雕像或饰板。但是，正如帕泰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在这个镇重建起来之后——它于公元前约1300～前1200年毁于希伯来人的入侵——“考古学的证据仍然证明，这种阿斯塔特雕像在希伯来人中间是非常流行的”。[②]

当然，《圣经》本身有些地方也隐隐约约地提到这种情况。在《以斯拉记》、《何西阿书》、《尼希米记》和《耶利米书》等经文中，先知们经常抱怨崇拜其他神的“恶劣行为”。他们认为那些仍然崇拜“天后”的人简直是大逆不道。[③] 而且他们极愤怒地反对“耶路撒冷不贞洁的女人”，这些女人同情那种“正在没落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中，男人没有独占所有世俗的和精神的权威。但是，除了这些偶然的而且总是贬义的细节之外，并没有提到曾经存在过或可能存在过不是男性的神祇。

无论是雷神、山神还是战神，以及后来先知们的更有教养的神，这里只有一个神：“妒忌”而不可思议的耶和华。在后来的基督教神话中，耶和华派他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去死，以赎他的人类孩子的“罪恶”。而且，虽然希伯来词“埃洛希姆”（神）不仅有阴性词根，而且有阳性词根（顺便解释一下，在《创世记》中第一天的创造故事里，男人和女人都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但是，神的所有其他名字，例如，王、主、

---

① 拉斐尔·帕泰：《希伯来女神》，纽约，埃冯出版社，1978，第12～13页。甚至在《圣经》中我们也读到，除了耶和华之外，所罗门的神庙也被用来崇拜男神和女神。

② 拉斐尔·帕泰：《希伯来女神》，纽约，埃冯出版社，1978，第48～50页。尽管本书报道了关于我们女性中心的宗教遗产的全部资料，但是帕泰的解释通常不超出统治者的范式。关于从一种女性主义观点出发的不同研究，参见卡罗尔·P. 克赖斯特：《异教徒和外来者：西方宗教中反女权的斗争》，载于《调查》第61期（1978年秋季号），第260～280页。

③ 参见，例如，《耶利米书》44：7。斯通：《当上帝是一位妇女时》对这个观点作了很好的讨论。还可参看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第一性》，纽约，企鹅图书公司，1971。该书包含了关于女性崇拜不仅在妇女中而且在男人中拥有惊人力量的有趣材料。例如，戴维斯引用了西里尔的信，我们在信中读到，在公元5世纪，当他们得到通知，从今以后教会允许他们“把处女马利亚当做圣母崇拜”时，以弗所的人们高兴地在大街上跳起了舞（参见戴维斯：《第一性》，第246页）。

父和牧人明显地都是阳性的[1]。

如果我们把《圣经》作为标准的社会文献来阅读，那么，有关这种社会秩序的唯一最重要的阐述是没有女神。这种社会秩序是若干世纪以来编写和修改这种宗教文献的男人所努力建立和维护的。因为从官方批准的《圣经》中删去女神就象征着神的力量不再保护妇女，而且不再为受男人虐待的妇女复仇。

这并不是说《圣经》中不包含重要的道德教训和神秘的真理，也不是说犹太教后来的发展对西方历史没有做出积极的贡献。事实上，虽然日益明显的是西方文明起源于更古老的智慧，但是，其中大量人道与正义的东西仍是脱胎于希伯来预言家的教义。例如，以赛亚的许多教义——后来耶稣的许多教义就是来自以赛亚的教义——就是为伙伴关系社会而不是为统治者社会而设计的。然而，尽管有些与人道和进步交织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在犹太基督教《圣经》中所发现的大多数东西仍是一个神话和法律的网络，这个网络试图把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统治者体制强加于人，并试图维持这种体制而且使之永恒化。[2]

---

① 关于希伯来语"埃洛希姆"（神）这个词有趣的语源学的分析，S. L. 麦格雷戈·马瑟斯的《神秘教义的显现》（伦敦，罗特烈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7）和琼·辛格的《雌雄同体》（纽约，铁锚图书公司，1979）中讨论了这个词。马瑟斯不仅指出"埃洛希姆"（神）这个词是带阳性词尾的关于神的阴性名词，而且指出，希伯来词"鲁阿克"（神圣的精神）是阴性的，当然，就像"赫克玛"（智慧）是古代所有女神的名称一样。

② 关于早期神话和象征如何被"侵占和颠倒，歪曲和曲解"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分析，参见戴利：《女性生态学》，特别是第2章。关于这个题目的各种分析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许多学者通过各自独立的研究，今天正在达到同样的基本结论：奥威尔在《1984》中的"预言"所描述的过去发生的统治者重新编造神话的工作十分成功。因为不仅我们真正的史前史及其女神已经消灭了，而且从我们的语言中删除反映性别平等的词所造成的思想的僵化"除了认识到它是异端之外已经不可能继续追随异端思想了"。正如在《1984》中，连必需的话都没有了（戴利：《女性生态学》，第336～331页；奥威尔：《1984》，第252页）。关于某些较早的、始于前统治者时代的、以歪曲的形式解释宗教和古典的神话的非女权主义尝试，参见，例如，罗伯特·布里福尔特：《圣母》，纽约，约翰逊复印公司，1969；简·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M. E. 哈丁：《妇女的神秘宗教仪式》，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71；埃里克·诺伊曼：《伟大的母亲》；罗伯特·格雷夫斯：《白人女神》，纽约，文特奇图书公司，1958；海伦·迪纳：《母亲和女战士》，纽约，朱利安出版社，1971；弗雷泽：《金枝》，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2；J. J. 巴霍芬：《神话、宗教和母权》，拉尔夫·曼海姆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861，1967。母权这个术语，虽然有时以不同的形式加以使用，但是，只不过意指一种母系继承权制度，而不是父系继承权制度，换言之，意指通过母亲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通过父亲来追溯血统。

与几千年前横行于古代欧洲的库尔干人一样，来自南方沙漠地带攻占了迦南的希伯来部落，乃是带来了他们的战争之神的外来入侵者；这个神就是残忍而妒忌的耶赫维或耶和华。他们在技术和文化上比库尔干人先进，但是，与印欧人一样，他们也是由极端残暴而好战的男人来统治的。我们在《旧约》连篇累牍的叙述中读到，耶和华如何发布烧毁、抢劫和屠杀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如何被忠实地执行了。[①]

与库尔干人及其他印欧人一样，希伯来的部落社会也是极端等级制的，由摩西和利未两个宗族从上而下加以统治。居于这两个宗族之上的是一小撮精英。这就是柯纳思或柯亨家族，从亚伦传下来的世袭教士，他们是绝对的权威。正如我们在《旧约》中所读到的，这个氏族的男人声称他们的权力直接来自耶和华。此外，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正是这些教士精英最有可能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而完成了重新修改神话和历史的大部分工作。[②]

最后，完成并支持统治者社会的暴力、独裁主义和男性统治结构的《旧约》公开宣称，正是上帝的意志要男人统治妇女。因为与在欧洲和小亚细亚造成大破坏的库尔干人和其他印欧人侵者的社会一样，古代希伯来人的部落社会是一种严格的男性统治制度。

有必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绝不是想入非非——这意味着古代希伯来宗教——更不必说犹太教——应该对强加的统治者意识形态负责任。从一种伙伴关系的现实向统治者的现实的转化早在希伯来人入侵迦南之前就开始了，而且同时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方继续进行着。此外，犹太教的神和道德观念已远远超出了《旧约》的范围，而且在舍金纳的神秘传统中，

---

① 参看，例如，《约书亚记》6：21；《申命记》12：2~3。因为在基督教传统中，犹太人常常因为杀死上帝之子和其他"令人厌恶的事"而受到谴责，对于大部分欧洲历史来说，这些事情有利于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合理化，所以有必要强调，这些事情并不是希伯来人的发明，而是统治者社会的特点。关于犹太人要为父系制受到谴责的错误讽喻（或暗示）的两篇重要文章，参见朱迪思·普拉斯科夫的《谴责发明父系制的犹太人》和安内特·多姆的《因女神之死而谴责犹太人》，两文均载于《利利斯》(*Lilith*) 1980年第7期，第11~13页。

② 《达特茅斯版圣经》，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50，第146页。与大多数传统的资料一样，《达特茅斯版圣经》也称犹太基督教《圣经》的第一部分为《旧约》，虽然犹太学者指出，犹太人认为只有一本《圣经》，因此"希伯来圣典"或"希伯来圣经"这个术语可能比《旧约》更恰当。在本书中，我宁可使用"希伯来圣经"这个术语。但是，很明显，这会引起许多混乱，因为我询问过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伪经或新发现的希伯来古书（和"死海古卷"一样），而不是《圣经》中的《旧约》。

它实际上仍然保留了许多旧的女神崇拜的成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女神的崇拜实际上广泛流传在希伯来人的宗教中，直到君主时代。也有个别妇女，例如女祭司和法官黛博拉，仍然升到了领导地位。但是，总的看来，古代希伯来社会是由一小撮男人精英从上面加以控制的。正如我们仍然可以在《旧约》中读到的那样，最基本的是，这种男性统治等级所制定的法律规定妇女不是自由而独立的人，而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最初，她们不得不属于她们的父亲。后来，她们可能为她们的丈夫或主人所有，就像她们所生的所有的孩子都归她们的丈夫或主人所有那样。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被征服的城市或国家的少女和妇女——正如我们的国王詹姆斯所钦定的《圣经》所指出的——如果她们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同宿”，便常常根据耶和华的命令被降为奴隶。[①] 我们在《旧约》中也了解到有关受契约束缚的雇工的情况（詹姆斯国王钦定的《圣经》称这种雇工为男仆和女仆），以及法律如何规定一个男人可以把他的女儿卖为女仆。最说明问题的是，当一个男仆获得自由时，根据《圣经》的法律，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仍然是主人的财产。[②]

但是，不仅女仆和妾，而且她们所生的子女也是男性的财产。关于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和萨拉的儿子以撒献给耶和华作祭品的众所周知的故事戏剧性地阐明了，甚至合法妻子的孩子也受男人的绝对控制。而且正如关于雅各如何通过为他的岳父工作七年而追求他的妻子利亚的著名故事所阐明的那样，基本上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性与经济

细心阅读《圣经》中完全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大量规定和禁令，这种试图保卫妇女的贞操而使妇女丧失人性的观点也许就更清楚了。例如，在《申命记》第22章第28～29节中，我们读到：“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古希伯来计量单位）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我们从这段话所得到的印象是，这种法律代表了道德败坏

① 参看，例如，《民数记》31：18。

② 《出埃及记》12：7。

而邪恶的异教徒文明的一个伟大进步，向道德和人道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在制定这种法律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来考察它，那么，恰恰证明了，它并不是出于任何道德或人道的意识。相反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男人对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的所有权。

这种法律所说明的是，既然一个没有许配人家而又不是处女的女子不再是一笔有经济价值的财产，那么她的父亲必须得到赔偿。至于法律要求引起这个经济问题的男人和姑娘结婚，那么，在一个丈夫对他们的妻子实际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里，这种强迫的婚姻根本不可能被认为是为了姑娘的幸福。这种惩罚同样与男性的经济有关：既然姑娘现在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商品，而且没有更多的市场价值，那么继续把她强加给她父亲可能是不“公平”的。她必须归促使她丧失其价值的男人所有。

在《申命记》第 22 章第 13～21 节中，甚至更蛮横地表明了这个关于“合乎道德的”性习惯和法律的完整制度的真正目的。这些经文谈到了一个男人的情况。他声称，既然他已发现他的新娘不是处女，那么他“讨厌她”而且希望摆脱她。《圣经》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提供了下面这种法律的补救办法：如果妻子的父母能够拿出“女儿贞洁的凭证”并“把那布铺在本城长老面前”，那么，丈夫必须付给新娘的父亲 100 舍客勒银子。而且只要他的妻子活着，他就不能把她送回她父母那里去。但是，如果新娘的贞洁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那么丈夫实际上可以赶走她。因为法律命令“他们将那女子带到她父亲家的门口，而且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位女子结婚时不是处女，那么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杀死她。这是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做了丑事”。用现代话来说，因为她不仅给她的父亲，而且给她的大家族——以色列的 12 个部落——带来了耻辱，所以作为惩罚她应该被处死。但是，这种耻辱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失去贞洁的姑娘实际上使她的人民和父亲受到什么损失或伤害呢？

回答是，作为一个在性行为和经济上都有自由的人而活动的妇女，对于一个严格的男性统治的社会的全部社会和经济组织乃是一种威胁。这种行为不可能得到支持，以免整个社会和经济制度土崩瓦解。因此，“必需”给予最严厉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谴责，以及最极端的惩罚。

这些管理妇女贞洁的法律的实际目的是要保护男人之间的基本经济交

易。在要求给父亲以赔偿的情况下，如果对妇女的控告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法律要惩罚对作为一位正直商人的男人的名誉的错误中伤。它也给父亲提供进一步的保护。如果控告是不真实的，那么有问题的商品（他女儿）绝不会给退回来。另一方面，在本城的男人用石头打死他女儿的情况下，如果控告是真的，那么法律也要保护父亲。既然丧失名誉的新娘不可能再卖出去，那么就要毁掉这个现在毫无经济价值的财产。同样，《圣经》的通奸法对贼（偷了另一个男人的财产的男人）和被损害的财产（给她的丈夫造成"耻辱"的妻子）提出惩罚：不仅命令杀死奸夫，而且要求杀死淫妇。

但是，制定这种维护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的法律的男人并没有用这种极其经济学化的术语来谈论问题。相反，他们认为他们的法令不仅是道德的、正义的和可尊敬的，而且是上帝的旨意。至今，由于把我们神圣的《圣经》当成神的作品，或至少是道德的、明智的作品的思想业已形成，所以我们很难客观地看待《圣经》，并发现一种宗教的全部含意，在这种宗教里，至高无上而且唯一的神是男性。

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犹太—基督教传统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道德进步。事实上，《圣经》本来就与什么是正确的以及什么是错误的有关。但是，统治者社会中的正确和错误的东西不同于伙伴关系社会中的正确和错误的东西。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不仅在犹太教中，而且在基督教中，都有许多教义适合于人类关系的伙伴制度。但是，就它反映统治者社会的程度而言，《圣经》的道德充其量是一种发育不全的道德。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假道德，上帝的旨意是一种以这种假道德掩盖残忍和野蛮的手段。

例如，在《民数记》第 31 章中，我们读到了在米甸人失败后所发生的一切。在杀了所有的成年男子后，古代希伯来入侵者"掳走了米甸人所有的女子和他们的孩子"。而且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命令："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保留她的性命。"①

正如我们经常在《圣经》中读到的那样，上帝的命令就是一种惩罚。按摩西的说法，胜利之后爆发的瘟疫就是这些被掳来的妇女的过失。但是，甚至这种说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上帝会命令"女孩子之中凡没有出嫁的"都可以"保留她的性命"。统治阶层的男人所承认的解释可能是这样

① 《民数记》31：9，17～18。

的：虽然男人得到命令，他们愿意杀死老太婆和男孩子，但是他们非常不愿意毁灭他们的战利品——还是处女的女孩。因为这些战利品可以被卖为妓女、奴隶，甚至妻子。

统治者的道德

强加的统治者道德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甚至今天那些自认是善良而有道德的男女在读到上述那些经文时，不去问一问为什么一位正直公正的上帝会命令做出这种可怕而非人的事情。他们好像也不怀疑某些穆斯林男人的道德规范，这些穆斯林男人甚至在今天还认为对于任何实际的或捏造的不正当性关系，他们的责任是通过威胁杀死，甚至真的杀死他们自己的女儿、姐妹、妻子和孙女，来“保护妇女的贞操”。他们也不怀疑为什么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以及一般男人的眼里，这种戒律——剥夺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任何价值，除非她们在性上是“纯洁的”——仍然应该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的“道德”。

因为一旦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我们的精神就不再是统治者社会所需要的那种精神了。在统治者的社会里，我们的道德发展只能到此为止，不会进一步发展。因此，由于目前像 V. 昌尼这样的科学家所发现的制度的复制过程，千百万人民今天仍然没有能力发觉《圣经》的真实含义，以及它如何发挥着维持那种把我们束缚在统治者制度范围内的作用。

关于这种制度所导致的愚昧无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也许与《圣经》中对强奸的处理有关。在《士师记》第 19 章，编写《圣经》的教士们告诉我们一个关于父亲把自己的处女女儿交给一群醉鬼的故事。这位父亲把一位来自利未人高等阶层部落的男客人请到了家里。便雅悯部落的一群无赖围住房子，命令客人滚出来，显然是要毒打他。这位父亲对他们说：“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客人）的妾，我将她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她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1]

---

[1] 《士师记》19：24。包括《圣经》学者在内的大多数读者很久以来可能心安理得地无视《圣经》中的这样一些段落：男人非人地对待妇女可怕地证明了流行范式的力量。今天，重新分析《圣经》的浪潮正在独立地重新评价这些段落，而且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参见玛丽·戴利：《超越·圣父》，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3）；它们令人鼓舞地证明了重新恢复生气的当代伙伴关系世界观的力量，这是一个我们将要讨论的题目。

我们被告知这是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接着，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进一步被告知，这位男客人如何“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她交合，终夜凌辱她，直到天色放亮才放她去”。她如何回到“她主人”住宿的旁门前，如何当他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时”，绊倒在她身上，并命令她“起来，我们走吧”；而最后如何发现她已死，他就将她的尸体驮在驴上，起身回家了。[①]

《圣经》在叙述这个辜负女儿和妾的信任，合伙强奸以及杀死无助的妇女的残忍故事时，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同情，更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的愤慨或义愤。但是，更重要而且令人吃惊的是，父亲所提供的祭品在那时乃是他自己女儿最宝贵的东西——她的贞操，而且也可能是她的生命，而这并没有违背法律。甚至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明明会导致轮奸、折磨，而且最后杀害一位妇女——她本是利未人的妻子——的行为同样也不犯法，而这是在一本从表面上看全是惯例和禁戒的书——《圣经》中讲的，这些惯例和禁戒是从道德和法律上来判断是非的。

总之，这部圣书（《圣经》）的道德所宣布的法律如此残缺不全，以至于我们这里仍然可以读到，占人类一半的妇女可以合法地由她们自己的父亲和丈夫交给别人强奸、毒打、折磨或杀死，而他们不会受到惩罚或道德谴责。

甚至更残忍的是一个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然被规定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日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必读的道德寓言：关于罗得的著名故事。当罪恶而不道德的所多玛和蛾摩拉城被毁灭时，罗得是唯一被上帝饶恕的人。这里，我们在《创世记》第 19 章第 8 节中再次读到，同样冷酷的事实是，根据显然广泛流行并被社会承认的习惯，罗得把他的两个还是处女的女儿（可能还是孩子，因为那时的姑娘结婚都很早）交给了一伙威胁他家两位男性客人的匪徒。对于一个如此违背人性地对待他自己的女儿的父亲，圣书还是没有提出任何犯法或表示任何正义的愤慨的迹象。正相反，因为罗得的两位客人原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当上帝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城的“堕落”而“将硫黄和火降与他们”时，罗得却由于他的“堕落”真的得到了报酬！只有罗得和他的家眷得到了饶恕。[②]

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从这些关于《圣经》的道德和

---

① 《士师记》19：25～28。

② 《创世记》19。

它所维护的制度的例子中学到什么呢？很明显，强迫妇女做男人的性奴隶的道德是为了满足严格的男性统治制度的经济要求，在这种制度中，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从妇女和儿童劳动所获得的利益转给了男性。这种道德也是为了满足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基本推翻旧秩序的社会现实的要求，在这种旧秩序中，妇女在性生活、经济和政治上都是自由的力量，而且女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以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强有力的结构才能维持下来。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非巧合的是，在古代世界，强加的男性统治到处都是从一种和平而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向一种野蛮而贪婪的男人统治的等级制和暴力的秩序转化的组成部分。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同样并非巧合的是，在《旧约》中，妇女被排除了她们从前作为女祭司的角色，以便由男人来制定现在统治社会的宗教法律。同样也并非巧合的是，曾经和女神崇拜结合在一起的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在这里成了至高无上的男性神祇的私人财产的代表——象征并使男性统治阶层对社会和所有男人对所有女人享有生死予夺的绝对权力合法化。

知识邪恶，生育肮脏，死亡圣洁

正如我们在《创世记》中所看到的，那里叙述了亚当和夏娃如何由于拒绝了耶和华叫他们离开知识之树的命令而受到永恒的惩罚，任何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教士——以及由于耶和华的直接命令，对一般男人——的反叛都是一种滔天大罪。独裁主义和男性统治在这里都依靠同样的格言为自己辩护。现代极权主义者和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人——不管他们是有神论的右派，还是无神论的左派——仍然向他们的追随者这样说教：不要胡思乱想，承认**现实**，承认**权威**的话是真的。尤其是不要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你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怀疑我们或寻求独立的知识。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对你的惩罚将是可怕的。

同时，不服从权威和敢于追求有关什么是善和恶的独立知识被说成是最令人憎恨的罪恶；而在我们的《圣经》中，屠杀和奴役自己的同胞，并且毁灭和占有他们的财产，却常常得到宽恕。在战争中杀人实际上得到了神的批准！就像抢劫赃物、强奸妇女和儿童，以及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得到神的批准那样。对于所有非暴力的罪行（包括性犯罪）判死刑也被说成

是维护神圣的正义的一种手段。而且，甚至兄弟之间的谋杀也不如由于偷吃知识之树的果实而不服从权威那么严重。因为该隐杀死他自己的弟弟亚伯并没有使人类陷于永恒的痛苦之中，相反，正是夏娃对于未经批准或独立“品尝”什么是善或恶，才使人类永远陷于痛苦之中。

在战争中，在进行残酷的处罚时，在男人行使统治妇女和儿童的绝对权威时，杀人流血和伤害他人成了规范，而生孩子的行为现在却成了道德败坏和肮脏的。在《旧约》中，我们发现了一章关于生孩子的叙述，它挤在关于麻风病及干净和不干净的食物的叙述中间。在《利未记》第 12 章中，我们读到，一位生了孩子的妇女必须通过赎罪祭才能洁净自己，以免她的“不洁”玷污他人。这不仅要求她单独幽居，而且要给祭司送祭品，并举行一定的仪式。只有她把“赎罪祭品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她的血源就洁净了”，她才能再次被证明是“洁净”的。[1]

因此，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后来在犹太和以色列的神权政治国家，战争、独裁统治和对妇女的征服成了新的统治者道德和社会的组成部分。通过重新精心炮制的神话，知识已经被认为是罪恶。甚至生育也被认为是肮脏的。总之，我们的文化进化的改道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现实完全被颠倒了。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即使历史是由为他们的强大的主子服务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祭司们记录的，我们仍然发现古老的精神——根据完全不同的进化路线前进的早期人类精神——正在为重新肯定自己进行着斗争。

伟大的女神——对她的崇拜曾经是一个更和平、更平等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还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她不再是统治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但她仍然是一种受到认真对待的力量，一种甚至在欧洲中世纪被崇拜为上帝之母的力量。尽管许多世纪以来，预言家和教士不断禁止女神崇拜，但是，对她的崇拜并没有完全被压服。就像何露斯和他的母亲俄赛里斯、赫利俄斯和狄俄尼索斯，以及在他们之前很久的卡塔尔·惠雅克的年轻男神、年轻的女神珀耳塞福涅或科列那样，在埃勒夫西斯的秘密宗教仪式中，耶稣仍然是圣母的儿子。实际上，他仍然是女神的儿子，而且就像她的较早的圣婴一样，他每年春天在复活节的复活象征着自然的更新。

---

[1] 《利未记》12：6～7。

正如女神的儿子曾经也是她的配偶一样，在基督教神话中，“基督也是马利亚——母教堂——的新郎，马利亚仍然是基督的母亲”[1]。对于基督教仪式来说如此重要的洗礼盘或圣杯，仍然是象征古代女性的器皿或生命的容器，正如荣格派神话史学家埃里克·诺伊曼所写的那样，用洗礼来表示“返回圣母神秘的子宫及其生命之水中”[2]。

现在人们知道，甚至为耶稣所选择的生日（他本人的真正生日历来无人知道）也占用了曾经与女神崇拜有关的节日。圣诞节或基督弥撒时间的选择是因为古人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庆祝传统的冬至节——女神赋予太阳生命的日子，它通常在12月21～24日之间。同样，在罗马时代，从12月21日到1月6日（为主显节选择的日子）这段时间，仍是庆祝许多普通人出生和新生的节日。[3]

但是，虽然存在这么多相似之处，仍然有根本的不同。在官方的基督教众神中，只有妇女现在还是唯一终有一死的形象。她仍然被崇拜为仁慈和富于同情心的母亲。而且在某些肖像画中，例如在《情窦初开的处女们》中，她仍然在她的身体内包含着生命的最大奇迹和神秘。[4] 但是，她现在显然是一个小人物。此外，在这种男性统治的宗教中占中心地位的神话形象不再是年轻男神的诞生，而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死亡。

耶稣的母亲只是生了他；派他到人间来的是他的圣父，他是为了偿还人类罪恶的一只献祭的替罪羊。由于他是被派来“拯救”人类的，所以他在这“泪之谷”的短暂停留无关紧要。正是他的死和他所允诺的死后更美好的生活才是重要的，但只对那些发誓服从上帝命令的人来说才重要。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在死时甚至没有任何希望，只有永恒的磨难和罚入地狱。

女神创造生命、维持生命和更新生命的力量的宗教形象不再被强调了。鲜花和小鸟、动物和树，除了作为背景之外，已烟消云散。对于怀抱圣婴的女神——圣母马利亚和圣婴——的回忆仍然存在。但是，男人和妇女的精神现在不仅被贯穿所有基督教艺术的压倒一切的主题所支配，而且

---

① 诺伊曼：《伟大的母亲》，第313页。

② 诺伊曼：《伟大的母亲》，第312页。

③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第2卷，第5页；《宗教和伦理学简明百科全书》，第1卷。

④ 参见，例如，约瑟夫·坎贝尔：《神话形象》，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第59～64页。

被吞噬了。在一幅幅描绘基督教圣徒用残忍的刑罚折磨他们的肉体的油画中，在一幅幅描绘基督教殉道者被各种各样残酷而巧妙的方法所屠杀的油画中，在丢勒所想象的可怕的基督教地狱的油画中，在米开朗琪罗著名的《最后的审判》中，在描绘莎乐美拿着施洗者约翰被割下的头没完没了地跳舞的油画中，我们都发现了这一主题。

现在也许再也找不到像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无处不在的主题那样伤人感情的主题了，艺术的中心形象不再是对大自然和生命的赞美，而是歌颂痛苦、磨难和死亡。[①] 因为在这种新的现实——现在被认为是一位男性上帝的唯一创造物——中，作为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力量的创造和抚育生命的圣杯，已经被统治和毁灭的力量——剑的致命的力量所取代。而且正是这种现实直到今天仍然在折磨着全人类——不仅包括妇女，而且包括男人。

① 戴利：《女性生态学》，第17～18、39页。戴利——一位神学家——愤怒地写道：不仅生命之树已经被“吊在死木头的死尸的恋尸癖的象征”所取代，而且“父权制”“本身成了整个星球流行的宗教，而它的基本教训就是恋尸癖”。

第八章　历史的另一半：第1部分

就像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游客那样，通过考古学的发现，我们游历了不同的现实。我们并没有发现“人性”永恒堕落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旧框框，而是发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在古代文明中，我们的文化进化如何被截断，接着完全改变了方向。我们看到，当我们的社会和技术的进化重新开始时，它已经完全改变了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文化的古老基础绝没有被连根拔掉。

古老的对于生命和大自然的爱，古老的并非掠夺的分配方式，古老的并不是压迫的关心方式，作为职责而不是统治的权力观，并没有完全丧失。但是，像妇女及与女性相关的品质一样，它们被降到了从属的地位。

人类对美、真、正义与和平的追求也没有消失。更确切地说，它被新的社会秩序所淹没和镇压下去了。旧的追求有时仍然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但是，逐渐地把人类关系（以人类男女两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组织成严格的、以武力为基础的等级制的方式这一基本问题，将被人们忽略。

现实的转化已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这个表面上不需证明的事实——一个社会把最基本的人类关系组织起来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生活和思想的一切方面——几乎立刻被完全掩盖起来。因此，甚至我们复杂的现代语言——有用来描述一个人所能想象和无法想象到的一切事物的技术术语——也没有专门的性别术语来描述我们直到现在所说的统治者社会和伙伴关系社会之间的深刻区别。

我们充其量不过拥有像“母权制”这样的词来描述父权制的对立面。但是，这些词只是通过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描述强化了关于现实（和“人性”）的流行观点。此外，由于父权制这个词使人想起专制父亲和

智慧老人充满激情和斗争的形象，所以它甚至不能十分精确地描述我们现在的制度。

伙伴关系和**统治者**是用来描述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两种对立组织原则的术语。但是，虽然这两个有用的术语反映了基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并不特别表达一个基本的观点：存在着两种组织人类男女两部分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这种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全部社会制度。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地位上：在这里，为了简明地传达信息，我们需要比我们常用的词汇所提供的这些词更精确的术语，以便继续探讨这两种抉择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技术的进化。我们也将仔细地考察古希腊的文明，它以最先精确地表达科学思想而著称。我所提出的两个新术语——在特定的上下文联系中将被用来代替统治者和伙伴关系这两个词——就是根据这种先例得出来的。

这里，我提出 androcracy（男性统治）这个术语，因为它是一个比父权制这个词更精确的术语，这个词描述了一种男人通过暴力和暴力威胁而统治的社会制度。已经在某些地方使用的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词根 andro，或“男人”，以及 kratos［如在 democratic（民主）中］，或“统治”。

为了描述对一种以人类的一半支配另一半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制度所作的实际选择，我提出新的术语 gylany[①]（男女合作）。gy 来自希腊词根 gyne，或“妇女”。an 来自 andro，或“男人”。在这两个词之间的字母 l 具有双重意义。在英语中，字母 l 代表人类男女两半的**联系**，而不像 an 在 androcracy（男性统治）中代表他（她）们的等级。在希腊语中，字母 l 来自动词 lyein 或 lyo，它本身也有双重含义：解决或解答［如在 analysis（分析）一词中］，解散或解放［如在 catalysis（催化）一词中］。在这个意义上，字母 l 通过使人类男女两半摆脱可笑而歪曲的僵化角色——这种角色是男性统治制度所固有的统治等级制所强加的——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新术语的使用从根本上区别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等级制度，而传统的术语是不能说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的。这里，**等级制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基础的人类等级制度。这些**统治的等级制度**完全不同

---

① 为 gylany（男女合作）选择的发音是 gi—lan—ee。字母 g 发硬音〔g〕，就像在 gift 中那样。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gylany 这个词作为一个整体和 progeny（后裔）这个词一样具有重音音节和节奏。

于第二种等级制度——我提议称之为**现实化的等级制度**。这些现实化的等级制度是人们所熟悉的系统内部的系统之间的等级制度，例如，身体的分子、细胞和器官之间的等级制度，即是一种向更高、更先进而且更复杂的功能水平的进步。相比之下，正如我们可以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那样，统治的等级制度的特点是禁止更高功能现实化，这不仅表现在整个社会系统之内，而且表现在个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男女合作的社会组织模式比男性统治的社会组织模式为我们将来的进化展现了更大可能性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隐藏的遗产

使用希腊语词源的术语来描述这两种对立的社会模式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进化，似乎特别合适。因为如果我们从文化转化理论所提出的新观点重新考察古希腊，那么，我们就能鲜明地阐明作为地球上两种完全不同生活方式的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的进化由于男女合作模式的影响而取得的进步。

关于西方文明的大多数课程是从阅读荷马的著作、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的选集，以及现代古典历史学家吹捧的光荣的伯里克利的希腊黄金时代的著作开始的。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欧洲历史是从最早知道的有关印欧文化或雅利安文化（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记载开始的，而且我们应该把我们现代许多关于正义和民主的观念归功于卓越的古典希腊文明。

有时，通过浏览辅助阅读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毕达哥拉斯是从一个名叫铁米司托克列亚的人那里学习伦理学的，这人是德尔斐的一位女祭司；或者发现，曼提涅亚的一位女祭司狄奥提马曾教过苏格拉底。[①] 我们甚至可能偶然发现似乎是稀奇古怪的资料：全希腊的领袖都来到了德尔斐，在那里，一个名叫毕托涅斯的女祭司就他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向他们提出了建议。但是，在我们所阅读的著作里，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没有提到过妇女，通常也没有提到过克里特。

事实上，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早期欧洲文明不曾存在过，直到印

---

① J.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伦敦，默林出版社，1903，1962，第 646 页。

欧征服者来到欧洲之前，住在欧洲的是一些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文化的野蛮民族。我们也被引导相信，当首先成熟的欧洲文明出现在希腊时，妇女基本上没有公民权或政治权，当然也没有权力地位。

然而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有些最有权力的人物是女性。当情节展开时，奥德修斯正被仙女卡吕普索扣押，她统治着奥巨吉亚岛。经女神雅典娜调停之后，当奥德修斯最终离开奥巨吉亚岛时，发生了暴风雨，他被女神伊诺给他的一幅面纱从水中救了出来。这幅面纱使他浮在水面上，直到他被冲到费阿西亚岛的海岸上，在这里，他被公主瑙西凯厄发现。

在宏伟的费阿西亚宫廷——许多学者认为是迈锡尼皇宫的精确画像——里，瑙西凯厄的母亲阿瑞特皇后作为最受尊敬的妇女受到国王的尊敬，而且受到“所有人的崇拜，当她在城里散步时，他们把她看成是一位女神……”[1]。奥德修斯离开费阿西亚之后，他又碰上许多令人生畏的女性人物：可怕的女怪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诱人堕落的海妖塞壬，以及强有力的女巫皇后喀耳刻。

甚至在他回家之后，我们也发现，他的妻子佩涅洛佩是一位强有力的坚定的妇女。意味深长的是，她正在抵抗一大群求婚者，这些人希望和她结婚以便统治伊萨卡——这就有力地暗示了，甚至在亚该亚人入侵希腊之后，母系继承仍然是一种规范，也是任何统治权的先决条件。[2]

我们已经看到，赫西奥德所提到的“黄金种族”——他们生活“在和平安宁之中”，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富饶的大地倾吐着她的果实”——是对新石器时代相当和平与平等的农业民族的回忆，这个民族到现在还被铭记在传说中。在赫西奥德的神话中，一个名叫卡俄斯（Chaos）的男性人物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现在从考古学记载所知道的东西：印欧人的统治是通过大规模物质破坏和文化瓦解的混沌状态（Chaos）而强加的。

与荷马的著作一样，在赫西奥德的著作中到处都有关于一个更早的、更高程度的男女合作的社会和神话的痕迹。例如，与古代的女神一样，恰

---

[1] J.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261页。

[2] 诸如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等晚期希腊戏剧肯定了这点，因为这些戏剧里的皇后们，如克吕泰涅斯特拉，明显地主管一切，而她们的丈夫则是作为配偶被提到的。

恰仍然是“胸怀宽广的大地”创造了天国和“高耸的群山——仙女们总是喜欢去的地方”。而且就像在更古老的宗教中那样，仍然是女性的力量——她“没有甜蜜的爱的结合”，换句话说，单独——拥有大海。[①]

赫西奥德的世界已经是男性统治的、好战的、等级制度的世界。但是，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古老的伙伴关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男女合作的价值还没有被完全忘掉。赫西奥德认为，战争并不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或者像后来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宣称的那样：战争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②] 赫西奥德明确地写道：战争和战神阿瑞斯是“一小撮男人”带到希腊的，他们是带着青铜武器侵入希腊的亚该亚人，他们最后被赫西奥德最鄙视的男人——多利安人赶走了，他们用他们的铁制武器蹂躏了希腊。

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弗洛伊德和荣格是对的，而且真有一种遗传下来的种族记忆，那么，它可能是鼓舞赫西奥德记叙更美好却已失去了的过去的那种东西。但是，更可能的解释只不过是，赫西奥德仍然受到世代相传的关于过去的发展道路的故事的影响。

事实的真相是，赫西奥德明确地陈述道：“关于大地和天空曾经是同一形态的故事不是出于我的想象，而是来自我的母亲。”[③] 这不仅暗示他的著作实际上是以世代相传的故事为基础的，而且也指出，他的母亲，一位妇女，仍然通过对一个更早而且更少压迫的时代的模糊回忆，在她当时所处的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得到安慰。

赫西奥德一直写到历史学家所谓的希腊的黑暗时代才结束。这个时期结束于古典希腊的出现，多利安人的入侵使欧洲陷入混乱之后500年。但是，很明显，正如N. 普拉东、J. 霍克斯、J. V. 卢斯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希腊文明并不是从多利安人蹂躏的欧洲的灰烬中生长出来的——就像雅典娜恐怕并不是诞生于宙斯的脑袋。这些蛮族入侵者也不会给他们带来这种文明的种子。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希腊文明也许主要不是“文化扩散”的结果，也不是通过贸易和其他交往“仿效”更古老而且更先进的

① 赫西奥德：《劳动和生活》，转引自约翰·曼斯利·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8，第4页。

② 赫拉克利特，转引自爱德华·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纽约，斯克里伯纳出版社，1972，第49页。

③ 赫西奥德，转引自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5页。

中东文化的结果。

更可能的，并且与考古学资料比较一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迈锡尼时代进行过统治的早期亚该亚入侵者和取代了亚该亚人的多利安统治者，只是在他们吸收了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大量物质和精神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卢斯曾试图重建这一过程。她写道："就像一棵被战火蹂躏过的橄榄树一样，米诺斯文化暂时停止了活动，然后在迈锡尼城堡的荫庇下又抽出了新枝。……米诺斯的公主'阿特拉斯的女儿'嫁到了迈锡尼军阀的宫殿里。米诺斯的建筑师设计了大陆的宫殿，而米诺斯的画家则用壁画装饰了这些宫殿。希腊语第一次成了米诺斯作家所掌握的书面语言。"[1]

于是，在野蛮人的下一次进攻之后，尽管以更加不同的形式，这些相同的米诺斯枝条再一次绽出了新芽。卢斯写道："也许并不是偶然，古风时期的多利安人的克里特曾经以它优越的法律和制度而著称。经历过长达数百年和平时代的细心照料的树干，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连根拔掉的。取自同一树干的嫁接枝条被移植到希腊本土，而且在那里扎根、繁荣。"[2]

因此，正如卢斯所写的那样，甚至在遭多利安人蹂躏之后，也"并不是一切都失去了"[3]。的确，许多东西被忘记了，正如现在甚至关于米诺斯文明的记忆也开始淡漠而成了传说。而且许多东西被改变了，正如在官方的希腊万神殿里，伟大的女神——以赫拉、雅典娜、阿佛洛狄忒等形式——现在从属于宙斯。然而，更加适合伙伴关系社会而不适合统治者社会的希腊文明的重要成分仍然存在。或者用更专门的术语来说，它们更加适合男女合作的社会而不适合**男性统治**的社会。

自然的循环统一和宇宙的和谐

希腊文明最初的表现之一是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经指出，他们的世界观——所预示的观念仍令今天的许多人感到震惊并引起争论——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从世俗的、科学的观点探讨现

① J. V. 卢斯：《阿特兰提斯的毁灭》，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1968，第158页。
② J. V. 卢斯：《阿特兰提斯的毁灭》，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1968，第159页。
③ J. V. 卢斯：《阿特兰提斯的毁灭》，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1968，第159页。

实的世界观。[1] 因为在这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知识第一次不再被描绘为通过神圣的神话和宗教仪式所显示的功能，而是经验可以证明和不可以证明的事实。例如，在荷马的著作里，彩虹仍然是女神伊里斯的化身，而在阿那克西米尼的著作中，它是由太阳光线落到稠密、潮湿的空气中生成的。[2]

在这方面：色诺芬尼、泰勒斯、第欧根尼和毕达哥拉斯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观念的确是对早期宗教世界观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的许多基本设想在许多方面更符合早期的、更高程度的男女合作的世界观，而不符合后来的男性统治的世界观。

例如，色诺芬尼被认为是哲学史家爱德华·赫西所说的"与传统希腊宗教无关的激进的一神论"的最初来源。[3] 赫西指出，色诺芬尼的观点——一种无所不包的无限的理智统治着宇宙——是与官方的奥林匹亚万神殿所表达的世界观尖锐对立的。这里，一群神出鬼没而且常常全副武装的神——显然与流窜并横行于古代世界的许多小酋长和国王一样——行使着专横而反复无常的权力，不仅支配着大自然的循环，而且支配着他们的人类"臣民"的生活。[4]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对史前史的了解，恰恰可能轻易就认为，正是这种关于宇宙的统治者或男性统治的观点实际上是"新的和革命的"，而不是——如赫西所写的那样——构成 6 世纪希腊政治和社会发展基础的世界观。[5]

也可以说，当多利安人的进攻过去之后，文明开始重新出现之时，关于连贯和循环的世界秩序的古老观点——更早的时候，伟大的女神、母亲和万物的创造者象征着这种世界秩序——可能会重新出现，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这种情况并非巧合。同样并非巧合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城市中，在那里，卡塔尔·惠雅克曾经繁荣昌盛过，而且发生

---

① 例如，阿那克西曼德（约生于公元前 612 年）在某些基本方面预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谈到人类生命的起源：人类的原型最初生出来时是一种像鱼似的生物，长大后从水中来到陆地并蜕去它们的鱼形外壳，变成了人的模样。这些观念表明，阿那克西曼德可能已经知道某些有关人类胚胎发展的情况（爱德华·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 26 页；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 33～34 页）。

② 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 46 页。

③ 爱德华·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 14 页。

④ 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 13 页。

⑤ 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 13 页。

在曾经辉煌灿烂过的米诺斯克里特文明附近的岛屿上，在那里，以母亲、处女、女创造者或女祖先等各种面貌出现的女神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直到多利安人占领这些岛屿之后才结束。[①]

我们早就提到过，女神崇拜为何不仅是多神论的，而且是一神论的。女神以许多种形式受到崇拜，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神祇拥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最著名的是：女神作为母亲和万物的创造者到处都被认为是一切自然和生命的渊泉。[②] 因此，在这一点上，前苏格拉底的观点——关于一个井然有序而首尾一贯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更接近于古老的观念——女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创造万物和包容万物的超人力量，而不同于后来的奥林匹亚万神殿所象征的特点——根据这种观点，一群好争吵的、竞争的，而且一般来说神出鬼没的神统治着世界。

毕达哥拉斯关于宇宙是一种巨大的音乐和谐（著名的“宇宙和谐”）的观念似乎同样更符合古老的宗教宇宙学，而与四分五裂、钩心斗角的奥林匹亚众神不同。在前苏格拉底的宇宙学说中，我们现在发现了代替女神的更加非人格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与包罗万物并且可能是男性的神有关。但是，他们的世界仍然完全不同于某些男性统治论思想家所想象的那种混乱而纯粹随意的宇宙。

支配前苏格拉底宇宙观的原则之一是，世界秩序根据可观察到的规律运转，“主要的变化是在每日和每年的循环中重复自身”。[③] 这种观点明显地是对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宗教的那种东西的回忆，在古代宗教中，自然的循环和妇女的月经周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据亚里士多德的报道，泰勒斯——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是“自然”哲学的开创者——认为水是万

---

①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诸如 N. 普拉东和 J. 霍克斯等学者已经论述了希腊文明的克里特渊源。正如普拉东所写的，“这种生气勃勃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明不可能被消灭得一干二净”（N. 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第 96 页）。同样重要的是，主要的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兼科学家，例如，科洛封的色诺芬尼，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尼生活在东地中海岛上和南安纳托利亚海岸城市——数千年崇拜女神的文化遗址，直到宣告希腊黑暗时代开始的多利安人的大屠杀为止还没有被毁灭。

② 安那克萨哥拉的某些论述表达了统一的互相联系的宇宙观，作为万物的母亲和创造者的女神最早象征着这种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认为，万物是互相关联或联系的，而不像在男性统治的神学和科学理论中那样是分等级的。他写道：“在万物中，同一个世界秩序中的东西并不是互相分离的，或者说是用斧子劈开的——既不是冷和热，也不是热和冷。”（引自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 177 ~ 181 页。）

③ 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 17 页。

物的始基。这种观点明显地也是对更早的观念的回忆，这种观念认为，女神和她的土地本来就生于原始的水。[1]

同样的，诸如阿那克西曼德、芝诺和恩培多克勒等哲学家在公元前6~前5世纪就已经表达了作为一种不仅是关于变化的，而且是关于稳定的基本原则的对立平衡的辩证观念。[2]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东西似乎早在女神崇拜时代的宇宙学的形象化描述中就已经预示了。

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的欧洲库库特尼文化的装饰陶器上，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之间的对立紧张是一个常见的主题。[3] 关于自然及其通过表面上的生和死的对立的周期性复原的物力论，乃是古代宗教神话的核心；女神不仅体现了生与死的统一性，而且体现了生与死的两重性。母性和处女性对立的原则同样融合在女神身上。[4] 女性和男性常常同样不仅融合在女神的早期雌雄同体的形象中，而且融合在后来的婚姻的神圣仪式中。事实上，全人类的生与死及自然万物的生与死，在古老的宗教神话中，都是女神的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并列和本质上统一的表观。早期神祇的这种包罗万象的变形特征被埃里克·诺伊曼总结为一句话："拥有许多对立面的女神"[5]。

由于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其他中东文化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有的学者试图把前苏格拉底的观念解释成是从这些古老的、更先进的、到那时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男性统治的文明中"借用的东西"。文化的传播无疑是前苏格拉底世界观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到现在为止受到压制或忽视的因素——似乎是本土传统和传说的影响。

特别是本土发展似乎导致了原始男性统治制度的逐渐"削弱"。在各个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相对和平和摆脱了外来侵略的时期，不仅艺术和手工业恢复了活力，而且出现了用寡头政治的民主（选举由男性贵族或男性有产者组成的政府）代替强人国王和酋长的运动。

---

① 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19页。

② 参见，例如，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34、35、89、94、137、168页。

③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102、196页。

④ 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198页。

⑤ 埃里克·诺伊曼：《伟大的母亲》，第275页。

于是，毫不奇怪，正如赫西所指出的，希腊哲学家的观念反映了而且也鼓舞了“政治平等的传播”，以及作为“某种明确的、公正的和不变的东西”的法律的重新出现。[1] 的确，毕达哥拉斯在宇宙的原理和人的原理中提出的“几何相等”的观念，并不符合新秩序的强者统治，虽然毕达哥拉斯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好像受寡头政治的支配，这种寡头政治沿着柏拉图后来关于哲学王的概念的路线前进。[2]

在这一点上，的确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塞诺斯那里了解到，毕达哥拉斯从铁米司托克列亚那里接受了他的大部分伦理学知识。铁米司托克列亚是德尔斐的一位女祭司。我们还听说，毕达哥拉斯把古代的神秘主义引入了希腊哲学，而且据说，毕达哥拉斯甚至是一位女权主义者。[3] 在他改造俄耳甫斯的神秘宗教时，毕达哥拉斯似乎也强调崇拜女性原则。[4] 而且第欧根尼告诉我们，妇女和男人一起在毕达哥拉斯的学校里学习，就像她们后来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学习一样。[5]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古典历史学家简·哈里森所指出的那样，柏拉图哲学的许多东西是以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以及俄耳甫斯的象征为基础的，后两者保存了前男性统治的宗教和道德的原理。[6] 柏拉图的一个井然有序而和谐的理想宇宙超出了人类感官的“黑洞”，似乎来自与毕达哥拉斯相同的传统。而且柏拉图在他关于理想国家的《理想国》一书中所提倡的妇女教育平等的确不是一种符合男性统治思想的观念——这种男性统治的思想认为，最重要的乃是妇女必须受到压制。[7]

古代希腊

当我们回顾古代希腊的时候，似乎很清楚的是，这种引人注目的文明

---

① 赫西：《前苏格拉底派》，第 14 页。

② 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 80 页。

③ 哈里森引证亚里士多塞诺斯的著作作为材料的来源：毕达哥拉斯是随地米斯托克列亚学习伦理学的（《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646 页）。霍克斯写道，作为俄耳甫斯主义的改革家，毕达哥拉斯采纳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诸神的黎明》，第 283 页。）

④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646 页。

⑤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646 页；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284 页。

⑥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647 页。

⑦ 柏拉图：《理想国》，第 4 卷。

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对于艺术的强烈的爱，对于自然过程的强烈的兴趣，丰富多彩而且千变万化的女性和男性的神话象征学，以及建立希腊人所谓的民主的更平等的政治组织形式的简单而有限的尝试——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同时，现在不难发现希腊文化为什么没有进步的根源。希腊民主排斥了大多数居民（妇女和奴隶没有参与权）的事实，乃是男性统治的上层建筑在起作用，这种上层建筑被强加在早期更加和平、更加平等的社会秩序之上。因此，希腊统治阶级最关心的是战争，把他们所谓的英雄主义的男性美德和武力征服加以理想化，而且变本加厉地贬低妇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表现在雅典娜身上的古典希腊的男性统治因素和男女合作因素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由于反映了古老的伙伴关系文化进化方向的规范，所以她仍然是带着她的古代的蛇的象征的智慧女神。但是，由于她同时也反映了新的统治者的规范，所以她也是新的战争女神，全身披挂，戴着头盔，拿着长矛，她的圣杯现在是一块盾牌。我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看到这两种因素：荒谬的等级制的国家和人道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国家。

一方面，柏拉图鼓吹由他讽刺地称之为“一种高贵的谎言”所支持的三种阶级的社会，这个“谎言”编造的故事是这样的：统治阶级或“卫国者”是用金子做成的，士兵是用银子做成的，而其余的人（工人和农民）则是用铜和铁做成的。另一方面，对于卫国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真正严格的共产主义的制度，而且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可能是由公正的原则来支配的，这种原则更符合圣杯所象征的那些东西，而不符合剑所象征的那些东西。而且，虽然不能通过夸大的想象把柏拉图叫做女权主义者，但是，与雅典的现实尖锐对立的是，他在《理想国》中鼓吹统治阶级中的妇女可以得到与男人相同的教育。

我们在希腊艺术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的并列。对于生命和自然的古老的爱，被表现在不仅有女性而且有男性身体的优美的油画上。但是，争斗和武装冲突也是经常的主题。

我们在希腊的宗教中发现了两种文化互相冲突的进一步证据。在奥林匹亚的万神殿中，甚至在地方的神殿中，女性神祇仍然受到崇拜的事实证明了希腊宗教的较早根源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妇女和“女性的”价值并没有受到压制。正式地说，宙斯是至高无上的神，但是，女神仍然是强有力

的，有时比男神更有力。我们在离雅典几英里远的埃勒夫西斯每年都举行的盛大的埃勒夫西斯秘密宗教仪式中，也清楚地看到了同样的文化根源。在这里，女神以得墨忒耳和科列的孪生形式仍然向新宗教信徒揭示最高的神秘真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在我们至今仍保存着的一个彼奥提亚的金印和出土于底比斯的一幅瓶画上，古代的女性容器——圣杯或圣水器——在这些仪式中仍然是主要的形象。[①]

我们在雅典妇女自相矛盾的地位中同样看到了希腊社会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的因素。尽管存在着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但是，重要的是，至少对于有些妇女来说，雅典妇女的地位比中东神权政治统治下的妇女的地位要高得多。事实上，正因为妇女在雅典可能受到较少的压迫，所以这表明，在雅典甚至可能存在过某种类似于一种“妇女运动”的东西。

的确，和男女奴隶一样，所有的妇女都被排斥于受到赞扬的雅典民主政治之外。奥古斯丁保存下来的故事——这个故事说，雅典妇女如何丧失了选举权，同时，发生了一种从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变——表明，强加的男性统治标志了真正民主制的终结。[②] 此外，在希腊的古典时代，大多数上层阶级的妇女必须生活在有害健康而且贬低人格的女眷内室，或妇女集中居住的地方。但是，也存在这样的证据：还是在这个雅典——在希腊所有的城邦国家中，正如文化史学家杰奎塔·霍克斯所写的那样，这里的妇女“地位最低（或者只是怨气最大?）”——有些妇女在精神生活和公众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③] 例如，伯里克利的伙伴阿斯帕西娅不仅作为一位学者而且作为一位政治家进行活动。她支持雅典家庭妇女受教育，而且全

---

① 还可参看表现入会式典礼的一个骨灰坛的插图。在图中，得墨忒耳受到崇拜，新教徒抚摸盘在她身上的大蛇。站在得墨忒耳左边的另一个女性形象是她的女儿和孪生女神珀耳塞福涅（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546 页）。关于埃莱夫西斯的神秘宗教仪式的一个新颖而引人注目的研究，参见凯勒：《古希腊的生殖、性和新生女神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神秘宗教仪式》（未发表的手稿）。正如凯勒指出的，埃莱夫西斯的神秘宗教仪式保存了许多古代女神崇拜的成分。她写道：“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仪式证明了，生命所体验的仍然永远是最神秘的诞生、性欲和死亡，以及最神秘的对于万物的永恒的爱。在这种神秘的宗教中，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人们似乎在美丽而富饶的大自然中——包括他们的谷物丰收，在个人的爱、性欲和生殖中，以及在人类精神的新生中，甚至通过痛苦和死亡——表达了他们的欢乐。西塞罗关于这些仪式写道：‘我们不仅有理由生活在欢乐中，而且要带着更美好的希望去死。’”

② 奥古斯丁，转引自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 261 页。

③ 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 286 页。

面地帮助创造了历史学家所谓的“伯里克利黄金时代”著名的市民文化。[1]

正如我们早已指出的，虽然受到过分吹捧的雅典教育一般来说仅限于男人，但是也有妇女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学习。如果我们考虑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之前，美国妇女并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那么，雅典的情况就特别揭示了希腊文化中强大的男女合作/伙伴关系的倾向。

就像所揭示的那样，在希腊历史的各个时期，仍然可以在“异教的”图书馆里发现妇女的作品，这些图书馆后来都被狂热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烧毁了。例如，据说曾在毕达哥拉斯的学校学习过的一位希腊妇女，哲学家阿里格诺特，曾编过一本名叫《神圣的讲道》的书，她也是《狄俄尼索斯的仪式》和其他作品的作者。[2] 有人推测，《奥德赛》的作者可能是一位妇女。甚至有这样的证据：妇女领导着她们自己的哲学学派。这些学派中有一个是昔兰尼的阿瑞特学派，她们的主要兴趣是自然科学和伦理学，她们主要关心的是一个“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的世界”[3]。阿尔戈斯的特勒西拉以政治诗歌和圣歌而著称。根据女历史学家埃莉斯·博尔丁的说法，维奥蒂亚的科琳娜——品达罗斯的老师——“在诗歌竞赛中曾经五次赢了品达罗斯”。而埃琳娜被古人称为荷马的对手。

根据保存下来的希腊女诗人莱斯沃斯的萨法或萨福（她也给妇女办了一所学校）著作的几个片段，我们了解到，她写作了优美的诗歌，歌颂爱情，而不是像大多数希腊诗歌那样歌颂战争。她写道：“有人说，在这个邪恶的大地上，骑兵是最大的奇观，而其他人则声称步兵或带长桨的舰队才是最大的奇观。我却说，只有你的爱才是唯一的奇观。”[4]

---

① 埃利斯·博尔丁：《历史的下面》，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1976，第260～262页。正如女权主义哲学家马拉·凯勒所指出的，重要的是，阿斯帕西娅似乎来自安纳托利亚，在那里，女神仍然是重要的，而且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独立的（1986年和马拉·凯勒的私人通信）。阿斯帕西娅大约在公元前450年来到雅典，她在那里为妇女开办了一所学校，而且还到处讲演。苏格拉底、伯里克利和其他著名男人都参加了她的演讲会（威尔·杜兰特：《希腊的生活》，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39，第253页）。

② 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646页。

③ 玛丽·比尔德：《妇女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6，第326页。

④ 参见《萨福：希腊抒情诗》，威利斯·巴恩斯通译，纽约，铁锚出版社，1965。萨福的大部分作品和其他“异教”著作一道被基督教的狂热分子烧毁了。但是，正如凯勒所质问的那样，为什么荷马（他歌颂战争）的作品被保存下来，而妇女的作品，如萨福（她歌颂爱情）的作品却被毁灭了呢？关于萨福——柏拉图称她是第十位缪斯——的讨论，参看，例如，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第286页；博尔丁：《历史的下面》，第260～262页。

对于某些希腊妇女来说，**艺妓**的职业和妻子的从属角色相比给她们提供了一种更加独立而且相对受尊重的选择。虽然艺妓曾被错误地当成娼妓，但是，这并不是古希腊人的观点。艺妓更像依赖达官贵人的高等妓女，她们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常常行使着重大的政治权力。她们是娴熟的表演家和女服务员，具有不同程度的教养和文化兴趣。但是，最有趣的是有关艺妓是学者甚至是公众领导人的记载。博尔丁写道：“来自伊奥尼亚和埃托利亚城邦国家的艺妓被认为是最才华横溢的。柏拉图的两个最出名的学生是曼图亚的拉什尼娅和阿克西奥提娅。”① 对雅典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阿斯帕西娅被认为曾经是一名艺妓。

也许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某些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一种返回到人类男女两半不再分等级的社会组织的运动，某种也许与妇女解放运动相似的运动。像阿里斯托芬和克拉提诺斯这样的男人在其讨厌女人的讽刺作品中嘲弄地记录了这种情况：他们在团体和交谈中碰到的女人十分不得体地表示她们“想做一个像男人的女人”②。这的确很有可能，即，那些经常而频繁地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宗教庆典或集会上露面的妇女——她们在此向女神祇致敬——可能仍然保持着女性身份的强烈意识。因此，直到古典时代，许多希腊妇女仍拥有授权的根据。这是大多数西方文化中的妇女所缺少的东西，在这些文化中，女神终于被推翻，或完全被消灭了。

同样有趣的是古希腊妇女发动反战活动的证据。保存至今的希腊戏剧，如阿里斯托芬的著名的《吕西斯忒拉忒》，给我们十分生动地记录了一种可能是有组织的和平运动，这种运动与我们今天的和平运动十分相似。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妇女威胁不和男人过性生活，直到他们停止战争为止。被这位极其受欢迎的喜剧作者发展成一种十足的玩笑的这一主题，不仅表现了运动可能拥有的力量，而且表现了一种在我们时代仍然体现男性统治的社会特点的策略，即通过使用嘲笑和下流的手段来维持男性对妇女的控制。

这种下流的手段——实际上，更普通的手段是不记录有关妇女的资料——已经是大部分希腊历史的特点。这里，就像在我们所有其他地方的历史中那样，任何与妇女有关的东西，根据事实本身，都是次要的，或者常常根本不加考虑。因此，传统的历史学家一贯无视妇女为正义和人类社会工作的积极性。但是，现在发现了无数的事实：我们过去的历史表明，妇女的

① 博尔丁：《历史的下面》，第262~263页。

② 例证是阿里斯托芬的《得墨忒耳节的妇女》和《政治中的妇女》。

这些活动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正如我们下面要更详细地加以考察的那样，这些事实证明，在希腊和其他地方，如果稍微给妇女一点机会，她们就会积极努力使诸如和平与创造力等“女性”价值在社会运动中占据优先地位。

历史学家的词汇中缺少同性别有关的专门术语，例如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他们故意从有关我们过去的叙述中删去妇女，以利于维护建立在男女分等级的基础上的制度。这就加强了男性统治的基本原则：妇女不如男人重要。通过删去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极为重要的“妇女问题”的任何线索，实际上同样使人们无法对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所描绘的这两种社会模式作出抉择。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种性别整体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就能发现作为这个地球上的两种生活方式的男女合作论和男性统治论之间隐蔽的冲突。于是，与中东神权政治统治下的妇女相比，某些希腊妇女有较大的自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标志。例如，这一标志可以被认为是希腊人关于政治权力乃是职责而不是统治的更人道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乃是前男性统治时代的特点——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并恢复活力的原因和结果。

我们西方许多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例如，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来自希腊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这两位男人是由妇女教育的这一事实，加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观念是从早期男女合作的根子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也揭示了，教育过毕达哥拉斯的铁米司托克列亚和教育过苏格拉底的狄奥提马都是女祭司——早期宗教和道德传统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但是，当我们能够在古希腊发现男女合作重新恢复活力的大量迹象时，我们也能够发现残忍的男性统治在抵制这种进化的挺进。官方的希腊宗教基本上是尊重统治者的宗教：宙斯通过残忍而野蛮的行动——包括他多次不仅强奸女神，而且强奸凡间妇女——建立并维护他的至尊地位。我们已经指出过，古典时代伟大的宗教祭祀剧，如《奥瑞斯忒亚》，目的就在于巩固和加强男性统治和男性暴力的男性统治规范。这反映了希腊统治精英的政策。因为无论这些男人变得如何“有教养”，如果他们打算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那么他们就不能对男性统治、独裁主义和作为男性统治制度特点的制度化的社会暴力这三个方面组成的结构作任何根本性的变革。

男性统治的是与非

统治古希腊的男人可能支持，有时甚至赞美人道主义。但是，这种支

持和赞美只能到此为止，而不会更进一步。关于这种情况，古典希腊那个稀奇古怪和十分令人不安的人身攻击事件——判处似乎无害的老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已经揭露了许多。甚至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也因为用“激进的”观念“腐蚀”雅典青年而被判死刑，那么，这些激进的观念是什么呢？意义深远的是，它们包括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男女合作的观点，例如，妇女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男性统治者的强权即公理的信条进行正面进攻的有关正义的概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十分有力地表达了苏格拉底对于那种根据暴力划分等级的制度的挑战。在书中，我们发现了苏格拉底关于妇女在教育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甚至使18世纪被认为十分开明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都感到十分震惊。在西方哲学的这部经典作品里，我们也发现了苏格拉底和诡辩派哲学家格劳孔的对话。格劳孔所明确表达的见解和苏格拉底提出的尖锐问题都表明，对于作为统治阶级的男人来说，法律和正义纯属权术问题。

诡辩派有时也因暗中破坏传统的道德而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公开拒绝希腊的神。但是，柏拉图在这部对话中表明，他们的哲学学说实际上表达了他们时代的传统道德，没有任何伪装或掩饰的外表。[①]

诡辩派直率地表达的世界观完全是统治希腊的男人们的世界观——就像它是今天统治着大部分世界的男人们的世界观一样，因为诡辩派更彻底地表达了男性统治关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道德见解，在这种男性统治的生活中，那时和现在一样，男人用他们的武力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在《理想国》中，格劳孔告诉苏格拉底，法律只不过是弱者的发明，他们十分狡猾，完全看到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压制强者，至于公正，它只不过是“最好的——做了坏事而不被发觉——和最坏的——被冤枉而无法报复”之间的“妥协”。[②]

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同样的世界观和正义观也出现在受到赞扬的希腊通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他记述了公元前431～前403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修昔底德所叙述的雅典人的使者和雅典人妄图兼并的基克拉泽斯的一个小城邦米洛斯的代表之间的对话中，雅典使者直率地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对是非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得利。因为“正义的问

① 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269～270页。

② 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286、285页。

题是由双方力量相等才引起的，而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①]。

正如约翰·曼斯利·鲁宾逊在他关于希腊哲学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权术道德部分地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的：人类是“残忍的、贪婪的、自私自利的动物”[②]。这种权术道德也建立在另一个前提上：以力量划分等级的人类是“自然的”，因此是正确的。根据这种观点，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指出的，自然中存在统治的原则和被统治的原则。换言之，应该支配社会组织的原则是等级而不是联系。正如奴隶自然而然要受自由男人统治、妇女要受男人统治那样，亚里士多德所明确阐述的恰恰表达了男性统治的哲学和生活的基础。其他的一切都违背了应该遵守的——因而也是“自然的”——秩序。[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哲学前提也是构成西方文明其他主要传统——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的组成部分。这里，它们被表现在诸如原罪和宗教神话等基督教观念里；在宗教神话里，上帝的地位高于男人，男人高于妇女、儿童和自然，而这一切都是神定的。[④]

实际上，如果我们研究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就会了解到，通常用来表达等级观念的词“等级制度”（hierarchy），本来就与教会的管理机关有关。它来自希腊语的 hiero（神圣的）和 arkhia（统治），而且描述了权力的等级秩序或层次，统治教会的男人通过这种权力行使统治他们的教士和基督教欧洲人民的权威。[⑤]

但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它是一种常常被遗弃，但仍在坚持的希望的基础，这种希望就是：人类精神的进化有朝一日仍能摆脱那种使我们陷入野蛮和压迫的制度。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方面就是两千年以前在西方规范中可能已经产生的一种从属的或男女合作的转化。

---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267 页。

② 鲁宾逊：《早期希腊哲学导论》，第 287 页。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④ 《创世记》1～3。

⑤ F. 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新兴的文化》，第 282 页。

第九章　历史的另一半：第2部分

差不多两千年以前，在加利利湖畔，一位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的名叫耶稣的青年犹太人痛斥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仅是富有的和有权的当局，而且包括宗教当局——剥削和压迫巴勒斯坦的人民。他宣扬普遍的爱，并且教导说，逆来顺受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和弱者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大地的主人。此外，他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常常抵制他的文化指定给妇女的从属和孤立的地位。在他那个时代，自由地和妇女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异端形式，耶稣则宣布所有人在精神上平等。

毫不奇怪，按照《圣经》，在耶稣时代，当局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革命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消灭他的激进思想。从男性统治制度的观点来看，耶稣的这些思想的确是太激进了，在这种男性统治制度中，男人的等级高于妇女是一切人类等级的模式，《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简短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在这里读到，对于那些信奉耶稣福音的人来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有些基督教神学家，例如伦纳德·斯威德勒，已经断言耶稣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甚至从官方的或“神圣的”经文中也能看出，他反对他那个时代对妇女的严格隔离和奴役。[①] 但是，女权主义的最初目的是解放妇女。因此，说耶稣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从历史来看可能并不准确。说耶稣的学说体现了人类关系的一种男女合作观点，似乎可能更准确。

这种观点并不新颖，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也包含在《旧

① 伦纳德·斯威德勒：《耶稣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载于《天主教世界》，1971年1月，第177～183页。

约》里的那些与一种伙伴关系社会的观点相一致的部分中，但是，这位加利利的青年木匠明确地、十分有力地——实际上，在他那个时代的宗教精英看来，异端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因为虽然妇女解放并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转化理论的新观点来考虑耶稣所宣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而且统一的主题：一种通过用男女合作的价值代替男性统治的价值的解放全人类的远见卓识。

耶稣和男女合作论

《新约》中被认为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显然熟悉耶稣——所创作的那些作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一般被认为是“真正”来源于耶稣的。虽然这些作品也是在耶稣死后许多年才写下来的，而且无疑被重新编辑过，但是，它们可能仍然比其他部分，例如《使徒行传》和《哥林多书》，更准确地反映了耶稣的学说。

这里，除少数例外，我们很难找到有关统治者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亦即男尊女卑这种模式的论述。相反，贯穿在《新约》的这些作品当中的则是耶稣关于精神平等的教训。

甚至更引人注目的，而且广为流传的是耶稣的教导：我们必须把“女性的美德”从从属的或配角的地位提高到主要的和中心的地位。我们必须不是凶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必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必须爱我们的邻居，甚至爱我们的敌人。要代替粗暴、侵略和统治这些“男性美德”，我们首先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是互相负责、同情、温柔和爱。

当我们不仅仔细考察耶稣的教导，而且仔细考察他是如何着手传播他的教义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所宣扬的就是关于一种伙伴关系社会的福音。他反对高阶层的男人——在耶稣的时代，这些人是祭司、贵族、富人和国王——是上帝的宠儿的教条。他从容地和妇女们打交道，因此公开拒绝当时男性至上主义的规范。而且与后来基督教哲人——他们实际上争论过妇女是否有不死的灵魂的问题——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耶稣的确没有宣扬过绝对统治者的教义：妇女在精神上低于男人。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耶稣是否曾经真的存在过。争论的原因（有详细的文献记载）是，除了极不可靠的基督教原始资料之外，绝对没

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耶稣确实曾经存在过。分析家们也指出，事实上，有关耶稣生平的所有事件，以及他的许多教导，都曾出现在其他宗教的神话人物的生活和言论中。这可能表明，耶稣是用从其他地方借来的东西虚构的，以便为早期教会的头目服务。奇妙的是，有关耶稣的真实性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也许正是他的女权主义和男女合作的思想和行动。因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制度压倒一切的需要就是制造能够支持而不是排斥男性统治价值的神和英雄。

因此，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虚构一个人物，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 4 章第 7～27 节中所读到的，他由于公开和妇女交谈而违背了当时男性统治的习惯；或者，他的门徒对他竟然和妇女谈话，而且谈得这么久"感到惊奇"；或者，他不会宽恕以石块击毙妇女的习惯，在她们的男性主人看来，她们和一个不是她们的主人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乃是犯了滔天大罪。

在《路加福音》第 10 章第 38～42 节中，我们读到，耶稣公开把妇女包括在他的伙伴之中，甚至鼓励她们摆脱她们的奴隶身份并积极参与公众生活。他称赞积极分子马利亚比她的亲姐姐马大更有福分。而且在官方的所有福音书里，我们读到有关马利亚·马格达林娜以及耶稣如何尊重和关心她的故事，而马格达林娜可能是一名妓女。

甚至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从福音书中了解到，正是马利亚·马格达林娜最先看到了耶稣的复活。在耶稣死后，在他空了的坟墓前哭泣的也是这位守着他的墓穴的马利亚·马格达林娜。在那里，在耶稣向他的 12 个公认的男门徒显圣之前，她看到显圣的耶稣出现在她面前。而且正是马利亚·马格达林娜受耶稣之命告诉其他门徒，他可能要升上去见他的父。[1]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耶稣的时代，他的学说——像现在一样——对妇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虽然基督教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提到这种情况，但是甚至在官方的著作或《新约》中，我们都发现基督教有女性的领袖。例如，在《使徒行传》第 9 章第 36 节中，我们读到，一个叫大比大或多加的耶稣女门徒，由于不在众所周知的、公开计算的 12 个门徒之内而为人们所怀疑。在《罗马书》第 16 章第 7 节中我们发现，保罗郑重地向一位名叫犹尼亚的女使徒问安，他说她在使徒中是最有名望的，也是**比他先在**基督里。我们读到，"又问马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

[1] 参见，例如，《约翰福音》20：1～18。

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黑体是本书作者改的）。

有些学者认为，《新约》的《希伯来书》实际上可能是一位名叫普里西拉的妇女写的。她是阿奎拉的妻子，《新约》里谈到她和保罗一起活动，常常在提到她丈夫的名字之前提到她的名字。[①] 而且正如神学史家康斯坦斯·帕维所指出的那样，在《使徒行传》第 2 章第 17 节中，我们发现，神明确指定妇女当**先知**。在书中，我们读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黑体是本书作者改的）。

因此，很清楚，尽管当时有严格的男性统治这种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妇女在最初的基督教团体里仍然发挥了领导作用。正如神学家伊丽莎白·舒斯勒·费奥伦查所指出的，《新约》中所提到的早期基督教的许多聚会是在妇女家中举行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歌罗西书》第 4 章第 15 节中，我们读到，聚会是在宁法家举行的。在《哥林多前书》第 1 章第 11 节中，我们读到，聚会是在革来氏家中举行的。在《使徒行传》第 16 章第 14 节、15 节和 40 节中，我们读到，在腓立比的聚会是从使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吕底亚皈依基督开始的。等等，等等。[②]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同一部《新约》中，我们继续读到有关马利亚·马格达林娜的记载。她被怀疑是一名妓女，一名违背了最基本的男性统治法律的妇女，这种法律认为她应该是她丈夫或主人的性奴隶。然而，她显然是早期基督教运动的一位重要成员。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存在着压倒一切的证据：马利亚·马格达林娜是耶稣死后的早期基督教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事实上，在一份被禁止的文件里，描绘了她坚决反对在某些基督教派别内部重新恢复受到耶稣反对的那些等级——这些派别的领导人显然没有把这份文件包括在编成的《新约》内便是证明。

对于男性统治的精神来说，把耶稣包括在男女合作的反革命当中的观点是难以理解的。打个比方说，骆驼穿过针眼似乎也比这种观点进入原教旨主

① 《S. 斯科特·巴契教授访谈录》，载于《追溯基督教的来源》，《大学学院图书馆联合会月刊》1980 年 11～12 月第 11 期，第 5 页。

② 参看，例如，伊丽莎白·舒斯勒·费奥伦查：《早期基督教运动中的妇女》，载于卡罗尔·P. 克赖斯特和朱迪思·普拉斯科夫主编《妇女精神的兴起：一本妇女宗教读物》，旧金山，哈泼与罗出版社，1979，第 91～92 页；埃莉斯·博尔丁：《历史的下面》，第 359～360 页。费奥伦查的《对她的回忆》（纽约，十字路出版社，1983）是一部从女权主义观点研究《新约》的重要著作。

义者的头脑容易，原教旨主义者的汽车今天坐满了劝告别人“正确理解耶稣”的教徒。首先，耶稣为什么要提高处于奴隶地位的妇女和女性价值呢?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明显的是，以耶稣的那种身份，他可能已经为更重要的事耗尽了精力，由于习惯的限制，他绝不会考虑任何所谓妇女问题的事。

事实上，耶稣显然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因为耶稣本人是男性统治的产儿，是一位生在仍然是犹太教严格的男性统治时代的犹太人。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 8 章第 3～11 节所读到的，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时，按照习惯，妇女会因为与人通奸，换言之，会因为违反她丈夫或主人的性财产权而被人用石头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最说明问题的是，耶稣不仅阻止了这种用石头打死妇人的事，而且他这么做也是对犹太法律学家和法利赛人的公然反抗；这些人精心制造了这种情况，以便揭露他是一个危险的反叛者。

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耶稣的男女合作学说不那么引人注目。很久以来，耶稣一直被认为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精神人物之一。无论用任何关于卓越的标准来衡量耶稣，《圣经》中所描绘的这个人物都显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敏感性和理智水平，以及反抗公认权威的勇气，而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公开反对残忍、压迫和贪婪。因此，毫不奇怪，耶稣应该意识到，他可能看到的他周围的“男性”统治价值、不平等和征服，贬低和歪曲了人类的生命，因此必须以同情、职责和爱为基础的温柔的、更“女性的”价值体系取而代之。

耶稣认识到，我们的精神进化已经被一种组织人类关系的方式所阻止，这种组织方式的基础是以暴力为靠山的等级制。耶稣的这种认识可能导致一种基本的社会变化。它可能把我们从男性统治制度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如在男女合作重新复活的其他时代那样，这种男性统治制度的反抗是十分强烈的。而且在基督教的最初作家最终留给我们的《新约》中，这种观念常常被附加进去的完全互相矛盾的教义所掩盖，这种教义为教会后来的男性统治结构和目的辩护。

被禁止的圣典

艺术品修补者常常揭露出古代杰作的真相，他们必须刮掉为了歪曲这些杰作而涂上的一层层油彩、污垢和旧虫胶。现在，探索《新约》内外含

义的神学家和宗教史学者的新学术成就，以同样的方式揭示出鼓吹男女合作的耶稣。

为了更好地理解早期基督教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在《新约》中所包含的官方经文之外寻找其他古代基督教文献，有一些文献只是在最近才被发现。其中最重要而且最说明问题的是 1945 年在上埃及的一个边远省份——纳格·哈马迪出土的 52 卷诺斯替教派的福音书。[①]

在普林斯顿进行研究工作的宗教学教授伊莱恩·帕格尔斯在其《诺斯替教派福音书》一书中写道："写作并传播这些经文的那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是'异端'。"[②] 然而，以前所知道的有关这种"异端"圣典的许多东西，就是来自攻击它们的那些男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客观的观点。

事实上，公元 200 年前后开始控制了后来被称为"正统的"或唯一真正的教会的那些男人，命令毁灭了所有这些经文的抄本。但是，正如帕格尔斯所写的那样，"有一个人，可能是来自圣帕克米乌斯附近的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得到了这些被查禁的抄本并把它们藏起来，它们才免遭毁灭。他把抄本藏在坛子里。抄本被埋藏了大约 1600 年终于保存了下来"[③]。而且由于一系列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似的事件，这些被禁止的诺斯替教派的福音书在被发现后又过了 34 年，即在 1979 年，学者们才完成了对它的研

① 詹姆斯·鲁宾逊主编《纳格·哈马迪大全》，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77。这绝不是说这些古代基督教福音书不是男性统治的文献。难以判断的是，对这些文献的各种翻译在什么程度上起了作用。例如，最近从科普特语译成英文的工作就是古代和基督教研究所的科普特诺斯替教派藏经科研项目。但是，流行的形象化描述的语言清楚地证明，这些文献写作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男人和男性概念化的神祇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福音书中最主要的异端之一是：有些异端说回到了前男性统治的力量概念，这种力量以与圣母的创造性力量和智慧相关的女性形式支配着宇宙（参见，例如，《托马斯福音》，第 129 页；《菲力福音》，第 126～142 页；《执政官的人格，耶稣基督的智慧》，第 206 页；《雷电、完美的精神》，第 271 页；《伟大的塞特的第二论文》，第 330 页）。贯穿所有这些相当不同的福音书——它们来自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传统——的明显异端是：它们向等级制是神所规定的教义挑战。甚至超出这种男女合作的主题——女性是神的力量的象征，马利亚·马格达林娜是耶稣最心爱、最信任的同伴——的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在这里读到，它们直接反对这样的观念：神秘的直觉或知识只能通过教会统治阶级——教皇、牧师和祭司——才能得到，这已成为而且仍然是正统基督教的标志。

② 伊莱恩·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79，第 xix 页。

③ 伊莱恩·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79，第 xix 页。注意，君士坦丁于公元前 313 年发布的米兰敕令标志着基督教教会与罗马统治阶级联盟的开始。

究，而帕格尔斯的著作终于使它们引起公众的关注。

根据哈佛大学赫尔穆特·凯斯特教授的看法，这些最近发现的基督教的神圣作品有些比《新约》的福音书更古老。他写道，它们的时代“可能属于1世纪下半叶（50～100年），或早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及《约翰福音》”[①]。

因此，《诺斯替教派福音书》成书于男性统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已经是西方规范的时代。它们不是关于男女合作的文献。但是，我们在其中所发现的东西却是对男性统治社会规范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gnostic”（诺斯替）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词“gnosis”（真知或知识）。这是与仍然广泛使用的术语 agnostic（无知）相对而言的，后者指那种相信知识不能被确知或不可知的人。和西方及东方其他神秘主义宗教传统一样，诺斯替派基督教承认似乎并非是异端的观点——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通过宗教训练和道德生活，更高的神圣的真理的秘密是可知的。

那么，诺斯替派的什么观点如此异端，以至于必须查禁呢？明确地说，我们在这些诺斯替福音书中所发现的观念，与引起希伯来教士辱骂并企图与之断绝关系的耶稣的观念相同。这是一种无须通过以一个首席拉比、高级主教或教皇为首的宗教僧侣统治集团就能接近神的观念。更确切地说，直接通过真知或神圣的知识而不用向独裁主义的教士致敬或交纳什一税就可接近神。

我们在这些“正统”基督教教士查禁的圣典中还发现经文证实了一个重要人物确实存在过，这个人物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官方经典读物的怀疑，而且受到更早发现的诺斯替教派的片断文献的怀疑。这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利亚·马格达林娜，她是早期基督教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马利亚福音》中，我们再次看到，她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门徒（就像在官方的《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中也顺便记录的那样）。[②]这里，我们还读到，基督比爱其他所有的门徒更爱马利亚·马格达林娜，正如在诺斯替派的《菲利普福音》中也加以肯定的那样。[③]但是，恰恰是

---

① 赫尔穆特·凯斯特：《托马斯福音书导论》，见《纳格·哈马迪大全》，第117页。

② 参见《马可福音》16：9～20；鲁宾逊主编《纳格·哈马迪大全》，第471～474页；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11页。

③ 参见鲁宾逊主编《纳格·哈马迪大全》，第43、138页。关于这些文献的卓越分析，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1章。

马利亚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中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只在这些被查禁的圣典中才有所记载。我们在《马利亚福音》中所读到的是，在耶稣死后，马利亚·马格达林娜是基督教的领导人，她勇敢地向作为新宗教僧侣统治集团首领的彼得的权威挑战，这个集团以这样的主张为根据：只有彼得及其教士和主教才能和上帝直接交往。[①]

帕格尔斯评论道："考虑一下《马利亚福音》的政治含义吧！因为马利亚敢于反抗彼得，所以把她作为榜样的诺斯替派向那些主张彼得是继承人的教士和主教挑战。"[②]

在新兴的以彼得为首的日益等级化的教会和诸如人数众多的诺斯替派以及孟他努斯和马西昂派等其他早期基督教团体之间，存在着其他有关的、同样是基本的教义差别。与那些现在被描绘成基督教创始人的男人相反，这些教派不仅把妇女尊为门徒、预言家，而且把她们尊为基督教的创始人；他们把坚决信奉耶稣的精神平等学说作为职责，他们也把妇女包括在他们的领导集团之中。[③]

为了进一步强调基本的男女合作联系原则，而且为了废除永久的等级制，某些诺斯替教派在每次聚会上通过抽签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我们实际上是从诺斯替派的敌人伊里奈乌斯主教的著作中了解到这一点的，伊里奈乌斯于公元 180 年左右在里昂主管教会。[④]

帕格尔斯写道："在正统基督教徒日益在牧师和平民之间作出区别的同时，这种诺斯替基督教团体却表示，他们拒绝承认在他们自己之间的这种区别。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们并不把他们的成员分成高等和低等的'等级'，他们遵守严格的平等原则。所有的男女新教徒同样平等参加抽签：任何人都可以被选为**教士**、**主教**，或**预言家**。此外，由于他们每次聚会都抽签，所以甚至抽签所造成的区别也绝不能成为永久的'等级'。"[⑤]

对于到处都根据等级来夺权的男性统治的基督教徒来说，这种抽签方法是十分可恨的。例如，德尔图良——他在公元 190 年前后为"正统"观

---

①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11～14 页。

②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14 页。有些官方的基督教经典仍然包含着这些男女合作的启示的痕迹。参见《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③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3 章。

④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xvii，第 41 页。

⑤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41～42 页，黑体是原文如此。

点写作——愤恨地写道："他们大家都平等地接近，他们平等地倾听，他们平等地祈祷——甚至和异教徒平等地做这一切，如果他们碰巧来了的话。"他同样愤恨地写道："他们也和所有来的人一起分享和平之吻。"①

但是，德尔图良最痛恨的是妇女的平等地位——这也可能最招人恨，因为它威胁到他和他的同事主教们竭力强加在教会中的等级制度的基础。帕格尔斯指出："德尔图良尤其反对'异教徒中的那些妇女'参与，她们和男人分享权威的地位。""'她们讲道；她们参加讨论；她们驱除妖魔；她们治病'——他怀疑，她们甚至可能施洗礼，这就是说她们也担任主教！"②

对于像德尔图良这样的男人来说，只有一种"异端"甚至比男女精神平等的观念更严重。这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女神的观念。它从根本上威胁了日益增长的男性的权力，这些男人现在正在建立他们自己新的"教会君主"。而这种异端——正如我们仍然可以在并不包括在官方的或《新约》的经文中的《诺斯替教派福音书》和其他神圣基督教文件中所读到的那样——的确是耶稣的某些早期门徒所鼓吹的。

根据较早的而且明显地仍被牢记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女神被认为是圣母和万物的创造者——瓦伦廷和马可的追随者向圣母祈祷，她是"神秘而永恒的沉默"，她是"美之女神，她先于万物"，而且她是"纯洁的智慧女神"。③ 在另一部经文中，我们发现把三形普罗提诺亚（按字面翻译，意思是三种形式的原初思想）歌颂为这样的力量：女性的思想、理智和预见——这仍然是遵循较早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这些力量被认为是女神的象征。经文开始时，有一位神人说："我是普罗提诺亚，居住在光明之中的思想……她先于万物而存在……我在万物中运行……我是万物之中不可见的太一……我是感觉和知识，通过思想发出声音。我是真正的声音。"④

在另一部被认为是诺斯替派教师西蒙·马古斯所写的经文中，天国本身——生命诞生之地——被认为是圣母的子宫。⑤ 而且在属于马可或狄奥

①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42～43 页。
②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42 页。
③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54 页。
④ 鲁宾逊主编《纳格·哈马迪大全》，第 461～462 页。
⑤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52 页。

多图斯（约公元 160 年）的作品中，我们读到，"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结合构成圣母的最好产品，即智慧"[①]。

无论这些"异端"采取什么形式，它们显然来自较早的宗教传统，当时女神受到崇拜，而女祭司是她的世俗代表。因此，神的智慧几乎一直被人格化为女性——正如它仍然存在于这样的阴性词——如希伯来语的霍克玛（hokma，智慧），希腊语的索菲娅（sophia，智慧）——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其他古代神秘传统中那样。[②]

这些异端所采取的另一种形式是它们描述神圣家族的"非正统的"方式。帕格尔斯报告说："一个来源于诺斯替派的团体声称，他们已经通过詹姆斯和马利亚·马格达林娜继承了耶稣的神圣传统。这个团体的成员不仅向圣父而且向圣母祈祷：'从你那里，圣父，并通过你，圣母，两个不朽的名字，神的父母，而且你，居住在天国，仁慈，万能的名字。"[③]

同样的，教师和诗人瓦伦廷教导说，虽然神本质上是不可描述的，但是，神可以被想象为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构成的一种二分体。[④] 其他人更直截了当地坚持，神应该被认为是雌雄同体。或者，他们把神的精神描绘为女性，以便用天主教传统的三位一体术语，从圣父和圣灵或圣母的统一中得到他们的儿子救世主基督。[⑤]

男女合作的异端

这些早期基督徒不仅威胁"教会长老"日益增长的权力，而且他们的观念也是对男性统治家庭的直接挑战。这些观点从根本上破坏了神所规定的男性统治女性的权威，家长统治的家庭就是以这种权威为基础的。

圣经学者常常指出，希伯来当局和罗马当局都认为早期基督教是一种威胁。这并不仅仅因为基督教徒不愿意崇拜皇帝并效忠于国家。西德图宾根基督教起源研究所前所长 S. 斯科特·巴契教授指出，把耶稣的学说和他的门徒当做危险的激进分子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他们对现存的家庭传

---

①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56 ~ 57 页。

②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52 ~ 53 页。

③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49 页。

④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3 章，特别参看第 50 页及随后各页。

⑤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52 ~ 53 页。

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妇女有她们自己的权利，巴契的结论是，原始基督教的基本威胁是他们不仅“不尊重”他们时代的罗马人的家庭结构，而且“不尊重”犹太教的家庭结构，这两种家庭的结构都把妇女列于从属地位。[1]

如果我们考察作为大千世界的缩影——而且是幼小而顺从的孩子所知道的唯一世界——的家庭，那么，这种对于男性统治的、父亲的话就是法律的家庭的“不尊重”，可能被认为是对以暴力划分等级的制度的一种主要威胁。它解释了在我们的时代促使我们返回“美好的旧时代”——那时，妇女和“地位较低的男人”仍然知道他们的地位——的那些人为什么宣称“传统”家庭是绝对优越的。它也阐明了两千年前使世界分裂的那场斗争，当时耶稣正在宣扬他的同情、非暴力和爱的福音。

在我们的时代和那些骚乱的年代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在那些骚乱的年代里，所有时代中一个最强有力的男性统治的社会——罗马帝国——开始瓦解了。这两个时代都是“混沌”理论家所谓的系统日益处于不平衡状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系统可能发生前所未有而无法预料的变化。如果我们从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之间持续冲突的观点来考察紧接着耶稣去世前后的时代，那么我们发现，与我们的时代一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男女合作重新复活的时期。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正是在这种社会大混乱的时期，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热力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所写的那样，最初微不足道的“波动”可能导致系统的转化。[2]

如果我们把早期基督教当成最先出现在罗马帝国边缘地区（在犹太这个小省份）的一种开始时微不足道的波动来考察，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文化进化的潜在影响就获得了新的意义，而它的失败则产生了甚至更巨大的震动。此外，如果我们在这种较大的构架内部——这种构架考虑到在所有系统中所发生的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来考察早期基督教，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甚至在罗马自身内部也存在着男女合作重新复活的其他表现。

在罗马，例如，教育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有时给贵族男女孩子提供同样的课程。正如神学史学家康斯坦斯·帕维所写的那样：“在公元 1 世纪，

① 参见《S. 斯科特·巴契教授访谈录》，载于《追溯基督教的来源》，第 5 页。

② 参见伊利亚·普利高津和伊萨贝尔·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4，特别参看第 5～6 章。

罗马帝国内部的许多妇女受到了教育，而且有些妇女在公众生活中很有影响并享有巨大的自由。”[①] 不过仍然存在着法律限制。罗马妇女必须有男性监护人，而且从来没有获得选举权。但是，尤其在上层阶级里，妇女日益进入了公众生活。有些妇女学习艺术。另一些妇女则从事某种职业，例如行医。还有一些妇女参与经商、法庭工作和社会生活，参加体育运动，看戏，消遣娱乐，听音乐，以及无须有男人陪伴而独自旅游。[②] 换言之，正如帕维和帕格尔斯都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向妇女“解放”发展的运动。

还有对男性统治制度的其他挑战，例如奴隶造反和边远省份的反叛。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犹太人起义（公元 132 ~ 135 年）可能标志了犹太国家的灭亡。[③] 但是，当以暴力为基础划分等级的男性统治受到挑战，早期基督教徒拥护非暴力并谈论同情与和平时，罗马甚至变得更加专制而凶暴了。

正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包括基督徒君士坦丁）骄奢淫逸的生活及其臭名昭著的竞技场所表明的，男女合作对这种血腥的统治者社会的挑战失败了。事实上，甚至在基督教自身的内部，男女合作也没有成功。

钟摆向回摆动

帕格尔斯评论道：“尽管从前基督教妇女公开活动，但是，在公元 2 世纪，大多数基督教团体承认提摩太的伪保罗信是真作，这封信强调（和夸大）保罗的观点中反女权主义的成分：‘让妇女学会默默地服从一切。我不允许妇女教训或支配男人，她应该保持沉默。’……公元 2 世纪末，妇女参加礼拜明确地受到谴责：妇女继续在其中担任领导的团体被打上异端的烙印。”[④]

正如帕格尔斯进一步写到的那样：“凡是研究基督教早期历史（所谓的‘研究基督教早期教会领袖的著作’的领域——即对‘基督教会创始

① 康斯坦斯·帕维：《〈新约〉中妇女的神学和领导》，载于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主编《宗教和性别歧视：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妇女形象》，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74，第 118 页。

② 参见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62 ~ 63 页。

③ 参见阿巴·埃班：《犹太史》，纽约，伦道姆出版公司，1968。

④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 63 页。

人’的研究）的人，都应对下面这段结束《托马斯福音》的叙述作好思想准备：‘西蒙·彼得对他们（众门徒）说：让马利亚离开我们，因为妇女不值得以命相待。’耶稣说：‘为了使她成为男性，我本人将领导她，以便她也可以成为一种活的精神，和你们男性一样。因为每个使自己成为男性的妇女都将进入天国’。”①

这种完全排斥妇女的生命价值的观点——甚至更有讽刺意义的是，生命本身就来自于妇女——只有联系到目前开始的男性统治的退化和压制才有意义。它有助于证实我们许多人深有所悟却无法确认的事实：基督教最初的爱的福音犯了可怕的错误。否则这种福音怎么会习惯于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执行的反对他人和互相残杀的所有的严刑拷打、征服和杀人放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西方历史的很大一部分——辩护呢？

因为在西方世界终于产生了一种无法预料而激动人心的系统变化。一个新的时代从罗马古典世界瓦解的混沌中产生了。最初那种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神秘迷信成了新的西方宗教。虽然它不断预言自身和社会的改变，但是社会没有改变，这种“外来的入侵者”本身却被改变了。与在它以前的和从那以后的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变成了一种男性统治的宗教。神圣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帝国。

到了公元200年，在这种古典精神颠倒的情况下，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完全成了一种等级制的和以暴力为基础的制度，而这是耶稣曾经反对过的。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帝垮台之后，它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武器，即国家的奴仆。正如帕格尔斯所写的，当“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成了一种官方承认的宗教时，以前迫害基督教徒的警察现在受基督教主教的指挥了”②。

根据基督教的历史，据说在公元312年，在君士坦丁打败和杀死他的对手马克森提并被宣布为皇帝的前一天，他在日落时看到神灵的显圣：一个刻着“在这个象征里，你将是胜利者”这句话的十字架。基督教历史学家通常不予记载的是，据说，这位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把他的妻子福斯塔活活煮死了，而且命令刽子手杀死了他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③ 但是，在

①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49页。

②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xvii页。

③ 参见，例如，《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第634页；H. G. 韦尔斯：《历史大纲》，纽约，花园城出版社，1920，第520页；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第一性》，纽约，企鹅图书公司，1971，第234、237页；亨德里克·范·卢恩：《人类的故事》，纽约，邦尼和利夫莱特出版社，1921，第135页。

欧洲被基督教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流血和镇压不只限于君士坦丁的私人行动，也不只限于他的公务活动和他作为基督教继任者的公务活动，例如，后来关于教会异端是一种应受拷问和死刑处罚的反叛行为的敕令。

现在，命令对所有不愿意接受“新秩序”的人严刑拷问和处死成了教会领袖们本身的日常公务。[①] 有组织地查禁所有可能威胁这种新的男性中心的等级统治的“异端”知识，也成了例行公事。

显然，现在与其说上帝是纯粹精神和父母，不如说是男性。而且正如教皇保罗六世在大约2000年以后的1977年仍然断言的那样，妇女被排斥在教士之外，“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男子”[②]。同时，《诺斯替教派福音书》以及与它们相同的其他经文——在基督教初创的年代，这些经文曾在基督教团体中自由传播——被那些现在自称是正统的，即唯一合法的教会人士痛斥为异端并被销毁。

正如帕格尔斯所写的，所有这些原始资料——“秘密的福音书、启示和神秘的训诫”——“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资料都被排斥在集成《新约》的精选书目之外。……诺斯替教派所崇敬的每部秘密经文都被从正统经文集成中删除了，而且被那些自称是正统基督徒的人打上了异端的烙印。在整理各种经文的过程结束时——可能要到公元200年——**实际上所有有关女神的女性形象都从正统传统中消失了”**。[③]

相信平等的基督教徒反被其他基督徒诬为异端，这种现象由于下述事实尤其令人啼笑皆非：在早期的使徒团体中，妇女和男人像耶稣所命令的那样生活和工作，实行**仁爱**或兄弟姐妹之爱。如果我们考虑到许多亲密无间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妇女和男人作为基督教的殉难者而死，那么这就更令人哭笑不得了。但是，对于现在利用基督教到处建立他们的统治的男人来说，基督教的生活和基督的意识形态却必须符合男性统治的模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异教徒的基督教化成了对曾经坚持恢复权力即正义的统治者原则的辩护。这不仅需要战胜所有不接受官方基督教的人或强迫其改变信仰，而且需要有计划地摧毁“异教的”寺庙、神殿和“偶像”，并关闭古代希腊的学园——“异教的”研究工作仍然在那里进行着。

---

① 参见，例如，H. G. 韦尔斯：《历史大纲》，第522～526页；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第一性》，第14章；G. 拉特雷·泰勒：《历史上的性》，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54。

②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69页。

③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57页，黑体是后改的。

教会靠权力证明“道德”正义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为止，任何没有教会“祝福”的艺术表现或对经验知识的追求，实际上在欧洲都不得存在。而且有计划地毁灭所有现存的知识，包括大规模地焚书，这些事干得如此之彻底，甚至超出欧洲并扩大到基督教权威可能达到的任何地方。

因此，在公元391年，在狄奥多西一世统治下，已经彻底男性中心化的基督教徒焚毁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古代智慧和知识最后的博物馆之一。[①] 而且在后来被列为圣徒的圣西里尔（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主教）这个男人的帮助和教唆下，基督教的修道士残忍地用牡蛎壳把希帕蒂亚——亚历山大城新柏拉图哲学学派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凌迟处死。因为按照圣西里尔的说法，这位妇女——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她竟敢违背上帝的命令去教训男人。[②]

在官方批准的著作中，保罗派的教义——或者像学者们正越来越确信是伪保罗派的教义——富有权威性地重新肯定：女人和所有标有女性标志的东西都是低下的，而且十分危险，必须严加控制。但是，仍然有例外，引人注目的是亚历山大的克雷芒的著作仍然不仅把上帝描绘为男性的，而且描绘为女性的。他写道：“‘博爱’这个名字为男人和妇女所共有。”[③] 但是，耶稣所提出的人类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男性和女性、富人和穷人、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基本上被从正统基督教教会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中删除了。

控制新的正统教会的男人们可能在仪式中举起古代的圣杯，它现在成了盛满象征性的基督的血的圣餐杯，而实际上剑再次君临一切。教会和统治阶级在剑和火的帮助下，不仅消灭了异教徒，例如太阳神教徒、犹太人，或埃莱夫西斯和德尔斐的古代神秘宗教的信徒，而且消灭了所有不承认失败并接受他们的统治的基督教徒。他们仍然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传播耶稣爱的福音。但是，通过他们的神圣宗教战争、政治迫害、宗教法庭、焚书和焚人的暴行和恐怖，他们传播的不是爱，而是古代的男性统治的镇压、劫掠和屠杀。

---

① 参见，例如，《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第61页；戴维斯：《第一性》，第420页。

② 参见《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第705、1032页；戴维斯：《第一性》，第420页。

③ 帕格尔斯：《诺斯替教派福音书》，第68页。

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耶稣的非暴力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他死在十字架上——变成了暴力和恐怖的统治。正如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所指出的那样，就其对耶稣学说的歪曲和滥用而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倒退。[①] 基督教现在再也不会威胁已确立的男性统治秩序了，实际上它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一样，由于都以精神启蒙和自由的名义起家，所以也变成了一种使男性统治秩序永存的强有力的方法。

然而，男女合作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远未结束。在男性统治的基督教——以及以它的名义统治欧洲的专制国王和教皇——的黑暗世纪内，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强烈要求恢复我们的文化进化的男女合作会重新出现。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不断的斗争已经是形成西方历史的未受注意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正在重新达到顶点。

① 参见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文明史》，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第4卷，《信仰的时代》，第843页。

第十章　过去的模式：男女合作论和历史

绝大多数学校所讲授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关于在男人之间和各民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历史就是战争的日期、国王和将军们的名字，他们有的建造要塞、宫殿和宗教纪念碑，有的则毁灭它们。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已经考察过的新材料和我们已经发展的新理论构架重新考察历史，那么，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就出现了。现在，在所有这些血腥的日期和姓名背后，可以发现某些与自然界相同的潜在过程[①]——科学家们（例如伊利亚·普利高津、伊莎贝尔·斯滕格斯、爱德华·洛伦兹，以及拉尔夫·亚伯拉罕），正在研究这一过程——波动，或明显无定型的运动；振荡，或周期运动；以及系统在临界"分叉点"上发生的转变；正如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所写的，这时"系统可以在多于一种可能的未来之间或当中进行'选择'"。[②]

从表面上看，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到贯穿全部历史的波动：从好战的时代到比较和平的时代；从专制主义的时代到更自由和更有创造性的时代；从妇女深受压迫的时期到至少某些妇女有广泛的受教育和生活机会的时期。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类波动没有真正使人惊奇的东西，只是实际存在的事实，未必有什么重大意义。

但是，这类波动真的只是随意的、无定型的运动吗？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历史波动存在着模式。从我们正在展开的

---

① 参见伊利亚·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4；爱德华·洛伦兹：《非规则性：大气的基本性质》，载于《地球》1984年第36A号，第98～110页；拉尔夫·亚伯拉罕和克里斯托弗·肖：《动力：行为几何学》，圣克鲁斯，航空出版社，1984。

② 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第169～170页。

观点来看，可以发现，战争时代通常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时代。比较和平的时代通常也是比较平等的时代，而且可能也是文化进化和高度创造性的时代。而且，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考察的话，那么，振荡或循环运动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我们发现，在这些循环运动的背后，是一种潜在的动态，迄今为止，这种动态只得到粗略或肤浅的研究。

如果我们从一种整体论的观点——不仅考虑男女两部分人类，而且考虑我们文化进化的全部历史——来考察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循环模式与我们考察过的基本转化有关：把我们置于一种根本不同的文化进化过程中的我们史前史的系统转化。而且，如果我们根据自然科学中刚发现的关于系统稳定性和系统变化的新原理，来考察在这种从伙伴模式的社会组织向统治者模式的社会组织转化之后所发生的情况，那么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明晰性，而且获得了一种新的复杂性。

正在研究系统过程的动力学的数学家谈到他们所使用的术语：**吸引子**。这些吸引子大致类似于磁体，它们可以是“点”吸引子或“静态”吸引子，这种吸引子控制处于平衡状态的系统的动态；“周期”吸引子控制循环或振荡运动；而“混沌”或“奇异”吸引子则是完全不平衡状态或非平衡状态的特征。[①] 混沌吸引子或奇异吸引子有些像古尔德和埃尔得雷奇的边缘孤立物，它们有时可能相对迅速和不可预料地成为整个新系统集结的核心。但是，当点吸引子丧失了它们的某些吸引力，而周期吸引子逐渐变得更有吸引力时，也可能发生比较缓和或比较“细微的”转化。[②]

同样，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谈到最初局限于系统某一小部分的波动。如果系统是稳定的，那么这些波动所表现的新功能模式就不会保存下来。但是，如果“创新者”增加得足够快，那么整个系统就可能采纳一种新的功能模式。[③] 换句话说，如果波动超过了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所说的“成核阀值”，那么它们将“传给整个系统”。由于这些最初的小波动被放大了，临界“分叉点”朝可能的系统转化的道路实际上就出现了。当达到这些分叉点时，“决定论的描述完结了”，而系统将选择哪一个“分支”或“将来”，就再也不可能加以预言了。[④]

---

① 亚伯拉罕和肖：《动力：行为几何学》。

② 亚伯拉罕和肖：《动力：行为几何学》。

③ 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第 189～190 页。

④ 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依次）引自第 187、176～177 页。

我们怎样才能把对自然过程的这些观察运用到社会过程中呢？在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大区别，社会系统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而且十分明显地存在着逐渐增大的选择成分。虽然把社会系统中所发生的东西还原为简单组织水平上所发生的东西基本上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切活的系统，那么，不仅控制稳定性而且控制变化的各级模式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同型性或相似之处就变得明显了。而且，如果我们从这种关于系统和系统变化的新进化观所提供的动力学观点来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可以开始系统地阐述一种关于文化转化的新理论，或者更明确地阐述男性统治的和男女合作的系统的变化。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波动绝非随机的，这些波动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在占优势的男性统治的系统内向伙伴关系模式的社会组织的“吸引子”的周期运动。在结构方面，这种周期运动反映在人类有组织的关系——尤其是人类男女两半之间的关系——的周期性变动之中。在价值方面，它反映在（从文学到社会政策的一切东西中）剑所象征的陈腐僵硬的“男性”价值和圣杯所象征的旧的温柔的或“女性”价值之间的周期斗争之中。

此外，可以从一种更广泛的进化观来看这些历史的动态。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人类文明形成的年代里，我们人类最初的文化方向是向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早期伙伴关系的或原始男女合作的社会模式发展的。我们的文化进化最初是由这种模式塑造的，并在高度创造性的克里特文化中达到了它的早期顶点。然后，产生了一个日益不平衡或混沌的时期。通过不断的入侵浪潮，通过剑和笔的逐步复制力量，男性统治首先充当了“混沌”吸引子，后来成了大多数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静态”吸引子或“点”吸引子。但是，在全部成文史中，特别是在社会不稳定时期，男女合作模式始终充当一种十分弱小但持久的“周期”吸引子。正如我们现在将重新加以考察的历史所表明的，就像一棵不管怎样常常被毁坏或被砍倒而拒不死亡的植物一样，男女合作始终企图重新确立它在阳光下的地位。

“女性”是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历史乃是互相冲突的力量的辩证运动，这种观念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

思等人的分析。阿诺德·汤因比、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阿瑟·施莱辛格和其他人也看到了历史的循环。[①] 然而，在通常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学中，尤其没有提及男女合作的上升时期和男性统治的倒退时期之间强有力的变动。因此，为了理解这种循环变动——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因为一个更加激烈的从和平向战争的转化可能是我们最近的转化——我们必须转向不落陈套的历史学家的著作。

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就是亨利·亚当斯。虽然在某些方面，亚当斯作为一个空想家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男人，他论证说，我们必须恢复一种更古老、更宗教化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亚当斯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对历史上一种强有力而传统上被忽视的“女性”力量的认识。亚当斯断言，“不理解性活动”，历史就是“单纯的卖弄学问”。他批评美国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提到一个妇女的姓名”，而且批评英国历史学“就像认为妇女是一种新的而且无法描述的物种那样胆怯地对待她们”。[②] 实际上，亚当斯的分析的主要突破点在于认为，西方历史上的文明化力量就是他所谓的圣母马利亚。他写道：“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不能像圣母马利亚那样建立沙特尔（Chartres）”，因为正是圣母马利亚才是“西方世界曾经感受到的最伟大的力量”。[③] 与圣母马利亚的积极力量相对立的是一种否定和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亚当斯称之为“狄那莫”（Dynamo，动力）或无法控制的无人性的技术的粗野力量。

亚当斯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男性统治的性成见与神秘观点的混合物。但是，一旦超越这些障碍而出现的东西，与我们已经认为是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统治者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或剑和圣杯所代表的两种权力观之

---

① 关于历史和经济的循环理论，参见，例如，沃尔特·考夫曼：《黑格尔：一种新解说》，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5；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西方的没落》，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26～1928；皮梯里姆·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危机》，纽约，达顿出版社公司，1941；R. 哈米尔：《康德拉季也夫周期是未来的浪潮吗?》，载于《未来学家》，1979年10月；阿瑟·施莱辛格爵士：《政治学的趋势》，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4；戴维·洛耶：《领导的激情》，旧金山，约西·巴斯出版社，1977。

②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纽约，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18，第441～442页。

③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纽约，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18，第388页。关于强调亚当斯高度评价“女性”的一个有趣的解释，见刘易斯·芒福德：《向亨利·亚当斯道歉》，载于《解释和预测：1922～1972年》，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73，第363～365页。

间的斗争，其实是相同的。实际上，亚当斯所说的圣母马利亚和狄那莫的象征主义十分接近圣杯和剑的象征主义。圣杯和圣母都是创造和养育的“女性”力量的象征；而剑和狄那莫则是残忍的、破坏性技术的“男性”象征。

根据所谓的女性价值和男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来分析历史的一位更加著名的先驱是 G. 拉特雷·泰勒，他写了一本《历史上的性》。[①] 但是，就像使用亚当斯的材料那样，我们在使用泰勒的材料时必须抛弃他说他在描述的东西，而采用他实际上在描述的东西。根据威廉·赖克[②]和其他心理学家——他们主要认为家长制社会是对性的压抑——的著名理论，泰勒认为，从对性采取宽容态度到对性采取压制态度的历史性周期交替，是在更自由、更有创造性的时期与更专制主义的、没有创造性的时期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③] 但是，他的书实际上用文献所证明的是，构成这些循环的基础的是在他本人所提到的确认母亲身份或者确认父亲身份的价值之间的转化。

实际上，泰勒的术语**母系制**或确认母亲的身份和**父系制**或确认父亲的身份——他不得不发明这些术语，是因为他缺少表达他正在研究的东西的词——描述了与**男女合作**及**男性统治**相同的结构。母系制时期是妇女和“**女性**”（泰勒称之为确认母亲身份）的价值获得较高地位的时期。这些时期的特点是更大的创造性、较小的社会和性压抑、更加重视个性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反之，在父系制时期，对妇女和女性的贬低则被大肆宣传。这些时期——当确认父亲身份的或“男性”的价值再一次上升时——是社会和性压抑更厉害，而不重视创造性的艺术和社会改革的时期。[④]

泰勒把法国南部的抒情诗人时期当做中世纪的母系制时期的例子——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一个男女合作重新复活的时期。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当时，12 世纪阿基坦的埃莱亚诺及其女儿玛丽和阿利克司的宫廷对于妇女彬彬有礼的爱和尊重，不仅是诗歌的主题，而且是生活的主题。[⑤] 妇女是强有力的和受尊敬的，而不是受统治的和被鄙视的；男人是可敬的

---

① 参见 G. 拉特雷·泰勒：《历史上的性》，纽约，巴兰坦图书公司，1954。

② 参见，例如，威廉·赖克：《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1980。

③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 5 章。

④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 5 章。特别参看第 81 页上父系制和母系制对比表格。

⑤ 关于（她的时代的）一部优秀的传记和历史，参见马里恩·米德：《阿基坦的埃莱亚诺》，纽约，霍桑图书公司，1977。还可参看罗伯特·布里福尔特：《抒情诗人》，布鲁明登，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5。

和有绅士风度的，而不是颐指气使和粗野的。这种抒情诗人的观点并不新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重复克里特和新石器时代的观点。但是，正如泰勒指出的，在男性的暴行和放荡乃是规范的时代，抒情诗人关于骑士气概、绅士风度、荣誉和浪漫爱情的观点的确是革命性的。

泰勒还阐明，抒情诗人的“女性”（或用他的术语，“确认母亲的身份”）[①] 价值毫无疑问地使西方历史深深地人道化了。这些价值后来不仅“在母系制上升时开花结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父系制也逐渐接受对弱者、儿童和妇女的绅士风度的理想，假如这些妇女属于自己的阶段”[②]。

关于抒情诗人，泰勒写道：“他们是创新者和进步分子，对艺术感兴趣，有时迫切要求社会改革；他们避免使用暴力；他们喜欢鲜艳华丽的服装。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圣母马利亚上升为他们的特殊保护人；他们的许多诗歌就是献给她的，而且在 1140 年，在里昂创立了一个新的节日——正如明谷的贝尔纳所反对的那样，一个为教会的习惯所不知道的、为理性所不同意的而且为传统所不承认的节日——圣灵怀胎节。”[③]

贝尔纳的指责——对于生育圣子的母亲的崇拜并没有得到传统的认可——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马利亚的崇拜是对古代女神崇拜的一种再现。而教会对于马利亚崇拜的狂热反抗，不仅是对这种早期宗教绵延不绝的力量的默认，而且也表现了父系制对于男女合作的价值——这种男女合作的价值代表了抒情诗人运动的特点——的强有力复活的反抗。

正如我们所读到的那样，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术语——**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代替泰勒的术语：母系制和父系制，那么，中世纪历史中似乎不可理解的许多东西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意义。可以认为，教会宣告妇女的从属和“沉默”地位，并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历史上的秘密宗教仪式，而是教会所拥有的男性统治和统治者模式的**最初**表现。如果要维持男性统治的规范和中世纪教会的权力，那么，顺从而沉默的妇女——以及耶稣最初所宣扬的“女性”价值——就是不可缺少的。

此外，中世纪历史另一个费解的方面获得了一种可以理解的——以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教会极其恶毒地诬蔑妇女——用《严惩邪

①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 84 页。
②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 91 页。
③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 85 页。

恶》（或《锤死女巫》，教会所庇护的宗教法庭审问官对女巫进行政治迫害的指导手册）中的话来说——是“一切罪恶的世俗根源”[①]。

在大多数历史书中，至多顺便提一下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对于女巫的断断续续迫害——当时，根据教会的命令，男人们性虐待狂地、骇人听闻地严刑拷打了数千甚至可能上万的“女巫”。在提到对妇女的这些野蛮迫害时——大多数妇女最后被宣判，极其痛苦地被慢慢烧死——常常被解释为群众歇斯底里的结果。我们被告知，从13~16世纪，欧洲农民简直疯了，或者女巫本人疯了——正如格雷戈里·齐尔布格所写的那样，“成千上万着了魔的和魔鬼缠身的女巫和男巫是一大群神经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②]。但是，正如巴巴拉·埃伦赖克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所指出的那样，“使女巫发疯的既不是一个执行私刑的政党，也不是歇斯底里的妇女所组成的自杀团伙。相反的，它是按着有计划的、墨守法规的程序进行的。迫害女巫是有组织的运动，由教会和国家发起、提供资金并具体执行的”[③]。

促成这些迫害的一个原因是，在13世纪，女巫开始给君主和贵族治病时，教会就已经开始培养男性“医生”（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受过实际的治疗训练）同传统的“女巫”竞争；这些妇女当时被指责拥有影响健康的“魔力”，而且由于她们犯了使用魔法给人治病的“罪”而常常被处以火刑。[④]

① 海因里希·克雷默和詹姆斯·斯普伦格：《邪恶的斧子》，蒙塔古·萨默斯译（伦敦，普希金出版社，1928），1490年经教皇特许作为对女巫进行政治迫害的宗教法庭审问官的手册第一次出版。

② 格雷戈里·齐尔布格，转引自巴巴拉·埃伦赖克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女巫、产婆和奶妈：妇女医治者的历史》，纽约，旧威斯特堡，女权主义出版社，1973，第7页。

③ 格雷戈里·齐尔布格，转引自巴巴拉·埃伦赖克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女巫、产婆和奶妈：妇女医治者的历史》，纽约，旧威斯特堡，女权主义出版社，1973，第7页。

④ 格雷戈里·齐尔布格，转引自巴巴拉·埃伦赖克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女巫、产婆和奶妈：妇女医治者的历史》，纽约，旧威斯特堡，女权主义出版社，1973，第10页。关于这个题目的卓越研究，还可参见温迪·福克纳：《医术和治疗权》，载于温迪·福克纳和埃里克·阿诺德主编《发明的窒息：妇女生活中的技术》，伦敦，冥王星出版社，1985。这份著名的文件片断所报道的研究表明，当教会开始在其所批准的大学里培养医生（不包括妇女）时，传统的治疗者（那时被指控为有“魔力”的产婆或“女巫”）必然首先受到怀疑，随之被消灭。同时还发布命令：在这些“女巫受审”时，应该请医生判定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好或坏）是自然原因的结果，还是巫术的结果。教会不仅卓有成效地排挤了妇女（包括有教养的妇女治疗者和农民妇女治疗者），而且同样成功地使这些妇女的许多古老的治疗方法丧失了信誉，例如，新鲜空气和沐浴。教会新培养的医生宣称这些方法是有害的。他们用开刀放血、水蛭吸血和有毒的泻药代替了女巫们的“烈性药物”。直到19世纪，男医生们一般仍然给病人开出这些“药方”。

另一个原因是——反映在这样的谴责中：在一个有组织的女巫大聚会上，异教徒在树林里碰头并和魔鬼结合——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明显地坚持较早的宗教信仰，可能包括对一个女性神祇和/或她的儿子或配偶——古代的公牛神（现在是长着偶蹄的魔鬼）的崇拜。但是，最多而且最明显的指责是对女巫性别的指责，因为在教会看来，所有女巫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她们“罪恶的”女性的性别特征。[①]

这种反常地把妇女看做一种性别的厌恶女人的观点，通常被说成是遭性挫折的男人们的不合理性。但是，教会在“道德上”谴责妇女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扭曲，而是为男性统治辩护——是男性统治制度对早期男女合作传统和男女合作浪潮再起的适当的（从这个词的本义来说也是合理的）反应。正如泰勒写到的，男女合作浪潮的再起威胁要“推翻父亲的权威”[②]。

换言之，官方批准的对女巫的迫害，以及教会对作为一种性别的妇女的指责，既不是古怪的现象也不是不相干的现象。它们首先是强加的，然后加以维护的男性统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反对重新复活男女合作所必需的，并在这种意义上是合理的手段。

在强调教会歇斯底里地反对女性和暴力镇压——这使“道德的”中世纪成了“尸骨存放所和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混合物”[③]——时，泰勒倾向于忽视教会谴责女性的基本上是反女权主义的特征。然而，他所提供的

① 《邪恶的斧子》的主题是，撒旦通过女性所起的作用，像他在伊甸园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宣称，“所有的巫术都来自妇女贪得无厌的色欲”，因此，“毫不奇怪，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受巫术异端的影响”……“赐福于我们的上帝保护男性免遭这种滔天之罪”（引自埃伦赖克和英格利希：《女巫、产婆和奶妈：妇女医治者的历史》，第10页）。介绍这种观点——“巫术”部分地代表了前基督教宗教的残余——的第一部著作是玛格丽特·艾丽斯·默里的《西欧的巫术崇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1）。现在得到相当广泛地承认的这种分析，部分地支持了朱尔·米什莱的《恶魔崇拜和巫术》（纽约，城堡出版社，1970）。关于另一部更新的讨论对女巫的迫害是压制妇女的一种手段的女权主义著作，参见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第一性》，纽约，企鹅图书公司，1971，第18章；玛丽·戴利：《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运动的元伦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8。关于重新解释巫术（巫术迷信）、其他治疗术和助产术的自然宗教的某些著作，参见斯塔霍克：《梦见黑暗：魔术、性和政治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82；马戈特·艾德勒：《堕落的月亮：今日美洲的女巫、巫师、女神崇拜者和其他异教徒》，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81；斯塔霍克：《蛇形舞》，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79。

②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77页。

③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126页。

资料无疑只会被教会认为是“异端”。泰勒反复证明，把教会极其残酷地加以迫害的各个异端教派的共同思路是他们都承认所谓的女性价值。这些教派的特点是把圣母马利亚作为我们的女思想家来崇拜。而且和早期基督教教派——这些早期基督教教派在那个时代男女合作的复活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们常常也给予妇女高级地位，甚至领导地位。[①]

正如泰勒本人所写的那样，“我们必然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教会的确——不管是多么模糊地——感觉到存在着把抒情诗人、卡德尔教派、巴加德教派和各种小教派——他们都宣扬一种纯洁的爱——团结在一起的某种共同因素呢？……答案只能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的因素：……虽然他们的教义和仪式完全不同，而且他们之中有些教派仍主张留在教会内，但在心理上，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确认母亲的身份。这是中世纪教会真正感兴趣的唯一异端”[②]。

历史本身的重复

在《历史上的性》中，我们看到，中世纪教会的基本性质是父系制，或确认父亲的身份——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男性统治的或统治者的特征。我们也开始看到，在历史的摆动背后，存在着统治者价值和伙伴关系价值之间特有的冲突。

例如，泰勒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当一位妇女——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坐在英国王位上时，“确认母亲身份的”或“女性的”价值正在上升。在伊丽莎白的英格兰，有“一颗对别人负责的清醒的良心，例如，表现在济贫法的制定上”；也存在着“一种对自由学习的爱，表现在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建造学校上”，而且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力量，尤其表现在英格兰更喜欢的艺术形式诗歌和戏剧上，但也表现在绘画、建筑

①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99～103页。因为他们把妇女看做平等的人类，所以友谊或两性之间非性欲的联系便成为卡德尔教派的一个原则。一个讽刺性的结果是，官方教会却激烈谴责“纯洁的爱”或“无私的爱”。教会谴责这些“异教徒”，他们遵循基督的学说，把他们的教会叫做**爱的教会**，他们不仅希望通过节育消灭人类的种族差别，而且想消灭一切形式的性反常行为。

②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125页。

和音乐上”。[1]

同样有意义的——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用系统论的术语来说，重要的——是在男女合作重新恢复活力的时期，例如，伊丽莎白时代、抒情诗人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上层阶级的妇女相对说来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2] 例如，波蒂娅和莎士比亚剧中的其他女主角都是著名的博学妇女，这反映了那个时期妇女较高的地位。但是，正如莎士比亚在《驯悍记》中对异端反叛的凯特的处理和其他文学作品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在伊丽莎白时代即将结束之前，用暴力重新肯定男性统治就已经进行了。

事实上，最说明钟摆向回摆动的标志之一是憎恶女人的教义的复活。伴随着引入为妇女的从属地位辩护的新“事实”——这是泰勒所谓的“早期教会领袖永恒的自我欺骗”的一个信号，“他们设想，行为的标准正在

① 泰勒：《历史上的性》，第151页。

② 在女权主义学者中间，仍然在争论琼·凯利－加多尔的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妇女是否甚至有过一次文艺复兴（凯利－加多尔：《妇女有过一次文艺复兴吗?》，载于《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雷纳特·布里登撒尔和克劳迪娅·孔兹主编，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77）。早期的伯克哈特—比尔德思想学派认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玛丽·比尔德：《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妇女》，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6，第272页）。鲁思·凯尔索和凯利－加多尔现在证明，妇女实际上失去了基础，而在封建社会时期处境较好。的确，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妇女，如著名的阿基坦的埃莱亚诺及其女儿香巴尼的玛丽，拥有一点点独立地位（虽然埃莱亚诺曾被她的丈夫监禁了许多年），而且在发展和传播尊重而不是贬低妇女的抒情诗人的理想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E. W. 蒙特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关于妇女在中世纪是否实际上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参见，E. W. 蒙特：《柱脚和标桩》，载于布里登撒尔和孔兹：《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第125页）。同样的，正如凯利－加多尔所指出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像卡斯蒂利奥内这样的正统作家利用几个著名的例外，如卡特琳娜·斯福尔扎，鼓吹妇女教育平等，反对妇女只充当家庭角色的资产阶级观念，而且至少谴责了双重的性别标准，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贵妇不可能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力量。换言之，在任何时期我们都没有发现从属于男人的妇女的状况有任何基本的改变。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封建抒情诗人时期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更加“女性化的”人道主义价值都努力冲在前头。我们也看到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选择的机会，或者至少对她们从属于男人的状况直接提出了某种挑战（例如，向对妇女的性奴役和中伤提出了挑战）。抒情诗人对妇女的理想化，对妇女性独立的歌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妇女教育平等的理想就是例证。但是，我们最终所看到的是，向牢固的男性统治秩序（不管它是封建的，还是中央集权的，是13世纪的，还是15世纪的）冲击的男女合作潮流的失败。我们还看到，这种持久的和周期性高涨的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之间的冲突今天仍然继续进行着。

衰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把“确认父亲身份的”社会准则再次强加于社会。[①]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更具有压迫性、更血腥的男性统治的倒退时期即将来临的早期警告信号。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心理学家戴维·温特最近的著作。与其他著名的现代学者一起，温特在他的《权力的动机》一书中研究了他所谓的“权力动机”。[②] 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试图通过客观的测量来揭示历史的模式。虽然我们必须再次抛开温特所强调的传统的男性中心心理学观点，但是，他的发现用材料令人激动地证明了，对妇女采取更加高压的态度预示着侵略战争时期的来临。

温特的社会心理分析主要以研究文学作品中某些经常出现的主题为基础，他集中研究了文学和歌剧中的一个最著名的浪漫人物——打扮漂亮、“专门勾引女人”的唐璜。温特指出，虽然必须谴责唐璜的行为是“恶劣”而“下贱的”，但是，唐璜实际上被理想化为“西班牙最伟大的诱奸者”，他还指出，侵犯、憎恨、渴望羞辱和惩罚妇女——而不是性的冲动——是唐璜的深层动机。他进一步指出了某种具有深刻的心理学和历史重要性的东西：对妇女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妇女

---

① 参见泰勒：《历史上的性》，第126页。从历史上看，涉及作为男性统治的关键的男性统治者/女性被统治者的人类关系模式的任何基本改变，用暴力重新强迫接受男性统治都是特别重要的。换言之，试图提高妇女地位（以及伴随这种地位的“女性”价值）的一切历史努力只能被允许到这样的程度而不能更进一步，如果要维持男性统治制度的特点的话。因此，对妇女受统治的地位的任何基本改变都必然遭到殊死的反抗。这并不是说，任何时期的男女合作的高涨从一开始并没有遭到男性统治的反对。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在男女合作更强和男性统治更强的时期之间的选择中反复看到的是，当男女合作的潮流上涨时、男性统治的反抗也随之加强，最终导致一个更加严厉的男性统治时期，至少暂时是这样。例如，激烈反对教会领袖的绝对权威，而且激烈反对通过教士的纯洁理想贬低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的新教改革，似乎暂时允许对妇女的地位作某些改良。实际上，某些进步的天主教人道主义者——他们是宗教改革的先驱，例如，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鼓吹妇女教育并教导说：“基督的学说并没有抛弃年龄、性别、生活中的运气和地位”（伊拉斯谟：《帕拉舍尔苏斯》）。此外，推动工业革命的技术改革开创了这个社会和经济上升的时代，此时，制度和角色发生基本变化已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清教主义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惩罚性的男性统治控制一切的时期，因此，无论在妇女的从属地位方面，还是在这种新的制度化的基督教基本等级特点方面，最终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关于特别重视妇女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有趣的概论，参见谢林·马歇尔·温特杰斯：《宗教改革时代的妇女》，载于布里登撒尔和孔兹：《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

② 参见戴维·温特：《权力的动机》，纽约，自由出版社，1973。

受到男人极其严厉的压制。他所引证的与题目有关的典型例子是，在上层西班牙人接受了“摩尔人的习惯而把他们的女性眷属隐蔽起来”时，西班牙产生了有关唐璜的传说。[①] 温特解释说，这种明显的敌意背后的心理学原因是，在这个时期，母子关系——以及一般的男女关系——变得特别紧张。[②]

联系起来看，温特的“权力动机”显然是——用我们的术语来说——男性统治企图征服和君临其他人类。在确认了唐璜对妇女的贬低是这种“权力动机”的表现之后，温特接着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中经常出现有关唐璜的故事与帝国扩张和战争时期有关。他的发现所证明的是我们可以用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互相交替的模式所预言的东西；在历史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日益加强的时期之前和之中，有关这个最著名的男性统治妇女的原型的故事层出不穷。

温特断言，用系统的术语来说，男性统治必然与男性战争暴力相关。他还断言，诸如凯特·米利特和西奥多·罗斯扎克等先驱的女权主义学者早就看到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互相交替的一个方面：男性至高无上地位的重新理想化，标志着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的转向——这种社会准则和行为在历史上促使男性统治重新诉诸暴力。[③]

米利特的优秀著作《性政治学》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她直觉地发现了我们政治历史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男性统治。而罗斯扎克虽然因他对社会传统的男性中心论的分析而十分出名，但是，他的论文《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该文从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系统变迁的发展理论的观点分析了历史。[④]

为了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大屠杀中怎样达到顶点的逐步升级的暴力和军国主义，罗斯扎克用心体会了上百部研究著作的言外之意和本质，他发现了他所谓的“男性统治的历史性危机”[⑤]。他指出，19 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仅向男性统治而女性服从这种传统的关于两性的陈规陋习

① 参见戴维·温特：《权力的动机》，纽约，自由出版社，1973，第 172 页。

② 参见戴维·温特：《权力的动机》。

③ 参见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学》，纽约，双日出版社，1970；罗斯扎克：《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载于《男性和女性》，贝蒂·罗斯扎克和西奥多·罗斯扎克主编，纽约，哈泼·科洛风出版社，1969。

④ 参见罗斯扎克：《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

⑤ 参见罗斯扎克：《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第 90 页。

发起了挑战，而且因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它也向流行的制度提出了大规模的面对面的挑战，直指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我们通常的历史著作很典型地几乎没有报道这场19世纪的挑战。但是，它作为我们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带有同情心的辩护。因为它不仅向男人对妇女的传统统治宣战，而且也向我们的制度的最基本价值宣战，在这种制度中，像温柔、同情与和平等品质被认为是女性的，完全不适合真正的或“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而且完全不适合社会的管理。[①]

男性统治制度对于这种挑战的回答是用暴力重新肯定男性的陈规陋习及其所有的表现。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世纪初的情形，正如罗斯扎克所写的那样，“那个时期的政治风气充满了以势压人的男人味”。在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大谈“不好战和孤立的自由主义的弊端”，以及“男子汉的和冒险的美德”。在爱尔兰，革命诗人帕特里克·皮尔斯宣称“流血是一件纯洁而神圣的事情，而认为流血是一种最后的恐怖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它的男子气”。在意大利，菲利普·马里内蒂宣称：“我们一心要完成光荣的战争，只有战争使世界健康！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毁灭性武器！蔑视妇女！”[②]

与唐璜的神圣传说一样，这种对于妇女和所有被认为是女性的东西的蛮横蔑视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要旨（正在渗入超越一切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的著作中去）是，向一个“不好的”和“非男子气的”世界——一个不再由**男性的**剑统治的世界——的转化是不能被容忍的。

通过研究所有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的本质，罗斯扎克证明了男人们——这些男人在本世纪初和全部历史的转折时期把世界投入了战争——有一种基本的共性。这就是，男人就是暴力。如果要维持一种以暴力为基础划分等级的制度，那就必定需要暴力：他还明确地肯定了温特在其著作中所看到的推动力：重新把“男性的”陈规陋习理想化，不仅标志着价值的一种倒退转化，而且标志着一种从和平向战争的转化。

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伦的研究同样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种仍然被普遍忽视的社会推动力。在《权力：内在的经验》中，麦克莱伦报告他如何

① 参见罗斯扎克：《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特别参看第102页。

② 罗斯扎克：《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特别参看第102页。前两处引文从第92页开始，第3处引文从第91页开始。

试图通过在讨论以前时代的著作和论文的过程中寻找指示器，以便发现人们是否可以预言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①] 他的研究成果证实，运用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的历史模式，我们可以预言什么在指引历史变动。

麦克莱伦研究了美国历史上的文学和历史材料。他发现，在他所谓的“亲缘动机”获得力量的时期之后，紧接着的是和平时代。例如，麦克莱伦发现，在 1800～1810 年和 1920～1930 年的和平年代之前，“亲缘动机”（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更加“女性的”和平和同情的价值）增强了。[②] 反之，在各种著作再一次显示出向我们所谓的“帝国权力”动机（我们称之为“男性”统治者的动机）转化的时期，几乎总是在战争中达到顶点。在英国的历史上，在历史的暴力时代（例如，在 1550 年、1650 年和 1750 年）之前也有一种强烈的“帝国权力”动机和脆弱的“亲缘动机”的结合。[③] 另一方面，在英国的历史上，在比较和平的时代之前，是脆弱的权力动机和强烈的亲缘动机的时期。

与泰勒的著作一样，麦克莱伦证实了另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作为合作关系的社会模式特点的“更温柔”、更“女性”的价值，乃是一种强调创造而不是强调破坏的特殊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克里特令人喜爱的壁画和宫殿中，以及在泰勒所谓的母系制时代（例如伊丽莎白时期）所看到的那样，男女合作较好的时期也是独特的伟大的文化创造时期。

麦克莱伦为了简化他的动机体系，把亲缘需要归为“n 亲缘”，权力需要归为“n 权力”，等等。根据这些术语，他观察到，“伊丽莎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动机指示器完全证实了这个时期必定是一个美好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正如历史学家一直证明的那样。亲缘需要已经增加，权力需要已经下降，这象征着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而且成就斐然，预示着某种繁荣”[④]。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向较高水平的文化进行的运动，在流行的男性统治制度下，只能发展到这种程度，而不会进一步前进。为了维持这种男性统治制度，必须使文化倒退，再一次把这种制度投入男性统治的暴力“规范”的动力学之中。

---

①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权力：内在的经验》，纽约，欧文顿出版社，1975。

② 戴维·麦克莱伦：《权力：内在的经验》，纽约，欧文顿出版社，1975，第 340 页。

③ 戴维·麦克莱伦：《权力：内在的经验》，纽约，欧文顿出版社，1975，第 324 页。

④ 戴维·麦克莱伦：《权力：内在的经验》，纽约，欧文顿出版社，1975，第 320～321 页。

使我们在其书中对富有特色的男性统治制度的结构的考察更加圆满的是，麦克莱伦的分析还证实，在侵略性的权力动机再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制度的第三种主要组成部分——独裁主义——得到了加强。他写道："低落的亲缘需要和强烈的权力需要的结合，在现代国家里已经和专政、残暴无情、对自由的镇压，以及国内和国际暴力联系起来了。"[①]

新的女权主义学术著作还以新的说明方法集中研究了权力问题。著名的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和精神分析学家琼·贝克·米勒的优秀著作证明：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亲缘**如何与女性结合，而**权力**——在通常意义上指统治他人的权力——如何与男性结合。[②]

这些著作也揭示了其他极其重要的东西：麦克莱伦所谓的亲缘、泰勒所谓的母系制，以及我们所说的男女合作的价值结构。在男性统治的制度中，一般被限制在一个被隔离的世界即妇女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服从或从属于更大的"男人的"或"现实的"世界。

正是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男女合作作为**可以授予的权力**的定义，这种权力赋予并创造了古代伙伴关系的十分富有特色的精神气质。正如米勒所指出的，这仍然是妇女把权力规定为母亲帮助她们的孩子，特别是她们的儿子发展他们的才干和能力的职责的方式。[③] 正是在这里，伯纳德所谓的"女性的爱和职责的精神气质"仍然是思想与行动的主要模式——但只对妇女是如此。[④] 而且正是在这里，同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吉利根所说的对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明确职责加以关心的女性道德。[⑤]但是，同样的，它只是那些不想统治社会的人——妇女——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考虑到这些关于通常被忽视的人类的一半的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开始看到的是，如何可以根据亲缘或**联系**的男女合作的价值的衰落，以及相关的侵略的权力，或以暴力划分**等级**的男性统治的价值的增强，来预言战争

① 戴维·麦克莱伦：《权力：内在的经验》，纽约，欧文顿出版社，1975，第 319 页。

② 杰西·伯纳德：《女性世界》，纽约，自由出版社，1981；卡罗尔·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呼声》，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妇女和权力》，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

③ 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妇女和权力》。

④ 伯纳德：《女性世界》。

⑤ 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呼声》。

和镇压的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表面上难以理解的转折——它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常常中断——的背后，存在着对于我们的文化进化的根本性抗拒：一种占人类一半的妇女在其中被统治并受压制的社会制度。

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但是，如果这些男性统治/男女合作的制度的动力学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它们只得到这么少的正规研究呢？事实上，既然妇女是我们人类的一半，那么，为什么她们的行为、能动性和观念只得到这么零乱的研究呢？我们再次面对这些忽略中的一个忽略：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对未来的时代感到惊奇。

对人类社会进行一种整体论研究的大门迄今为止还只打开了一条细缝。当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正如小林恩·怀特所说的那样——对历史的记载是具有选择性的，其特点是由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来撰写，为了他们的利益记录他们的事迹，这时，这扇大门才会打开一条大缝。但是，只是现在——在开始严肃地考虑历史上所忽视的占人类一半的女性时——我们才可能开始发展一种新的历史理论和一种新的文化进化理论，这种理论考察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

毫不奇怪，我们传统的历史学有意删去了任何与妇女或“女性”有关的内容，不久以前还没有一所美国大学有妇女研究教学大纲。在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学和小学里仍然没有这种课程。甚至现在，在开设妇女研究课程的地方，在等级森严的高等院校和大学里，妇女研究课程得到的预算也很少，地位低下，甚至没有任何优先权。只在屈指可数的地方，妇女研究被当做一门必修课。因此，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很难相信，曾经存在过任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妇女，或者不会相信，任何妇女和女性价值这样表面的东西——不仅对我们的过去，而且对我们所展望的更美好的未来——可能是一种核心力量。

玛丽·比尔德的《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是20世纪首批这样的著作之一：它试图纠正这种病态的、把妇女从通常被写成历史的史料中删掉的做法。[1] 通过证明，尽管男性占统治地位，但妇女实际上曾经是西

---

[1] 参见比尔德：《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方社会的重要创造者，这位开创性的女历史学家指出了一条回到史前时代——那是失去了的人类遗产的源泉——的道路。这里特别有关的是比尔德所提供的某些重要文献，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文献似乎可能比温特和麦克莱伦所证明的“女性”和“男性”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基本的历史选择更令人不能容忍。这些文献所证明的是：妇女地位上升的时期是文化重新恢复活力的特别时期。

从我们已经展开的文化形态转化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理所当然地发现妇女的地位与一个社会是和平的还是好战的、是关心人民福利还是不关心社会是否公正，以及是等级制还是平等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个社会中构成人类两半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具有深刻的而且是高度可预言的、系统的意义。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没有任何这样的理论框架，但是在20世纪初开始写作的比尔德仍然能够发现这些模式，而且评论了它们，这是西方历史上不多见的描述妇女活动的尝试之一。

在《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一书中，比尔德评论了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妇女在推动人文主义学说方面所进行的广泛和有影响的活动”。她指出，这是一个妇女——以及艺术表现和艺术探索等“女性”价值——开始把她们自身从中世纪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代。她证明，在17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代，妇女同样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发动了针对比尔德所谓的旧政权的“野蛮和弊病”的世俗反叛——正是在朗布耶夫人、尼农·德·朗克洛和若弗兰夫人等妇女的“沙龙”里，后来成为更人道的，或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更男女合作的现代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萌芽。[1]

这并不是说，妇女没有同样帮助保持当权的男人和“男性”价值。尽管普天之下英雄辈出，但是妇女在有文字记载的过去的作用，必然主要是男性统治规定的男性“助手”的作用。但是，正如比尔德反复证明的，虽然妇女帮助男人打仗，而且有时甚至和男人并肩战斗，但是，一般来说，她们的作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因为没有社会化的粗暴、侵略和适合进行征服的气质，所以妇女在她们的生活、行动和观念上“比较温柔”，

---

[1] 参见比尔德：《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第255、323～329页。

即较少的暴力和较多的同情和关心。例如，正如比尔德所评论的，“荷马所创造的歌颂战争、仇恨和复仇的不朽的赞美诗集最早的——而且也许是第一个——对手，是一位被她的人民称作萨法的伊奥利亚妇女的诗集，而后来她的人民都知道她叫萨福”①。

我们还在另一部集中研究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开创性著作——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的《第一性》——中发现了这种见解。② 与没有公共机关或有学问的同事的支持而试图重写她们的过去的其他许多关于妇女的书一样，戴维斯的书曾因稀奇古怪——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深奥，那么就是异想天开——而受到批评。但是，尽管这些书有缺点——也许更正确地说，因为它们的确不符合公认的学术传统——但它们直觉地预示了一种对历史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妇女的地位和所谓的女性价值将成为中心。

和比尔德的书一样，戴维斯的书把妇女放回到男性统治论的历史学家把她们从其上抹掉的地位上。它还提供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压迫女人和贬低女性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戴维斯把伊丽莎白时代和随后的清教徒的倒退进行了对比，清教徒用恶毒的手段镇压妇女，包括烧死“女巫”。

但是，恰恰主要在今天那些更名副其实的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我们才能找到充实并发展一种关于男女合作和男性统治的转化和选择的新整体论理论所需要的资料。这就是下面这些妇女的著作，例如，雷纳特·布里登撒尔、格尔达·勒纳、多萝西·丁纳斯泰恩、埃莉诺·李柯克、乔安·麦克纳马拉、唐娜·哈拉维、南希·科特、伊丽莎白·普莱克、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苏珊·威普尔、琼·凯利－加多尔、克劳迪娅·孔兹、卡罗琳·麦钱特、玛里琳·弗伦奇、弗朗索瓦兹·德·奥博纳、苏珊·布朗米勒、安内特·埃利希、简·雅奎特、卢尔兹·阿里兹普、高群逸枝、雷娜·拉普、凯思琳·纽兰、格洛丽亚·奥伦斯坦、贝蒂娜·阿普特克、卡罗尔·杰克林、拉·弗朗西丝·罗杰斯－罗斯，以及男人们的著作，例如，卡尔·德格勒、P. 斯蒂文·桑格伦、莱斯特·柯肯德尔和伦道夫·特朗巴赫，他们——艰苦地常常使用不引人注目的、难以找到来源的、如妇女的日记和其他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记载——正在逐步地

① 比尔德：《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第 312 页。

② 参见戴维斯：《第一性》。

开拓一部难以相信的、被忽视的另一半历史。[1]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提出构成一种历史范式所需要的那些过去没有发现的材料，只有理解了这种历史范式，人们才能超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不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因为正是在新的女权主义的学术著作中，我们开始看到法国哲学家夏尔·傅立叶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注意到的某些事物背后的合理性：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志。[2]

女性的精神气质

我们已经看到，在严格的男性统治时期，温柔的、更“女性的”价值被相当严格地限制在妇女顺从的世界，即男人统治家庭的私人领域。反之，我们看到，在男女合作上升的时期，这些价值推广到更多的公众中或男人的世界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现在，新女权主义的学术成果可以证明，这种进步之所以取得并不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周期性的和不可抗拒的原则或“命运”（例如，亚当斯所并列的“圣母”和“动力”）。这种成果的取得是由于一个非常简单而实际的理由，这个理由对于那些把妇女包括在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中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妇女并没有被严格限制在家庭的私人领域的时代和地方——在她们作为“女性精神气质”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可以更自由地进入公共领域即群众中去的时代——她们把一种更强调男女合作的世界

① 参看，例如，布里登撒尔和孔兹主编《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埃利斯·博尔丁：《历史的下面》，哥伦比亚，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1976；南希·科特和伊丽莎白·普莱克主编《她自己的遗产》，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79；纳瓦尔·埃尔·萨达威：《遮住了面孔的夏娃：阿拉伯世界中的妇女》，伦敦，ZED 出版社，1980；格尔达·勒纳：《多数人发现了他们的过去：置身于历史中的妇女》，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拉·弗朗西丝·罗杰斯－罗斯：《黑人妇女》，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塞奇出版社，1980；马撒·维西努斯主编《忍气吞声：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布鲁明登，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2；苏珊·莫舍·斯图尔特主编《中世纪社会中的妇女》，费城，罗特利杰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84；玛里琳·弗伦奇：《超越权力：论妇女、男人和道德》，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85；卡尔·德格勒：《争执：从革命到现代美国的妇女和家庭》，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莱斯特·柯肯德尔和阿瑟·E. 格拉瓦特主编《2020 年的婚姻和家庭》，布法罗，普罗米修斯图书公司，1984。上述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时代和地点考察了妇女地位的变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而已。

② 夏尔·傅立叶，转引自希拉·罗博瑟姆：《妇女：反抗和革命》，纽约，文特奇出版社，1974，第 51 页。

观引入了社会的主流。

正如我们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后来的耶稣时代所看到的那样，妇女实际上在改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过伟大的作用。但是，也许最明显的情况是，现代最深远的人道化社会运动——除了在女权主义的原始资料中——也几乎完全被忽视了。这个运动就是女权主义运动，它首先在19世纪点燃，而现在在20世纪又一次被点燃。

尽管即便这种运动一般也被我们的标准历史教科书所忽视，然而诸如露西·斯通、玛格丽特·富勒、玛丽·莱昂、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 安东尼等人的上百部不出名的或被忽视的著作，显然大大改变了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地位。在家庭事务上，这些现代女权主义的“母亲们”把妇女从赞成殴打妻子的法律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她们帮助妇女摆脱赋予丈夫支配妻子的财产的法律。她们向妇女开放了像法律和医生这样的职业，并为妇女赢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因此极大地丰富了她们的生活和她们家庭的生活。[①]

但是，在把妇女从男性统治的明显压迫形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19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仍然以另一种方式——特别是，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标准历史教科书，这种方式就变得更明显——推动了我们时代的男女合作。在使更多的妇女能够在她们的家庭之外的世界至少获得部分立足之地的过程中，这个运动广泛地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人道化了。因为正是由于许多妇女所体现的“女性精神气质”的影响（这些妇女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简·亚当斯、索杰纳·特鲁思和多萝西娅·迪克斯等，她们现在正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公众世界”），出现了有组织的护理和社会工作等新的职业，解放奴隶的废奴主义运动获得广大基层群众的支持，对待精神病患者和精神有缺陷的人就更人道了。[②]

此外，正是这种由亲缘关系而不是由以暴力为基础的等级制所决定的更“女性”的或伙伴关系的人类关系的观点，通过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传到了社会的主流之中。与19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一样，妇女解放运动

① 参见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一个世纪的斗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属的贝尔纳普出版社，1959。

② 参见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一个世纪的斗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属的贝尔纳普出版社，1959。还可参看博尔丁：《历史的下面》；卡罗尔·海莫威茨和米歇尔·韦斯曼主编《美国妇女史》，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78；鲁思·布林：《妇女的贡献：社会改革》，明尼阿波利斯，狄龙出版社，1977。

也极大地改进了妇女的境遇。同时，当技术的变化正在日益使妇女从家务的从属角色变成劳动力的从属角色时，妇女解放运动迫切要求制定在家庭内外保护妇女的新法律。但是，这种现代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通过把一种更高程度的男女合作意识引入曾经牢固地处于男人控制下的活动领域，再次彻底改变了妇女和男人的地位。

正如19世纪妇女在解放黑奴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妇女在20世纪再次为巩固黑人的公民权提供了有力的来自基层的支持，甚至为此而死。同样的，今天遍布整个西方世界的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组织——它们正试图创造一种更公正、更和平的与生态和谐的社会秩序——主要是由妇女组成的。[①]

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女合作的价值带人了公众生活。例如，个别妇女——她们偶然把这种价值带人了男性等级制度的最高层，如英迪拉·甘地，或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所以经常这么做，正因为她们在证明自己并不是十分“温柔”或“女性”。而且，许多男人今天显然也在为社会进步与和平而工作，就像他们在男女合作重新恢复活力的其他时代中所做过的那样。但是，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之一是，这些时代是更加女性化的价值（以及妇女）很少“被私人化”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拒绝那种认为越南战争是“爱国的”和“高尚的”的“男性”观念——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这不仅是一个许多妇女拒绝待在男子家庭的私人领域里的时代，而且也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许多男人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的”陈规陋习——特别是在他们的公众行为中，“真正的男子汉”不能是“女人气的”，即彬彬有礼、温和而关切的。

这并不是说，在妇女地位的变化和“女性”价值的上升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到大多数妇女强有力地要求或得到任何利益时，男性统治往往已经在进行反抗了。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主流文化时期，年轻男子否认战争是“英雄的”和“男子汉的”，而且转向更女人气风格的服装和发型，而妇女在权力平等方面大获其利。但是，在旧的性陈规陋习受到强有力的

---

① 参看，例如，理安·艾斯勒：《妇女与和平》，载于《妇女论坛》，第16~18页；博尔丁：《历史的下面》。史学家格达·勒纳指出："迫切需要对妇女社区建设作出历史的解释。"（《多数人发现了他们的过去》，第165~167页。）

挑战的同时，所谓的保守的和男性的反抗力量正在反平等权利修正案派、道德多数派和其他右翼团体中聚集起来。同样，在文艺复兴和伊丽莎白时代，我们发现了强大的男女合作的复活潮流，我们也发现了同时发生的男性统治反抗的明显征兆。一方面，可以看到一种统治阶级的妇女享受平等教育的趋势。伴随这种趋势，我们在像克里斯廷·德·皮桑的《妇女城市之书》这样的作品中发现了现代女权主义文学的萌芽。[①] 另一方面，对妇女的诬蔑中伤也尖锐化了，新的法律限制了她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且一种文学流派致力于表现安分守己的“女性的”——即顺从的——妇女。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最后的基本观点。尽管在男女合作的上升时期，男性统治的基础削弱了，但是直到现在妇女的服从地位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相应的，一直与妇女相关的价值——如亲缘、关心和非暴力——的服从地位也是这样。

界线的终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男性统治制度的第一条“防御”线就是重新肯定男性统治。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发现，一种趋向更严厉压制妇女的倒退预示了一个普遍压迫和血腥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正如麦克莱伦、罗斯扎克和温特的研究十分生动地证明的那样，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结论：除非对妇女及亲缘关系的压制与关心他人等价值之间的系统关系最终得到缓解，否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战争走向另一个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时期。

麦克莱伦的研究证明，暴力主题在文学和艺术中的泛滥预示了战争和压迫的时期。温特关于强奸犯唐璜的研究则证明，压制妇女的暴力主题是一个甚至更加特殊的关于暴力和战争的预示器。今天，反对妇女的暴力不仅在小说，而且实际上正在全世界大规模泛滥。

从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向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激进主义的仇恨妇女的教义严重倒退的痛苦中。在文学和电影中，有关对妇女施加暴力，以及有关谋杀妇女者和强奸犯绘声绘色的描写空前泛滥，早期文学

① 关于克里斯廷·德·皮桑的《妇女城市之书》在这方面的卓越讨论，见琼·凯利：《早期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的怨言（1400～1789）〉》，载于《符号》第8期（1982年秋），第4～28页。

(《驯悍记》或《唐璜》)中的暴力与之相比则显得淡而无味。同样空前未有的是,赤裸裸描写色情的文学无孔不入,四处扩散;通过金钱的魔力,通过书籍、报刊、连环漫画、电影,甚至有线电视进入家庭,大肆宣扬着这样的信息:性快乐就在于对女性实施暴力、野蛮、奴役、折磨、残害、羞辱和贬损。[①]

正如西奥多·罗斯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增加记录罪行的术语——**从重惩处**,打断骨头的家法,用火烧妻子,挖出她的眼睛等[②]——标志了对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抗。因为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暴力反对妇女一直是男性统治制度对于任何进行根本变化的威胁的反应,随着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而来的是以暴力对待妇女的巨大浪潮。例如,印度的火烧新娘,伊朗的公开处死,拉丁美洲的监禁和拷打,世界范围的殴打妻子,以及全球的强奸恐怖行为——学者们估计,美国现在平均每13秒就发生一起强奸案。[③]

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来看,今天不难看到反对妇女的大规模野蛮暴力的系统功能。如果要维持男性统治,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压迫妇女。而且这种暴力——以通过复活诬蔑妇女的宗教和用屠杀、强奸和折磨妇女满足性快感所煽动的暴力——之所以在整个世界正在增加,那是因为男性统治遭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争取人类解放和互相支援的合作的妇女运动的强有力挑战。[④]

全世界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包括上百万成员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从官方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到美国的全国妇女研究协会、全国妇女组织以及老年妇女联合会等各级团体——全都致力于改善妇女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个联合国妇女十年委员会。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全球性的会议,吸引来自全世界四面八方的成千上万妇

① 参见,例如,劳拉·莱德勒主编《取消黑夜》,纽约,W. 莫洛出版社,1980。

② 罗斯扎克:《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

③ 参见,例如,卡里尔·雅各布斯:《暴力的模式:从女权主义观点论关于色情文学的法规》,见《哈佛妇女法律杂志》1984年第7期,第5~55页;还可引用联邦调查局的数字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犯强奸罪的人数增长了95%以上,即便把妇女多报的强奸数字打个折扣,这个数字仍表明强奸罪十分严重。把性快乐等同于暴力对待妇女的日益泛滥的色情文学(反映了男性统治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抗)和强奸罪的增加有关。

④ 参见,例如,理安·艾斯勒:《暴力和男性统治:定时炸弹》,载于《社会中的人性》第7期(1984年冬—春),第3~18页;艾斯勒和洛耶:《和平和女权主义理论:新方向》,载于《和平建议公报》1986年第1号。

女讨论男性占统治地位所引起的问题。在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来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妇女前所未有地欢聚一堂，为一个性平等、发展及和平——首届联合国妇女十年委员会的三个目标——的未来而工作。[①]

妇女和男人日益认识到，这三个目标和我们一直在考察的来自直觉感受的那种动力有关。因为一旦男性以暴力反对妇女的做法被发觉，就不难看出，男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他们必须统治那些身体没有他们强壮的妇女——同样会认为他们的“男子”职责就是征服弱小的男人和民族。

但是，以国防的名义（如在美国和苏联）或者以上帝的神圣名义（如在伊斯兰世界）进行战争和备战，不仅有助于加强男性统治和男性暴力，而且就像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所表明的那样，也加强了男性统治制度的第三种主要组成部分——独裁主义。战争时代为“强人”领导提供辩护，也为中止公民自由和公民权提供辩护——正如美国 1983 年入侵格林纳达时的新闻管制和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处于战争状态的各个国家的长期戒严令所表明的那样。

过去，钟摆始终从和平摆向战争。每当更加“女性的”价值暂时上升，并威胁要改变社会制度时，惊慌失措和恐惧的男性统治就把我们强行推向倒退。但是，目前的向后摆动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严重的国内和国际暴力吗？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越来越压制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吗？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另一次（现在是核）战争吗？这是在给予生命的圣杯的力量仍然至高无上的女神时代就以这种希望开始的文化进化的注定结局吗？或者我们目前已经完全可以自由地避免这种结局？

---

① 虽然现代妇女运动存在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方面，但是，认为妇女过去从来没有向男性统治提出过挑战则是大错特错了。关于美杜莎和亚马孙的古代故事证明，她们的反叛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但是，正如 D. 斯彭德所写的那样，男性统治制度故意消灭了这些自我肯定和反抗的努力，以便使所有的妇女都觉得这种行为甚至这种思想有点反常（并且是前所未闻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三个世纪的主要妇女思想家》，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3）。

第十一章　自由的丧失：未完成的转化

我们的时代应该是现代的理性时代。启蒙代替了迷信；人道主义代替了野蛮状态；经验知识代替了谎言和教条。可是，也许前所未有的这种魔术般的力量应归功于语言。因为正是通过语言，通过使人类精神能够有意识地进行逻辑思考的语言，现在才能根除人类一切古老的非理性的东西、一切古老的错误和弊病。而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

一个理由是，前所未有地有这么多人成了有文化的人，而且前所未有地有这么多新的传播媒介把语言传送到我们地球上这么多的居民中去。进入哲学史学家亨利·艾肯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①]的运动，伴随着一次重要的社会技术转变。这是一次类似几千年以前的农业革命“第一次浪潮”的转变，或者用阿尔文·托夫勒的术语来说，是“第二次浪潮”[②]。工业革命虽然仍然主要局限于西方，但它带来了新技术的猛烈冲击，其中印刷机第一次使大规模销售书籍、杂志和报纸成为可能。接踵而来的是听觉传播媒介：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紧接着这些之后的是视觉传播媒介：电影和电视，它们和日益剧增的报刊、书籍一起，用语言潮水般地淹没了我们地球上每一个偏僻的角落。

但是，特别在西方，这种意识形态的剧变有另一个理由。正如宗教意识形态在先进的工业化之后遭到削弱那样，存在着一种对于认识、安排、评价现实的新方法——换言之，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强烈要求，实际上几乎是一种渴望。

被人们称之为世俗牧师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呼声，很快就响彻了整个

---

① 参见亨利·艾肯：《意识形态的时代》，纽约，良师益友出版社，1956。

② 参见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0。

西方世界。大约在 19 世纪，他们根据康德和黑格尔、哥白尼和伽利略、达尔文和拉瓦锡、密尔和卢梭、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世俗世界的早期先知的现代福音，到处重新解释、重新安排和重新评价现实。

理性的败北

这些人是一次文化转变的预言家。随着人类精神被理性解放，“理性的男人”——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产儿——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野蛮状态。

通过工业革命，我们的技术进化正在飞跃地向前发展。我们的文化进化不久也可能是这样。同样，新的物质技术（例如机械和医学），正在带来近乎神奇的变化。新的社会技术（例如更好地组织和指导人类行为的方法），可能迅速实现人类较高的潜能和抱负。追求正义、真理和美的古老的人类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这种伟大的希望和前途逐渐开始衰落。因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期间，“理性的男人”总是不断地压迫、屠杀、剥削和羞辱作为他们的同胞和姐妹的人类。通过诸如 19 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类新的“科学”学说的辩护，对于“低等”种族的经济奴役仍在继续着。现在不再是为了“拯救异教徒”或为了上帝和国王的伟大荣誉和权力而进行战斗，而是为了“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例如，促进“自由贸易”和“遏制”敌对的经济和政治强国——而进行殖民战争。如果说男性对妇女的统治不再能以诸如夏娃拒绝服从上帝的命令这种非理性的根据为基础，那么新的“理性科学的”教条现在则可以为之辩护并宣称，男性统治是生物学的和/或社会的法则。

“理性的男人”现在大谈他们可以“统治”大自然，“征服”自然环境，而且——在伟大的 20 世纪的进步中——“征服”宇宙。他们大谈他们为什么不得不发动战争以创造和平、自由和平等，为什么必须在把尊严和解放带给受压迫的人民的恐怖活动中杀死儿童、妇女和男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精英中的成员，他们继续积累财富和/或特权。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和达到较高的限额，他们还开始故意毒害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危及其他物种的生存，而且导致成年人严重患病和儿童畸形。可是他们始终辩解说，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爱国的，就是理想主义的，而且——首先——是合理的。

最后，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之后，理性的诺言开始受到怀疑。“合理”和高效利用人类脂肪制造肥皂的是什么人？或者高效利用卫生淋浴设备释放毒瓦斯的是什么人？如何解释经过周密策划的观察原子弹和原子辐射对活生生而且完全无助的人类的影响的军事实验呢？所有这一切超高效的大规模毁灭能被称之为人性的进步吗？

工业爆发性的过分扩张，把全体居民严密地组织在装配线上，把人变成数字装入电脑，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进步吗？这些现代的发展，以及日益加剧的陆地、海洋和空气污染，与其说是文化进步，不如说是文化倒退的象征！既然“理性的男人”似乎决心亵渎并毁灭我们的星球，那么退回到“宗教的男人”不是更好吗？退回到科学进步把我们投入我们世俗的技术时代之前的时代，不是更好吗？

在 20 世纪最后的 25 年中，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不仅在质问理性，而且在质问所有先进的现代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履行它们的诺言。到处都在谈论“自由主义的终结”，就像“现实主义者”断言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只不过是乌托邦梦想一样。

进步的世俗意识形态的所谓失败所造成的幻想破灭，正在促使全世界人民退回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激进主义学说。由于日益加剧的即将发生的全球混乱迹象的威胁，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返回到古老的男性统治观点：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尘世的生命，而是由于不服从上帝——以及在地球上为上帝辩护的男人的命令——我们是否将受到残暴的永恒惩罚。

面对核武器威胁要毁灭地球的现实，从并没有给现行制度提供实在替换物的世界观的观点来看，似乎只有三种方法来应付似乎日益无法解决的全球危机。第一种方法是返回到古老的宗教观：唯一的出路是在来世，在那里——正如再生的基督徒和伊斯兰什叶派教徒所断言的那样——上帝将奖赏服从他的命令的那些人，而惩罚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第二种方法通过更直接的形式逃避现实：使身穿奇装异服、跳着摇摆舞的青年更加颓废和愤怒的虚无主义、麻木主义、万念俱灰；使人神智昏昏的吸毒、酗酒或纵欲；使人堕落贪婪的拜金主义；沉湎于现代娱乐场使人变成冷血动物。这一切与古罗马帝国末日的血腥斗兽场何其相似乃尔。第三种方法是试图把社会拉回到想象中的更美好的过去，回到在妇女和“下等”男人怀疑她（他）们在“自然秩序”中的适当位置之前的“古老的黄金时代”。

但是，从我们已经展开的、以对我们的现在和过去进行细致的重新考察为基础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绝望都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一种在我们这个高技术的时代必然驱使我们走向核战争的统治者社会模式，那么，一切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的或自然的法则——即使促使我们全面失败和最后导致核战争，这种制度也会为了获得更好的统治和毁灭方法而利用技术的惊人发展——那么，一切并不是枉费心机的。总之，如果我们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来考察我们的现状，那么，对于一种建立在以暴力为基础的人类的一半统治另一半的等级制之上的制度，明显地存在着可选择性。同样明显的是，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社会的伟大转化并没有失败，而只是没有完成。

对男性中心论前提的挑战

产生于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观念，实际上只有部分是新的。扎根于我们在前几章考察过的深远的过去之中的这部分观念，是男女合作的观念：适合伙伴关系而不适合统治者的社会组织制度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在诸如夏特莱夫人和若弗兰夫人这样一些妇女的文化沙龙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以更现代的形式重新出现。首先，在这么多世纪的弃置或误用之后，对于少数有教养的精英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新奇的、理智的消遣而已。但是，通过更好的大众传播技术，如印刷机，以及后来又通过大众教育，这些观念——它们并不符合一种统治者的社会模式——开始到处被复制。

这些观念中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有关进步的观念。因为如果宇宙并不是如宗教教义所断言的一个由一位万能的神所控制的永恒不变的实体，而且如果"人"毕竟不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改造自然、社会和"人"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是那些证明西方文化的伟大突变就是用世俗观念代替宗教观念的人所常常强调的一个观点。但是被忽略的一点是，被抛弃的不是宗教，而是静止和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是上帝的意志这种男性统治的诺言。[1]

1737 年，当圣皮埃尔神父写作他的《关于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察》

[1] 参见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开创自由》（正在写作中）。

时，他表达了——也许第一次以这样明确的术语——人类有“无限远大的进步生活的前景”[①]这种观念。这种关于有无限的机会在我们的地球上改进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观念，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彻底否定。基督教信仰认为，这个地球是一个试验场地，在这里，人类在神的计划的指导下，为了他们不是在这个地球上的，而是在来世的最后命运接受培养和训练。不再支持独裁主义的现状，而是支持永恒进步的人类理想和抱负，这种进步乃是实际上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的法律、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等和自由这两个相关的观念，也表现了与男性统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决裂。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已经写道，“大自然所创造的人类在肉体和精神能力上是如此平等，以至于……把所有人集中起来加以考虑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严重到一个人因此可以要求他本人的任何利益，而另一个人则不能妄求这种利益”[②]。

18世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写道，人不仅生而自由和平等，而且这是一种授权他们“砸碎他们的锁链”的“自然权利”[③]——这种关于现实的观点必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核心观点。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断言，在同一世纪的英国，这种“自然权利”属于妇女和男人——这必然是仍在进行的女权主义革命的核心观点。[④]

接着在19世纪，奥古斯特·孔德论述了实证主义和人类发展的规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述了代议制政府最适合培育合乎需要的道德和理智品质。卡尔·马克思——他的主要影响在于第一个发现了前男性统治的时代——论述了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

① 圣皮埃尔神父，转引自玛丽·比尔德：《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6，第330页。

② 圣皮埃尔神父，转引自玛丽·比尔德：《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6，第150页。平等派——1649年支持克伦威尔革命推翻英国君主政体的一个教派——也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而且像生而平等一样，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财产、自由权和自由……每个人都天生是国王、牧师和预言家。”

③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纽约，哈夫纳出版社，1954。

④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维护妇女的权利》，载于《女权运动：基本历史著作》，米里亚姆·施奈尔主编，纽约，文特奇图书公司，1972，第6～16页。

⑤ 关于孔德，参看艾肯：《意识形态的时代》，第128页。关于密尔和马克思，参看奥尔伯里·卡斯特尔：《现代哲学导论》，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6，第455、535页。

完全压倒这些世俗哲学家之间的许多差别的是共同的反男性统治的设想：在适当的社会条件下，人类能够而且应当生活在自由而公正的和谐中。换言之，虽然并没有用那些术语明确表达出来，但是，这些妇女和男人所预想的，是一种伙伴关系的而不是统治者社会的可能性。

当时与现在一样，**人类**这个术语通常相当于“男人”或“男性”。因此，新的18世纪和19世纪所许诺的人权一般被认为只适用于男人。事实上，这种许诺开始只是给予白种的、自由的和有财产的男人的。然而，随着这些基本的意识形态与过去的决裂，社会现实同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所有妇女和男人的生活。

首先是美国革命，接着是法国革命向王权制度——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男性统治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目中，**平等**、**自由**和**进步**这样的词代替了像**效忠**、**秩序**和**服从**这样的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共和国逐渐代替了君主国，世俗学校代替了教会学校。而且较少独裁的家庭开始代替严格的男性统治的家庭；在后一种家庭里，父亲和丈夫的话就像国王的话一样，一直是绝对的法律。

今天，继续削弱家庭内部的男性统治，被许多人描述为家庭内部危险倾向的组成部分。但是，逐渐侵蚀父亲和丈夫的绝对权威，乃是向更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前进的整个现代运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正如社会学家罗纳德·弗莱彻——少数集中研究这个基本观点的人之一——在《家庭及其未来》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事实是，在整个社会的重构过程中，现代家庭已经成为向社会公正的中心理想靠近这一更大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①]。

最近一部阐明这些基本的，但仍然被普遍忽视的心理历史动力的著作是伦道夫·特朗巴赫的《平等主义家庭的兴起》。[②] 他证明，现代平等主义家庭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出现得更早，这一事实可能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像法国、俄国和德国那样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暴力反对君主制的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研究证明了，英国统治阶级家庭中妇女力量的兴起如何在统治英国的男人中引起了重要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促使这些男人更愿意接受社会改革，例如，接受议会政府，而君主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

① 罗纳德·弗莱彻：《创造现代家庭》，载于《家庭及其未来》，K. 埃利奥特主编，伦敦，J. 和 A. 丘吉尔出版社，1970，第183页。

② 伦道夫·特朗巴赫：《平等主义家庭的兴起：男性中心的血统和家庭关系》，纽约，学术出版社，1978。

首脑，这与俄国、德国及法国的国王仍然保留专制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世俗的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继续从作为我们文化进化的两种不同道路（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之间的基本冲突的观点来分析现代历史，那么，进步的现代世俗意识形态的出现就获得了一种新的而且更加充满希望的意义。运用文化转化理论所提供的新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平等和自由这样一些观念的复制逐渐导致形成了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以这种充当“吸引子”的男女合作的观念作为核心，形成了新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体系，它们逐渐被传播到社会体系中去，而且至少部分地代替了男性统治的范例。这些意识形态锲而不舍地向这种金字塔形的世界挑战，统治这个世界的统治顺序是从最顶端的男性上帝依次排下来的男人、妇女、儿童，最后是大自然的其他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进步的意识形态中最早的一种，正是今天进步人士最激烈地加以批评的那些意识形态之一：资本主义。17 世纪的新教改革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由于其强调商人的勤俭美德、个人成就和财富——反对商人懒惰、个人失败和贫穷等罪恶，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前提。[①] 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直到 18 世纪才出现的。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它的公认的创始人是被称为第一位世界性的哲学家亚当·斯密。[②] 作为第一位经济学家，斯密鼓吹自由市场乃是一个自由而繁荣的社会的基石。

由于与旧观点——根据这种旧观点，男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基本上是一种天生的功能，生下来就是贵族、手工艺者或农奴——的彻底决裂，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向自由社会前进的运动。它从根本上向最早的或原始的男性统治社会组织的严格等级制度挑战，在这种男性统治的社会组织中，最强壮、最野蛮和最暴虐的男人、战士和征服者，以及他们的后代，

① 参见，例如，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30；以及 R. H. 托尼：《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纽约，哈考特·扣雷斯出版社，1926。

② 参见，例如，罗伯特·海尔布罗纳：《世俗哲学家》，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61。

贵族和国王，行使由神所制定的宗教意识形态为之辩护的专制权力。

因此，资本主义——主要建立在一种经济的或物质的基础之上的第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是在从统治者社会向伙伴关系社会运动中的重要的一步。它还提供了许多促进新的而且更负社会责任的政治形式，例如，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比封建经济无限优越，封建经济主要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封建贵族和国王们在贪得无厌地追求作为权力基础的不动产的过程中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反复屠杀和劫掠。但是，就它强调个人私欲、竞争和贪婪（利润动机），它所固有的等级制（阶级结构），以及它继续依靠暴力（例如殖民战争）而言，资本主义基本上仍然是男性统治的制度。

最关键的是，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家乔治·吉尔德公开阐明的，资本主义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男性至高无上为基础的。在他的《财富和贫困》一书——里根总统认为该书是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关于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吉尔德特别鼓吹他所谓的“男性卓越的侵略行为”是所有社会和经济价值中最伟大的东西。[1]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随后出现的主要意识形态。它们的早期理论家否定了资本主义所信奉的许多男性统治的前提。诸如夏尔·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促进平等的理想的重要因素。他们所说的平等，是一种以联系或亲缘，而不是以等级或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2] 虽然在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只是一种偶然的启示，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承认男人对妇女压迫的重要性，恩格斯把这种压迫称之为“第一次阶级压迫”，或“女性的世界性的历史失败”。[3]

但是，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例如，自由的普及教育和累进所得税）帮助获得了伟大的社会平等，而且使千百万农民和工人摆脱了野蛮的贫困，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保留了男性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部分地在于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已发展成现

---

① 乔治·吉尔德：《财富和贫困》，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81。

② 参看论圣西门的一章，载于蒂莫西·雷森主编《社会学之父》，巴尔的摩，企鹅图书公司，1969。关于夏尔·傅立叶的讨论见海尔布罗纳：《世俗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第58、50页。

代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它并没放弃男性统治的原则：权力是通过暴力获得的，正如它的著名格言“目的高于手段”所证明的那样。而且问题还在于第一个采纳共产主义作为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史前时代妇女和男人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变动迎来了他们十分厌恶的阶级社会。因而，在俄国革命的早年，曾经作了某些努力使妇女地位平等化。但是，最后，男人——而且同样重要的“男性”价值——仍然占了统治地位。[1]

实际上，现代历史最有教益的一课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大规模倒退回暴力和专制主义，正好与早期以一种平等的男女关系代替父权制家庭关系的政策相反。正如托洛茨基试图评论的那样（但只是在他下台和流放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领导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2] 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没有对人类两半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基本的改革，这种关系仍然以等级而不是以联系为基础。

在 19 世纪期间和进入 20 世纪以来，其他现代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废奴主义、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环境主义——也出现了。但是，就像众所周知的盲人摸象的笑话那样，它们各自描绘了作为整体问题的男性统治这个怪物的不同表现。同时，它们并没有涉及我们人类男性统治和女性被统治模式这一问题的实质。

直截了当地向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人类关系模式以及人类等级原则挑战的唯一意识形态，当然是女权主义。因此，它不仅在现代历史中而且在我们文化进化的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从前几章详尽阐述的文化进化的长远观点来看，女权主义显然并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反之，我们和其他人类的亲缘或联系的观念在男性统治制度中只能得到口头上的信奉，对于几千年的文化进化来说，这种观念曾操作性地被实际地表现在更平等与和平的社会中。而且统观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古希腊和罗马，在抒情诗人和伊丽莎白时代，在文艺复

---

[1] 希拉·罗博瑟姆：《妇女：反抗和革命》，纽约，文特奇图书公司，1974；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学》，纽约，双日出版社，1970；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自由主义的“败北”，从一种新的女性—男性观重新评价意识形态》，载于《政治心理学》1983 年第 4 期，第 375～391 页，或参看艾斯勒和洛耶：《开创自由》。

[2] 列昂·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马克斯·伊斯门译，纽约，梅里特出版社，1965。托洛茨基指出：“你不能‘废除’家庭，你必须取代它”（第 145 页）。

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妇女问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始终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

但是，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确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虽然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弗朗西丝·赖特、欧内斯廷·罗斯、乔治·桑、萨拉和安吉利娜·格里姆克，以及玛格丽特·富勒这样一些妇女早就明确地表达了女权主义的许多哲学基础，但是，它的正式诞生日是1948年7月19日在纽约的塞内卡瀑布。[①] 在那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种会议上作了中心发言，她表达了发动妇女集体反对屈从和贬损的目标。她说：“在摆在公众面前的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没有一个问题比法律上所谓的‘妇女权利’问题更生死攸关地影响人类的家庭。”[②]

虽然这篇措词激烈的发言现在向我们这个拥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力量和确定性的制度提出了挑战，但是女权主义仍然被许多人认为“只是一个妇女问题”。而且作为一种结果——因为女权主义继续被从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分离出来——其他从中间派到左派的进步意识形态，继续为大量的内部矛盾所困扰。

相比之下，第四组现代意识形态没有遇到这种困难，没有进退两难的矛盾问题。这些意识形态在18世纪和19世纪开始发展成埃德蒙·伯克、阿尔图尔·叔本华和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些人的著作，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厚颜无耻的男性统治论者。[③]

尼采——他的哲学把最初的或原始的男性统治重新理想化——仍然被大量引证并受到赞扬。尼采公开地而且没有任何伪装或掩饰地宣称，正如男人必须统治妇女那样，少数“自然选择的”、“在全社会中纯血统的”男人必须统治其余的人类，而且他把他反对这些“退化的”和“女人气的”观念——平等、民主、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根据建立在严格“合理的”和非宗教的基础上。[④]

尼采哲学认为“有权有势的人可以任意驾驭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

---

① 参见，例如，D. 斯彭德主编《女权主义理论家：三个世纪的主要妇女思想家》，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3，施奈尔主编《女权运动》。

② 埃伦·卡罗尔·杜波依斯主编《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B. 安东尼：通信、著作和演说》，纽约，肖肯出版社，1981，第29页。

③ 参见卡斯特尔《现代哲学导论》，第421~452、123~141、321~336页。

④ 参见卡斯特尔《现代哲学导论》，第340页。

尼采哲学乃是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先驱。由于回到了印欧神话，尼采把犹太—基督教传统贬斥为完全不是男性统治的，因为它包含了所谓的“女人气的”“奴隶道德”：例如“大公无私”、“博爱”、“仁慈”和“邻里之爱”等观念。就像在亚利安人或印欧战士的“贵族”时代那样，尼采的理想道德秩序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统治者”个人决定谁是进行光荣战争的“精英”和“超人”英雄。这是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男人说，“我喜欢什么就把什么据为己有”，他懂得如何“控制妇女并惩罚和打倒目空一切的家伙”，而且使她们成为“甘心服从……和天生驯服”的弱者。总之，这是一个与20世纪那部关于新的男性统治的杰出著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所想象的世界十分相像的世界。

人类关系的统治者模式

那些仍然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文化进化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右派意识形态在现代的兴起感到十分悲哀。他们惊恐地注意到：右派意识形态可能重新把独裁主义强加在我们头上，并把我们推回到一个甚至更加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时代。他们对右派和新右派的军国主义，以及有关暴力、流血和战争的理想尤其感到惊恐，他们认识到，对于我们的安全和生存所采取的这种思想方式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右派意识有第三个方面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这就是，所有的右派——从20世纪末美国的右派议员到20世纪初的法兰西行动派——不仅接受，而且公开承认男性统治、战争和独裁主义之间的系统关系。①

如果我们重新客观地考察现代政治制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并非偶然的是，严格的男性统治及其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价值，标志了某些最暴虐和最专制的现代制度的特征。例如，希特勒的德国、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这种镇压制度——诸如非洲的伊迪·阿明、巴基斯

① 参见，例如，伯特伦·格罗斯：《友好的法西斯主义》，波士顿，南区出版社，1980；《自由》1984年7~8月第79期和1985年11~12月第80期；尤金·韦伯：《1905~1914年法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理安·艾斯勒：《人权，没完成的斗争》，载于《国际妇女研究杂志》1983年9~10月第6期，第326~335页；理安·艾斯勒：《人类生活的改善和人类生活的未来》，载于《人道主义》1981年9~10月第41期，第13~19页；艾伦·克劳福德：《恐吓右派》，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1980。

坦的齐亚－乌尔－哈克、西印度群岛的特鲁希略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的政权——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①]

最能说明问题（而且毫不夸张）的是，“现代民主的摇篮”——即受法律约束的同一个美国政府，在进行着偷偷摸摸的战争，而且大幅度削减公共福利费用以便为美国历史上最高额的军事预算提供资金，同时也反对用给予妇女合法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代替剥夺妇女优生自由的修正案。此外，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两种最明显的新男性统治的宗教意识形态——杰里·法尔韦尔（里根总统的好友和宗教顾问）所宣扬的美国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伊朗的阿亚托拉·霍梅尼的意识形态——那么，制度化的暴力、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由的压制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极其明显了。

在美国，杰里·法尔韦尔向千百万电视观众宣扬，上帝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他对言论自由、优生的自由以及根据个人良心决定是否崇拜的自由的反对，构成了对自由的威胁。而且他对一个相当军事化的和“强大的”美国的支持，对野蛮专制的南非政府以及其他用武器——这些武器是由“敬畏上帝的美国领导人”所提供的——屠杀和拷打自己人民的政府的支持，把上帝意志的标记刻在了暴力上。法尔韦尔的男性统治基督教以这种方式阐明了他们对于男性统治、独裁主义与男性暴力之间的联系的“实用主义”认识。

当阿亚托拉·霍梅尼宣称“披巾”——传统的伊斯兰教妇女必须穿的一种长袍——是伊朗向一种由占据高位的霍梅尼及其毛拉们控制的神权政治的男性统治回归的象征时，他表达了一种对这些联系的同样认识。[②] 实际上，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来看，所谓伊斯兰教的复兴事实上就是复活以暴力反对现代强大的男女合作潮流的男性统治制度。

阿亚托拉·霍梅尼在领导了两天反对更平等地对待妇女的暴乱之后，立即就被驱逐出伊朗了。霍梅尼一回国，他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中止1967年的家庭保护法（这个法令在离婚、结婚和继承权方面给妇女更大的

---

① 参见，例如，理安·艾斯勒：《妇女的权利和人权》，载于《人道主义》1980年11～12月第40期，第4～9页；艾斯勒和洛耶：《自由主义的败北》；E. L. 埃里克森：《美国人的自由和激进的右派》，纽约，弗·昂加尔出版社，1982。还可参看《自由》1984年7～8月第79期。

② 弗雷德·布伦纳：《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梦》，载于《自由》1979年7～8月第74期，第11～13页。

自由），而且告诫他的追随者恢复妇女戴面纱的传统。[1] 同时，还迅速地强制实行了严厉的新法律：在学校和海滩实行性隔离，以及把女孩最小结婚年龄降低到 13 岁。[2]

在霍梅尼的新"道德"秩序中，不仅纵容而且实际上命令暴力扣押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并把伊朗投入反伊拉克的"圣战"中，任何不服从现有政权的人都被宣布为反伊斯兰的罪犯，可以处以监禁、拷打，甚至死刑。既不允许言论自由，也不允许出版自由。任何建立反对党的企图都被污蔑为异端。[3] 而且在 1983 年，10 名巴哈教派妇女，包括伊朗第一位物理学家、一位音乐会女钢琴家、一位护士和三位十几岁的女大学生，因信仰男女平等和组织妇女而获罪，并被公开处死。[4]

总之，那些总是把强人统治重新强加在妇女和男人头上的人认为，所谓的妇女问题——例如合法的优生自由和平等权——是小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下右派的行动——从美国的新右派到他们在西方和东方的宗教副本——就可以发现，对他们来说，使妇女退回到她们传统的服从地位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5]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献身于这些理想——如进步、平等与和平——的人仍然看不到"妇女问题"与所要达到的进步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对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从中间派到左派的其他人来说，妇女解放是一个次要的或表面的问题——即便涉及这个问题，也要在我们这个地球所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

许多意识形态的混乱，以及现代文化运动的艰难曲折，根源于那些为进步而工作的人没有发现，只要仍然保留统治者统治的人类关系模式，那么创造一个公正而平等的社会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仍然看不见社会的平等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相互矛盾，理性实际上似乎已经抛弃了

---

① 弗雷德·布伦纳：《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梦》，载于《自由》1979 年 7～8 月第 74 期，第 12 页。

② 《阿特拉斯世界出版评论》，1979 年 9 月。

③ 布伦纳：《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梦》。

④ 《妇女国际网络新闻》，第 9 期（1983 年秋），第 42 页。这些信奉男女平等的妇女并不是因她们的信仰而被处死的第一批巴哈派教徒。塔希里——建立巴哈教派信仰的巴伯的最初信徒之一——在赴死刑时宣称："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杀死我，但你们无法阻止妇女的解放。"（引自约翰·赫德尔斯顿：《地球只是一个国家》，伦敦，巴哈出版信托公司，1976，第 154 页。）

⑤ 艾斯勒和洛耶的《开创自由》将深入考察这个问题。还可参看本书第 240 页注①、②。

我们。有人还记得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关于没穿衣服的国王的故事，只有一个幼小的还没受教育的孩子发现了国王是裸体的。由于受到需要维持现行制度的现实观点的教育的影响，甚至我们理智的伟大的逻辑力量也难以把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关系的统治者模式和统治者社会之间的联系看清楚。

男性和女性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类型。因此，构成男女之间关系的方式乃是人类的基本模式。因而，人类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关系从一诞生就被传统的男性统治家庭所养育的每个儿童自觉或不自觉地当做指导原则了。[1]

在种族主义的情况下，人类关系的这种模式从不同性别的成员普及到不同种族的成员。在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殖民主义现象中，它又被进一步普及到不同的国家（通常也是不同的种族）。正是这种模式在全部历史中有助于将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所有可能的变化合理化。

前进还是倒退？

一旦我们抛弃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互相对立、宗教和世俗互相对立，或左派和右派互相对立的旧的意识形态标签，现代历史在许多基本方面就彻底地变得清楚了。进步的现代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是反对男性统治的不断高涨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最初的自由市民、工人和农民（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黑奴、殖民地居民和妇女的造反，也是这个用男女合作代替男性统治的仍在推进的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所有这些群众反叛，从根本上说，从过去到现代，都是反抗一种等级制是社会组织首要原则的制度。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男性统治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挑战一直是零敲碎打的。右派的或新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人和公众生活的、内部一致和包罗一切的观点，但是，在进步的意识形态中，只有女权主义由于把诸如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运用于全人类——不仅包括人类一半的男性，而且包括女性——而避免了内部的不一致。只有女权主义提出了重新安排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的观点。而且只有女权主义明确指

[1] 这包括妇女和男人，以便妇女不仅会承认她们自己的统治，而且会支持男人反对其他人的暴力行动。艾斯勒和洛耶在《开创自由》中考察了这一点。

出了男性强奸和殴打妻子的暴力和男性的战争暴力之间的系统联系。[①]

根据我们现代的意识形态体系来看，女权主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吸引子。当它停留在系统的边缘时——在19世纪和20世纪，女权主义充当了一种周期吸引子——指导了向一种世界观前进的理智的运动；这种世界观认为，妇女和女性不应继续被贬值。但是，在我们这个系统日益不平衡的时代，女权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十分完整的男女合作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不仅把我们的宗教的，而且把我们世俗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成分结合起来，这种现代男女合作的世界观终于提供了内部一致的、要求用伙伴关系的社会代替统治者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

向这种意识形态前进的运动已经存在。例如，弗里特约夫·卡普拉的埃尔姆伍德研究所主办了"1985年新范式专题讨论会"。新范式思想特别被描述为"后家长制的"，而且这种新认识论被认为表现了一种"从对自然的统治和控制向合作和非暴力的转化"[②]。诸如罗伯特·荣克、戴维·洛耶和约翰·普拉特等男性未来学家同样承认妇女平等与和平的联系。[③] 巴哈教世界审判所1985年致世界各国首脑的声明明确认为，"达到性别之间的完全平等"是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④]

---

① 参看，例如，W. 斯科特·海德：《为了女权运动的健康》，布法罗，玛格丽特女儿出版社，1985；M. 戴利：《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运动的元伦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8；阿德里安娜·里奇：《妇女的诞生》，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76，索尼娅·约翰逊：《从家庭主妇到异教徒》，纽约，花园城，双日锚出版社，1983。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的《开创自由》主要深入分析了当代历史上存在于男性统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背后的动力。这里，应该注意好战的社会和战争时代之间的区别。在好战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一般偏低，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战争时期妇女的地位始终是下降的。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战时生产缺少男人，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暂时的改善，她们这时有机会接管某些更加受到重视的"男人的工作"。例如，欧洲封建时代，男人都去参加宗教战争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情况也是这样。但关键是，妇女的地位和更大的独立性只得到了暂时的改善。既然并没有对妇女和诸如同情、关心和非暴力等女性的才能作出新的评价，因此，当男人打完仗回来时——而且制度照旧是男性统治的和好战的——妇女便再次被驱回"妇女的工作"和从属的地位。

② "新范式专题讨论会"，埃萨伦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苏尔，1985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

③ 参见，例如，约翰·普拉特：《妇女的作用和伟大的世界性转变》，载于《未来》1975年10月第7期；戴维·洛耶：《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上的男人》，载于《人道主义》1985年11～12月第45期。罗伯特·荣克，欧洲和平运动"创始人"之一，也积极支持妇女更多地参与政治，而且承认这是和平的先决条件之一。

④ 《世界和平声明》，海法，巴哈世界中心，1985，第11～12页。

来自全世界的女权主义哲学家和活动家——例如妇女中有威尔玛·司各特·海德、海伦·卡尔迪科特、贝蒂·弗里丹、阿尔瓦·米尔达尔、埃莉斯·博尔丁、弗兰·霍斯肯、希尔卡·皮蒂拉、查伦·斯普雷特纳克、塞利娜·加西亚、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戴姆·妮塔·巴罗、帕特里夏·埃尔斯伯格、帕特里夏·米施、巴巴拉·戴明、马拉·凯勒、贝拉·阿布朱格、帕姆·麦卡利斯特、艾丽·希克森和伊丽莎白·多德森－格雷——要求一种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人的新伦理学，它以“女性的”价值，如非暴力和关怀为基础。[①] 而且无数女权主义艺术家、作家、神学家和科学家提出了适合于一个伙伴关系的世界，而不适合于一个统治者世界的新理论和新形象，她们是：杰西·伯纳德、卡罗尔·克赖斯特、阿比达·哈那姆、苏珊·格里芬、卡伦·萨克斯、朱迪思·普拉斯科夫、琼·布林德尔、吉塔·森、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戴尔·斯彭德、纳瓦尔·埃尔·萨达威、琼·奥巴尔、贝蒂·里尔敦、斯塔霍克、保拉·冈恩·艾伦、卡罗尔·吉利根、夏洛特·邦奇、朱迪·芝加哥、真弓织田、艾丽斯·沃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乔治亚·奥基夫、佩吉·桑迪、霍利·尼尔、厄休拉·勒·吉恩、E. M. 布罗纳、玛吉·皮尔西、艾伦·玛丽·陈、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这里仅举少数人而已。[②]

还有人试图发起一种主要是以联系而不是以等级为基础的男女合作政治运动。例如，皮特拉·凯利关于生态学—女权主义—和平党的观点极大

① 参见，例如，海德：《为了女权运动的健康》；弗兰·霍斯肯：《霍斯肯报告：女性的生殖缺陷和性缺陷》，列克星顿“妇女国际网络新闻”，1979；海伦·考尔迪科特：《原子狂人》，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0；帕姆·麦卡利斯特主编《重新纺织生活之网：女权运动和非暴力》，费城，新社会出版社，1982；查伦·斯普雷特纳克主编《妇女精神政治学》，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82；伊丽莎白·多德森－格雷：《失去的绿色乐园》，马萨诸塞，韦尔兹利，圆桌出版社，1979 年；希尔卡·皮蒂拉：《今非昔比》，国际联合发展委员会和国际科学情报研究会关于古罗马广场的讨论会，内罗毕，1985。

② 参见，例如，阿比达·哈那姆：《黑眼睛的伊斯兰教天堂女神：伊斯兰世界的妇女》（在写作中）；苏珊·格里芬：《自然中的妇女》，纽约，哈泼·科洛封图书公司，1978；保拉·冈恩·艾伦：《能预见的妇女》，旧金山，老处女的墨水出版社，1983；琼·奥巴尔：《第三世界的妇女：改变她们地位的因素》，北卡罗来纳，德拉姆，杜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1976；朱迪·芝加哥：《宴会》，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79；艾丽斯·沃克：《紫红色》，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出版社，1982；R. R. 鲁瑟主编《宗教和性歧视：妇女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形象》，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74；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对有机体的一种感觉：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生平和著作》，旧金山，W. H. 弗里曼出版社，1983。

地促进了西德的绿色和平组织运动。[①] 而索尼娅·约翰逊为 1985 年美国总统选举拟订的公民政党纲领，明确地表达了女权主义在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对现实全力以赴的、充分一体化和首尾一贯的纠正，必然有效地促使一种伙伴关系社会的实现。虽然我们并不常常以这种方式考虑它们，但是，绝大多数社会现实——学校、医院、证券交易所、政党、教会——是曾经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妇女和男人心中的观念的现实化。废除奴隶制、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以及在最近几百年以来我们已经取得的所有其他进步也都是这样的。[②] 甚至物质现实——桌子、书、锅、飞机、小提琴——也是人类观念的现实化。但是，新观念被转化成新现实不仅需要观点的清晰性，而且需要有机会改变旧的现实。

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我们现时代的骚动正在为社会变迁——而且潜在地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转化——提供机会。正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周围看到的那样，迅速的技术变革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性。而且，就像转化理论所证明的，当不稳定状态出现时，就可能发生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化。

现代妇女和男人对统治者社会的反叛是和伟大的技术进步一起到来的。此外，每次重要的技术变革都通过强制改变妇女和男人的角色而推进了男女合作的潮流。现在，甚至大自然似乎也正在反抗男性统治：土壤侵蚀、资源枯竭、酸雨和环境污染。但是，大自然的这种反叛并不是——就像有时所争论的那样——对技术的反抗。反之，它是对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利用技术的反抗，在统治者社会里就是这样利用技术的，而且男人必须不断征服自然、妇女或其他男人。

据说，现代技术不仅对我们的文化进化而且对我们的生物学进化都是一种危险。只要男性统治仍然存在，先进的技术肯定会对我们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可是，甚至这种威胁也为根本性的制度转化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

---

① 关于这个题目的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弗里特约夫·卡普拉和查伦·斯普雷特纳克的《绿色政治学》（纽约，达顿出版社，1984）。

② 正如未来学家斯图尔特·康格所指出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机构如法院、学校和教会，就像纸和笔、汽车和飞机，或者算盘和计算机是技术的发明一样，也是社会的发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精神的产品。（《社会发明》，萨斯喀彻温，艾伯特王子城，萨斯喀彻温新起点公司，1970。）

在这最根本的层次上，现代男女合作的潮流可以被看做是由我们物种的生存冲动所驱使的适应性过程。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的那样，各方面所提供的证据是，现行的制度迅速地接近了它的逻辑进化终点，五千年来男性统治的迂回曲折的路线的终点。前途可能是这种即将灭亡的制度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所进行的最后的暴力大屠杀。但是，男性统治的垂死挣扎可能也是男女合作诞生的阵痛，而且打开进入一个新的未来的大门。

第十二章 进化的中断：统治者的未来

曾经只是在科幻电影脚本里描述的我们未来的情景，现在却成了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可能性。这类剧本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在一场核战争消灭了人类之后，少数逃脱了核辐射的生命形式之一的蟑螂将接管我们的地球。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它可能是男性统治的一种恰当结局，而且是冷酷无情的进化在开我们的玩笑。阻碍我们的文化进化的体制最终可能成功地创造那种最适合的生物：昆虫，而不是人类。

诺伯特·威纳在他的《人有人的用处》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指出，诸如蚂蚁和蜜蜂等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等级制组织完全适合这些很少进化的生命形式。[①] 威纳注意到，昆虫的身体被限制在坚硬的外骨骼或外壳中。它们的精神也被限制在很小的脑子里，仅仅为记忆的存储或作为学习的基础的复杂的信息传递过程留下极小的余地。因此，一种每个成员在其中执行一种严格限制和预定的功能，而且性别也是完全专门化的社会组织，适合像蜜蜂和蚂蚁这样的社会性昆虫。这里，蜂后或蚁后的唯一功能是产卵。雄蜂的唯一功能是授精。而工蜂或工蚁，就像它们的名字所指出的，只从事非生殖性的工作，以保证昆虫群体的食物供给和巢穴建造。

相比之下，人类是拥有最灵活的，而且最少专门化身体结构的生命形式。不管妇女还是男人都具有直立的姿势，使我们的双手可以自由地制造和使用工具。男女两性都拥有高度进化的大脑，它具备无限的记忆存储能力和非凡的信息处理能力，使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灵活的、万能的样子——

① 诺伯特·威纳：《人有人的用处》，纽约，阿冯出版社，1950，1967，特别参看第2～3章。

总之，成为人。[①]

因此，像男性统治这样严格的等级制社会结构——它使人类男女两半只具备固定不变的和有限的功能——虽然十分适合像社会性昆虫这样能力十分有限的物种，但是它确实不适合于人类。[②] 而且在我们这个技术进化的时刻，它可能也是致命的缺陷。

难以解决的问题

威纳论述控制过程的著作是关于理解我们这个现在正在自然科学中继续发展的世界的能动的新方法的开山之作。他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决定我们物种的进化优势的，是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以对他所谓的反馈作出反应的极其优越的能力：把有关过去的行为是否有效的信息转变成应付现在情况的新信息的能力。[③]

此外，就像威纳所写的那样，由于我们可以迅速地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拥有进一步进化的有利条件。其他物种也逐渐形成新的行为模式以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如果它们不这样，那么它们就完了。但是，对于大多数物种来说，这些变化发生在它们的生物学进化过程中，而且这些变化改变了它们的肉体和精神结构。相比之下，如果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人类可以运用我们极其优越的精神十分迅速地，甚至不断地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

但是，成功地这么做需要三件事情：我们理解反馈，我们正确地解释它，而且我们把它用于促成变化。

---

① 就像威纳根据他的系统观所写的那样，“控制论采取了这样的观点：机器或有机体的结构就是据之可以看出其性能的索引……人类社会之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乃是一桩十分自然的事情，就像蚂蚁社会之建立在遗传模式的基础上一样”（《人有人的用处》，第79、81页）。正如阿什利·蒙塔古所详尽地证明的，表现我们人类的特征并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那种品质是我们的巨大的灵活性和我们的发明能力。特别参看阿什利·蒙塔古：《人类发展的方向》，纽约，哈泼出版社，1955；《论人类》（第2版），纽约，达顿/霍桑图书公司，1966；《成长中的青年》，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81；《触摸》（第3版），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86。

② 因此，威纳写道：“预先指定各人社会职能的秩序井然的国家”并不符合人类有机体的结构，或者说，不符合“通向可能的未来的不可逆转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却是人的生活的真正条件”——更不符合社会组织的民主形式（《人有人的用处》，第70～71页）。

③ 《人有人的用处》，第71页，第3章。

现在，关于我们地球的现状的反馈向我们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未来学家把这些问题总结为一句话：**世界性难题**。[1] 根据计算机分析的资料——例如，罗马俱乐部的第一和第二份报告，像《地球2000年》这样的政府报告——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研究机构的大量报告——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当我们的世界日益发生大规模政治的、经济的和环境的混乱时，我们就是在向一个甚至更混沌的时代发展。[2]

我们已经看到了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和环境破坏。我们正在看到酸雨、超标准的核辐射、有毒的垃圾和其他工业和军事污染的后果。科学家感到忧虑的是，化学制品引起臭氧层日益变薄甚至可能改变世界气候。热带雨林的迅速毁灭也是与此有关的重要原因。许多物种正在消失，而且预测表明，大约在2000年，几十万种物种，也许是现存所有物种的20%，将不可避免地消失。[3]

可耕地的大量减少是另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饥荒肆虐的非洲，因为每年有相当于缅因州那么大面积的耕地和草场变成了不毛之地。而且预测表明，迅速漫延的沙漠化可能正在加速。[4]

饥荒和贫困已经是灾难。1983年，1100万儿童不到一周岁就死了。20亿人靠每年不到500美元的收入生活。4.5亿人遭受饥饿和严重的营养不良。20亿人没有可靠的卫生饮用水的供应。[5]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国民贫困率在17年中是最高的，约占全国人口1/5的3400万人被列为官方的贫困线以下的穷人。[6]

根据现在的趋势，预测表明，情况将会更坏，而不会改善。富人和穷人之间、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而且尽管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但是由于人口增长、世界上数量日益增加的穷人的生活水平在未来的

---

① 参看，例如，爱德华·科尼什：《对未来的研究》，华盛顿特区，世界未来协会，1977。

② 参见，例如，米哈依洛·梅萨洛维奇和爱德华·佩斯特尔：《处于转折点上的人类》，纽约，达顿出版社，1974；《关于地球2000年给美国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美国国务院，1980；欧文·拉兹洛：《决定性的年代》，载于《未来》1985年2月第17期，第2～23页；威廉·纽费尔德：《五个潜在的危机》，载于《未来学家》1984年4月第18期。

③ 《关于地球2000年给美国总统的报告》，第3页。

④ 《关于地球2000年给美国总统的报告》，第2～3页。

⑤ 鲁思·西瓦德：《世界军费和社会经费（1983年）》，华盛顿特区，世界热点出版社，1983，第26页。

⑥ 鲁思·西瓦德：《世界军费和社会经费（1983年）》，华盛顿特区，世界热点出版社，1983，第26页。

年代里将比他们今天的更低。[①]

总之，我们正从我们周围的一切得到危险的信号，反馈表明我们的地球系统正在开始瓦解。这些信号中最危险的是未来学家所谓的人口爆炸。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生出来，他们接着又生出越来越多的人，人口正在以难以相信的速度增加着。[②] 事实上。如果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预测表明，到21世纪中叶，我们星球在一年里所增加的人口可能比基督死后整个最初的1500年里所增加的人口还多！[③]

人口危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政策无法降低增长率——乃是未来学家所谓的**世界性难题**中似乎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的核心。因为存在于我们时代的土壤侵蚀、沙漠化、空气和水的污染，以及所有其他生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压力背后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对于有限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压力，需要为所有这些人提供服务的数量日益增加的工厂、小轿车、卡车和其他污染源的压力，以及他们的需要和渴望所刺激的日益恶化的状况的压力。[④] 而且正好与这种人口爆炸有关的是，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男性统治制度下，我们日益恶化的问题如何和为什么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

人类问题和妇女问题

看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看到，流行的范式使学者们如此盲目，以至于他们在史前母亲女神的形象中只看到了丰满的维纳斯——男人的肥胖的性对象。以这种相同的心理定势看一下我们的将来，同样会以一种歪曲的

---

① 《关于地球2000年给总统的报告》，第1、26页。该报告设想人口增长将停止。但是，正如乔纳斯·索尔克在《世界人口和人类价值》中所指出的，以人道的方式停止人口增长将需要切实可行的人类发明。

② 仅仅在1974～1984年的10年期间，世界人口数量就增加了7.7亿，达到47.5亿。世界银行估计，到2025年，地球人口可能接近翻一番，即约83亿，而这些人口中大约有7亿人是因资金缺乏而营养不良的第三世界的居民（《时代》1984年8月第6期，第24页）。对于非洲大陆来说——在那里，人口每23年就增加一倍——用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话来说，对于它的将来的最可怕的预测是一场“噩梦”（《人口零增长报告人》1984年3～4月第16期，第3页）。

③ 梅萨洛维奇和佩斯特尔：《处于转折点上的人类》，第72页。

④ 参见，例如，莱斯特·布朗：《忽视的结果：世界耕地的减少》，载于《未来学家》1979年4月第13期，第141～152页；布朗：《1985年世界状况》，纽约，诺顿出版社，1985；《世界人口增长和地球的安全》，载于《人口》1953年9月；斯蒂芬·芒福德：《美国的民主制和梵蒂冈：人口增长和国家安全》，纽约州，阿默斯特，人道主义出版社，1985。

方式看我们地球所遭受的苦恼。

问题是从这样的事实开始的：绝大多数专家所搜集的信息长期以来就没有把妇女计算在内。因此，大多数决策者只根据一半资料进行工作。但是，即使资料摆在他们面前，如果要维持现存的制度，决策者仍然不会采取适当的行动。

例如，在许多人口过剩而经济不发达的伊斯兰国家里，并不认为过高的生育率是一个问题。像阿亚托拉·霍梅尼和齐亚－乌尔－哈克这样的领导人似乎根本不关心他们的人民的极端贫困和这样的事实——在这些文化中，妇女被认为是男性操纵的生育机器——之间的关系。无独有偶，在1984年墨西哥城人口会议上——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口过剩的城市里，在一个每年有上百万非法移民劳工逃向北方以逃避日益增长的人口过剩所引起的极端贫困的国家里，召开了这次会议——里根政府的代表断然宣称不存在人口问题。①

世界新闻界甚至大多数学术论文都认为，这些例子主要证明了在人口问题上缺乏理智，或对政府的作用缺乏认识。但是，这种印象可能是危险的误解。因为这些例子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敏锐的认识，即对维持世界范围内男性统治制度所需要的是什么的认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男性统治大规模倒退的时代，这种政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它一度是一个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追求正义、平等和社会进步的男女合作理想的榜样。美国——不仅对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政策施加了不相称的影响，而且消耗了世界资源的不相称的比

---

① 为墨西哥城人口会议准备的1984年5月30日的《美国意见书》阐述道："人口增长本身是一个中性的现象。它并不一定好或坏。"使经济学家大吃一惊的是，它进一步断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否定的关系"（《白宫政策发展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准备的意见书草稿》，《人口零增长率报告人》转载，1984年5～6月第16期，第3页）。这份意见书所阐述的观点的可靠性立即受到了世界银行1984年7月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的挑战。这份286页的文件指出，"在某些国家里，发展尤其是不可能的，除非立即可以达到较慢的人口增长"。它还指出，世界上的穷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发生明显的倒退，这是人口增长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增加计划生育的资金是基本的任务。（《人口零增长率报告人》1984年7～8月第16期，第2页。）大多数人口专家一致认为，美国的立场及其对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努力的非难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墨西哥城世界人口会议所采纳的国际人口委员会的世界行动计划也强调，人口是"发展计划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且强调，"应该优先考虑的行动纲领是把所有基本人口和发展因素结合起来"。（《人口零增长率报告人》1984年7～8月第16期，第4页。）

例部分——最近倒退回可能提高而不是降低出生率的政策。里根政府不仅大大削减了为第三世界计划生育方案提供的资金，而且在美国饥饿和贫困日益增加的同时，这个政府照样强制通过了一个可能再次宣布流产为非法的宪法修正案。而且在一个打算否定妇女公正和平等地选择不生育的生活方式的议案中，里根政府同样坚决反对已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而且无视或实际上否决了早期设想的使妇女就业和教育机会平等化的法律。[①]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除了中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最近的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之外，计划生育几乎很少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反之，在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这个最贫困的东欧集团中的一个国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宣布，妇女的"爱国职责"就是生四个孩子，还要求妇女在她们的工厂每月接受怀孕检查并对"长期不孕"提供医生证明。[②] 而且在发展中世界许多人口最过剩和最贫穷的国家中，尤其反对妇女节育。[③]

虽然在1984年召开的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人口会议上，宣布了"改善全世界妇女的地位"——不仅为了这个问题本身的缘故，而且因为它在降低人口出生率方面的重要性——乃是大会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为妇女节育创造机会和动力的政策几乎在全世界都极不受重视。[④] 而且情况仍然是这样——尽管全世界的人口专家明确表示，如果人口计划能够成功，那么为妇女而不是为那些妻子和母亲创造令人满意的和对社会有益的角色，甚至比有效的节育教育更重要。[⑤]

从逻辑上来说，选择是简单的。扼制人口增长的传统方法是疾病、饥饿和战争。给妇女生育自由的优先权和平等是阻止人口爆炸的另一种方

---

① 参看，例如，理安·艾斯勒：《把妇女推回到她们1900年的角色》，载于《人道主义》1982年3~4月第42期；《人权修正案和人类生活的未来》，载于《人道主义》1981年9~10月第41期。

② 《现代国家》，1985年1~2月，第5页。

③ 参见，例如，理安·艾斯勒：《人口：妇女的现实，妇女的选择》，载于《国会记录》第98届国会第2次会议，1984。

④ 就像埃丝特·布希纳博士——津巴布韦国家儿童生育间隔和人口出生率协会协调人——所强调的，大多数非洲妇女并没有获得生育自由，她们"必须经过她们丈夫的同意"才能实行节育（《波普赖恩》1985年8月第7期，第2页）。珀迪塔·休斯顿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呼声》通过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访问，对这个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看法。

⑤ 参见，例如，《德雷珀基金会第9号报告：改善妇女的地位》，华盛顿特区，1980年10月；凯思琳·纽兰：《妇女和人口增长》，华盛顿特区，《世界观察报告第16号》，1977年12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通过社会和经济发展加速人口稳定性》，载于《发展报告第24号》，华盛顿特区，海外发展委员会，1977。

法。但是，最优先考虑这些“妇女问题”可能意味着现存制度的结束。它可能是一种从统治者社会向伙伴关系社会的转化。而对于男性统治精神——我们世界现在的许多领导人的精神——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些男人寻找并建立了“智囊机构”，它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想听的东西。美国极端保守的势力所建立的基金会是遗产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相继为著名的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和其他证明不存在全球人口问题的人的研究提供资助。[1] 实质上，他们的设想是，从短期看，漫延的饥荒将有助于减少过剩的人口，而从长期看，这些统治世界经济帝国的男人将通过激烈的、侵略性的竞争生产如此之多的财富，足以“细水长流地”养活未来的数十亿人口。[2]

这些在我们的史前时代颠倒现实的男人的现代继承人用同样的方法“解决”饥饿和贫困的难题。作为第一步，地球现存的饥饿和贫困不是被否认就是被缩小。[3] 如果这时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例如，平均每分钟有 30 个儿童死于缺少食物和缺少廉价的疫苗[4]——的话，那么他们会反驳说，这种“不幸的情况”只是暂时的。贫困和饥饿也将逐渐消失，因为“自由市场”将盛行起来。[5]

---

① 参见，例如，朱利安·西蒙和赫尔曼·卡恩主编《资源丰富的地球：对 2000 年地球的一个回答》，纽约，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4。西蒙的论点：地球完全可以养活两倍于现有地球人口的人口，而且，实际上，既然人类的独创性实质上就是创造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未来，那么，更多的人就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西蒙还争辩说，由于物质进步的利益日益广泛地为全世界所分享，所以人口将自然而然地稳定下来。但是，至于这种情况如何才能出现，他争辩说，没有必要进行基本的变革。它可能是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发生的——这对财产继承权基金会富有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② 参见米利安·西蒙和赫尔曼·卡恩主编《资源丰富的地球：对 2000 年地球的一个回答》。还可参看赫尔曼·卡恩：《难以想象的乐观主义》，载于《未来学家》1975 年 12 月第 9 期，第 286 页。卡恩在文中承认，尽管他对未来持极端乐观的看法，但是，最可能的情况是将会发生广泛的饥馑。

③ 参见，例如，朱利安·西蒙：《地球上的生活正在变好，而不是变坏》，载于《未来学家》1983 年 8 月第 17 期，第 7 ~ 15 页。参见林赛·格兰特：《关于丰饶的谬论：永恒增长的神话》，载于《未来学家》1983 年 8 月第 17 期，第 16 ~ 23 页；赫尔曼·戴利：《最后的失败：朱利安·西蒙的经济学》，载于《未来学家》1985 年 10 月第 7 期，第 446 ~ 450 页，该文对西蒙的观点作了无情的批判。

④ 西瓦德：《1983 年世界军费和社会经费》，第 5 页。

⑤ 参见本页注①、②、③。关于对经济发展就是答案这种观点的另一种批判，见吉塔·森及卡伦·格罗恩：《发展、危机和可供选择的两种远景：第三世界的妇女观》，新德里，黎明出版社，1985。在论述饥饿和贫困的某些结构性根源时，这一研究从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观点考察了这个问题。

甚至那些似乎对人类的痛苦并非麻木不仁、实际上十分关心的人，也常常陷入掩盖和歪曲现实的习惯的罗网之中。当证据清楚地证明，与男性统治/统治者制度的等级秩序相一致的饥饿和贫困，实际上主要是“妇女问题”时，他们继续笼统地谈论饥饿和贫困。[①]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以妇女为家长的家庭在美国是最贫困的，它们的贫困率是其他家庭的三倍，而且每三个生活贫困的美国老人中有两个是妇女。[②] 在发展中世界里，现实甚至更可怕。[③] 在非洲的难民营内外，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饿死——穷人中最穷的和饥饿者中最饥饿的是妇女和她们的孩子。[④] 而且正如联合国《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的报告和其他官方和非官方的报告所证明的那样，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⑤]

逻辑可能再次要求，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应该优先考虑研究解决妇女贫困和饥饿的方案。但是，对于这些现实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在美国，尽管妇女严重失业，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通过的失业救济法案只在像建筑和修路这样男性统治的职业之外提供了一些工作。在非洲，尽管有饥荒，而且尽管妇女承担了 60% ~80% 的农业劳动工作，但是农业技术援助、贷款、政府的赠与地和现金津贴几乎全部为男人所独吞。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尽管由于不平等的教育和培训，妇女注定要从事报酬最低的职业，但是经济发展和国外援助方案照样完全

---

① 参见，例如，《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联合国新国际主义出版社编辑，英国、牛津；理安·艾斯勒：《性平等对世界的冲击》，载于《人道主义》1981 年 5 ~6 月第 41 期；巴巴拉·罗杰斯：《妇女的家务》，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9。

② 参见，例如，《受损害的妇女及其孩子》，载于《美国公民权委员会报告》，1983 年 5 月；卡林·斯托拉德、巴巴拉·埃伦赖克和霍莉·斯克拉：《美国梦中的贫穷：首先是妇女和儿童》，波士顿，南角出版社，1983；《贫困中的妇女》，载于《国家经济就业机会咨询委员会最终报告》，1981 年 9 月；《州政府的妇女权利议事日程》，州和地方政府选举联合会，华盛顿特区，1984。

③ 由联合国协调的十余年来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成果在《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中有所综述。它报告说，虽然“大多数妇女做双倍的工作”，而且“耕种全世界大约一半的农田”，但是，她们“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土地，很难得到贷款”，“而且集中在低工资职业”，“所得工资仍然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工资低 3/4”（第 1 页）。

④ 妇女不仅是穷人的大多数，而且占全世界挨饿人口的大多数，这种情况现在已得到了广泛的证明。事实上，这种情况很久以来就得到公开的承认，例如，休·道恩在他 1981 年的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的呼吁书中写道：“在埃塞俄比亚的旱灾和内战中死难的五百万人口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⑤ 参见，例如，琼·特纳主编《拉丁美洲的妇女：温和的呼声》；医学博士西尔维·斯普林斯：《国际教育发展》，1981；休斯顿：《第三世界妇女的呼声》。

被男人所独占。[1]

男性统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照料妇女和孩子的是作为“家长”的男人。但是，这种理论是以一种再次忽视大量数据的现实模式为基础的。因为我们有相当充分的数据证明，全世界这么多妇女和儿童生活在十分悲惨的境遇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这些“完整的”和“破碎的”家庭里，男人都没有给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

问题不仅在于，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里，半数以上离婚的父亲不得不服从法庭的判决继续赡养孩子和妻子。[2] 问题也不仅在于，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现在大批男人丢下需要养活的妇女和孩子涌入城市，他们偶尔回家只是为了再生一个孩子。[3]

问题在于，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妇女贫困和饥饿的根源是相当深远的。它不仅局限于妇女充当家长的家庭中，而且也存在于这样一种家庭组织中，在这里，男性的“家长”拥有社会承认的权力，可以决定应当如何分配和使用财产或金钱。

例如，在我们西方的历史上，不论是俄罗斯的农奴、爱尔兰的矿工，或是美国的“建筑工人”，许多男人认为“交出”他们的工资以便他们的妻子可以给家庭购买食物乃是对他们的男性尊严的侮辱。但是，正如大多数西方男人今天仍然干的那样，他们喝光或赌光他们的工资，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向他们的男性权威挑战，那么他们就打他们“爱唠叨的”妻子。这同样仍然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常见的模式。

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为全家准备——而且常常也种植——粮食的妇女要到男人吃饱了才能吃饭。[4] 这里，我们再次对这种性歧视的吃

---

① 例如，美国国际发展署 1982 年只把它的发展援助计划的 4% 分配给了妇女（鲁思·西瓦德：《妇女……一次世界性调查》，1985，第 17 页）。

② 参见，例如，巴巴拉·伯格曼：《妇女和男人分担对儿童的经济赡养》，载于《人权季刊》1981 年春第 3 期，该文论述了美国男人不赡养儿童而引起的贫困。

③ 参见，例如，《法律和妇女的地位：一次国际专题讨论会》，纽约，联合国社会发展和慈善事务中心，1977。该文提供了有关在非洲许多国家里根据传统和现代法律准则男人合法或不合法地没有责任赡养妻子和孩子的专门资料。还可参看《弗兰·霍斯肯——〈妇女国际新闻〉编辑——访问记》，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的《弗兰·霍斯肯：世界慈善家》（载于《人道主义者》，1982 年 9～10 月）讨论了这个题目。

④ 参见，例如，《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检查和估价：健康和营养》，联合国 10 年妇女工作成绩检查和估价世界大会，亚特兰大会议，116/5 附录 3；罗杰斯：《妇女的家务》；西瓦德：《妇女……一次世界性调查》，华盛顿特区，世界热点出版社。

饭行为方式作一些理论说明。通常，在妇女从早到晚从事劳累至极的工作的地方，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即那里的男人需要更多的食物，或者说那里存在着西方局外人不应该加以损害的“种族传统”。这些也是对食物禁忌的理论根据，这种食物禁忌禁止妇女，特别是怀孕的妇女，吃那些恰恰对她们的健康有益的食物，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证明，营养性贫血症折磨着第三世界近一半的育龄妇女和60%的孕妇![1]

但是，这种在资源分配方面的性歧视模式并不“仅仅”严重影响妇女。这种模式对于男人和人类进化同样具有可怕的影响。众所周知，患营养不良症的母亲常常生出更孱弱和有病的婴儿。这不仅明显地影响女婴，而且影响男婴；他（她）们一生下来在体质上就低于标准水平，而且也常常有精神缺陷，或者充其量具有比他们应该具有的智力——如果他们的母亲得到充足的食物的话——更低的智力。

因此，由于我们的世界故意无视这些现在仍然被叫做“妇女问题”的人类问题，成百万的男人和女人被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过健康的、创造性的和有益的生活的机会。而且由于妇女的权利没有被认为是人权，因此不仅我们的文化进化，而且我们的生物学进化也不必要地被阻碍了。

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步骤改变食物分配的性歧视模式，看来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就像在人口政策和发展政策的情况中那样，在男性统治横行的制度中，存在着压制因素。

基本的问题是，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对于系统阐述和贯彻那种可以有效地研究我们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政策来说，存在着两个基本障碍。第一个障碍是，维持男性统治所需要的现实模式要求无视所有与人类的一半有关的问题，或者把所有这些问题庸俗化。这种对于资料的极端排斥忽视了这样的重要问题：在任何其他环境中，科学家可能立刻攻击它是一种致命的方法论缺陷。但是，甚至在这第一个障碍被以某种方法克服，而且决策者得到了完整而公正的资料时，第二个甚至更基本的障碍仍然存在。这个障碍就是，在一个男性统治的制度里，最优先的政策必须是保持男性统治。

因此，可能削弱男性统治的政策——以及对人类将来的目的提出任何希望的大多数政策——无法得到贯彻。即使这些政策得到了系统论证，它们也必定被暂缓考虑，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或者使之无效。

---

[1] 西瓦德：《妇女……一次世界性调查》，第25页。

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

人们在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人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难题时，就会寻求别的解决办法。按照尊重等级秩序并规定权利就是力量的男性统治精神，这些解决办法往往被等同于暴力和强人统治。

因此，毫不奇怪，除了进步制度崩溃和/或大规模的核破坏之外，一个常见的远景方案是全球极权主义。这一直是许多科幻故事——从奥威尔的预言似的《1984》到电影《滚珠》和《华氏451°》——的主题。它也是博学的未来学家所研究的题目，例如，雅克·埃吕尔关于缺乏人性的专家治国论者所统治的非人道的世界的预言。① 甚至赫德森研究所的赫尔曼·卡恩所预告的“乐观主义的”方案——这个方案展示了支持研究所的大公司和军方委托人通过正常的商业过程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的未来情景——也是一个被卡恩称之为新“奥古斯丁帝国”所统治的世界。②

经常提到的是，极权主义的未来的巨大心理魅力是它允诺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位领袖像孩子的“强壮的父亲”那样“照顾一切”，作为忠诚服从的报酬。社会化了的服从男性统治的精神在危机时代当然倾向于接受这种“保护”。但是，说现代极权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巨大的危险性——还有另一个理由。

对极权主义的传统看法是，它对我们世俗的科学时代来说是一种完全现代的苦恼，一种特殊的恐怖。③ 的确，纳粹德国大规模灭绝人的集中营的技术效率是空前的。但是，正如史前史和历史充分证明的那样，企图杀光全人类的尝试完全是正常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通过作为其标志的恐怖进行统治也是正常的。

通过重新了解我们失去的过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就它的统治方法和基本结构来说，现代极权主义是以统治者社会组织模式为基础的文

① 雅克·埃吕尔：《技术社会》，纽约，诺夫出版社，1964。

② 参见，例如，赫尔曼·卡恩和A. 韦纳：《2000年》，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7，第189页。

③ 参见，例如，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梅里迪安图书公司，1958；罗伯特·A. 布雷迪：《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纽约，维金出版社，1937；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的面目》，伦敦，三一出版社，1965；乔治·摩斯：《纳粹文化》，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社，1966。

化进化的逻辑顶点；就它通过恐怖进行统治的效率而言，它是这种类型社会的最终发展。实质上，它是最初在我们史前时代出现过的、严格的男性统治的城邦国家的一个技术发达的变种。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是古代神权政治城邦国家的现代继承者。在古代神权政治的城邦国家里，正如文化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写的那样，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巨大的社会机器上受到严格控制的齿轮。[①] 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的等级制的精英，实际上是古代战士/祭司统治者特权阶级的继承人。两者都主张一种只有直接听从命令的路线——不管是上帝、元首还是斯大林。两者都要求有权通过法律解释命令和依靠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把这种命令强加于人。

正如在男性统治的神权政治国家里那样，教会和国家没有分离，统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男人不仅行使着精神的权力，而且行使着世俗的权力。与男性统治的宗教一样，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能容忍对于“真正”信仰的任何背离。而且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是与男性统治的宗教一样——两者都提出了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包括了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方面。极端右派分子仍然引证《圣经》为男性统治家庭辩护。在纳粹德国，元首宣称，妇女及像犹太人这样“弱小的”和“女人气的”男人，都天生比他的新“超人”种族低劣。而在苏联——无数描绘妇女为她们的男人做饭的小说和电影一再重复的官方的家庭关系模式，与纳粹宣传所理想化的德国**家庭主妇**的模式完全一样。[②]

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俯首帖耳和循规蹈矩是最高的美德。而且在两者那里，不仅允许使用暴力，而且命令使用暴力，如果这种暴力是为官方称许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话——哪怕是使用中世纪祭司的恐怖统治、焚书和烧死人民，或者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更有效的洗脑术和严刑拷打都行。

具有超凡魅力或催眠能力的领袖——他们成功地团结他们的追随者去“消灭敌人”——是现代的和传统的极权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特点。例如，

①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技术和人类的发展》，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与沃尔德出版社，1966。

② 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在《开创自由》中将进一步分析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的男性统治特点。

在中世纪的欧洲，像教皇乌班二世和明谷的伯纳德这样的男人，在声势浩大十分壮观的群众集会上，成功地煽动起来的男性统治的那种宗教热情和贪婪，把欧洲和小亚细亚抛入了长达几世纪之久的血腥屠杀的宗教战争。[1]在纳粹德国，在同样大规模的和十分壮观的群众火炬集会上，希特勒的激烈演说把现代世界推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近以来，通过电视这个具有催眠力的媒介，悄悄进入千百万家庭的新生的具有超凡魅力蛊惑人心的政客，正在劝告美国人参加社会活动反对“未开化的和不道德的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政客把我们世界的所有罪恶都归咎于它们。

传统的和现代的极权主义制度都要求它的人民不断学习神圣的或官方批准的经典，这些经典提供了全部答案：绝对“真理”。而且，为了服务于这个与史前时代和历史上的男性统治的严格宗教审查制度相同的目的，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被牢牢地掌握在现代极权主义政府的手中。

实际上，虽然是在一个比史前时代强加的男性统治时期更小的范围内，但是，现代极权主义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许是，（就像在奥威尔的《1984》中那样）他们的主要工业之一就是制造神话。在纳粹德国，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黑头发男人被成功地神话化为元首、“纯种”、金发碧眼的强人领袖、漂亮的“亚利安超人”。在俄罗斯，上帝父亲及其代理人、专制的小父亲或沙皇，首先被列宁——革命之父，他的木乃伊状的尸体成了狂热崇拜的对象——接着被斯大林——他冷酷无情地残杀了他自己的千百万人民——所取代。

在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神话中，我们都可以精确地看到在最初的男性统治接管颠倒现实的时期曾经使用过的同样的操作过程。它们不仅创造了新的神话，而且创造了新的象征。例如，卐字饰和锤子、镰刀在20世纪几乎就像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一样有权威，用以动员男人们进行神圣的宗教战争和战争。而且产生了代替旧的宗教典礼和仪式的新的典礼和仪式：群众集会、火炬游行、有节奏的行军；还有领袖正义的、雷鸣般的、愤怒的演说，劝告“有知识的人”前进并用暴力传播“真理”。

---

① 马里恩·米德的《阿基坦的埃莱诺亚》（纽约，霍顿图书公司，1977）生动地描述了这些中世纪的事件。纳粹和中世纪教会的庆典之间的惊人相似之处是它们都用长达数小时的集会和反复歌唱的方法使群众筋疲力尽，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受影响。

新的现实和古老的神话

如果我们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重新考察纳粹的神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并非巧合的是，它们是印欧或亚利安人侵者的神话的翻版。因为纳粹德国不仅就它的神话而言，而且就它的现实而言，都是库尔干时代的一种再现。

就他们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而言——犹太人的房屋、商店、私人财产甚至金牙都被用来充实官方的国库和赏赐党的忠实信徒——纳粹简直就是在重复曾经忙于抢劫财物的库尔干人的方法。他们屠杀、抢劫和掠夺。

纳粹认为妇女是用性支配的财产的观点，同样是库尔干人的规范的翻版。德国的“新亚利安超人”认为，妇女应该——用尼采的话来说——像某些“常常令人愉快的家畜”，应该被用来满足男人的性快乐，应该是私人仆从、娱乐物和生育器。[①] 甚至比这更过分的是，正如在希特勒的赏赐有功的士兵有权得到不止一个妻子的计划中所写的那样，纳粹认为，妇女基本上是库尔干男人认为她们所是的那种东西：战士的战利品。[②]

万能的元首或领袖的统治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了库尔干酋长的男性中心强人统治。纳粹的精锐部队，可怕的党卫队和冲锋队，是库尔干人的战士阶级的翻版，他们作为“男性”美德的活生生的样板，通过毁灭和恐怖追求荣誉、尊严和权力。

就它忠实地复制严格的男性统治、独裁主义和高度制度化的男性暴力而言，纳粹德国是对男女合作的冲击的一种最激烈的反动。它也是向最早的，而且最野蛮的原始男性统治形式的一种最现代的倒退，也是新的男性统治的未来的预示者。

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不管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是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都是现代化的男性中心论的解决方法。它的基本前提是轻视“女人气”或和平的手段；它是这样一种信念：服从命令——不管它们是神的还是世俗的命令——乃是最高的美德；它也是这样一种信条：从男性和女性开始，把人类分成必须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内群和外群。

---

① 阿尔伯里·卡斯特尔：《现代哲学导论》，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6，第357页。

② 克劳迪娅·孔兹：《祖国的母亲：纳粹德国的妇女》，载于R. 布里登撒尔和孔兹主编的《真相大白：欧洲历史上的妇女》，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77，第469页。

这么多的人之所以过去和现在仍然接受这种解决方法，并不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世界日益增加的问题提供了任何可行的答案。它的吸引力来自男性统治和新男性统治的象征和神话的牢不可破的力量。因为这些形象和故事继续反复向我们的无意识的精神灌输这样的恐惧：甚至有任何背离男性统治的前提和解决方法的想法，不仅在今生而且在来世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从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所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过低估计神话的力量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人类的心理似乎对一系列传说和象征有一种内在的需要，这些故事和象征向我们"揭示"宇宙的秩序，而且告诉我们我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这是一种对似乎超出了任何理性主义的或逻辑的体系的力量所能提供的意义和目的的渴望。

现代历史证明，制止恐怖的方法——在男性统治的神话的指导下，恐怖一直是人类的命运——并不是压制一切不能被归结为"男性"理性的东西。这种方法并不试图压制我们精神的直觉的、非线性的、非理性的功能，在新男性统治的教义中，这些功能常常被称为"女人气的东西"。[①] 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象征和神话是一种比逻辑或理性更低的，因此不合需要的秩序。确切地说，问题在于，何种象征和神话能够丰富和指引我们的精神：促使人类进步的，还是促使人类倒退的？男女合作的，还是男性统治的？

正如库尔干人的入侵中断了我们早期的文化进化那样，今天，极权主义者和希望成为极权主义者的人，仍然经常借助于新旧男性统治的神话阻挡我们的文化进化。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从统治者社会向伙伴关系社会的部分转变已经部分地解放了人类，使我们能向更公正和更平等的社会前进。但是，同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不仅有左派的而且有右派的、更深地

① 学者们——如卡尔·荣格和刘易斯·芒福德，罗伯特·格雷夫斯和米尔西亚·伊莱亚德——已经阐明必须平衡我们的"直觉"认识和"理性"认识。罗伯特·奥恩斯坦最近在他的《意识心理学》中试图理解和调和这两种认识，他指出，直觉主要被认为是一种更加"女人气的"，因而是较低级的存在（《意识心理学》，旧金山，弗里曼出版社，1972，第51页）。最有影响的例子是英里斯·伯曼在他的《重新着迷的世界》（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一书中所提出的他所谓的"恢复参与意识"的必然性，他指出，女权运动、生态学和精神更新——它们显然在政治上没有共同之处——似乎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了。还可参看格雷戈里·贝特森：《走向精神生态学》（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72），这是另一部更加整体论的观点所需要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并没有贬低我们的理想的、更直觉的、"女人气的"方面。

加固以现代的或极权主义的形式出现的统治者社会的反向运动。

由于男性统治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以及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新技术——现代宣传、麻醉品、神经毒气——甚至控制精神的实验的强有力的惯性推动，所以一个极权主义的未来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然而，这种世界秩序可能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不管它们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极权主义的领袖和希望成为领袖的人的基本共同点是，他们都信奉作为我们解放的工具的剑的致命力量。因此，总有一天，统治者的未来几乎一定也是全球核战争的未来，而且是人类问题和愿望的彻底结束。

第十三章　进化的突破：走向一种伙伴关系的未来

科幻作家对于未来的幻想充满了惊人的技术发明。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幻想唯独没有发明新的社会。他们所预想的那些东西似乎在向未来前进，实际上多半是把我们向后拉。不管是在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1]里，还是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里，我们经常发现的，实际上是变成了星际高技术战争世界的封建皇帝和中世纪封建君主的社会组织。

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生活了5000年以后，的确很难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1915年写成的《赫尔兰》[2] 中作了尝试。这是一个幻想有一个和平和高度创造性社会的乌托邦。在这个社会里，最受尊重和报酬最高——而且最受社会重视——的工作是使儿童的德、智、体都得到发展。这本书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里自我毁灭了，而幸存的妇女有了可乘之机，经过一场惊人的突变，她们通过学会完全依靠她们自己来繁殖自己，拯救了她们这一半人类。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作为一种性别的男人，而在于男人和女人在一种统治者制度中必定被社会化。在新石器时代和克里特曾有过男人和女人。在和平的孔人和班布提部落现在有男人和女人。甚至在我们的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是爱好和平和温柔的，而许多男人却是爱好和平和温柔的。

显然，不管男人还是妇女都有采取许多种不同行为的生物学潜能。但是，就像包裹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的外部防护层或壳那样，男性统治的社会组织包裹了人类男女两部分，他（她）们严格的等级角色阻碍了他

① 弗兰克·赫伯特：《沙丘》，费城，奇尔顿出版社，1965。

② 夏洛特·吉尔曼：《赫尔兰》，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9年再版。

（她）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根据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两种可能性——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的观点来考察我们的进化，我们就会发现，社会生物学家——他们今天试图再次把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注入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使它重新恢复生气——如此频繁地引证昆虫社会来支持他们的理论，这绝不是偶然的。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他们的著作加强了这样的观点：严格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标准模式——人类关系的男性统治和女性被统治模式——是预先安排在我们的基因中的。[①]

正如许多科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进化并不是预先决定的。[②] 相反，

---

① 例如，E. O. 威尔逊用蚂蚁群体来说明“侵略性行为”是进化中的一种“竞争性技能”，他把蚂蚁群体描述为“是众所周知的倾向于互相侵略的”。参见E. O. 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综合》，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第244页。他还用昆虫社会支持“性内选择”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是以求爱的雄性的侵犯性排他态度为基础的”。他叙述了在某些种类的甲虫中存在着“粗暴的男子气概”（第320页）。他接着举了一些昆虫中的暴力的雄性统治的例子，例如黄粪蝇，雄黄粪蝇始终强制地骑在雌蝇身上，阻止竞争的雄蝇骑在雌蝇身上（第321~324页）。威尔逊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认为，必须把昆虫和人类行为区别开来。例如，他认为“蚊子是一种无意识的昆虫”，其受“基因所规定的一系列固定的行为”必须“从一出生就迅速而准确地表现出来”，反之，“人类基因则规定了发展一系列才能的能力，而不是把一种能力专门化”。（《论人性》，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第56页。）但是，威尔逊所阐述的主要观点是，男性侵略和男性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不难发现，这也是人们常常引证他的观点的原因，例如，在解释他的“父亲投资”的进化理论时，威尔逊写道：既然“在每次交配活动中男性投资都相对少……为了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多获得女性的投资”——这可能只有最富侵略性的男性才能做到，因此淘汰了“劣等”男性的基因（《社会生物学》，第324~325页）。他还进一步用一种昆虫的实验阐述了进化有利于雄性侵犯的社会生物学理论，这个实验——用10只黑腹孢属果蝇（一种苍蝇）进行交配——是社会生物学家贝特曼1948年进行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实验（第325页）。他接着讨论了动物基本上是多配性的，因为不止和一个雌性交配的“最适应的”雄性有利于整个物种的进化（第327页）。在其他地方，威尔逊坚决主张，“显性所决定的生育优势也适用于我们人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证了唯一的一个例子：巴西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是一个十分好战的、严格男性统治的部落，在这个部落中，实行杀死女婴的惯例。在这里，“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比其他男人有更多的孩子”。威尔逊报告说，在这里，人类学家所描述的他们所谓的那种“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夫多妻的印第安人，特别是首领，比非一夫多妻的印第安男人更聪明”。根据这种观点，威尔逊的意思是，他关于“生育竞争中的统治优势”的假设是以“富有说服力”的证据为根据的（第288页）。

② 参见，例如，V. 昌尼：《广义进化论》，布达佩斯，基多大学出版社，1982；欧文·拉兹洛：《进化：广义的综合》，波士顿，新科学图书馆出版社，1987；奈尔斯·埃尔德雷奇：《时间结构》，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85。就像M. 米德所总结的那样，“在整个宇宙和生物进化中存在着选择自由和转折点。如果你认真考察进化过程，那么，它不一定采取现在的过程。它可能采取其他许多过程”（《我们开放的最后未来》，载于《下一个十亿年》，演讲论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出版社，1973）。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进化的共同创造者。例如，正如舍伍德·沃什伯恩所写的那样，我们发明工具不仅是解放我们的双手去创造更复杂技术的两足行走和直立姿势的原因，而且是其结果。[①] 而且，正如技术和社会都已经发展得更复杂那样，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已经日益不取决于我们的生物学进化方向，而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进化方向。

人类进化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就其本质而言，人类的中心任务是如何组织社会促进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和我们独具的潜能的发展。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男性统治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因为它在本性上就重视毁灭性的技术，它所依靠的就是用暴力控制社会，而且它赖以生存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人类关系模式经常引起紧张局势。我们还看到，男女合作或伙伴关系的社会——它的象征是维持和增进生命的圣杯，而不是致命的剑——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选择。

问题是我们如何从这里前进到那里。

一种新的现实观

像伊利亚·普利高津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这样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化学和生物学系统中的分叉或进化的分支，包含了大量的偶然性成分。[②] 但是，正如进化理论家欧文·拉兹洛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系统的分叉也包含了大量的偶然性成分。他指出，人类“有能力进行有意识的和集体的行动”，深谋远虑地“选择他们自己的进化道路”。而且他补充道，在我们的“决定性时期”，我们“不能放弃对偶然发生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化进行下一步的选择，我们必须自觉地和有目的地进行这种选择”[③]。或者像生物学家乔纳斯·索尔克所写的那样，我们最紧迫的需要是使人类精神这个奇妙的工具具有必要的想象力，从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④]

最初，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困难任务。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关于现实的观点——关于什么是可能的和合乎需要的东西

① 舍伍德·沃什伯恩：《工具和人类进化》，载于《科学的美国人》1960 年 9 月第 203 期，第 62 页。

② 伊利亚·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斯滕格斯：《从混沌到有序》，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4，特别参看第 160～176 页；埃尔德雷奇：《时间结构》，第 189 页。

③ 欧文·拉兹洛：《决定性的时期》，载于《未来》1985 年 2 月第 17 期，第 16 页。

④ J. 索尔克：《解剖现实》，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第 12～15 页。

的观点——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关于我们的观念、象征、神话和行为可以被改变的最好证据，也许是这样的事实：这种变化实际上在我们的史前史中已经出现过了。

我们已经看到，妇女的形象在大多数古代世界如何受到崇拜和尊敬，而仅仅作为性对象被男人占有并统治着的妇女形象如何只是在男性统治的征服之后才占优势。我们还看到，象征的意义——例如，知识之树和循环新生中蜕皮的蛇——在我们文化进化的那个关键性的分叉之后如何完全被颠倒了。这些象征不久以前在进化的时代被认为是人类渴望通过更高或神秘的知识获得解放的表现，现在却似乎与因怀疑男性统治和独裁统治而遭受可怕的惩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男性统治被强加于社会之后，由于男女合作的复活或男性统治的倒退的冲击，我们最重要的象征的意义往往已经被彻底地改变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十字架。刻在史前时代女神雕像和其他宗教器具上的十字架的原初意义，似乎一直是代表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出生和成长的女神的身份证明。这就是一直保存在埃及象形文字中的意义；在象形文字中，十字架代表生命和生活，构成了诸如**健康**和**幸福**这些词的组成部分。[①] 后来，在把人钉在木桩上成了处死他们的普通方法之后（正如在亚述、罗马和其他男性统治的艺术中所证明的那样），十字架成了死亡的象征。再后来，更加支持男女合作的耶稣的门徒再次企图把耶稣被钉死在上面的十字架变成一种复活的象征——一种与某种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象征，这种社会运动试图宣扬和实践人类平等以及这些“女人气的”概念：温柔、同情与和平。[②]

在我们的时代，在男性统治者的制度同化了这种社会运动几个世纪之后，我们解释古代象征和神话的方式不仅对我们如何创造现在，而且对我们如何创造将来，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某些宗教和政治领袖企图使我们相信一场善恶之间的最后核决战实际上可能是上帝的意志的同时，[③] 我们正看到，在一场加速发展的、实际上是空前的复活古代神话和

---

① 参见，例如，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

② 在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时期，十字架再次把屠杀和严刑拷问结合起来了。现代用十字架作为死亡和镇压的恐怖象征的是美国的三 K 党。

③ 参见，例如，《自由》1985 年 11～12 月第 80 期，第 4 页，引用里根总统的话，他至少有 11 次提到世界末日正在到来——一个能够带来这种末日的男人的清醒的声明。

象征的原初男女合作含义的运动中，对于渴望生命而不是死亡的广泛的重新肯定。[①]

例如，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艺术家们——如伊莫金·坎宁汉和朱迪·芝加哥——正在第一次运用各种各样女性的性形象，这显然使人联想起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克里特表现诞生、复活和变形的象征手法。[②]同样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取自自然的形象（例如海豹、鸟、海豚、茂密的森林和草原）第一次——在更早的时代，这都是女神神圣力量支配下万物统一的象征——正在被用于生态运动，以重新唤醒我们意识到我们与我们的自然环境的本质联系。[③]

往往无意识地拆散我们神秘的挂毯并重新编进较好的男女合作模式中去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中，诸如“征服自然”等“男性”美德，不再被理想化了——实际上已经在扎实地进行中。[④] 仍然缺少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以实现的新形象和新神话的“临界质量”。

也许最重要的是，女人和男人正在日益怀疑男性统治的社会的最基本假定：男性统治和男性的战争暴力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学家所从事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中，雪莉和约翰·麦科纳海所进行的十字架文化研究发现了维持男性统治所要求的严格的性习惯与战争及打老婆、骂孩子和强奸的发生率之间重要的相互关系。[⑤] 正如继续我们的论述的第二本书将详加阐述的那样，正在进行的日益增加的新研究证实了这些系统的相互关

① 全世界回归“原教旨主义”的运动同样正在反对这种重新编造的神话。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男性统治的宗教神话学的教义。这种回归之所以如此强烈，正因为以更加男女合作的方式不仅创造新神话而且重新解释旧神话的世界性运动正方兴未艾。

② 现代女神艺术也有一种新的流派。参见，例如，格洛丽亚·奥伦斯坦：关于《女性的创造：寻求伟大的神话圣母》的巡回演讲；以及格洛丽亚·奥伦斯坦：《作为萨满教巫师的艺术家》，妇女建筑画廊艺术展览会，加利福尼亚，洛杉矶，1985 年 11 月 4～28 日。

③ 同样重要的是，生态运动的诞生常常被认为是得益于一本书的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妇女：雷切尔·卡森，书名是《寂静的春天》（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62）。正如前内政部长詹姆斯·尤德尔写的，“一位伟大的妇女通过她对我们周围的危险的富有说服力的报道唤醒了国家”。

④ 参见，例如，弗朗索瓦兹·德·奥博纳：《女权运动或死亡》，巴黎，皮埃尔·奥雷出版社，1974；伊丽莎白·多德森－格雷：《我们的生态危机的精神性欲根源》，圆桌出版社发送的论文，1974；以及苏珊·格里芬：《妇女和自然》，纽约，哈泼·科洛封出版社，1978，该书分析了我们的生态危机和我们的男性及男性价值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关系。

⑤ 雪莉·麦科纳海和约翰·麦科纳海：《性放任、性角色的僵化和暴力文化》，载于《社会问题杂志》1977 年第 33 期，第 134～143 页。

系，因为许多学科的科学家已开始怀疑流行的现实模式。① 通过对人类男女两部分的研究，科学家们今天正在以寻根究底的方式扩大我们关于人类社会可能性的知识，以及人类意识进化的知识。②

实际上，从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来看，许多关于现代“意识革命”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男性统治意识向男女合作意识的转变。③ 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许多妇女和男人第一次直接向毁灭性的神话——例如“杀人者是英雄”——提出挑战。④ 他（她）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忒修斯到兰博和詹姆斯·邦德这些“英雄”的故事实际上教给我们的东西的实质，并且日益认识到要教育男女儿童重视关怀和亲近，而不是征服和统治。⑤ 在瑞典，已经通过了逐步禁止出售战争玩具的法律，这些战争玩具传统上用于教育孩子对他们所伤害的那些人不予同情，以及所有其他有关男人要杀死他们的同胞的态度和行为。⑥ 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的和平示威，激动人心地证明了我们和全人类血肉相关的意识正在觉醒。

全世界如此众多的男人女人第一次直接向作为统治者世界观基础的男性统治和女性被统治的人类关系模式提出了挑战。⑦ 就在我们揭露“性别

---

① 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的《开创自由》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还可参看艾斯勒：《暴力和男性统治：定时炸弹》，载于《社会中的人性》1984 年冬/春第 7 期，第 3～18 页。

② “意识觉醒”这个术语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当时妇女们集会讨论她们的个人问题，她们日益认识到这些个人问题是男性社会中占人类一半的妇女共同的社会问题。

③ 艾斯勒和洛耶的《开创自由》将深入考察这个问题。

④ 还可参看艾斯勒和洛耶：《和平和女权主义理论：新方向》，载于《和平建议公报》1986 年第 1 号；艾斯勒：《妇女与和平》，载于《妇女之声》1982 年 10～12 月第 5 期，第16～18 页；艾斯勒：《我们失去的遗产：上帝如何变成一个男人的新事实》，载于《人道主义者》1985 年 5～6 月第 45 期，第 26～28 页。

⑤ 例如，1985 年 12 月越南战争退伍老兵在玩具店门前散发传单，企图提醒人们意识到战争玩具是多么具有毁灭性。正如一位老兵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所提出的，如果他们出售美化战争的兰博和美国兵玩偶，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做些残废玩偶以表明战争的真相。

⑥ 《未来学家》，1981 年 2 月，第 2 页。

⑦ 由于越来越多的男人也开始认识到，不彻底改善妇女的地位，就不可能取得实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在联合国发起的第一个妇女 10 年（1975～1985 年）运动期间，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获得巨大的成就。例如，在 1985 年 7 月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肯尼亚总统丹尼尔·艾拉普·莫依说道：“没有妇女的充分合作，21 世纪的和平、发展和普遍遵守的人权将仍然是不可捉摸的。”肯尼亚副总统姆韦·基伯基最近谈道：非洲妇女——她们现在常常每 13 个月就生一个孩子——由于陷于沉重的家务而显得悲惨和虚弱，她们迫切需要得到解放。（引自戴维·洛耶：《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上的男人》，载于《人道主义者》1985 年 11～12 月第 45 期，第 28、32 页。）

战争”的观念是这种模式的后果的同时，这种模式的另一种结果——把“他人”看做“敌人”——也正在受到挑战。[1] 最重要的是，人们日益认识到：正在形成的对我们星球的“伙伴关系”的较高意识是与从根本上重新考察的改变妇女和男人的角色密切相关的。[2]

正如精神病学家琼·贝克·米勒所写的那样，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妇女“适合充当人类交往不可缺少的承担者”[3]，而且只有她们能够实事求是，甚至超然地评价她们和他人的亲缘关系。与男人——他们通常为适应社会生活，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相对照，妇女则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她们自身的首要职责是为他人谋福利，甚至不惜牺牲她们自己的幸福。[4]

人类经验的这种分裂，就像米勒所全面地证明的那样，不仅造成了妇女而且造成了男人的心灵扭曲。妇女过分倾向于与他人的认同，以至于害怕失去甚至中断某种亲缘关系。正如她写的那样，她们害怕的“恰恰不是丧失一种关系，而是某种近似于完全失去自我的东西”。相反，男人常常倾向于认为他们对亲缘关系的人类需要是一种“障碍”或“危险”。因此，他们可以认为，为他人服务并不占中心地位，而只是从属于他们的自我形象，即一个男人“只有在完成了男性主要的需要之后才可以要求或能够担负得起的东西”[5]。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关于性别角色和现实状况的观点是男性统治社会的基础。但是，正如米勒所写的那样，“极端重要的是认识到，对妇女感到如鱼得水的亲缘关系表示同情并不是错误或倒退。……尚未被认识到的是，这种心理的出发点包含了一种完全不同（而且更先进）的关

---

① 参见玛丽·戴利：《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运动的元伦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8；W. 斯科特·海德：《为了女权运动的健康》，布法罗，马格丽特女儿出版社，1985。

② 参见路易丝·布鲁因：《女权运动：对于未来的希望》，马萨诸塞，坎布里奇，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1981 年 5 月。书中有力地表述了戴利听说的“男性统治的侵犯行为的厌女症根源”（《女性生态学》，第 357 页）。还可参看艾斯勒和洛耶：《和平和女权主义理论：新方向》，以及《和平和女权主义理想：新方向》，载于《世界和平百科全书》，拉兹洛和约主编，伦敦，佩格蒙出版社，1986。

③ 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第 86 页。

④ 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第 69 页。

⑤ 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第 69 页。引文（依次）引自第 83、87 和 69 页。

于生活和功能的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这种方法完全不同于统治文化所培育的方法。……它为真理的出现留出了余地，这种真理就是：对于每个人——男人和女人——来说，个人的发展**只是**借助于亲缘关系才能继续进行"[①]。

这些想象男女现实状况的新方法正在产生人类精神的新模式。旧的弗洛伊德模式主要根据基本冲动，例如对于食物、性和安全的需要，来认识人类。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其他人道主义心理学家所提出的更新的模式认为这些基本的"防卫"需要说明了，而且也承认，人类拥有更高层次的、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成长"或"实现"的需要。[②]

这种从防卫需要向实现需要的转变，对于从统治者社会向伙伴关系社会的转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暴力或暴力威胁所维护的等级制度需要具有防卫习惯的精神。在我们这种类型的社会里，男人的敌对创造物始于他的人类孪生儿：女人，在流行的神话中，妇女至少应该对我们被逐出乐园负责。而对于男人和妇女来说，这种人类的一半高于另一半的等级制——正如艾尔弗雷德·阿德勒所指出的那样——毒害了人类的所有关系。[③]

弗洛伊德的观点证明，男性统治的精神浸透着内心冲突、紧张和恐惧。[④] 但是，当我们从男性统治向男女合作前进时，我们便愈发能够开始从防卫向成长运动。而且正如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和创造性的人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这种过程发生时，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自私和更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将日益向一种不同的现实——我们和全人类本质上相互关联的"最高经验"意识——前进。[⑤]

一种新的科学和精神性

关于我们的相互关联性这个主题——琼·贝克·米勒称这种相互关联

---

① 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6，第69页。引文（依次）引自第95和83页（黑体是原来的）。

② 亚伯拉罕·马斯洛：《走向存在心理学》，纽约，范·诺斯特兰德—莱因霍尔德出版社，1968。

③ 艾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康涅狄格，格林威治，福塞特出版社，1954。

④ 艾斯勒和洛耶正在研究男性统治的和男女合作的人格类型的不同特点，见《开创自由》（正在写作中）。还可参见理安·艾斯勒：《男女合作论：平衡的未来》，载于《未来》1981年12月第13期，第499～507页。

⑤ 马斯洛：《走向存在心理学》。

性为归属，杰西·伯纳德称之为“女性精神气质的爱和职责”，而耶稣、甘地和其他领袖则简称之为爱——今天也是科学的主题。这种正在发展的“新科学”——“混沌”理论和女权主义的学术著作是其组成部分——在历史上第一次更注重关系，而不是等级制度。

正如物理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所写的那样，这种更加整体论的方法与西方科学的大多数方法彻底决裂了，西方科学的特点是一种等级制的、划分过细的，而且往往是机械论的方法。[①] 这种方法在许多方面是一种更加“女人气的”方法，因为据说妇女是更“直觉地”进行思维的，倾向于从同时发生的印象的整体中，而不是通过一步一步的“逻辑”思维得出结论。[②]

索尔克创立了一门关于移情作用的新科学，它将动用理性和直觉“来改造集体精神，使之能够建设性地影响人类未来的进程”[③]。这种探讨科学的方法——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成功地使用过，她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将集中研究作为一种有生命系统的人类社会，我们的一切都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正如阿什利·蒙塔古所说的，它将是一门符合真正的、原初的教育意义的科学：引起并发展人类的遗传潜力。[⑤] 此外，正如希拉里·罗斯在《手、脑和心：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女权主义认识论》中所写的那样，它将不再是一门“直接控制自然或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的”[⑥] 科学。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卡罗尔·克赖斯特、丽塔·阿迪提和其他学者指出，在“客观性”和“独立领域”的保护性外表之下，科学往往把传

---

① 弗里特约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新兴文化》，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82。

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现在，当男性科学家发现传统的“男性”路线的研究受到限制时，才不再禁止认为两性可能拥有同样天生的思维能力的观念。虽然存在某些生物学的差别，但是，妇女更整体地处理信息的能力可能主要是由于性的严格的社会化和作用。例如，和男人不同，社会化了的妇女主要根据亲缘关系来认识她们的生活，而且她们和他人的需要更协调。

③ 索尔克：《解剖现实》，第11~19页。

④ 论述麦克林托克的权威性著作是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的《对有机体的一种看法：麦克林托克的生平和著作》（旧金山，弗里曼出版社，1983）。

⑤ 阿什利·蒙塔古，转引自《丛林时代》1986年8月7日。

⑥ 希拉里·罗斯：《手、脑和心：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女权主义认识论》，载于《符号》（1983年秋），第81页。

统观点认为是过分女性的东西而斥之为“非科学的”和“主观的”。[1] 因此，到目前为止，科学普遍排斥妇女科学家，而把它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男人身上。它也排斥我们所谓的“关怀的知识”：正如索尔克所写的那样，我们迫切需要这种知识选择那些人类的形式，这些形式是“与进化合作的形式，而不是那些反生存的或反进化的形式”[2]。

这种新科学也是跨越科学和精神性之间的现代鸿沟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鸿沟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移情作用归之于妇女和“女人气”的男人的那种世界观的产物。科学家们正进一步开始认识到，就像统治者精神所培育的精神与自然、妇女和男人、不同种族、宗教及种族集团之间的人为的冲突一样，我们需要重新审查观察冲突本身的方法。

正如米勒所写的那样，在集中研究实现而不是防卫时，问题不在于如何取消冲突，因为取消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着不同需要、欲望和利益的个人之间有了接触，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与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世界从冲突转化为和平共存直接有关的问题是，如何使冲突成为创造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3]

作为她所谓的创造性冲突的结果，米勒说明了个人、组织和国家如何才能发展和变化。由于带着不同的利益和目的的相互接近，冲突的各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目的和行动，以及对方的目的和行动。对于双方来说，结果是创造性的变化，而不是非创造性的顽固不化。与此相反，毁灭性的冲突则是维持等级制统治所必需的暴力冲突。

米勒指出，在当前的制度下“所产生的冲突似乎**始终**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然而，事实上，它实际上不承认需要冲突，而且不承认需要为导致危险的冲突提供适当的形式。这种冲突的最终毁灭性形式是恐惧，但是它同样**不**是冲突。它差不多是相反的东西，它是试图避免和压制冲突的最后结果”[4]。

---

① 参见，例如，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对性别和科学的反应》，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卡罗尔·克赖斯特：《学院和宗教研究中的范式转化》，载于克里斯蒂·法纳姆主编《学院意识的转化》，布鲁明登，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丽塔·阿迪蒂：《女权主义和科学》，载于《科学和解放》，丽塔·阿迪蒂、帕特·布伦南和斯蒂夫·卡夫拉克主编，波士顿，南角出版社，1979。

② 索尔克：《解剖现实》，第 22 页。

③ 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第 11 章。

④ 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第 130 页。

虽然这种统治者用镇压处理冲突的方法仍然占压倒优势，但是成功地用非暴力的和更“女性的”或“消极的”方法解决冲突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具体的希望。这些方法有着古代的根源。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苏格拉底和后来的耶稣都使用过这些方法。在现代，这类方法最著名的是在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男性统治先用屠杀，然后用尊其为圣徒来对付他们——这样的男人身上得以体现。但是，最广泛地使用这些方法的是妇女。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妇女用非暴力的方法反对不公正的法律。为了获得有关计划生育的信息、节育技术和选举权，妇女宁愿被逮捕和绝食，而不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去达到她们的目的。①

这种使用非暴力的冲突作为达到社会变革的方法，并不仅仅是消极的或非暴力的反抗。拒绝与暴力及不正义合作（这种暴力和不正义使用了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乃是促使社会积极转化的力量。甘地称这种力量为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或“真理的力量”。正如甘地所说的，目的是转化冲突，而不是压制它，或使它变成暴力。②

就像重新描述文化进化的过程一样，现在对我们规定权力的方法进行再审查是很重要的。在阐述仍在流行的权力观时，米勒指出，所谓需要控制和统治别人，从心理学上讲，并不是一种权力感的功能，而是无权力感的功能。在区别“支配自己的权力和支配别人的权力”时，她写道：“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权力通常被认为是危险的。你必须控制他们，否则他就会控制你。但是，在人类发展的领域里，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公式。恰恰相反。在基本的意义上，每个人的发展越膨胀，她或他将越能干，越有力量，而且越不需要限制或压制别人。”③

① 关于19世纪女权主义者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的一般看法，参见埃利诺·弗莱克斯纳的《一个世纪的斗争》，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贝尔纳普出版社，1959。关于19世纪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斗争的一般看法，参见梅布尔·纽科默：《一个世纪的妇女高等教育》，纽约，哈泼兄弟出版社，1959。关于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某些资料来自维维安·戈尼克和巴巴拉·莫兰的《性歧视社会中的妇女》，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71；罗宾·摩根主编《妇女会是有力的》，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70；约翰逊：《从家庭妇女到异教徒》，纽约，花园城，双日锚出版社，1983；理安·艾斯勒：《平等权手册》，纽约，阿冯图书公司，1978。

② 关于甘地研究的讨论，参见玛丽琳·弗格森：《大同时代的阴谋：20世纪80年代个人和社会的转变》，洛杉矶，塔彻出版社，1980，第119～200页。还可参看路易斯·弗希尔：《甘地传》，纽约，哈泼兄弟出版社，1950。

③ 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第116页。享有权力和支配权力的区别是圣杯和剑所象征的区别。

20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一个主题是，不仅探讨现存的权力关系，而且探讨选择认识和使用权力的方法：探讨作为亲缘的权力。已经有许多人对这个题目进行了研究，这里只举出下面这些人的名字：罗宾·摩根、凯特·米利特、伊丽莎白·简韦、贝里特·阿斯、佩吉·安特罗伯斯、玛丽路易丝·詹森－朱赖特、塔吉娅娜·马莫诺娃、凯瑟琳·巴里、迪瓦基·贾恩、卡罗琳·伯德、伯吉特·布罗克－厄特纳、黛安娜·拉塞尔、珀迪塔·休斯顿、安德烈亚·德沃金、阿德里安娜·里奇。[①] 在"姐妹关系是强有力的"这句话里所描述的这种非破坏性权力观是这样一种观点：妇女们正在日益发展，因为她们从她们"妇女的"世界向"男人的"世界前进。这是一种"双方都赢"而不是"有赢有输"的力量观，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促进个人自己发展，同时不必限制别人发展的方法。

用一种形象化的或象征的术语来说，这是作为联系的力量的表现。从太古时代起，它就由圆形或卵形——女神的宇宙蛋或"大圆圈"——来象征，而不是由金字塔的锯齿形线条来表现。在金字塔结构的社会里，作为神或国家和家庭首领的男人从上到下进行着统治。在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长期压迫下，圣杯所表达的转化的秘密，在古代被认为是对我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宇宙中其他万物的统一或联系的意识。伟大的预言家和神秘主义者继续表达了这种想象，并把它描述为早期基督教所谓的**爱的会餐**的那种转化的力量。这是人类之间的基本联系，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这种联系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特点。它被称之为"兄弟"般的爱。实质上，它是一位母亲爱她的孩子的那种无私的爱，曾经神秘地表现为伟大的圣母对她的人类孩子的神圣的爱。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和女神崇拜的早期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与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紧密相关——的新关系进一步重新肯定了占人类一半的妇女的尊严和价值。它不仅是一种更加安慰人和令人放心的想象统治宇宙的那种力量的方法。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代替神话和想象的富有建设性的东西，这些想象和神话长久以来由于比给予生命和教养更重视屠杀和剥削而

---

① 参见，例如，摩根主编《妇女会是有力的》；玛丽琳·弗伦奇：《超越权力：论妇女、男人和道德》，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85；阿德里安娜·里奇：《来自妇女》，矮脚鸡图书公司，1976；迪瓦基·贾恩：《妇女对权力的追求：5个印第安例子的研究》，杭齐亚巴德，维卡斯出版社，1980；玛丽路易丝·詹森－朱赖特译，韦尔纳·莫尔贝格：《性歧视：男性垄断的历史和思想》，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1982。

歪曲了人类关系最基本的原则。

在本书的开头几章里，我们看到，在我们文化进化的开端，体现在女神身上的女性原则不仅是使死亡新生或复活为生命的形象，而且是通过神的启示照亮人类意识的形象。正如荣格派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诺伊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古代的神秘仪式中，女神代表了神性的肉体转化的力量，这种神性是包含在它的“创造生命和带来死亡的总体”中的“生命的轮回”。但是，她也是精神转化的象征，就是说，她也是“这样一种核心力量：它在这种轮回中向意识和知识、转化和启示——人类从太古以来的更高目标——推进”[①]。

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

在我们的时代，关于转化已经说了和写了很多。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学家们论述了从“第一次浪潮”或农业社会，到“第二次浪潮”或工业社会，以及从现在到“第三次浪潮”或后工业社会的伟大技术转变。[②] 事实上，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已经看到了主要的技术转变。但是，在我们正在发展的文化转化理论的观点的范围内，可以看到，那些常常被描述为主要的文化转化的转变——例如，从古典时代到基督教时代，以及最近向世俗的或科学的时代的转变——仅仅是在从一种类型的统治者社会转向另一种类型的统治者社会的男性统治制度内的变化。

当一个系统可能发生根本转化时，或者说，当新的涨落或更高程度的男女合作功能模式出现时，始终存在其他的分叉点——社会失去平衡的点。然而这一切从来没有越过成核临界点，这个成核临界点乃是从男性统治向男女合作转变的标志。用一个熟悉的比喻来说，到目前为止，男性统治的系统像一条橡皮筋。在男女合作强有力的复活时期，例如在耶稣时代，这条橡皮筋就伸得特别长。但是，在过去，当男性统治达到了它的边界或界限时，橡皮筋总是迅速恢复原状。现在，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条橡皮筋第一次不能恢复原形，它可能断掉——而我们的文化进化最终可能超越几千年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限制。

---

① 埃里克·诺伊曼：《伟大的圣母》，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5，第333～334页。

②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0。

在我们的技术发展水平上，从一种统治者社会向一种伙伴关系社会彻底转变的政治和经济含义是什么呢？在一个不再由剑来支配的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技术可能大大地加速我们的文化进化。正如鲁思·西瓦德在她的年度报告《1983 年世界军费和社会经费》中所记载的那样，发展一项洲际弹道导弹的费用可以养活 5000 万儿童，建立 16 万所学校，开设 34 万座治疗中心。甚至一艘新型核潜艇的费用——等于世界上 23 个发展中国家一年的教育预算，在这些国家里，1.2 亿名学龄儿童没有学校可上，而且 1100 万名婴儿不满一周岁就夭折了——就可以为现在注定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中的千百万人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①]

正如未来学家的著作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所缺少的是社会指导系统，以及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它们为了更高的目的可以改变资源的分配，包括对我们的先进技术知识的分配。

威利斯·哈曼——他曾在斯坦福研究所主持重大的未来学研究——写道：所需要的——和正在发展的——是一种“基本的文化前提以及全部社会角色和制度的变革”。他称这种变革是一种新的意识，根据这种意识，竞争将为合作所平衡，个人主义将为爱所平衡。它将是一种“宇宙意识”，一种“更高的认识”，它把自我的利益和同胞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联系起来。而且它将承担的完全是一种“真正惊人重要”的基本转化。[②]

同样的，在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上，我们读到，为了“避免主要地区和最终的全球毁灭”，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它是由理性支配的长远的有机发展计划所指引的，“由一种真正全球合作的精英团结在一起的，在自由的伙伴关系中形成的”[③]。这种世界系统可能由一种新的全球道德来支配，这种道德的基础是对将来一代和现在一代的伟大意识和认同，而且它将要求与自然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和谐而不是征服，成为我们标准的理想。[④]

这些计划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这些未来学家并不认为技术或经

① 鲁思·西瓦德：《1983 年世界军费和社会经费》，华盛顿特区，世界热点出版社，1983，第 5、26 页。

② 威利斯·哈曼：《正在到来的转化》，载于《未来学家》，1977 年 2 月，第 5～11 页。

③ 米哈依洛·梅萨洛维奇和爱德华·佩斯特尔：《处于转折点的人类》，纽约，达顿出版社，1974，第 157 页。

④ 米哈依洛·梅萨罗维奇和爱德华·佩斯特尔：《处于转折点的人类》，纽约，达顿出版社，1974，第 146～147 页。

济是决定我们的未来的主要因素。他们反而认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将受人类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换言之，我们的未来将由我们人类构想它的可能性、潜力和意义的方式所决定。用未来学家约翰·麦克赫尔的话来说，“我们的精神蓝图是它的基本行动纲领”①。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未来学家现在用这么多话来说明的，是我们必须抛弃那些在传统上就与“男性”相联系的、顽固不化的、以征服为目的的价值观。因为，所谓需要一种“在自由的伙伴关系中形成的真正全球合作的精神”，“一种个人主义和爱的平衡”，以及“与自然和谐而不是征服自然的”规范目标，这不正是重新肯定一种更加“女性的精神气质”吗？而且，如果不用伙伴关系的社会代替统治者的社会，那么“规范层次的激烈变化”或“基本的文化前提和全部社会制度的变革”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从一种统治者社会向一种伙伴关系社会的转化显然会引起我们的技术方面的变化：从为了毁灭和统治而使用先进的技术向为了维持和提高人类的生命而使用先进的技术的转变。同时，剥夺了那些贫困者的需要的过分浪费和挥霍无度也可能开始消失。因为正如许多社会评论家所说的，我们西方那种过分浪费和挥霍无度的情结的核心是这样的事实：我们沉溺于获取、购买、制造和浪费**物质财富**，以弥补我们在现在的制度中养育儿童的方式和成人价值观所不能带给我们的那种和谐的情感关系的缺憾。②

重要的是，从男性统治向男女合作的转变可能会结束仍然伴随着我们的世界一起前进的统治型政治和剥削型经济。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个多世纪以前在他的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指出的，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并非取决于某些不可抗拒的经济法则，而是取决于政治的——即人类的——选择。③

---

① 约翰·麦克赫尔：《未来的未来》，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69，第11页。

② 参见，例如，T. W. 阿多诺、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丹尼尔·莱文森和 R. 内维特·桑福德：《独裁主义的人格》，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50，特别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的著作讨论了，严格等级制家庭培养的个人特别容易用物质追求代替他们无法得到的使感情满足的亲情关系。艾斯勒和洛耶在《开创自由》中深入考察了这些社会的和人格的动力。

③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W. J. 阿什利编辑，根据1871年第7版的1909年新版（纽约，朗文、格林出版社，1929）。还可参看海尔布罗纳：《世俗哲学家》，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61。

今天，许多人认识到，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能提供一种摆脱我们正在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方法。只要男性统治仍然占支配地位，就不可能有一种公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在那里，候选人是由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提供资金的——还没有达到政治民主那样，苏联这样的国家——由一个强大的、特权的而且最男性化的管理阶级来统治——仍然远离经济民主。

在所有的男性统治制度中，统治型政治和剥削型经济的样板尤其是一种“二元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妇女没有报酬的或充其量低报酬的创造性活动受到有计划的剥削。正如联合国《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所指出的，全世界的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按小时计算完成了全世界工作量的 2/3，工资收入却只相当于男人的 1/10，而她们占有的财产只是男人财产的 1/100。[①] 此外，妇女的无酬劳动——在非洲，她们从事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而且她们向全世界所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相当于各种正式医疗机构以及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常常没有计入国民生产总值。[②] 正如未来学家黑兹尔·亨德森所指出的，结果是一种以“统计学的幻想”为基础的全球经济预测。[③]

在《太阳能时代的政治学》一书中，亨德森描述了一个积极的经济未来，妇女和男人的角色在这种未来中将从根本上得到重新平衡。这将需要勇敢地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男性”军国主义是“人类能量最集中的增熵活动，因为它直接把贮存的能量变成浪费和毁灭，而丝毫没有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作用”。亨德森预言，在当前“以日益衰落的家长制为标志的”时期之后，经济和生态的现实将不会受“现在与男性身份密切相结合的”“男性化的”价值的支配。[④]

同样的，在《明智的选择》一书中，英国作家詹姆斯·罗伯逊把他所说的“极端扩张主义的”或“男性的”未来与“明智的、人道的、生态的”或“女性的未来”作了比较。[⑤] 而在德国，约瑟夫·休伯教授把他为未来制定的消极经济方案描述为“家长制的”。与此相反，在他的积极方

① 《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联合国编辑，新国际主义出版社，联合王国，牛津，第 1 页。

② 《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联合国编辑，新国际主义出版社，联合王国，牛津，第 1 页。

③ 黑兹尔·亨德森：《太阳能时代的政治学》，纽约，铁锚图书公司，1981，第 171 页。

④ 黑兹尔·亨德森：《太阳能时代的政治学》，纽约，铁锚图书公司，1981，第 171 页。引文（依次）引自第 337、364、373 页。

⑤ 詹姆斯·罗伯逊：《明智的选择》，明尼苏达，圣保罗，江河流域出版社，1979。

案中，“两性都有平等的社会地位，男女收入平等，平等地从事家务、照料孩子和其他社会活动”。[1]

把这些和其他经济分析统一起来的主题，虽然对于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明确的。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建立在（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以称之为**造福于人的劳动的异化**之上。[2] 当这种造福于人的劳动——养育、帮助和爱别人等维持生命的劳动——完全被纳入经济主流时，我们将发现一种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变革。[3] 渐渐地，当占人类一半的女性和在男性统治制度中被标以女人气的价值和目标被彻底纳入社会的指导机制时，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健康而平衡的制度将会出现。到那时，由于已被统一到女权主义的、和平的、保护生态平衡的、发挥人类潜能的及其他男女合作运动所展望的全球大家庭中，我们这个物种将开始实现其进化的全部潜能。

转　化

走向一个在心理上和社会上新生的新世界的运动，将需要我们还无法预言或者甚至无法想象的变革。由于以前对于社会改良的希望后来大多都失败了，所以关于一个积极未来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然而，我们知道，结构的变化也是功能的变化。正如一个人无法坐在一个圆屋子的角落里那样，当我们从一种统治者的社会向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转化时，我们的旧的思想、感觉和行动方式将逐渐被改变。

自从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类精神一直被男性统治的枷锁束缚着。我们的精神的成长一直受到阻碍，我们的心灵一直被麻痹。但是，我们追求真理、美和正义的热情绝不会被熄灭。正如打碎了这些枷锁，我们的精神、心灵和手将获得解放那样，我们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也将获得解放。

---

① 约瑟夫·休伯：《社会生态学和二元经济》，《不同的劳动，不同的经济》（法兰克福，斐舍尔出版社，1979）的英文节录。

② 我受益于 H. 罗斯的《手、脑和心：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因为她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个中心观点（参见本书第 228 页注⑥）。

③ 理安·艾斯勒和洛耶的《开创自由》和理安·艾斯勒的《出现》（在写作中）更深入地讨论了这种经济转化。

我个人认为，从男性统治向男女合作的转化最形象的比喻之一是毛虫蜕变为蝴蝶。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形象，它表达了人类飞向她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幻想，因为蝴蝶是古代的一种表示新生的象征，是属于女神的那种变形力量的一种显灵。

有两本书——《开创自由》和《出现》——将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这种转化。它们将设计一张关于社会现实的新蓝图——不是关于一种乌托邦（在希腊语中，这个字的字面含义是“乌有之乡”）的蓝图，而是关于一种现实之乡，关于一种伙伴关系的未来的可行方案的蓝图。虽然用几页篇幅显然无法概括这两本书将要展开的内容，但是在我们重新恢复我们被中断的文化进化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用对某些变化的简略素描来结束本章的论述。[①]

当我们从统治者社会向伙伴关系社会前进时，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再次懂得摆脱战争恐惧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摆脱了男性统治的世界里，随着妇女地位和更加“女性的”社会优先权的提高，核毁灭的危险将逐渐减少。同时，当妇女获得更加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因此出生率可能与我们的资源更加平衡——时，马尔萨斯所说的饥荒、疾病和战争的“必然性”将逐渐减小。[②]

因为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谈到了人口过剩、“男人的征服本性”，以及这样的事实：在男性统治的制度下，环境的“家务管理”并不是“男性”政策的重点，所以我们的环境的污染、退化和衰竭等问题在转化的年代里将同样开始减少。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短缺方面，以及在化学污染造成的卫生问题方面，结论也应该是这样。[③]

---

① 参见理安·艾斯勒：《现实之乡：关于一种可能的未来的妇女乌托邦和方案》（为乌托邦研究协会第 11 届大会准备的论文，加利福尼亚，阿西洛马，1986 年 10 月 2～5 日），本文第一次采用了“现实之乡”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一个现实的地方，一种可以实现的未来，和常用的“乌托邦”这个术语相反，乌托邦的字面意思是“乌有之乡”）。

② 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无法维持现在的人口增长率，因此，问题不在于人口增长是否会稳定下来，而在于如何稳定人口增长。参见，例如，J. 索尔克：《世界人口和人类价值：一种新的现实》，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81。还可参看理安·艾斯勒：《和平、人口和妇女的作用》，载于《世界和平百科全书》，拉兹洛和约主编。

③ 这个问题将在艾斯勒的《出现》中更深入地加以讨论。还可参看德·奥博纳：《女权运动和死亡》，伊丽莎白·D. 格雷：《失去的绿色乐园》（马萨诸塞，韦尔斯利，圆桌出版社，1979），以及其他生态女权主义者的著作。

当妇女不再被有计划地排斥于财政援助、政府赠与土地和现代化培训之外的时候，第三世界推动教育和技术发展以及提高生活标准的经济发展纲领就会变得更加有效。今天，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的经济衰退和千百万人民遭受的可怕痛苦也将大大缓解。因为，当妇女不再被作为育种动物和负重牲畜来对待，而是得到更多的健康治疗、教育和政治参与权时，不仅占人类一半的妇女，而且全人类都将受益无穷。[①]

有了旨在成功地减少世界上大量穷人——妇女和儿童——的贫困与饥饿状况的更加理性的方法，日益意识到我们和我们人类中所有其他成员的联系就会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事实上，当数十亿美元和工作时间从毁灭性的技术转用到维持和提高生命的技术上时，人类的贫困和饥饿可能逐渐变成对野蛮的男性统治历史的回忆。[②]

男女关系从现在的高度猜疑和互相指责向更加坦诚和信任的变化，将反映在我们的家庭和社区中，对我们的国际政策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将逐渐看到，现在折磨我们的似乎没完没了的日常问题——精神病、自杀、和妻子离婚及打孩子、谋杀、破坏狂和国际恐怖主义——在减少。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第二本书中所详细研究的那样，这类问题大部分产生于男性统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极其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统治者以暴力为基础的教养孩子的暴虐作风。因此，随着男女关系向着更平等和平衡的方向的变化，以及对男女儿童更加温柔、爱和关心等行为的强化，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期望发生基本的精神变革。这些变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反过来加快转化的步伐。

在将来的世界里——那时，妇女和男人生活在完全是伙伴的关系中——当然仍然存在家庭、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但是，就像现在已经出现了平等主义的家庭、风俗和社会活动网那样，未来的社会结构的

① 参看，例如，《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巴巴拉·罗杰斯：《妇女的家务：发达社会中的歧视》，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9；梅拉·布维尼克、纳迪亚·朱瑟夫和巴巴拉·冯·埃尔姆：《妇女主持家务：发展计划中受忽视的因素》，华盛顿特区，国际妇女研究中心，1978；梅·里哈尼：《似乎和妇女有关的发展》，华盛顿特区，海外发展委员会，1978；理安·艾斯勒：《性平等的全球冲击》，载于《人道主义者》1981 年 5 ~6 月第 41 期。

② 参看，例如，西瓦德：《1983 年世界军费和社会经费》，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自由主义的败北：从一种新的女性—男性观对意识形态的重新估价》，载于《政治心理学》1983 年第 4 期，第 375 ~391 页。

基础将是联系而不是等级。这些机构不再要求个人符合金字塔形的等级制，而是平等的，允许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时既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因此，妇女和男人的作用都将是非常灵活的，允许全人类最大限度地灵活发展。[①]

在保持目前趋势的情况下，我们的许多新机构也更将是全球范围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当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我们同环境的联系的意识坚定不移地保持下来时，我们可以希望看到，作为一种只顾私利的政治实体的旧的民族国家将会消亡。然而，与其说是更加一致和一元化——从统治者制度的观点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设想——不如说是更加个人化和多样化。较小的社会单位为了达到某些共同的目标将连接成矩阵或网络。这些共同的目标可能是合作开发海洋资源、探索太空、分享知识，或是发展艺术。[②] 还将有其他的、现在还无法预见的全球性的企业，以便发展更公平合理、更有效的方法来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新的物质和社会发明。此刻，在我们目前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还无法预见这些发明。

随着全球向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转变，将会出现许多技术上的突破。现有的技术也将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正如舒马赫和其他人所预见的那样，手工艺领域中的某些现有的技术可能是更好、劳动更密集的技术，例如，回到最优秀的创造性的和个性化的编织、木工、制陶和其他应用技术。但是，与此同时，既然目的是要把人类从昆虫般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领域都退回到劳动更密集的技术。相反，为了让我们得到时间和精力实现我们的创造性潜能，我们可以期望现代化和自动化发挥一种甚至更加维护生命的作用。而且将既利用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也利用大规模的生产方法，以便鼓励——实际上是要求——工人参与，而不是像在一种统治者制度中那样把工人本身变成机器或自动机。

发展更安全和更可靠的节育方法，将是技术上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我们还将看到大量有关了解和延缓衰老过程的研究，从已经出现的更换身体的陈旧部分的技术到再生身体细胞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实验室中创

---

① 参见，例如，卢瑟·格拉克和弗吉尼亚·海因：《人民、权力、变革：社会转化运动》，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公司，1970。

② 参见，例如，E.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1973；亨德森：《太阳能时代的政治学》。

造生命的技术更趋完善。但是，这种新的繁殖技术并不是要取代妇女，或者把妇女变成人工培育细胞的孵卵器。不管妇女还是男人都将认真评估这种新的生育技术，以保证它们完全实现两性的全部人类潜能。[①]

由于毁灭性的技术不再消耗和毁灭我们的大部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所以到目前为止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而且目前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事业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正如我们的男女合作的史前时代所预示的那样，结果将是普遍的经济繁荣。不仅物质财富的分配将更加平等，而且这也将是一种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秩序中，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用以保护自己和控制别人将被看成是病态或变态。

在实现上述这一切时，将有许多经济阶段。第一阶段——它已经在出现——将是一种所谓的混合经济，即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某些最好的成分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而且在有着多种多样分散的合作生产和分配的单位的意义上，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②] 人类不仅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拥有基本的经济权利的社会主义概念，当然将是以关心而不是以统治为基础的男女合作经济的中心概念。但是，当伙伴关系社会取代统治者社会时，我们还可以期待新的经济发明。

在这种新的经济秩序的核心，将是现在失败了的“二元经济”的替代物。在这种二元经济中，正如亨德森所证明的那样，以金钱、地位和权力作为奖赏的男性统治的经济成分，在其工业化的诸阶段中，“不仅必然要毁灭社会系统，而且还要毁灭生态系统”。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指望的与金钱无关的“非正式”经济——家庭生产和扶养儿女、赡养父母、社区志愿服务以及所有的合作活动，这种合作的活动使现在“得到过分酬劳的竞争活动显得很成功”——将得到适当的评价和赞扬。[③] 这将为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关心他人不仅是只得到口头表扬的，而且得到最高奖赏的，因此也是得到最高评价的人类活动——提供现在还缺少的基础。

---

① 关于新节育技术的男性统治方案，参见，例如，温迪·福克纳和埃里克·阿诺德主编《被发明窒息：妇女生活中的技术》，伦敦，普卢托出版社，1985；蒂塔·阿迪丽、雷纳特·D. 克莱思和谢利·明顿主编《试管妇女：母性的将来?》，伦敦，罗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84。

② 关于研究这些可能性的一本著作，参见马丁·卡诺耶和德里克·谢勒：《经济民主》，纽约，夏普出版社，1980。

③ 亨德森：《太阳能时代的政治学》，两段引文均引自第365页。

像使女性残疾、殴打妻子之类的做法，以及所有其他多少有点野蛮的做法——男性统治正是通过这些做法使妇女“安于她们的地位”——当然不会被认为是神圣的传统，相反，这些做法被认为是男性非人道地对妇女所犯下的罪行。[①] 就男人非人道地对待男人而言，由于“英雄”史诗和神话不再歌颂男性暴力，所以统治和征服等所谓的男性美德也将被认为是一个物种残忍和野蛮地对待自身的心理失常。

通过重新肯定和赞扬圣杯所象征的起改造作用的神秘事物，新的神话将重新在我们心中唤起那种已经丧失了的对生命的感激和赞美感，即在新石器时代和米诺斯克里特的艺术中还十分明显地残存着的那种对生命的感激和赞美感。通过把我们和我们在战争、等级制和男性统治成为我们的统治规范之前的比较单纯的精神根基重新联系起来，这种神话就不会在心理上把我们推回到我们人类在技术上仍处于幼稚时代的那个世界。相反，通过把我们的男女合作的神话和象征等古代遗产与现代观念结合在一起，它将把我们推向一个将是更加理性的世界，在理性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个由这样的意识——不仅在生态上，而且在社会中，我们彼此以及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是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所激励和指导的世界。

同对生命的赞美一起来到的将是对爱的赞美，包括对男女之间性爱的赞美。性结合通过某种我们现在称作婚姻的形式肯定会继续下去。但是，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将是彼此的伴侣关系、性快乐和爱。生孩子将不再与继承男性的姓名和财产联系在一起。而且其他的亲属关系——不仅仅异性爱的夫妻——也将得到完全承认。[②]

所有这些制度——不仅仅是那些专门为儿童社会化所设计的制度——的目的，都是要实现我们伟大的人类潜能。只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与其说是人类生活的数量，不如说是人类生活的质量才是至高无上的——才能拥有这样一种目的。因此，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预言的那样，儿童将是宝贵的，因此受到高度重视。[③]

---

① 理安·艾斯勒：《人权：未完成的斗争》，载于《国际妇女研究杂志》1983 年 9～10 月第 6 期，第 326～335 页。

② 理安·艾斯勒：《解决：顺利的离婚、结婚和妇女的未来》，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77。

③ 米德：《我们的开放的最终未来》；理安·艾斯勒和戴维·洛耶：《童年时代和选择未来》，载于《临床儿童心理学杂志》1980 年夏第 9 期。

妇女和男人都将积极关怀性格形成时期的儿童。不仅亲生父母，而且其他许多成年人都将为全社会最宝贵的产品——人类的儿童——尽各种各样的责任。合理的营养以及身体和精神的训练——例如，比较先进的瑜伽功和沉思冥想——将被认为是健康的身体和精神的基本前提。正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的那样，学习——并不是要使男女儿童社会化，以便适应他或她在一个等级秩序世界里的地位——将是一个终生的过程，以便在生活的所有阶段里最大限度地发挥灵活性和创造性。

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我们更高的进化潜能，即通过智慧和知识获得我们的更大自由，将指导我们的社会政策，最受重视的研究工作是预防个人和社会身心疾病。此外，我们至今还没有开发但已日益认识到的精神力量将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培育。结果将是，至今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精神和物质的潜能将被揭示出来并得到发展。[1]

因为重要的是，这个男女合作的世界将是一个儿童——女孩和男孩——的心灵在其中不再受到束缚的世界。它将是这样的世界，在那里，将不再通过关于我们人类仍以必然是邪恶和堕落的神话有计划地教我们学会克制和恐惧。在这个世界里，不会把关于男人因为是凶暴的而受到尊敬的史诗教给儿童，也不会把关于他们在阴森恐怖的森林里（在那里，妇女是恶毒的女巫）迷失的虚构故事教给儿童。他们将学到新的神话、史诗和故事：在这些神话、史诗和故事中，人类是善良的，男人是爱好和平的；创造性的力量和爱的力量——神圣的圣杯，即生命的神圣容器所象征的力量——乃是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因为在这种男女合作的世界里，我们对正义、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我们对知识和精神启示的渴望，以及我们对爱和美的向往，最终都将获得满足。而且在走完男性统治的血腥的历史弯路之后，妇女和男人最终都将发现人类潜在的意义。

① 戴维·洛耶：《斯芬克斯和彩虹：脑、精神和未来的想象力》，波士顿，新科学图书馆出版社，1983。

图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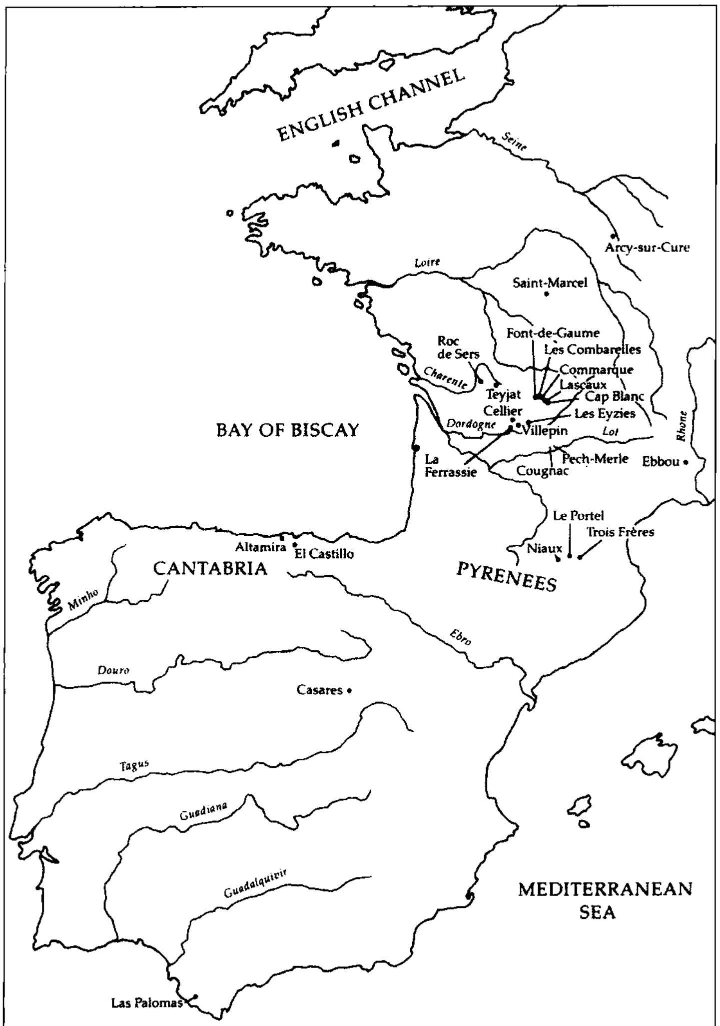


图 1　西欧旧石器时代洞窟艺术主要遗址

注：在东欧的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艺术。

资料来源：采自安德烈·勒鲁瓦－古朗：《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进化》，载于《科学的美国人》1986 年 2 月第 218 期，第 2 号，第 62 页。

表 1　安德列·勒鲁瓦－古朗的旧石器时代艺术年表*

年代（公元前）	文　化	时　期
5000	—	—
10000	晚期马格德林时代 V－VI	古典时期 （风格IV）
	中期马格德林时代 III－IV	
	早期马格德林时代 I－II	古代时期 （风格III）
15000	梭鲁特文化	
	格雷维特和梭鲁特文化之间的文化	远古时期 （风格II）
20000	格雷维特文化	
25000		远古时期 （风格I）
	奥瑞纳文化	
30000		

*（公元前约 30000 年至公元前约 10000 年）本表从下往上读。

资料来源：采自安德烈·勒鲁瓦－古朗：《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进化》，载于《科学的美国人》1968 年 2 月第 218 期，第 2 号，第 63 页。

表 2　詹姆斯·梅拉特的哈希拉和卡塔尔·惠雅克年表*

哈希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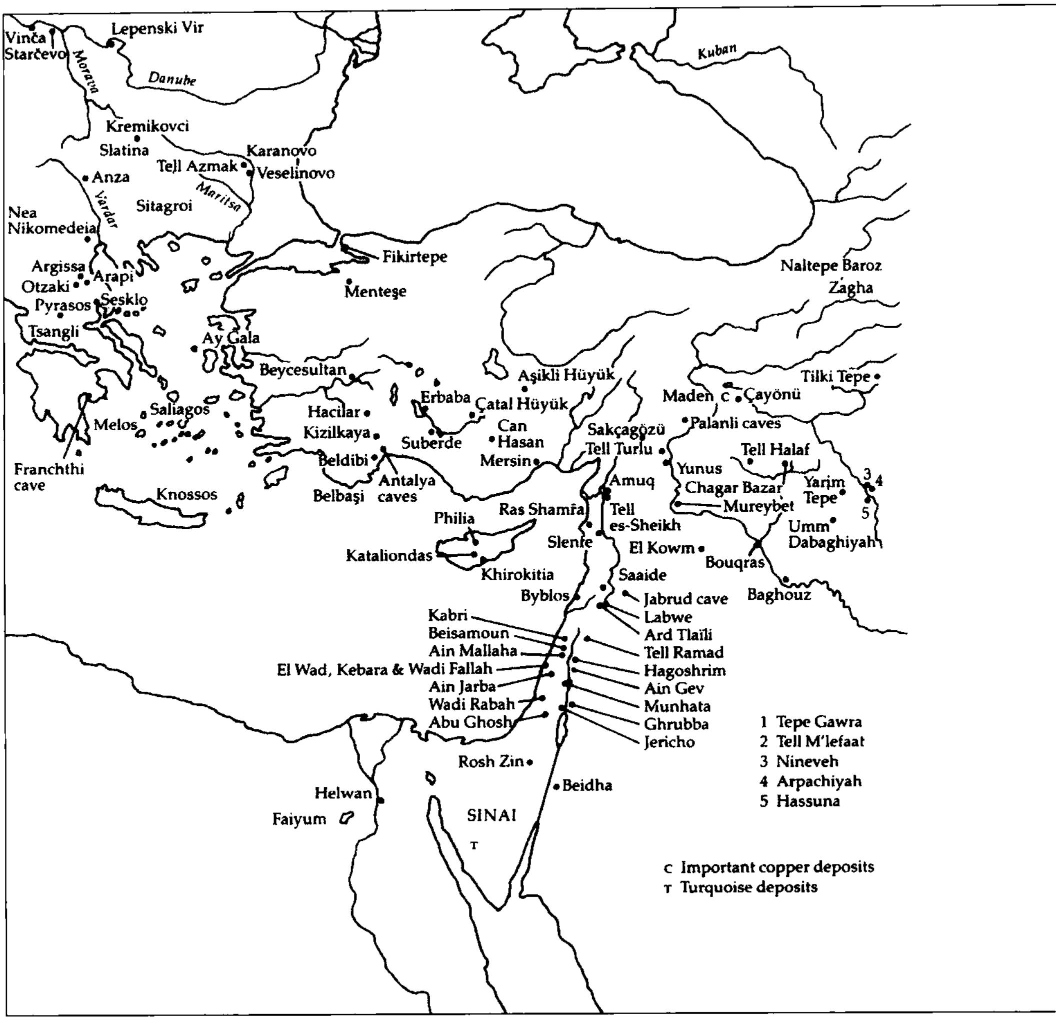
年代	层	测定年代
公元前约 5000		
	I d I c	—
约 5250		
	I a	5247 ± 119
	II b II a	5434 ± 131
约 5435	III IV	—
约 5500	V	—
约 5600	VI VII	5620 ± 79
	VIII IX	5614 ± 92 →5706
约 5700		

卡塔尔·惠雅克

年代	层	测定年代	
	0 I		
约 5720			
	II	5797 ± 79	
约 5750			
	III	5807 ± 94	
约 5790			
	IV	(6329 ± 99)	
约 5830			
	V	5920 ± 94	
约 5880			
	VI A	5781 ± 96 5800 ± 93 5815 ± 92 5850 ± 94	毁灭 开始
约 5950			
	VI B	5908 ± 93 5986 ± 84	 开始
约 6050/6070			
	VII	6200 ± 97 (?)	
约 6200			
	VIII	—	
约 6280			
	IX	6486 ± 102	
约 6380?			
	X	6385 ± 101	
约 6500			
	前 X 地层（还无日期）		

* （公元前约 6500 年至公元前约 5000 年）本表从下往上读。阿拉伯数字表示年代水平。罗马数字表示和发展水平相应的出土文物水平。

资料来源：詹姆斯·梅拉特：《卡塔尔·惠雅克》，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7，第 52 页。


Vinča
Starčevo
Lepenski Vir
Morava
Danube
Kuban
Kremikovci
Slatina
Karanovo
Tell Azmak
Veselinovo
Anza
Maritsa
Vardar
Sitagroi
Nea Nikomedeia
Fikirtepe
Menteşe
Naltepe Baroz
Zagha
Argissa
Arapi
Otzaki
Sesklo
Pyrasos
Tsangli
Ay Gala
Beycesultan
Aşikli Hüyük
Tilki Tepe
Maden
c
Çayönü
Erbaba
Çatal Hüyük
Saliagos
Melos
Hacilar
Kizilkaya
Suberde
Can Hasan
Mersin
Sakçagözü
Tell Turlu
Palanli caves
Tell Halaf
Franchthi cave
Beldibi
Antalya caves
Belbaşi
Knossos
Yunus
Amuq
Chagar Bazar
Yarim Tepe
Mureybet
Ras Shamra
Tell es-Sheikh
Philia
Umm Dabaghiyah
Slenfe
El Kowm
Bouqras
Kataliondas
Khirokitia
Saaide
Byblos
Jabrud cave
Baghouz
Labwe
Kabri
Beisamoun
Ard Tlaili
Ain Mallaha
Tell Ramad
El Wad, Kebara & Wadi Fallah
Hagoshrim
Ain Jarba
Ain Gev
Wadi Rabah
Munhata
Abu Ghosh
Ghrubba
Jericho
Rosh Zin
Beidha
Helwan
Faiyum
SINAI
T
1 Tepe Gawra
2 Tell M'lefaat
3 Nineveh
4 Arpachiyah
5 Hassuna
c Important copper deposits
T Turquoise deposi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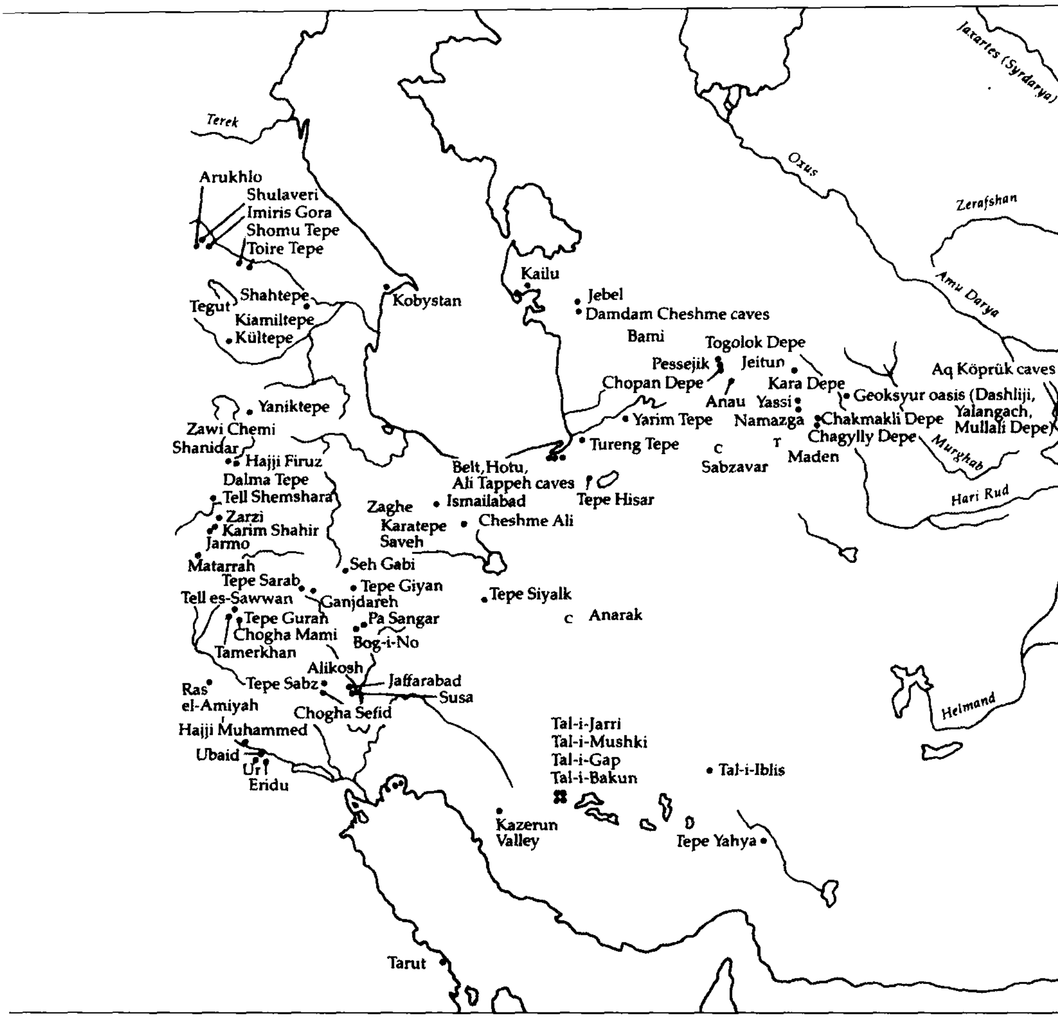


图 2　近东发现的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遗址

注：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这个术语指的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或农业的开端）之间的转变时期。不断发现的遗址表明了早期文化发展的范围。

资料来源：采自詹姆斯·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975，第 20、21 页（版权归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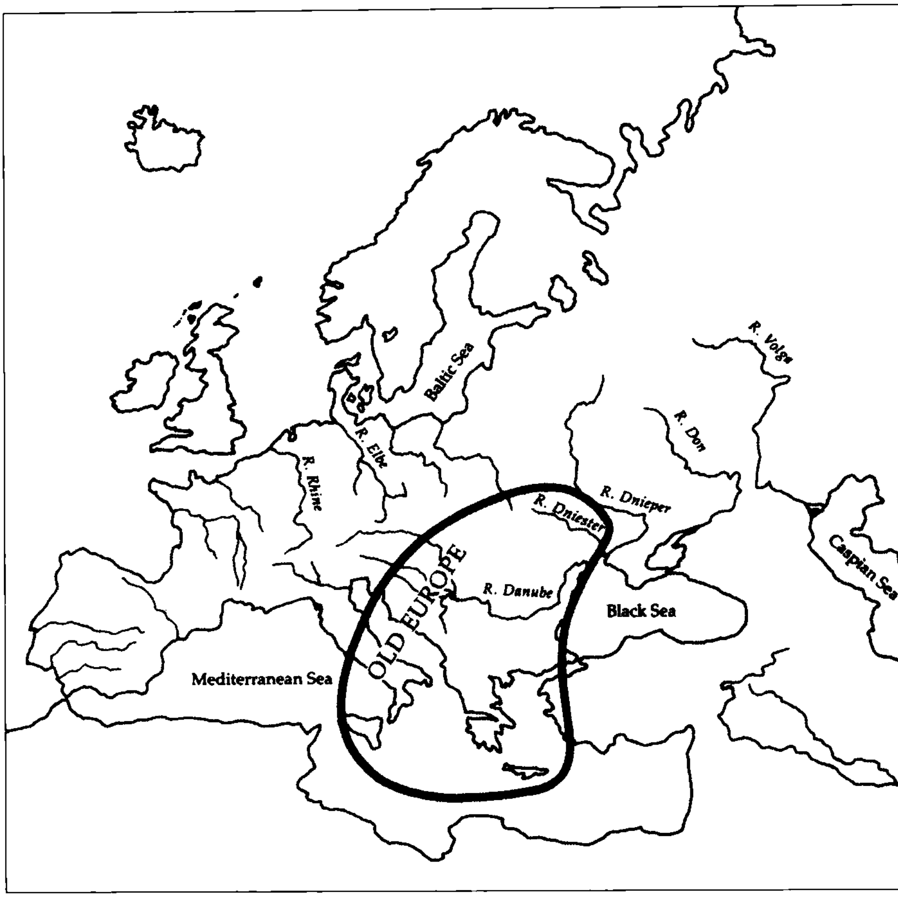


图 3　古代欧洲早期文明的大致范围

（公元前约 7000 年至公元前约 3500 年）

注：**古代欧洲**这个术语指的是从公元前约 7000 年延续到公元前约 3500 年的东南欧文明，但是，这个术语也可以用于印欧人入侵前的整个欧洲，包括从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的巨石器时代的西欧（爱尔兰、马耳他、撒丁岛和大不列颠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化。

资源来源：采自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 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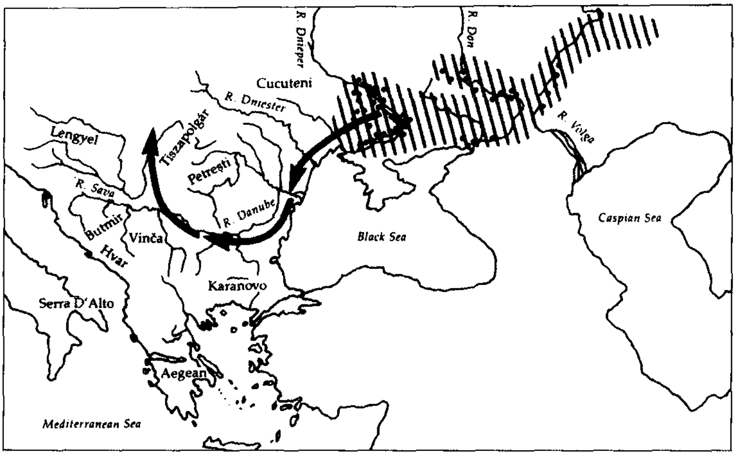


图 4　第一次库尔干浪潮（公元前约 4300 年至公元前约 4200 年）

注：黑色箭头表示库尔干人最早入侵的主要路线，他们主要袭击了古代欧洲的卡拉诺沃、温恰、伦格耶尔和蒂萨波尔加文化。

资料来源：原图最初刊在《印欧研究杂志》第 5 卷，第 4 期（1977 年冬季号），第 233 页。1986 年马里亚·金布塔斯为本书作了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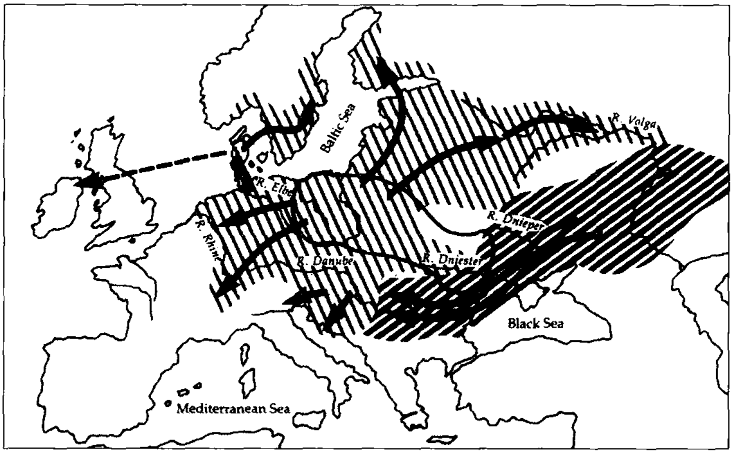


图 5　第三次库尔干浪潮（公元前约 3000 年至公元前约 2800 年）

注：箭头和阴影地区表示库尔干人后来从草原地区（图中粗黑线条表示的东部地区）和从混合文化地区（例如，图中央的粗黑线条画的长方形地区）的入侵。虚线箭头表示入侵爱尔兰的可能路线。

资料来源：原图最初刊在《第四和第三个千年的印欧人》（卡罗马出版社，1982）上，1986 年金布塔斯为本书作了修订。

表 3　马里亚·金布塔斯的古代欧洲文化繁荣和毁灭年表

（公元前约 7000 年至公元前约 2500 年）

时间公元前	主　要　事　件
7000 ~ 6500	在爱琴海沿海地带的山谷中生产谷物和定居村落生活开始阶段。
6500 ~ 6000	在爱琴海、中部巴尔干和亚得里亚海地带生产陶器的繁荣的新石器时代。
6000 ~ 5500	农业经济传播到多瑙河下游和中游流域（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传播到保加利亚中部的马里卡平原，并出现在德聂斯特·巴格地区。
5500 ~ 5000	谷物生产经济从欧洲的中东部地区传播到欧洲中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波兰南部、德国和荷兰（线陶文化）。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开始冶炼铜。村庄数目日益增加。在宗教仪式中开始命名祭祀用品。温恰、蒂萨、伦格耶尔、巴特米尔、达尼洛和卡拉诺沃文化的兴起。
5000 ~ 4500	古代欧洲文化的高潮。制陶艺术和建筑（包括两层楼的神殿建筑物）的全盛时期。在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西部出现了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文化，在特兰西瓦尼亚出现了佩特雷斯蒂文化。
4500 ~ 4000	古代欧洲继续兴盛的时期。铜和金的使用日益广泛，贸易日益繁荣。出现了车辆（泥制的小车轮模型）和驯养的马。草原游牧者第一次浪潮后来促使卡拉诺沃、温恰、佩特雷斯蒂和伦格耶尔文化开始瓦解。
4000 ~ 3500	最初的库尔干化：习惯模式、社会结构、经济和宗教的明显变化。古代欧洲艺术的衰落；小雕像、彩陶和神殿建筑绝迹了。在多瑙河下游和多布罗加出现了库尔干化的塞纳沃达文化。
3500 ~ 3000	来自黑海北部的第二次库尔干民族的入侵浪潮。青铜时代开始。黑海周围形成了冶金地区。库库特尼文明瓦解，出现了阿萨托沃—戈洛得斯克—福尔特斯提文化合成的库库特尼和库尔干文化的混合文化。保加利亚的以泽罗混合文化和多瑙河中部地区的巴登文化是由形成整个古代欧洲文化基础的东方（库尔干人）成分构成的。在欧洲的中北部出现了格洛布拉双耳陶瓶文化。
3000 ~ 2500	来自第聂伯河下游的下伏尔加平原的库尔干人第三次（或“贾姆那”）。入侵浪潮形成了横扫欧洲中东部的新高潮。种族转变：晚期巴登人和伏西多尔人变成了波希米亚人、中部日尔曼人、波斯尼亚人和亚里亚里海沿岸的人。大肚大酒杯民族（可能是库尔干化了的中欧人）大部分变成了西欧人。在莱茵河和第聂伯河之间成了由格洛布拉双耳陶瓶、长脖大酒杯文化和新的东方（“贾姆那”）文化成分混合而成的棱纹陶器复合文化，它和后来广泛传播的棱纹陶器文化传到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东部和第聂伯河及伏尔加河上游地区。

资料来源：原表最初刊在《印欧研究摘要》（第 131 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0，第 5 ~ 7 页）上，金布塔斯 1986 年为本书作了修订。

表 4　古代欧洲文化和库尔干文化比较

	古代欧洲文化	库尔干文化
经　济	农业（没有马）、定居经济	游牧（有马）经济
聚居地	大规模群居，村庄和城镇，没有山地要塞	半地下房屋组成的小村落首领从要塞里进行统治
社会结构	平等主义的母系制	家长制的，定居于丈夫部落
意识形态	爱好和平的、热爱艺术的妇女创造者	好战的男人创造者

资料来源：原表最初刊于《印欧研究杂志》第 5 卷，第 4 期（1977 年冬季号），第 283 页。金布塔斯 1986 年为本书作了修订。

表 5　克里特和其他古代文明的年代对比*

时　间 公元前	克里特 普拉东的年表	克里特 伊万斯的年表	其他古代文明选择 最重要的年代事件
6000	早期新石器时代 I	早期新石器时代	卡塔尔·惠雅克繁荣于安纳托利亚。 在泰国栽种稻米。 农业文化开始在欧洲和近东发展。
5000	早期新石器时代 II	中期新石器时代	开拓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殖民地。 埃及发展了农业定居地。 墨西哥种植玉米。
4000	中期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经济输入不列颠。 布列塔尼的早期巨石器时代遗迹。 中国的家庭养蚕。
3000	晚期新石时代	晚期新石时代	在地中海发展的基克拉泽斯文化。 农业耕作技术传入中非。 美州最初的陶器。 埃及第一王朝。
2600	前宫殿时期 I	早期米诺斯 I	文明在印度河流域的成长。 乌尔第一王朝。 在埃及建造基奥普斯金字塔。
2400	前宫殿时期 II	早期米诺斯 II	苏美尔的阿卡德时期。 埃及第五王朝。
2200	前宫殿时期 III	早期米诺斯 III	埃及第七王朝。 新苏美尔时期。
2000	古宫殿时期 I	中期米诺斯 I	在印度河流域驯养大象。 乌尔第三王朝。 埃及中王国时期。

续表 5

时　间 公元前	克 里 特 普拉东的年表	克 里 特 埃文斯的年表	其他古代文明选择 最重要的年代事件
1900	古宫殿时期Ⅱ	中期米诺斯Ⅱ	巴比伦第一王朝。
1800	古宫殿时期Ⅲ	—	汉谟拉比统治的巴比伦。
1700	新宫殿时期Ⅰ	中期米诺斯Ⅲ	希克索人征服埃及。
1600	新宫殿时期Ⅱ	晚期米诺斯Ⅰ	商朝文明在中国发展。
1450	新宫殿时期Ⅲ	晚期米诺斯Ⅱ	说亚利安语的民族征服印度。
1400	后宫殿时期Ⅰ	晚期米诺斯Ⅲ	赫梯帝国兴起。
1320	后宫殿时期Ⅱ	—	亚述作为军事强国兴起。 希伯来部落征服迦南。
1260	后宫殿时期Ⅲ	—	赫梯帝国灭亡。
1150	亚米诺斯	亚米诺斯	中国商朝灭亡。 地中海的迈锡尼文明灭亡。 在亚述提革拉—帕拉萨一世 强化统治下对近东的征服。

＊以阿瑟·埃文斯爵士和尼古拉斯·普拉东的年表为依据的克里特文明的发展和其他古代文明（时间只是近似的）的最重要事件的比较。

资料来源：阿瑟·埃文斯爵士：《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1～4 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1～1935；尼古拉斯·普拉东：《克里特》，日内瓦，内格尔出版社，1966；詹姆斯·梅拉特：《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975；以及关于世界历史的百科全书和图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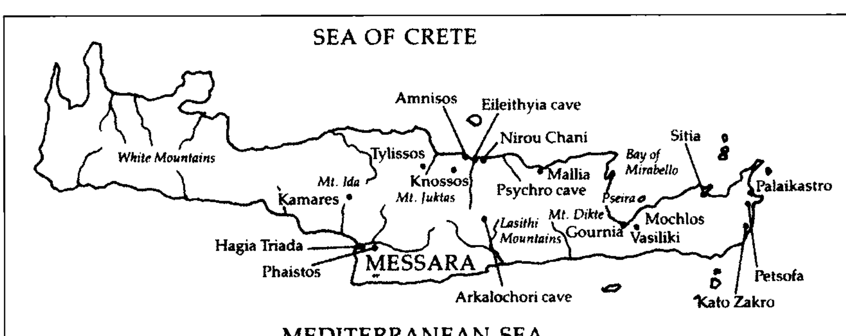


图 6　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主要遗址

资料来源：采自詹姆斯·霍克斯：《诸神的黎明：希腊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 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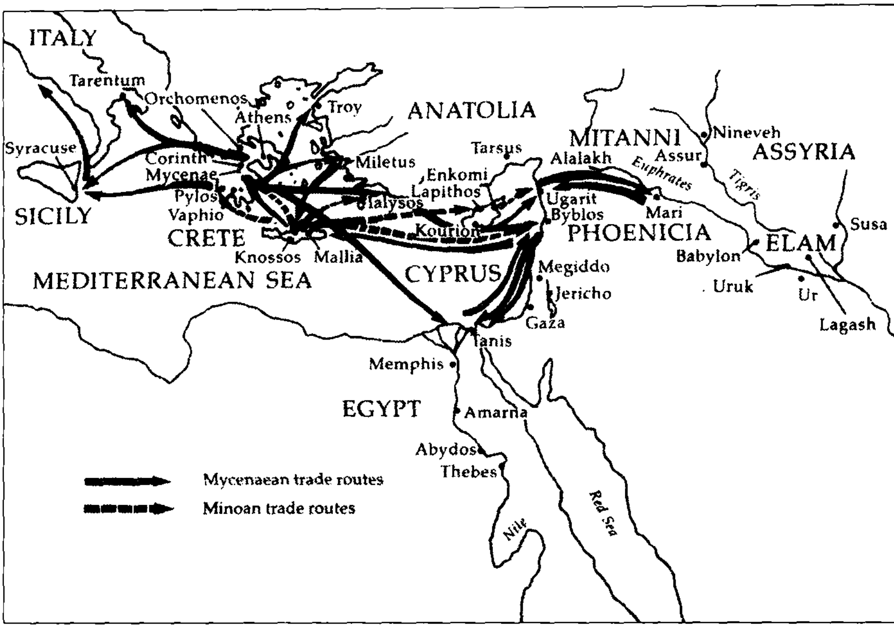


图 7　米诺斯和迈锡尼的贸易路线

资料来源：采自詹姆斯·霍克斯：《诸神的黎明：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渊源》，纽约，伦道姆出版社，1968，第 21 页。

致　谢

本书是以多种方式所作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利用了无数男女的著作和观点，对于他（她）们中的许多人，作者已经在注解中表示了谢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在编辑、手稿准备方面给予作者的批评、建议和帮助，尤其是过去10多年来给予作者的支持和鼓励，都是无法估量的。

戴维·洛耶——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对于本书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无法恰如其分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位非凡的人多年来的全心全意和积极的合作，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常常放下自己重要的工作，慷慨无私地以超人的耐心奉献出他的学识、思想、编辑技巧和理解。

许多妇女对本书给予了慷慨的帮助。我特别要向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内特·爱莉茜表示衷心的谢意。作为一位心理学教授和科学编辑顾问，她撇下自己繁忙的日常工作，几次阅读了最后形成本书的大量手稿。她在校阅本书时所提出的坦率的批评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对于我偶尔松懈的精神是一种巨大的帮助。我还要对卡罗尔·安德森、弗兰·霍斯肯、马拉·凯勒、丽贝卡·麦卡恩、艾索林娜·里奇和不久前去世的威尔玛·司各特·海德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们每位都阅读了本书不同阶段的手稿的全部或大部分，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慷慨无私地奉献了她们的支持和爱。《圣杯与剑》和我还要对阿什利·蒙塔古表示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他没有去完成自己的两本书而是逐字逐句、不漏掉每个注解地审阅了本书。这样一位为了改善人类的处境而奉献了自己漫长而非凡的创造性生命的大部分时光的人，对我的书所表示的信心对我来说乃是一种巨大的帮助和鼓舞。

我还应该开列另一张名单才能恰如其分地感谢以重要的方式对本书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我的女儿安德烈娅和洛伦·艾斯勒，我的代理人埃

伦·莱文，我的编辑简·约翰逊以及哈泼与罗出版社的其他许多编辑（他们是：克莱敦·卡尔森、汤姆·多萨尼奥、迈克·基霍、伊冯·基欧、多里安·高希和弗吉尼亚·里奇），以及在本书最后创作阶段热心关注本书的所有其他的人。

从他们各自学科的角度阅读了作为一本正在创作过程中的《圣杯与剑》的部分手稿并做出贡献的那些人有：考古学家马里亚·金布塔斯和尼古拉斯·普拉东；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和琼·罗克韦尔；精神病学家琼·贝克·米勒；文化和艺术史家埃莉诺·盖登和默林·斯通；比较文学家格洛丽亚·奥伦斯坦；生物学家维尔莫斯·昌尼；“混沌”和“自组织系统”理论家欧文·拉兹洛和拉尔夫·亚伯拉罕；物理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未来学家黑兹尔·亨德森和罗伯特·荣克；以及神学家卡罗尔·克赖斯特。阅读部分手稿或提供重要建议、信息、鼓励和支持的其他人有：（按字母顺序排列）安德拉·埃克斯、莱蒂·贝内特、安娜·比尼库斯、琼·布林德尔、玛丽·坎特龙、奥尔加·艾莱夫斯里亚得斯、朱莉娅·艾斯勒、梅尔·格雷夫、玛丽·哈迪、海伦·赫尔默、艾丽·希克森、伊丽莎白·霍尔姆、巴巴拉·霍尼格、阿尔·伊柯夫、埃德·贾维斯、阿比达·卡纽姆、萨姆森·诺尔、帕特·莱拉、苏姗·梅拉、玛丽和劳埃德·莫雷恩、希尔卡·皮蒂拉和柯塞特·汤姆森。名单很长，但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不可能提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因此，如果这里遗漏了谁的名字，我向他诚挚地道歉，因为我希望指名道姓地感谢在多年的研究和写作中不仅给我思想上的鼓励而且给我以情感上的支持的所有的人。

我的确应该特别感谢那些参与似乎没完没了的手稿准备工作的人，尤其是：珍妮·亚当斯、瑞安·邦兹、基德龙·布赖森、凯西·坎贝尔、西尔维亚·埃德格伦、伊丽莎白·多尔马特、黛安娜、伊丽莎白·哈林顿、彻里·朗、珍妮·麦格雷戈、迈克·罗森堡、辛迪·斯普拉格、苏姗娜·夏维奥纳、伊丽莎白·瓦伯和约·沃利。

人名和术语索引

（页码指正文外侧原书页码）

A

Aaron，亚伦，95
Aas，Berit，贝里特·阿斯，193
Abel，亚伯，63~64，101
Abraham，亚伯拉罕，96
Abraham，Ralph，拉尔夫·亚伯拉罕，135
Abzug，Bella，贝拉·阿布朱格，170
Achilles，阿喀琉斯，79
Actualization hierarchies，现实化的等级制度，106
Actualization power，现实化的权力，28
Adam，亚当，88~89，101
Adams，Henry，亨利·亚当斯，138，150
Addams，Jane，简·亚当斯，151
Adler，Alfred，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90
Adonis，阿多尼斯，23
Aegisthus，埃癸斯托斯，79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70，79，81，32，85
Agamemnon，阿伽门农，79
Agape，爱的会餐，193
Agriculture，invention of，农业的发明，69
Aiken，Henry，亨利·艾肯，156
Akenakes，阿克那克那，49

Allen, Paula Gunn, 保拉・冈恩・艾伦, 170
Amunoph Ⅲ, 阿蒙诺甫三世, 40
Anaximander, 阿那克西曼德, 111
Anaximenes, 阿那克西米尼, 109
Androcracy, defined, 明确的男性统治, 105, 106
Anthony, Susan B, 苏珊・B. 安东尼, 150
Antrobus, Peggy, 佩吉・安特罗伯斯, 193
Aphrodite, 阿佛洛狄忒, 22, 109
Apocrypha, 伪经, 86
Apollo, 阿波罗, 78, 87
Aptheker, Bettina, 贝蒂娜・阿普特克, 149
Aquila, 阿奎拉, 123
Arditti, Rita, 丽塔・阿迪提, 191
Ares, 阿瑞斯, 81, 108
Arete, Queen, 阿瑞特皇后, 107
Arete of Cyrene, 昔兰尼的阿瑞特, 114
Ariadne, 阿里阿德涅, 22
Arignote, 阿里格诺特, 114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115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06, 111, 118
Aristoxenus, 亚里士多塞诺斯, 112
Arizpe, Lourdes, 卢尔兹・阿里兹普, 149
Art, Cretan, 克里特艺术, 32, 34, 36, 37, 40～41; 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 17～21, 74
Artemis, 阿耳忒弥斯, 55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70
Asherah, 阿瑟拉, 88
Ashtoreth, 阿什托雷斯, 87
Aspasia, 阿斯帕西娅, 114, 115
Astarte, 阿斯塔特, 7, 30, 87
Atargatis, 阿塔迦蒂斯, 7, 86
Athene, Athena, 雅典, 雅典娜, 55, 78, 80, 86, 87, 107, 109, 113

Atlantis, legend of, 阿特兰提斯传说, 57, 62 ~ 63
Attis, 阿提斯, 23
Attractors, 吸引子, 136, 137
Atwood, Margaret,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170
Avebury, 埃夫伯利, 74
Axiothea, 阿克西奥提娅, 115

B

Baal, 巴力, 87
BaMbuti, 班布提, 73, 185
Baranamtarra, 巴拉那姆塔拉, 65
Bar Kokhlo 巴尔·科赫巴, 130
Barrow, Dame Nita, 戴姆·妮塔·巴罗, 170
Barry, Kathleen, 凯瑟琳·巴里, 193
Bartchy, Prof. S. Scott, S. 斯科·巴契教授, 128, 129
Beard, Mary, 玛丽·比尔德, 148, 149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娜·德·波伏娃, xxiii
Behn, Aphra, 阿弗拉·贝恩, xxiii
Bernard, Jessie, 杰西·伯纳德, xxiii, 146, 147, 170, 190
Bernard of Clairvaux, 明谷的伯纳德, 139 ~ 140, 181
Bible, 《圣经》, 93 ~ 96
Bird, Caroline, 卡罗琳·伯德, 193
Birth, as dirty, 生育肮脏, 101 ~ 103
Botticeli, Sandro, 桑德罗·波提切利, 22
Boulding, Elise, 埃莉斯·博尔丁, 115, 170
Breuil, Abbe, 修道院院长布日耶, 4
Bridenthal, Renate, 雷纳特·布里登撒尔, 149
Briffault, Robert, 罗伯特·布里福尔特, 69
Brindel, June, 琼·布林德尔, 170
Brock-Utne, Birgit, 伯吉特·布罗克 – 厄特恩, 193
Broner, E. M, E. M. 布罗纳, 170

Brownmiller, Susan, 苏珊·布朗米勒, 149
Buchholtz, Hans-Gunther, 汉斯－根室·巴克霍尔兹, 32, 41
Bull, 公牛, 22
Bunche, Charlotte, 夏洛特·邦奇, xxiii, 170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165
Butterfly, 蝴蝶, 18

C

Cain, 该隐, 63～64, 101
Caldicott, Helen 海伦·卡尔迪科特, 170
Calypso, 卡吕普索, 107
Campbell, Joseph, 约瑟夫·坎贝尔, 22, 88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62～163
Capra, Fritjof, 弗里特约夫·卡普拉, xxii, 169, 191
Carbon—14 (C—14) dating, 碳14测定时间, 10
Catal Hüyük, 卡塔尔·惠雅克, 7, 13, 42, 43, 56, 102
Ceausescu, Nicolae,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166, 176
Ceres, 刻瑞斯, 7
Cerridwen, 塞里德温, 69
Chaos, 卡俄斯, 107
Chaos theory, 混沌理论, xxii, 60～61, 190
Charybdis, 卡律布狄斯, 107
Chatelet, Madame du, 夏特莱夫人, 159
Chen, Ellen Marie, 艾伦·玛丽·陈, 170
Chicago, Judy, 朱迪·芝加哥, 170, 188
Chieftain grave, 首领坟墓, 50～51
Childe, V. Gordon, V. 戈登·蔡尔德, 51～52
Chloe, 革来, 123
Chodorow, Nancy, 南希·乔德罗, xxiii
Christ, Carol, 卡罗尔·克赖斯特, xxiii, 170, 191
Christianity, as androcratic, 男性统治的基督教, 130～134

Circe，喀耳刻，107
Clarke，Arthur C.，阿瑟·C. 克拉克 45
Clement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的克雷门特，133
Club of Rome reports，罗马俱乐部报告，173，195
Clytemnestra，克吕泰涅斯特拉，79，80
Cobra，眼镜蛇，107
Cohen，family of，科恩家族，95
Communism，共产主义，163～164
Comte，Auguste，奥古斯特·孔德，161
Constantine，Emperor，君士坦丁大帝，130，131
Copernicus，哥白尼，157
Corinna of Boeotia，维奥蒂亚的科琳娜，114
Cott，Nancy，南希·科特，149
Cratinus，克拉提诺斯，115
Creation stories，创世的传说，21
Crete，克里特，23，42，
Crispus，克里斯普斯，131
Cross，十字架，103，187
Csanyi，Vilmos，V. 昌尼，xxii，82～83，99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ory，文化转化理论，xxii
Cunningham，Imogene，伊莫金·坎宁安，188
Cybele，西伯勒，7
Cycles of history，between androcracy and gylany，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之间的历史循环，135～155

D

Darwin，Charles，查尔斯·达尔文，40，157
Davis，Elizabeth Gould，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149
Dea Syria，迪娅·叙利亚，86
Death，as holy，神圣的死亡，101～103
d'Eaubonne，Fran ξ oise，弗朗索瓦兹·德·奥博纳，149

Degler, Carl, 卡尔·德格勒, 149
Deophi, Oracle at, 德尔斐神谕, 70, 106
Demeter, 得墨忒耳, xvi, 7, 23, 69, 86, 113
Deming, Barbara, 巴巴拉·戴明, 170
de Morgan, Prof., 德·摩根教授, 29
Dinnerstein, Dorothy, 多萝西·丁纳斯泰恩, 149
Diodorus Siculus,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 70
Diogenes, 第欧根尼, 109, 112
Dionysus, 狄俄尼索斯, 102
Diotema, 狄奥提马, 106, 116
Dix, Dorothea, 多萝西娅·迪克斯, 151
Dodson-Gray, Elizabeth, 伊丽莎白·多德森－格雷, 170
Domination hierarchies, 等级制统治, 106
Domination Power, 统治的权力, 28
Dominator model, 统治者模式, xvii, xix
Don Juan, 唐璜, 143, 144, 153
Dorcas, 多加, 122
Dune,《沙丘》, 185
Durant, Ariel, 阿里尔·杜兰特, 133
Durant, Will, 威尔·杜兰特, 133
Dürer, Albrecht, 阿尔布来希特·丢勒, 103
Dworkin, Andrea, 安德烈亚·德沃金, 193

E

Eden, Garden of, 伊甸园, 63～64
Ehrenreich, Barbara, 巴巴拉·埃伦赖克, 140
Ehrlich, Annette, 安内特·埃利希, 149
Eldredge, Niles, 奈尔斯·埃尔德雷奇 xxii, 47, 136, 186
Eleanor of Aquitaine, 阿基坦的埃莱亚诺, 139
Eleusinian Mysteries, 埃莱夫西斯神秘宗教仪式, 102, 113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142

Ellsberg, Patricia, 帕特里夏·埃尔斯伯格, 170
Ellul, Jacques, 雅克·艾吕尔, 180
Elmwood Institute, 埃尔姆伍德研究所, 169
Elohim, 埃洛希姆, 94
El Saadawi, Nawal, 纳瓦尔·埃尔·萨达威, 170
Emergence, 出现, 198
Enpedocles, 恩培多克勒, 111
The End of Atlantis 阿特兰提斯的灭亡, 63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利希·恩格斯, 45, 46, 157, 163, 164, 165
English, Deirdre, 迪尔德丽·英格利希, 140
Enlil, 恩利尔, 92
Environmental damage, 环境破坏, 173 ~ 174
Equalitarian life style: in Crete, 克里特的平等主义生活方式, 31 ~ 41; in 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的平等主义生活方式, 24 ~ 28
Equality, idea of, 平等的观念, 160 ~ 162
Equal Rights Amendment, 平等权利修正案, 167, 176
Erinna, 埃琳娜, 115
Eumenides, 欧墨尼得斯, 78, 81, 82
Europe, Old, goddess worship in, 古代欧洲的女神崇拜, 12 ~ 15
Evans, Sir Arthur, 阿瑟·埃文斯爵士, 33, 40 ~ 41
Eve, 夏娃, 88 ~ 89, 101
Evolution, 进化, xxi, 60 ~ 61
Expenditures, military vs social, 军费和社会经费, 195
Ezra, 《以斯拉记》, 93

F

Fahrenheit 451, 《华氏 451°》, 180
Fall from paradise, 逐出乐园, 88 ~ 89
Falwell, Jerry, 杰里·法尔韦尔, 167
The Family, and Its Future, 《家庭及其未来》, 161
Family Protection Act of 1967 《1967 年的家庭保护法》, 167

Farming, invention of, 农业的发明, 69
Fates, 命运女神, 69, 80
Fausta, 福斯塔, 131
Feigenbaum, Marshall, 马歇尔·费根鲍姆, xxii
Feminist movement, feminism, 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 150 ~ 152, 154, 164 ~ 165, 169 ~ 171
Fiorenza, Elizabeth Schussler, 伊丽莎白·舒斯勒·费奥伦查, 123
The First Sex, 《第一性》, 149
Fletcher, Ronald, 罗纳德·弗莱彻, 161
Fourier, Charles, 夏尔·傅立叶, 150, 163
Franco, Francisco, 弗兰西斯科·佛朗哥, 166
French, Marilyn, 玛里琳·弗伦奇, 149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08, 190
Friedan, Betty, 贝蒂·弗里丹, 170
Fuller, Margaret, 玛格丽特·富勒, 150, 165
Furies, 复仇女神, 78, 80, 81

G

Gaia hypothesis, 盖亚假设, 75
Galileo, 伽利略, 157
Gandhi, Indira, 英迪拉·甘地, 152
Gandhi, Mohandas, 莫汉达斯·甘地, 190, 192
Garcia, Celina, 塞利娜·加西亚, 170
Gatherer, Woman Othe, 妇女采集者, 68
Gelpi, Barbara, 巴巴拉·吉尔皮, xxiii
Geoffrin, Madame, 若弗兰夫人, 148, 159
Gifts of civilization, as from goddess—worshipping age, 来自女神崇拜时代的文明的礼物, 66 ~ 73
Gilder, George, 乔治·吉尔德, 163
Gilligan, Carol, 卡罗尔·吉利根, xxiii, 146, 147, 170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 185

Gimbutas, Marija, 马里亚·金布塔斯, xvii, 12, 13, 14, 19, 22, 23, 27, 44, 46, 47, 48, 49, 50, 51, 52, 66, 71, 72, 73, 86
Glaucon, 格劳孔, 117 ~ 118
Gliddon, George R., 乔治·R. 格利登, 40
Global 2000,《地球 2000 年》, 173
The Gnostic Gospels,《诺斯替福音》, 125
Gnostic scripture, 诺斯替经文, 124 ~ 128
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 12
Golden race, legend of, 黄金种族的传说, xv, 61 ~ 62, 107
Gordon, Cyrus, 赛勒斯·戈登, 32
Gospel of Mary,《马利亚福音》, 126
Gospel of Philip,《菲利普福音》, 126
Gospel of Thomas,《托马斯福音》, 130
Gould, Stephen Jay, J. 斯蒂芬·古尔德, 47, 136
Greece, influence of earlier Goddess worshipping society on, 早期崇拜女神的社会对希腊的影响, 106 ~ 119
Griffin, Susan, 苏珊·格里芬, 170
Grimké, Angelina, 安吉利娜·格里姆克, 165
Grimké, Sarah, 萨拉·格里姆克, 165
Gylanic, Jesus Christ as, 基督耶稣的男女合作观点, 120 ~ 124
Gylanic society, description of, 描述男女合作的社会, 198 ~ 203
Gylany, defined, 明确的男女合作论, 105, 106

H

Hacilar, 哈希拉, 13, 76
Hand, Brain, and Heart: A Feminist Epistemolog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手、脑和心：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女权主义认识论》, 191
Haraway, Donna, 唐娜·哈拉韦, 149
The Hard and the Soft: The Force of Feminism in Modern Times,《硬和软：现代女权主义的力量》, 144
Harman, Willis, 威利斯·哈曼, 195

Harrison, Jane, 简・哈里森, 112
Hathor, 哈托尔, 30, 70
Hauser, Arnold, 阿诺德・豪泽, 39
Hawkes, Jacquetta, 杰奎塔・霍克斯, 31, 34, 36, 37, 41, 54, 55, 57, 108
The Hebrew Goddess,《希伯来女神》, 93
Hebrews, 希伯来人, 44~45, 58, 94~95
Hegel, Georg, 格奥尔格・黑格尔, 157
Heide, Wilma Scott, 威尔玛・司各特・海德, xxiii, 170
Helios 赫利俄斯, 102
Henderson, Hazel, 黑兹尔・亨德森, xxiii, 197, 201
Hera, 赫拉, 7, 55, 69, 86, 109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108
Herbert, Frank, 弗兰克・赫伯特, 185
Hercules, 海格立斯, 87
Heritage Foundation, 遗产基金会, 176
Herland,《赫尔兰》, 185
Hermes, 赫耳墨斯, 55
Herodotus, 希罗多德, 49
Hesiod, 赫西奥德, xv, 55, 61~62, 106, 107, 108
Hetaerae, 艺妓, 115
Hezekiah, King, 希西家国王, 88
Hierarchy, 等级制度, 105, 106
Higgins, Reynold, 雷诺・希金斯, 35
History, Cycles of, between androcracy and gylany, 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之间的历史循环, 135~155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66, 181, 182, 183
Hixson, Allie, 阿里・希克松, 170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160
Homer, 荷马, 55, 56, 62, 106, 107, 109, 115, 149
Hor-Aha, 霍阿哈, 29
Horus, 何露斯, 102

Hosea,《何西阿书》, 93
Hosken, Fran, 弗兰·霍斯肯, 170
Howe, Florence, 弗洛伦斯·豪, xxiii
Huber, Prof. Joseph, 约瑟夫·休伯教授, 197
Hudson Institute, 赫德森研究所, 180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人有人的用处》, 172
Hunger, as world problem today, 今日世界的饥饿问题, 174 ~ 177
Hunter, man the, 男人狩猎者, 3 ~ 4, 68
Hussey, Edward, 爱德华·赫西, 109, 110, 112
Huston, Perdita, 珀迪塔·休斯登, 193
Hybrid Cultures, 混合文化, 52 ~ 53
Hypatia, 希帕蒂亚, 133

I

Idi Amin, 伊迪·阿明, 166
Illuyankas, 伊卢扬克斯, 87
Indo-Europeans, 印欧人, 44 ~ 45
Ino, 伊诺, 1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1984, 1984 年国际人口会议, 176
Invasion, nomadic, and effects, 游牧部落的入侵及影响, 43 ~ 58
Iphigenia, 伊非革尼亚, 79
Irenaeus, Bishop, 伊里奈乌斯主教, 126
Iris, 伊里斯, 109
Isaac, 以撒, 96
Isaiah, 以赛亚, 94
Ishtar, 伊什塔尔, 7, 30, 64, 69, 70, 92
Isis, 伊希斯, 7, 30, 69, 70

J

Jacklin, Carol, 卡罗尔·杰克林, 149

Jacob，雅各，96
Jacquette，Jane，简·雅奎特，149
Jain，Devaki，迪瓦基·简，193
James，E. O.，E. O. 詹姆斯，2，7，93，128
Janeway，Elizabeth，伊丽莎白·简韦，193
Janssen-Jurreit，Marielouise，玛丽路易丝·詹森－朱赖特，193
Jantsch，Erich，埃里克·詹奇，xxii
Jaynes，Julian，朱利安·杰恩斯，74
Jehovah，耶和华，44，58，64，87，88，94，95，96，101
Jeremiah，《耶利米书》，193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xvi，23，24，94，102～103，190，192
Johnson，Sonia，索尼娅·约翰逊，170
John the Baptist，施洗者约翰，103
Jung，Carl，卡尔·荣格，108
Jungk，Robert，罗伯特·荣克，169
Junia，犹尼亚，122
Justice，beginnings of concept of，正义概念的起源，69

K

Kahn，Herman，赫尔曼·卡恩，177
Kampis，Gyorgy，G. 坎皮斯，82
Kant，Immanuel，伊曼努尔·康德，157
Karageorghis，Vassos，瓦索斯·卡拉吉奥吉斯，32，41
Keller，Evelyn Fox，伊夫林·福克斯·凯勒，191
Keller，Mara，马拉·凯勒，170
Kelly，Joan，琼·凯利，149
Kelly，Petra，皮特拉·凯利，170
Khan，Herman，赫尔曼·卡恩，180
Khanum，Abida，柯比达·哈那姆，170
Khomeini，Ayatollah，阿亚托拉·霍梅尼，167，175
King，Martin Luther，Jr.，马丁·路德·金，192

Kirkendall, Lester, 莱斯特·柯肯德尔, 149
Kitto, H. D. F. , H. D. F. 基托, 80
Knowledge, as bad, 知识邪恶, 101 ~ 103
Koester, Prof. Helmut, 赫尔穆特·凯斯特教授, 125
Konath, family of, 柯纳思家族, 95
Koonz, Claudia, 克劳迪娅·孔兹, 149
Kore, 科列, xvi, 7, 23, 102, 113
Kuan Yin, 观音, xvi
Kuhn, Annette, 安内特·库恩, xxiii
! Kung, 孔人, xix, 73, 185
Kurgan people, invasion of, and effects, 库尔干人的入侵和影响, 43 ~ 58

L

Ladon, 拉冬, 87
Lady of the Serpent Skirt, 蛇裙淑女, 21
Lancaster, Jane, 简·兰开斯特, 67
Lashenia of Mantua, 曼图亚的拉希尼娅, 115
The Last Judgment, 《最后的审判》, 103
Laszlo, Erwin, 欧文·拉兹洛, xxii, 186
Lavoisier, Antonie, 安东尼·拉瓦锡, 157
Leacock, Eleanor, 埃莉诺·李柯克, 149
Leah, 利亚, 96
Le Guin, Ursula, 厄休拉·勒·吉恩, 170
Leibowitz, Lila, 利拉·莱伯维兹, 67
Lenclos, Ninon de, 尼农·德·朗克洛, 148
Len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列宁, 182
Lerner Gerda, 格尔达·勒纳, 149
Leroi-Gourhan, André, 安德烈·勒鲁瓦－古朗, 5, 6, 7
Leviathan, 利维坦, 87
The Libation-Bearers, 奠酒人, 79
Libby, Willard, 威拉德·利比, 10

Lilith，夜妖，7
Lorenz，Edward，爱德华·洛伦兹，135
Lot，罗得，100
Lotan，Lowtan，洛坦，劳坦，87
Lovelock，James，詹姆斯·洛夫洛克，75
Loye，David，戴维·洛耶，xxii，169
Lucas，George，格奥尔格·卢卡奇，185
Luce，J. V.，J. V. 卢斯，63，108，109
Lugalanda，路加兰达，65
Lydia，吕底亚，123
Lyon，Mary，玛丽·莱昂，150
Lysistrata，《吕西斯忒拉忒》，115～116

M

Maat，玛亚特，7，69，70
McAllister，Pam，帕姆·麦卡利斯特，170
McClelland，David，戴维·麦克莱伦，145，146，148，153
McClintock，Barbara，巴巴拉·麦克林托克，191
McConahay，John，约翰·麦克纳海，188
McConahay，Shirley，雪利·麦克纳海，188
McHale，John，约翰·麦克赫尔，196
McKinnon，Catharine，凯瑟琳·麦金农，xxiii
McNamara Joann，乔安·麦克纳马拉，149
Magus，Simon，西蒙·马古斯，128
Male Supremacy，beginnings of，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开始，45～48
Malleus Maleficarum（*Hammer Of Witches*），《严惩邪恶》（《锤死女巫》），140
Mamonova，Tatyana，塔吉娅娜·马莫诺娃，193
Marcionites，马西昂派，126
Marcus，马可，127，128
Margulis，Lynn，林恩·马古利斯，75
Marinatos，Prof. Spyridon，斯派里登·马里那托斯教授，63

Marinetti，Filippo，菲利普·马里内蒂，144
Marshack，Alexander，亚历山大·马沙克，4，5
Marshall，Sir John，约翰·马歇尔爵士，9
Marx，Karl，卡尔·马克思，157，161，163，164，165，169
Mary，Virgin，贞女玛利亚，xvi，7，22，24，76，102，103，138，139
Mary Magdalene，马利亚·马格达林娜，122，123，126，128
Maslow，Abraham，亚伯拉罕·马斯洛，190
Matriarchy，母权制，xvi—xvii，24，27，39，105
Ma Tsu，妈祖，xvi
Maturana，Humberto，温贝尔托·马图拉纳，82
Maxentius，马克桑提，131
Mead，Margaret，玛格丽特·米德，202
Mein Kampf，《我的奋斗》，166
Mellaart，James，詹姆斯·梅拉特，xv，7～8，10，11，22，25～28，43
Merchant，Caroline 卡罗琳·麦钱特，149
Meryet-Nit，梅耶特－尼特，29，40
Metallurgy，and male supremacy，冶金术和男性至高无上，45～47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103
Mill，John Stuart，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57，161，196
Miller，Jean Baker，琼·贝克·米勒，xxiii，146，189，190，191～193
Millett，Kate，凯特·米利特，xxiii，144，193
Minoan culture，米诺斯文化，参见 Crete
Mishe，Patricia，帕特里夏·米施，170
Montagu，Ashley，阿什利·蒙塔古，191
Montanists，孟他努斯教派，126
Morgan，Robin，罗宾·摩根，193
Moses，摩西，88
Mother-Kali，母亲卡利，81
Mother-murder，as no crime，弑母不是犯罪，78～81
Mumford，Lewis，刘易斯·芒福德，180
Muses，缪斯，69
Mussolini，Benito，本尼托·墨索里尼，166

Myrdal, Alva, 阿尔瓦·米尔达, 170
Myths, reworking of, to fit dominator model, 重新修改神话以符合统治者模式, 85~89, 92~93

N

Nammu, 纳慕, 21, 64
Nana, Queen, 女王娜娜, 64
Nanshe, 南希, 65
Nausicaa, 瑙西凯厄, 107
Nazis, 纳粹, 182~183
Near, Holly, 霍利·尼尔, 170
Nehemiah,《尼希米记》, 93
Neumann, Erich, 埃里克·诺伊曼, 69, 102, 111, 194
Newland, Kathleen, 凯瑟琳·纽兰, 149
New Paradigm Symposium, 新范式专题讨论会, 169
New physics, 新物理学, xxii, 60~61
Nidaba, 尼达巴, 65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165~166, 182
Nightingale, Florence,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151
Ninlil, 宁利尔, 66, 69, 92
Nit-Hotep, 尼特-霍特普, 29, 40
Nott, J. C., J. C. 诺特, 40
Nut, 努特, 7, 22
Nympha, 宁法, 123

O

O'Barr, Jean, 琼·奥巴尔, 170
Oda, Mayumi, 真弓织田, 170
Odysseus, 奥德修斯, 107
O'Keeffe, Georgia, 乔治亚·奥基夫, 170

Orenstein, Gloria, 格洛丽亚·奥伦斯坦, 149
Orensteia, 《奥瑞斯忒亚》, 78~81, 85, 117
Orestes, 奥瑞斯忒斯, 78, 79, 80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85, 180, 182
Osiris, 俄西里斯, 102

P

Pagels, Elaine, 伊莱恩·帕格尔斯, 125, 126, 127, 128, 130, 131, 132
Paleolithic Cave Art, 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 4
Partnership model, 伙伴关系模式, xvii, xix, 7~41, 198~203
Parvey, Constance, 康斯坦斯·帕维, 123, 129, 130
Patai, Raphael, 拉斐尔·帕泰, 93
Patriarchy, 父权制, 24
Paul, 保罗, 122, 123, 130
Pau VI, 教皇保罗四世, 131
Pearse, Patrick, 帕特里克·皮尔斯, 144
Penelope, 珀涅罗珀, 107
Pericles, 伯里克利, 114
Persephone, 珀耳塞福涅, 23, 102
Petrie, Sir Flinders, 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 29
Pfeiffer, John, 约翰·法伊弗, 3
Piercy, Marge, 玛吉·皮尔西, 170
Pietila, Hilkka, 希尔卡·皮蒂拉, 170
Pindar, 品达罗斯, 114
Pisan, Christine de, 克里斯廷·德·皮桑, 152
Plaskow, Judith, 朱迪思·普拉斯科夫, xxiii, 170
Plato, 柏拉图, 62~63, 106, 112, 113, 117
Platon, Nicolas, 尼古拉斯·普拉东, 30, 31, 32, 33, 34, 36, 37, 41, 63, 108
Platt, John, 约翰·普拉特, 169
Pleck, Elizabeth, 伊丽莎白·普利克, 149

Politics,《政治学》, 118
The Politics of the Solar Age,《太阳能时代的政治学》, 197
Population problem, as "women's issue", 作为"妇女问题"的人口问题, 174 ~ 179
Pottery, invention of, 陶器的发明, 69
Power, as affiliation and linking, 作为亲缘和联系的权力, 193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权力：内在的经验》, 145
Pragmatopia, 现实之乡, 198 ~ 203
Priests, role in imposing dominator model, 祭司在强加的统治者模式中的作用, 84 ~ 85
Prigogine, Ilya, 伊利亚·普利高津, xxii, 129, 135, 136, 186
Priscilla, 普里西拉, 123
Progress, idea of, 进步的观念, 160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25, 106, 109, 112, 116
Pythia, 皮西亚, 70
Python, 皮松, 87
Pythoness, 毕托涅斯, 106

Q

Queen of Heaven, 天后, 7, 64, 93

R

Rambouillet, Madame, 朗布耶夫人, 148
Ramses, Ⅲ, 拉美西斯三世, 57
Rapp, Rayna, 雷娜·拉普, 149
Rational man, failure of, 理性男人的失败, 157 ~ 159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163, 167, 175, 175 ~ 176
Reardon, Betty, 贝蒂·里尔顿, 170
Reason, failure of, 理性的败北, 157 ~ 159
Reich, Wilhelm, 威廉·赖克, 138

Replication，复制，82～83
Republic，《理想国》，112，113，117～118
Rich，Adrienne，阿德里安娜·里奇，xxiii，193
The Rise of the Equaliarian Family，《平等主义家庭的兴起》，162
Rites of Dionysus，《狄尼俄索斯的仪式》，114
Robertson，James，詹姆斯·罗伯逊，197
Robinson，John Mansley，约翰·曼斯利·鲁宾逊，62，118
Rockwell，Joan，琼·罗克韦尔，79，80，81
Rodgers-Rose，La France，拉·弗朗斯·罗杰斯－罗斯，149
Rohrlich-Leavitt，Ruby，鲁比·罗尔利希－莱维特，37，38，93
Rollerball，《滚珠》，180
Roosevelt，Theodore，西奥多·罗斯福，144
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根源》，4
Rose，Einestine，欧内斯廷·罗斯，165
Rose，Hillary，希拉里·罗斯，191
Rosenfeld，Andrée，安德烈·罗森菲尔德，4
Roszak，Theodore，西奥多·罗斯扎克，144～145，153
Rousseau，Jean-Jacques，让－雅克·卢梭，117，157，160
Ruether，Rosemary Radford，罗斯玛丽·雷德福·鲁瑟，xxiii，170
Russell，Diana，黛安娜·拉塞尔，193

S

Sacks，Karen，卡伦·萨克斯，170
Sacred Discourse，《神圣的讲道》，114
Saggs，Prof. H. W. F.，H. W. F. 塞格斯教授，64
Saint-Pierre，Abbé de，圣皮埃尔神父，160
Salk，Jonas，乔纳斯·索尔克，187，191
Salome，莎乐美，103
Sand，George，乔治·桑，165
Sanday，Peggy，佩吉·桑迪，170
The Sane Alternative，《明智的选择》，197

Sangren, P. Steven, P. 斯蒂文·桑格伦, xvi, 149
Sappho (Sappha), 萨福 (萨法), 115, 149
Sarah, 撒拉, 96
Sarasvati, 娑罗室伐底, 71
Satyagraha, 不合作主义, 192
Schlegel, Alice, 艾丽斯·施莱格尔, xxiii
Schlesinger, Arthur, Sir, 阿瑟·施莱辛格爵士, 137 ~ 138
Schliemann, Heinrich, 海因里希·施里曼, xv, 73
Sehliemann, Sophia, 索菲娅·施里曼, xv, 73
Schopenhauer, Arthur, 阿尔图尔·叔本华, 165
Scylla, 斯库拉, 107
Self-organizing theory, 自组织理论, 60 ~ 61
Sen, Gita, 吉塔·森, xxiii, 170
Serpent, 蛇, 18, 21, 70, 86 ~ 89
Sex in History,《历史上的性》, 138, 142
Sexual Politics,《性政治学》, 144
Shagshag, 夏格夏格, 65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142
Shaw, Robert, 罗伯特·肖, xxii
Shekhina, 舍金纳, 7, 95
Shub-Ad, Queen, 舒伯 - 亚德女王, 65
Simon, Julian, 朱利安·西蒙, 177
Sirens, 塞壬, 107
Sivard, Ruth, 鲁思·西瓦德, 195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62, 163
Smith-Rosenberg, Carroll, 卡罗尔·史密斯 - 罗森堡, 149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157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63 ~ 164
Socrates, 苏格拉底, 106, 116, 117 ~ 118, 192
Solon, 梭伦, 62
Sophia, 索菲娅, 69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81

Spender, Dale, 戴尔·斯彭德, xxiii, 170
Spengler, Oswald, 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 137
Spinning, inivention of, 纺织术的发明, 69
Spretnak, Charlene, 查伦·斯普雷特纳克, 170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164, 182
Stanton, Elizabeth Cady,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150, 165
Starhawk, 斯塔霍克, 170
Star wars, 《星球大战》, 185
Statement of the Baha'i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巴哈教世界审判所声明, 169 ~ 170
Steinem, Gloria,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170
Stengers, Isabel, 伊莎贝尔·斯滕格斯, xxii, 135, 136
Stimpson, Catharine, 凯瑟琳·斯廷普森, xxiii
Stone Lucy, 露西·斯通, 150
Stone, Merlin, 梅林·斯通, 12, 29, 65
Stonehenge, 斯通亨奇, 74
Sumeria, Goddess Worship at, 苏美尔的女神崇拜, 64 ~ 66
Suttee, 自焚殉夫的寡妇, 50
Swidler, Leonard, 伦纳德·斯威德勒, 120
Syphon, 叙封, 87

T

Tabitha, 大比大, 122
Takamure, Itsue, 高群逸枝, 149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驯悍记》, 142, 153
Tammutz, 塔木兹, 23
Tanner, Nancy, 南希·坦纳, 67, 68
Tao of Physics, 《物理学之道》, xxii
Tao Te Ching, 《道德经》, xv
Taylor, G. Rattray, G. 拉特雷·泰勒, 138 ~ 140, 141 ~ 142
Telesila of Argos, 阿尔戈斯的特勒西拉, 114

Tertullian，德尔图良，127
Thales，泰勒斯，109，111
Thatcher，Margaret，玛格丽特·撒切尔，152
Themistoclea，铁米司托克列亚，106，112，116
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一世，132
Theodotus，狄奥多图斯，128
Thompson，George，乔治·汤普逊，80
Thucydides，修昔底德，118
Tiglath-pileser，提革拉·帕拉萨，57
Tofflter，Alvin，阿尔文·托夫勒，156，194
Totalitarian solution to global problems，极权主义对全球问题的解决，179~184
Toynbee，Arnold，阿诺德·汤因比，137
Trimorphic Protennoia，三种形式的原初思想，127
Trotsky，Leon，列昂·托洛茨基，164
Troubadour Period，抒情诗人（行吟诗人）时期，139
Troy，特洛伊，73
Trujillo Molina，Rafael，拉菲尔·特鲁希略·莫利那，166
Trumbach，Randolph，伦道夫·特朗巴赫，149~150，162
Truth，Sojourner 索杰纳·特鲁思，151
The Turning Point，《转折点》，xii
Types of Mankind，《人类的类型》，40

U

Ua Zit，瓦·泽特，70，87
Ucko，Peter，彼得·尤科，4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联合国妇女十年委员会，154
Urban Ⅱ，Pope，教皇乌尔班二世，181
Urukagina，乌鲁卡吉那，65
Urukagina reform，乌鲁卡吉那改革，65

V

Valentinus，瓦伦廷，127，128

Varel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 xxii, 82
Vasic, Prof. M., M. 瓦齐克教授, 71
Venus figurines, 维纳斯塑像, 参见 Goddess images, Goddess Worship
Vinca, 温恰, 71 ~ 72

W

Walker, Alice, 艾丽斯·沃克, 170
Warfare, beginnings of, 战争的起源, 48 ~ 58
Warrior gods, first, 最初的战神, 49
Washburn, Sherwood, 舍伍德·沃什伯恩, 186
Water, symbolism of, 水的象征主义, 21 ~ 22
Wealth and Poverty, 《财富和贫困》, 163
The Wealth of Nations, 《国富论》, 163
Weaving, invention of, 纺织的发明, 69
Wemple, Susanne, 苏珊娜·温普尔, 149
White, Lynn, Jr, 林恩·怀特, 147
Wiener, Norbert, 诺伯特·威纳, 172, 173
Winter, David, 戴维·温特, 143, 145, 148, 153
Witch hunting, 对女巫进行政治迫害, 140 ~ 141
Women, omission of in histories, 历史上对妇女的忽视, xviii, 106 ~ 119, 147 ~ 155
Women as a Force in History, 《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148
Women's Status: in *Bible*, 妇女在《圣经》中的地位, 93 ~ 103
Woolley, Sir Leonard, 伦纳德·伍利爵士, 3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178
Wright, Frances, 弗朗西丝·赖特, 165
Writing, beginnings of, 文字的起源, 71 ~ 73

X

Xenophanes, 色诺芬尼, 109, 110

Z

Zeno，芝诺，111
Zeus，宙斯，55，78，81，87，113，117
Zia-ul-Haq，齐亚-乌尔-哈克，166，175
Zihlman，Adrienne，阿德里安娜·齐尔曼，67
Zilboog，Gregory，格雷戈里·齐尔布格，140

中文版后记

1989 年 5 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我结识了理安·艾斯勒教授和她的丈夫戴维·洛耶教授。其时国际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在那里举行学术讨论会，他们夫妇都是小组成员。艾斯勒将本书的英文原本送我时，封面印着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教授的评语——“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着实令我心惊眼亮。交谈中又得知本书英文版在两三年内已重印 15 次，并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正在陆续出版，许多报纸和杂志发表了评论和赞誉的文章。在确信本书有崇高的学术价值之后，我便主动承担起组织翻译和出中文版的任务。

回国后几经周折，最后邀请到我的同窗、现在的同事程志民先生担任翻译。他在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化和《圣经》等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已有译著盈尺，是胜任的译者。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程先生便完成了初译；并且还不辞辛劳将本书多达数十页的注释引文也译出来了，便于读者翻检作者依据的大量原始资料。艾斯勒本人很重视译文的质量，请在加州教英语翻译的俞天民先生将我们寄去的译文审校一遍。待程先生定稿后，我又通读一遍，作了必要的改进和润色，以为完工之拂拭。艾斯勒本人不但放弃了中文版的版税，而且还接受了我的建议，为这个中文版提供了一笔资助，以提高印刷质量和出版速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沈恒炎社长、陆象淦总编和责任编辑罗琳女士对中文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做了许多工作。所以这个中文版本身就是中美双方有关人士合作的产物，实践并体现着本书的主导思想之一。

在通读完译稿之后我才明白，这本书主要依据西方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考古发现，再结合对神话、《圣经》和其他古代史料的分析，重新揭

示出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到欧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间这段早已湮没无闻的漫长时期的历史真相，起到了填补空白、钩沉出新的作用，因此才赢得了蒙塔古教授给予的评价。

但是，这本书落笔的重点却不是在人类历史，而是在人类的现状和未来。作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以女神手中的圣杯为象征的伙伴关系文化—社会模式和以男性武士手中的剑为象征的统治关系的文化—社会模式在各方面的差别；有力地证明这五千年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虐、独裁、专制，乃至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全球问题，都同男性至上的统治关系的文化—社会模式有关。目前人类社会已迫近另一个大分叉点，面临文化形态的大转变——转向男女平权的新型的伙伴关系文化—社会模式。由此才能消除弊病，避免灾变，开创一种合作、和睦、和谐的新生活方式。

在本书中，艾斯勒女士挺身反对男性统治主义，揭露性歧视、压迫妇女、剥削妇女的残酷事实，抨击形形色色的暴政、独裁、军国主义、极权主义，锋利的笔触直指当代的原教旨主义、美国新右派和法西斯主义复活的亡魂。通读此书，一个博学而勇敢的文艺复兴式的女权斗士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会有人不同意她的观点，但是，毫无疑问，艾斯勒和她的《圣杯与剑》不仅是属于女性的，也是属于男性的；不只是属于西方的，也是属于东方的；总之，是属于全人类的。

我相信，《圣杯与剑》的中文版一定会在中国长期赢得众多读者，引起共鸣和争论。一定会激励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从事中国文化和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思考和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我国 20 世纪发掘出土的大量史前文化遗址，结合有关女娲和伏羲及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的神话传说，是否也隐藏着一个可以用圣杯来象征的崇高女权的伙伴关系的文化—社会模式？殷人和周人先后入主中原，是否也起了与库尔干人以剑击碎圣杯，改变欧洲史前文化社会模式相类似的作用？抑或他们做得远不如库尔干人彻底，因此中国文化中保留下了较多的女性特征，如老子《道德经》中的“守雌”、“贵柔”思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精神，甚而至于有“阴盛阳衰”的现象，是否正是史前女权时代精神的血脉延续和空谷足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能为这样一本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当代名著在中国出版做组织工作，我感到荣幸。也愿同程志民先生一道听取广大读者对这个中文版的批评和改进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闵家胤

1992年7月20日

第二版后记

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中文版于1993年出版之后，受到我国读书界的重视和欢迎。第一版两千册不久即告售罄。《国外社会科学》、《中国妇女报》、《读书》等刊物先后发表了评介文章。

我们寄了十几册给艾斯勒本人。她周围有一些在加州的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读了中文版后对译文颇有微词。作为翻译和出版的组织者，我对译文的质量心里有底，有信心。所以写信向她解释，推测那些中国学人多半来自台湾。将近半个世纪的隔绝，海峡两边的中文书面语言，特别是专用名词的译法，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以致互相看对方的译著都自然感觉那是"poor translation"（糟糕的翻译）。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本书第一版的翻译和出版都太快，肯定有粗糙的地方和理解上的失误。所以，我征得艾斯勒同意之后，请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冯韵文先生对译文作了进一步校改，以期改善译本的质量。

最大的改动是本书的核心概念"partnership"的译法。初译时我和译者程志民先生都吃不准，便采取了骑墙的态度，大部分译"合作关系"，偶尔也译"伙伴关系"。在将原书读了两遍之后，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前主任李慎之先生作了咨询，我决定通通译成"伙伴关系"。

什么是"伙伴关系"呢？我写信问艾斯勒，她寄了一段定义式的解释，译成中文是这样：

> 伙伴关系要求人们合作并相互尊重。它包含参与、联系，并为大家的共同利益和平而和谐地工作。伙伴关系方式是通过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原则，它不同于在当今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制性的等级

> 服从体制。伙伴关系要求公平合理，意见一致，互利互惠，民主地参与决策；必须积极地倾听，富有同情心地分担，相互支持，以促进共同兴旺发达。它包容并追求把人们结为一体。在伙伴关系的环境里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有真诚的关怀和安全感。真正的伙伴关系导致人人获利并有条件实现自我。

这是当代社会，特别是未来社会，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集团之间、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是本书面向未来的着眼点。如果本书第二版的出版能促使“伙伴关系”概念进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那就是它最大的成功。

值得高兴的是，在本书第一版问世之后，我们已组织起一个跨院所、跨学科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用一年多的时间，集体完成了第一个研究项目，将以“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历史上的圣杯与剑”为题，出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连同本书的第二版一起贡献给 1995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沈恒炎社长、陆象淦总编辑的支持和帮助，按本书第二版的译文，在台湾还要出一个直排繁体字新版。衷心希望海峡对岸的台胞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也能发生共鸣，两岸炎黄子孙一起来营造中华民族两性之间新型的伙伴关系。当然，也希望他们能接受，或至少宽容大陆这边对许多术语的译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闵家胤

1995 年 5 月 4 日

对本书的评语

艾斯勒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启发性的史学论文，也提供了一种希望。在这本本年度最令人感兴趣的出版物中，它证明了，作为人就能够肯定生命而不是死亡。

——《明尼阿波利斯之星论坛报》

一本值得注意的用科学来理解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的书。

——马里亚·金布塔斯，《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的作者

《圣杯与剑》使我们对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重新澄清了男人和妇女的问题。……一项重大的贡献。

——琼·贝克·米勒，《走向一种新的妇女心理学》的作者

本书说明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才能达到新的平衡。

——黑兹尔·亨德森，《创造可供选择的未来》的作者

一部创新的著作，今后必定会引起争论和讨论。……任何关心我们在地球上的命运的人都需要阅读。

——欧文·拉兹洛，《进化：广义的综合》的作者

一部重要的著作，也许比发掘特洛伊城或破译楔形文字更重要。

——布鲁斯·威尔希尔，新泽西州立大学哲学教授

一本十分重要的书……揭示了个人的价值、目的和广泛成就等问题。

——罗伯特·马勒，联合国和平大学校长

读艾斯勒的书可以看到由伴随着妇女的养育力和再生力所引起的人类的新前景。

——《新妇女》

引人入胜……很有气魄。……考察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重大问题。

——《圣迭戈周报》

有些书像《启示录》，它们使心灵向难以想象的可能性开放。《圣杯与剑》就是这些极其重要的著作之一。理安·艾斯勒以最热情的语言证明，和平的梦想并非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伊莎贝尔·阿连德，《心灵的归宿》的作者

一种雄心勃勃的新综合理论。……（艾斯勒的）严谨探索……描绘了形成人类文化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

——《洛杉矶时报》

既有学者风度又热情洋溢……非常透彻地说明并分析了各种范式当前最深层次的变化。……对于所有认真关心正在形成的关于现实的新观点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材料。

——弗里特约夫·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的作者

多年来我所读过的最令人激动、最有开创性和最重要的书——也许是有关我们生存的答案。……一项可以拯救我们大家的巨大成就！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